欣赏鉴 西方哲理精译文丛

19

〔法〕 西蒙·波伏娃／著

李 强／选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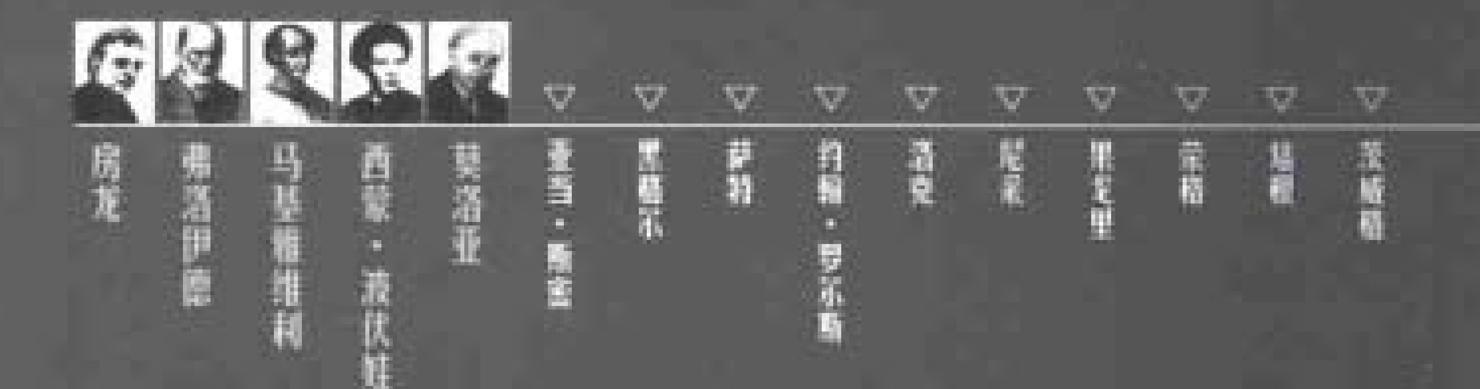
第二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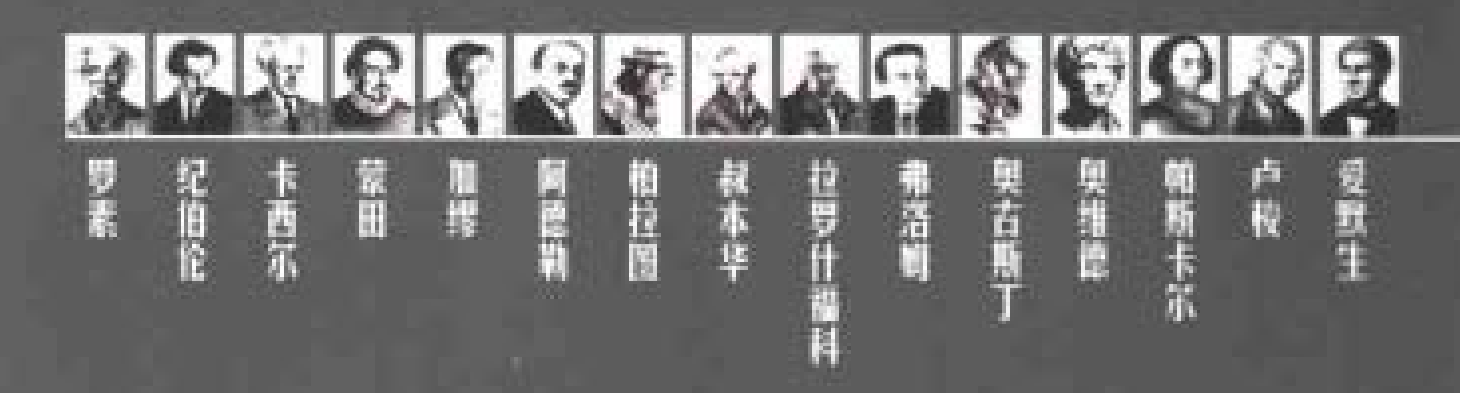
精神分析学的女性观
游牧部落中的女人
农业社会早期的女人
梦想、恐惧与崇拜对象
五位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
神话与现实
性觉醒
交际女性
女人的处境与特质
自恋
情妇
独立的女人

The Second Sex

Simone de Beauvoir

西苑出版社


房龙
弗洛伊德
马基雅维利
西蒙·波伏娃
莫洛亚
黑格尔
萨特
约翰·罗尔斯
洛克
尼采
荣格
茨威格


罗素
纪伯伦
卡西尔
蒙田
加缪
阿德勒
柏拉图
叔本华
拉罗什福科
弗洛姆
奥古斯丁
奥维德
帕斯卡尔
卢梭
爱默生


ISBN 7-80108-845-X
9 787801 088451 >
定价：19.50 元

欣赏鉴 西方新潮精译文丛

19

〔法〕 西蒙·波伏娃／著

李 强／选译



第二性

精神分析学的女性观
游牧部落中的女人
农业社会早期的女人
梦想、恐惧与崇拜对象
五位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
神话与现实
性觉醒
交际女性
女人的处境与特质
自恋
情妇
独立的女人

The Second Sex

Simone de Beauvoir

*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二性/（法）西蒙·波伏娃著；李强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2004.5

（西方哲理精译文丛）

ISBN 7-80108-845-X

Ⅰ.第… Ⅱ.①西… ②李… Ⅲ.妇女-问题-研究 Ⅳ.D44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9720 号

第二性

著　　者 [法]西蒙·波伏娃
译　　者 李　强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039
电话 68214971　传真 6824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aaa@xycbs.com
印　　刷 北京科普瑞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167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08-845-X / D·121

定价：19.50 元

（凡西苑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Simon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H. M. Parshle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译序

很少有女性能像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ior，1908—1986）那样，在如此多的领域取得辉煌的成就，赢得显赫的声誉：存在主义的发起者之一，女权主义运动最早的权威理论家，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圣西门式的传记作家，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激进左派，离经叛道的女才子……她天资聪颖，意志坚强，在十九岁的时候，她就发表了一项个人"独立宣言"，宣称"我绝不让我的生命屈从于他人的意志"。她和存在主义哲学家让·保罗·萨特亲密生活了半个多世纪，虽然没有结婚，却相伴一生，成为一段佳话。作为当代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她本身的经历已经成为一种化身，象征着即便是身为一个女人，也可以突破所有的限制，置社会习俗和偏见于脑后，按照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度过精彩的一生。

西蒙·波伏娃的才华令法国先后两位总统为之倾倒，前总统密特朗赞誉其为：法国和全世界最杰出的作家。现总统希拉克曾在一次演讲中宣称："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有地位的作家。"

《第二性》是使波伏娃获得世界声誉的代表作。一个最著

名、也是最恰当的评语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还被誉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在这部最全面的展示波伏娃才华的巨著中，她以百科全书式的广博学识、严肃的态度、大胆的笔触，在上卷中俯瞰了从原始社会到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西方妇女处境、地位和权利的演变和有关女性的种种神话，说明了女性并非是天生比男人低劣的第二性，以及女人如何变成了永恒的弱者；下卷中更以敏锐和深刻的洞察力，揭示了女性从童年到老年的整个个体发展史的性格差异，现代女性所面临的艰难的人生抉择和复杂的社会问题，指出她们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观、爱情观和家庭观。《第二性》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古代神话和民俗学等诸多领域，成为一部纵观整个女性的历史和世界的百科全书。1949 年在法国出版之后，立即引起轰动，1952 年译为英文，在美国也多次再版，成为美国年度畅销书之一。20 世纪 80 年代中文版本一出，《第二性——女人》也成了那个时代大学校园中女生的必读书。西蒙·波伏娃以此书一跃成为国际思想界的巨星。但与此同时，《第二性》也饱受非议，"色情狂"、"性冷淡"、"淫妇"、"慕男狂病人"、"女同性恋者"的恶毒攻击也不绝于耳，但是，这一切不能阻止她——西蒙·波伏娃将自身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典范，不加粉饰和修改地奉献出自己的观点。



《第二性》无愧于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全书规模宏大，内容庞杂，有的地方过于艰深晦涩，一般的读者很难通读全书，我们将全书的精华之处加以采撷，奉献给读者，相信通过这个选译本，已经足够反映《第二性》的主要的观点和文采，让读者领略到西蒙·波伏娃的卓越的才华和卓立不群的思想观点，以及对女性命运和未来的远见卓识。

囿于译者的水平，如果在译文中出观翻译的错误，敬请广大读者能够提出批评指正。

译　者

2003年7月



目录



第四部　女性的形成

第五部　处　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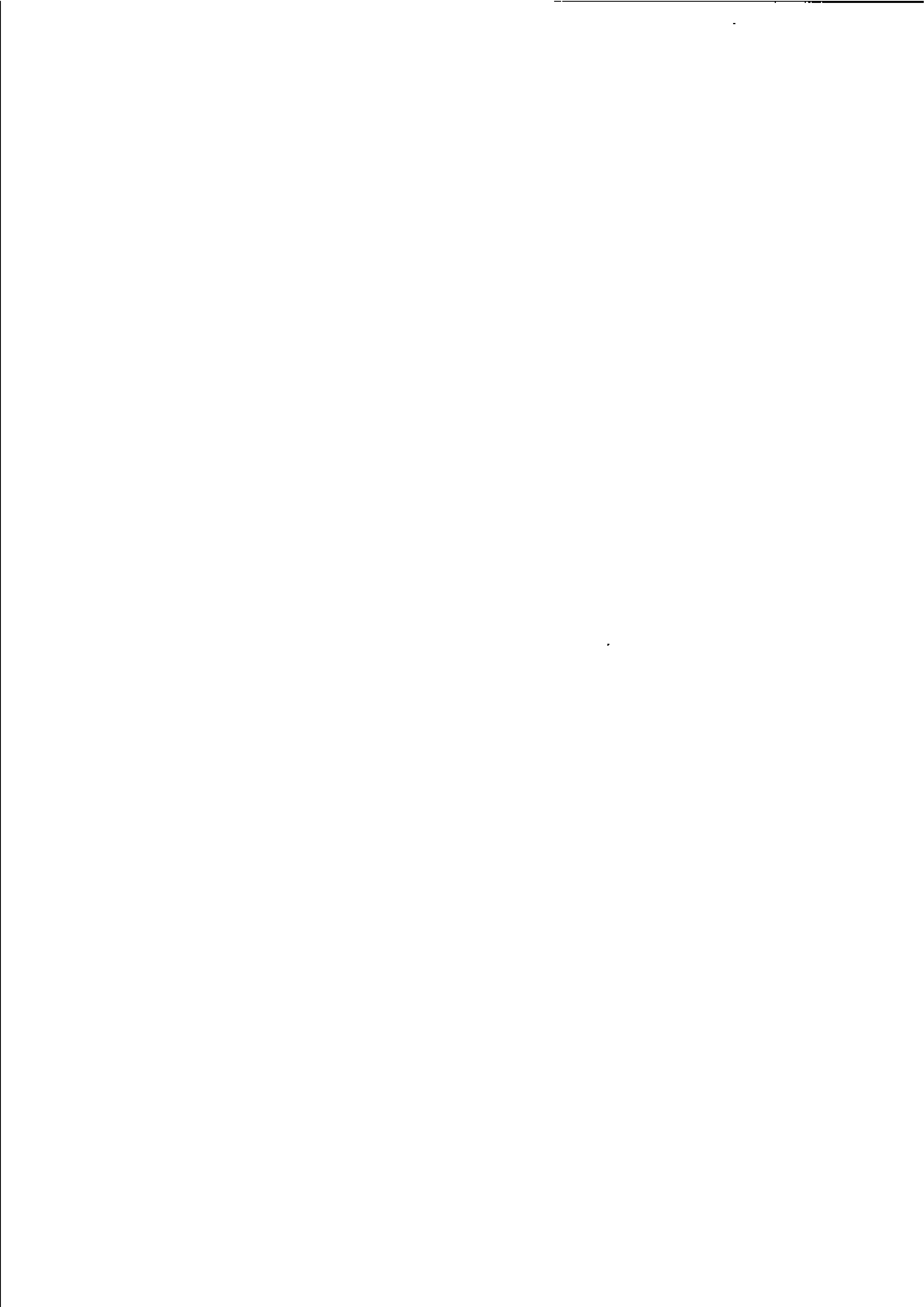


第六部　生存辩护

第七部　解放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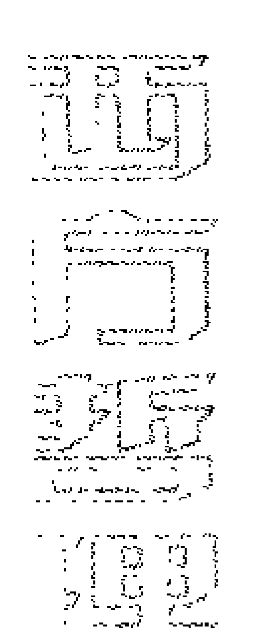
第一部　现实与神话



第一章　动物交配：生物学依据

女人？简单！喜欢下定义的人说：女人就意味着子宫和卵巢，用“雌的”这个词来定义女人就足矣了。当男人说出“雌的”这个词的时候，往往具有侮辱的含义，但他们并不会由于自己的这种动物性而感到丝毫的羞耻。相反，若是有人形容他：“真是个雄的（male）”，他却会以此为荣。“雌”这个字具有贬义性质的原因，并非是由于它突出了女人的动物性，而是由于它将她囚禁在性别的牢笼中。男人认为“雌的”即使用在沉默的无害动物身上，也是危险和卑劣的，这显然是女人引起了敌意的联想。甚至他还从生物学角度为这一观点找出论据并浮想联翩：敏捷的精子被淹没在硕大的卵子里；不可一世的白蚁王后役使着雄性的工蚁；雌螳螂和母蜘蛛已厌烦了爱情，于是咬碎吞下了自己的丈夫；发情的母狗带着骚味满街乱跑；母猴不知羞耻地露出臀部，摇摆地往前走；即使令人生畏的母虎、母豹、母狮，交配时也在雄性如同帝王的身体之下，像个奴隶。雌性是慵懒的、狡猾的、热切的、愚不可及的、无情的、残酷的、卑贱的，男人将这一切统统加在女人身上。

柏拉图说过，最初每个人都有两张面孔、四条胳膊、四条腿和两个连在一起的躯干。他们在某个时候被神灵劈



成两半，从此以后其中的一半总希望能够找到另一半并重新与之结合在一起。后来众神把各不相同的两半判为夫妻，繁衍后代。然而这个故事仅仅解释了爱情，但最早期的两性分化却是特定的。因而圣·托马斯[①]把女人称为“从属的”人，事实上这就是以男性本位作为了出发点，利用某种形式来暗杀了两性存在的意外和偶然。

人对两性的功能有着千奇百怪的理论。最初，没有科

学依据来证明这些理论，它们所反映的仅仅是某种社会神话。父亲与怀孕无关，这种想法有久远的历史——某些原始的母系社会就一直有这样的观念。伴随父权社会的出现，男性极力想获得控制和拥有后代的权力。于是一种新的理论创造出来：承认母亲在生育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他们承认的仅仅是她携带并培育了由父亲独自创造出的精子。

直到今天，人们才注意到某些科学家研究的反向趋向。在单性生殖实验中发现，精子的功能可以转化为一个单纯的物理化学反应物。有实验表明，在某些物种中，酸甚至用针刺一下，便可以引起卵子的分裂并促使胚胎发育。有人因此大胆假设，认为雄性物质（精子）如同醇素，对生殖并无多大作用，甚至假设有一天毋需雄性即可生殖——这种推理似乎就像许多女人所祈祷的那样。然而这种推论过于大胆，尚无任何生命过程能证明这一假设。有性生殖并不应先入为主地被认为是主要的生命形式，但事实上也可以毫无证据地说，它的重要性可以被低估。

---

① St. Thomas，1225—1274年，意大利神学家，最为伟大的基督教经院哲学家，著有《异教徒驳议辑要》。

现在人们已经清楚，后代的性别由受精时的染色体结构决定。在哺乳动物中，精子造成了这些结果。两种数量相等的精子，一种含有X染色体（卵子也都含有这种染色体），另一种含有Y染色体（这种染色体是卵子所没有的）。除了这两种染色体以外，卵子与精子里均含有另一组相同数量的染色体。当卵子受精与精子结合时，形成的受精卵就含有两组完整的染色体，于是形成了该物种的遗传特性——例如人有48个染色体[①]。如果由携带X染色体的精子完成受精，受精卵就会含有两个X染色体，便会发育成为女性（XX）。如果是带有Y染色体的精子使卵子受精，受精卵只含有一个X染色体，便会发育成男性（XY）。鸟类和蝴蝶的情况与人类恰恰相反，但其确定性别的原理却是一样，即含有X染色体或Y染色体的卵子决定后代的性别。在遗传学上，孟德尔[②]定律表明父母起着同样作用——染色体包含的遗传基因被同样地传到受精卵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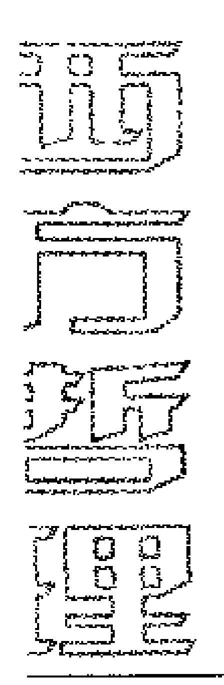
三姐妹

帕尔马·伊尔·韦基奥　约1480－1528年　意大利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两种因子并无优劣之别；它们一旦结合就会使其个体性在受精卵中荡然无存了。有两种常见的假说（在基础生物学意义上）存在着明显谬误。第一种是雌性被动说，这已被新生命源于两种因子结合这一事实所推翻，生命的火种不是一方的私人财产。卵子的细胞

① 原文有误，人的染色体实际有23对46个。——译者注

② Mendel，1822—1884年，现代遗传学之父，奥地利遗传学家。



核，是与精子细胞核严格对称的生命活动之源。第二种错误假说与第一种恰好相反，它并不否认两种遗传因子共存，但却认为雌性本原保持了物种延续，而雄性本原转瞬即逝。事实上，胚胎使父母的因子均得以延续，并按照雄性或雌性的形态将其传给了后代。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雌雄同体的因子，它生存的时间比雄性个体或雌性个体都要长，这些个体生出的后代都有这种遗传因子的作用。

由此得出结论，两种因子本质的作用相同：它们共同创造出生命。在新的生命体中，它们都丧失了自我，但又超越了自我。在受精现象的背后，由雄性因素提供了产生新生命的机会，而雌性因素为这个新生命创造了一个稳定的环境。

但由此来断定女人的位置在家里，未免太牵强附会了——可是就有这种穿凿附会之人。艾尔弗雷德·福尔叶[①]在其所写的《体质与性格》一书中，就以卵子来类比女人，以精子来类比男人。而许多貌似复杂的理论都建筑在这种可疑的类比推理之上，以含混的概念模糊了自然哲学与遗传科学的界限。因为从遗传定律来说，男人和女人都是由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只能说，在这些含糊的见解中仍然存在着中世纪哲学的幽灵，这种哲学宣扬宏观宇宙是微观宇宙具体而微的反映——卵子被描绘成一个小女性，而女人则被描绘成一个巨大的卵子。这些自炼金术士时代以来就被抛弃的奇谈怪论，与现代科学的精确性形成了鲜明对照。因此现代生物学同中世纪的象征理论格格不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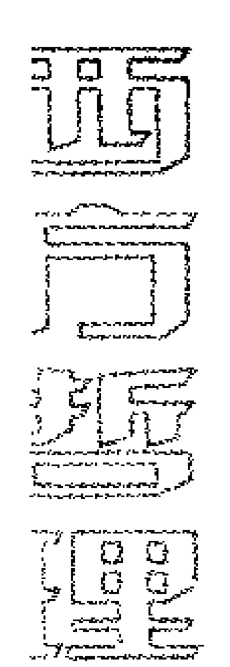
① Alfred Fouillee，1838—1912 年，法国哲学和社会学家，主张以柏拉图为出发点的进化论唯心主义。

然而社会学家对此视而不见。坦白地说，从卵子到女人是一个漫长的历程。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雌性的概念是以未受精的卵子来定义的。

要得到一个精确而普遍适用的雌性定义极为困难。将卵子的携带者定义为雌性，将精子的携带者定义为雄性，这种说法只能把问题简单化。实践证明，有机体与其生殖腺的机制极其复杂。有人认为，卵子体积庞大，要比精子消耗更多的生命能，但精子的数量大得惊人，所以两性消耗的能量差别不大。有人将精子的生成视做浪费，而卵子则被视为节约的典范。实际上卵子也浪费很大，因为极大多数的卵子没有受精的机会。微观世界的生命因子和生殖腺无法代表整个有机体，而我们要考察的就是整个有机体。

雌性被母性所支配，而雄性则掌握着性的支配权，可以说雌性是物种的牺牲品。在一年的某个固定时段，雌性的整个生命都由性周期（发情期）支配。性周期的持续时间及其规律因物种而异。性周期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卵子（其数量随物种而异）发育成熟，子宫内膜层变厚，内膜血管充血扩张；第二阶段是（若未受精）卵子衰亡，子宫内膜破裂，内膜随血流从体内排出，流血期很短。这就是女人和某些哺乳动物的月经。如果发生受精，第二阶段就是怀孕期了。排卵期（第一阶段）可以称为“发情期”，它和动情、发情及性活动的周期一致。

雌性哺乳动物的发情是被动的，目的在于等待雄性莅临。与某些鸟类发生的情况相同，哺乳动物的雌性也会引诱雄性，但充其量是用叫春、炫耀和作出猥亵姿势等方式来吸引雄性。它们不可能逼迫雄性性交，主动权操纵在雄性手中。可以看到，连昆虫也常常是雄性在受精时处于主动地位，特别是鸟类和哺乳动物，雄性强压在雌性身体上，而雌性则是被迫屈从，甚至反抗雄性。



不管雌性是自愿的还是被引诱的，无疑都是雄性占有着雌性，而雌性则被占有。“占有”这个词相当准确，因为无论用生殖器或是凭借优势力量，雄性都可以捕获雌性，强迫它就范，然后与其性交。对于昆虫、鸟类和哺乳动物，雄性的性器官插入雌性体内，这种插入侵害了雌性的身体内部。雌性如同一个封闭物，突然被插入了。雄性并没有侵犯物种，因为物种只有不断繁衍才能延续，否则

就会消亡。但是，雌性为了保护卵子，将它紧紧密闭在体内；而它的身体既保护了卵子，同时也抵抗着雄性的授精。所以，它的身体变成了必须穿透的屏障，而雄性也在进入时体现了支配权。

从性交时的体位上可以看出雄性的支配权，几乎所有的动物交配时雄性都位于雌性之上。雄性性器官是一个物体，但在这时生机勃发——它是个工具，而雌性性器官在交配时更具有容器的性质。雄性射出精子，雌性接受精子。所以虽然雌性在生育中起着关键作用，然而交配本身却是被动的。性交破坏了它的个体性，以插入和体内受孕的方式导人了一种异己的成分。或许它的发情出于本能需求，它发情时到处寻找雄性，然而性行为仍被它视为内部事件，并非视为与外界及同类的外部联系。

雄性能够自由地表现它的力量，物种的能量与它的生命主动性完全融为一体。相反，雌性的个体性同物种的利益是矛盾的，仿佛它被外力强行占有，被异化。因此机体的生物形态越高级，两性个体化的明显差别越大。雄性可以运用越来越多的形式，利用它的支配力量；雌性则越来越强烈地感到自己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它本身的利益同生殖繁衍的冲突越来越大。母牛和母马分娩时比老鼠和兔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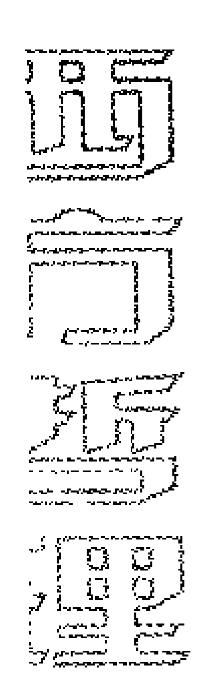
分娩时更加痛苦、更加危险。女人是雌性中个体化程度最高的，她的生育可能是最为脆弱、最易被支配的：她在完成生命的使命时最富戏剧性，与雄性之间的差别也最大。

男性的发育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从出生到青春期，他的发育是有规律可寻的。十五六岁时精子开始形成并一直持续到老年。伴随精子出现，荷尔蒙也开始产生，形成了男性性征。此后，男性的性生活一般同他的个体生存状态相一致：他的性冲动和性行为，他对物种的超越和他的主观性完全一致——他就是他的肉体的反映。

但女人的发育要复杂得多。早在胚胎时期，就已确立了卵母细胞的数量，大约有 4 万个不成熟卵子存在于卵巢内，所有卵子都在卵泡之中，最终能够发育成熟的大约只有 400 个。从出生时开始，物种就已限定了女人的命运，而且这种规限会轻而易举地增强。女人在降生以后，由于卵母细胞突然增大，经历了最初的青春期，然后卵巢开始缩小，直到原来的 1/ 5 为止。尽管她的身体在发育，但她的生殖系统却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有些卵泡虽然在膨胀变大，但并未成熟。小女孩和小男孩的发育过程基本相似。相同年龄下，女孩可能会比男孩长得更高更重。但到了青春期，物种重新支配了她的身体。在卵巢激素的作用下，正在发育的卵泡开始增多，有更多的血液容纳在卵巢里，从而使它变得更大，当某个卵泡终于成熟后，于是就出现了第一次月经。生殖系统的大小和形状开始固定，身体也具有了女性的曲线，同时内分泌平衡也确定下来。


西蒙·波伏娃/

除了第一性征，女人还有多种第二性征，它们或多或少的都是第一性征的结果并借助荷尔蒙的作用而直接产生。一般说来，女人比男人矮，体重较轻，骨骼较为纤细，骨盆较大，以适应怀孕和分娩的需要。女人的结缔组织存有脂肪，所以她的体形比男人更为丰满。另外，男女的外貌，如体格、皮肤和毛发，也存在显著不同。女性的



肌肉力量小很多，大约只有男性的2/3。她的肺活量和喉咙比较小，所以女性的声音比较尖细。女人的血液比重小，血液中血红蛋白的含量较少，因此她的身体会比男人虚弱一些，较容易罹患贫血。女人的脉搏跳动较快，血管系统相对稳定性要差一些，导致她随时都会脸红。不稳定性是女人生理组织最为明显的特征。另外，男人在钙代谢方面的稳定性也较高，而女人只能维持很少的钙，并且还

有大量的钙会在经期和孕期流失。可能卵巢对钙也起到分解代谢作用，因而这种不稳定性会给卵巢和甲状腺带来问题。女人的甲状腺比男人发达，而内分泌紊乱影响了交感神经，所以对神经与肌肉的控制发生失调。这种不稳定性与缺乏控制是女性唯情论的基础，它和循环系统的不稳定，如心悸和脸红等有密切关系，所以女人容易激动，如哭泣、歇斯底里地狂笑或神经过敏等。

很明显，女人对物种的从属性是这些特征的源泉，由此可以得出极为惊人的结论：即所有的雌性哺乳动物中，女人被异化的程度是最深的（她的个体性成为外部力量的牺牲品），同时她也最为激烈地反抗这一异化。而其他的雌性的生殖机能对机体的奴役并不如此强大。这样一来就要令她们难以接受。青春期的危机，每月都有的“隐忧”，长期的、经常的困难的妊娠，痛苦的甚至是危险的分娩，疾病与意外病症以及并发症——所有这些都是女人的命运。无疑，她的命运比其他雌性动物的命运更严峻，因此她对其个体性的捍卫也更加坚决。相比之下，男人似乎获得了无限的垂青：他的性生活同他身为人的生存状态并无矛盾，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他的生命历程相当稳定，没有危机，通常也没有灾难。女人的平均寿命和男人一样

长、有时更长一点，但她们多灾多难，时常身不由己。

生物学上的这些因素不可忽视。它们在女人生命历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也是形成其处境的一个基本方面。我们深入探讨，应自始至终都牢记这些因素。这是由于我们通过身体来认识世界，生理的差异使得我们对世界的认知也截然不同。这就是我们对生物学事实进行详细论证的根由——这些事实是认识女人的一个关键点。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事实注定将带给女人一个无法逃避的命运。以这些事实确立两性等级制度是不充分的，也不能够解释女人是第二性的原因，更不能够宣判她永远处于这一地位。

我们必须从本体论、经济学、社会学及心理学等方面全方位考察生物学事实。物种对女性的奴役以及对她的各种能力的制约，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实。女人的身体是限定她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她的身体不能充分地解释为何她是女人。生物学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女人为什么是第二性？我们的任务是发现女人的本性在整个历史过程中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人类是如何对待女性的。

第二章　性中心说：精神分析学的女性观

精神分析学对心理生理学的重要启示是，它认为各种因素只有在人的层面上介人心理生活才具有实质意义。存在的事实并非生物学家所说的生物客体——身体，而是主体借以生活的活生生的肉体。女人是雌的，某种程度上连她自己也这样想。生物学上的主要特征并非她生存处境的一部分。这样，卵子的结构没有在此得以体现；相反，生物学上并不重要的器官，如阴蒂，却起着首要的作用。本性其实没有限制女人，而是她在自己的情感生活中，为了自身利益同本性交流时，限定了她自己。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就以这种观点为基石，对此我无意全面评价，仅想探讨它在妇女研究中的作用。讨论精神分析学实际上决非轻而易举的事。与所有的宗教，诸如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一样，它在严格的概念中体现出一种令人尴尬的灵活性。它的理论术语，有时指向极其严格的具体含义，如“男性生殖器”就完全指代着男性的那个突出的肉质部分；有时，这些术语的含义又无限延伸并具有了象征的意义，这时“男性生殖器”又表示男性的全部特征与生存处境。如果你对这一学说的表面含义提出诘难，精神分析学家就会抗议说你扭曲了它的精神；如果你认同它的精神，他马上又提醒你应注意它的具体含义。

弗洛伊德对女人的命运从未特别关注。无疑，他仅仅把那些关于男人命运的描述稍加改动，就变成了描述女人的命运。性学家玛拉农[1]认为，“作为繁衍的能量，我们认为利比多是一种力量，它具有男性的特征。对于性高潮，我们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他看来，达到性高潮的女人已被“男性化”。性冲动是一条道路，而女人只是处在这条路的中途部分。弗洛伊德的观点倒并不这么极端，他承认女人的性欲和男人发展得同样完整，但他没有去专门研究这一问题。他说：“利比多实质上经常地、有规律地以男性方式体现，不管它是在男人还是女人体内出现都是如此。”他不相信女性的利比多具有自己的特性，在他看来，所谓女性利比多的特性是对人的一般利比多的某种复杂的偏离。他相信，发育过程一开始对于男女两性并无不同——每个婴儿必先经过依恋母亲乳房的口腔期，再经过肛门期，最后是生殖器期。在生殖器期，两性才开始有了差异。

弗洛伊德揭示了一个重要性被低估了的事实，即男性性冲动集中于阴茎，而女性却有两个差别明显的性冲动器官：一个是阴蒂，它在童年期发育起来；另一个是阴道，它发育于青春期以后。男孩子一旦进人生殖器期，他的发育过程就算完成了，但他必须经历从自体性满足倾向到异体性满足倾向的过渡。在自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在自身完成；而在异体性满足倾向当中，快感同一个客体——通常情况下是同女人紧密联系的。男性的这种转变在青春期要经过自恋阶段之后完成。与童年相同的是，阴茎仍然是性冲动的主要器官。女性的利比多也要经过自恋期，它一开始就是客体的，一般指向男人。但这一过程相对更为

---

[1] Gregorio Maranon，1888—1960年，西班牙内科医生，人类学家，著有《人类的性与性交阶段的进化》。



沐浴少女

贝尔纳迪诺·伦尼 约 1480－1532 年 意大利

复杂，因为女人必须经历阴蒂快感向阴道快感的过渡。对男人来说生殖器期只有一个，而女人却有两个。她的风险系数要大得多，因为她的性发育如果未能最终完成，便会一直处于幼年阶段，她的神经质会十分严重。

阿德勒[①]不同意弗洛伊德的观点，因为他发现只以性欲去解释人的行为的理论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在他看来，性欲与人的全部意志结为一体。而弗洛伊德则认为，人的所有行为似乎都是欲望的结果，即都是为了寻求快感。但阿德勒认为，人有自己的目的，他运用动机、目的和计划来取代性冲动，将智力因素放在首位。而性在其理论中往往仅有象征意义。根据他的理论体系，人生戏剧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每一个人都有追求权力的倾向，但它又与自卑情结纠缠在一起，由此引发心理冲突，使个人在逃避现实（他担心自己也许无法应付的现实）的过程中彷徨失措。主体从他臆想中的社会现实中脱离出来，因而会患有社会心理失调的精神病。女人的自卑情结，是她表现出的对她的女性气质感到自卑并加以反抗的方式。引起这种情结的，与其说是缺失阴茎，毋宁说是女人的全部生存处境。即使小女孩非常妒嫉小男孩的阴茎，那也是把它看成男孩子拥有特殊力量的象征。父亲在家庭的主宰地位，男人的各种优势，她自己被灌输的教育——所有事情都让她确信男性才是优越的。后来，她在做爱时又感到了新的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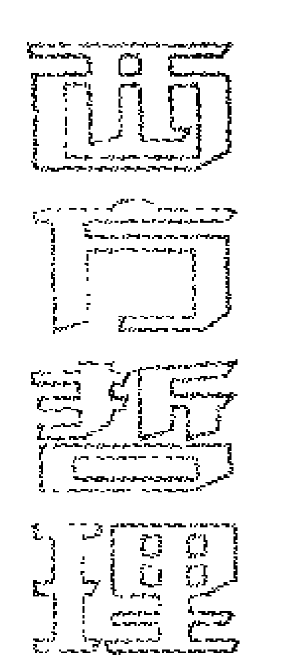
① Alfred Adler，1870—1937 年，奥地利精神学家，个体心理学创始人。

辱，因为做爱时女人通常在男人的下面。于是她以“男性化抗议”的方式进行反抗：她或者努力使自己男性化，或用女性的武器向男性挑战。直到成为母亲以后，她在孩子身上找到和阴茎对等的东西。但这就意味着，她终于彻底接受女人角色，承认自己的劣等性，她的内心斗争远比男性剧烈。

我无意对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分歧详加评论。客观地说，性冲动或者动机的解释都不全面，因为每一种冲动都会产生动机，每一种动机又要根据冲动来解释。把弗洛伊德与阿德勒各自的观点加以综合概括也许更加合理。阿德勒在引入目标和终极性等概念时，仍把精神分析学作为其理论的一个构成部分。当涉及动力与机制两者的关系时，他与弗洛伊德意见一致：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坚信一个无须证明的命题——人类的历史应当运用各种决定性因素的共同作用来解释，而所有的精神分析学家都为女性指派了同一种命运。她的人生被演绎为她的“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的对立。第一种倾向表现为阴蒂性冲动，第二种倾向则表现为阴道性冲动。孩提时代，她认为自己同父亲是相同的，后来她产生了由男性而来的自卑感，从而面临尴尬境地——或者坚持她的独立性，从而变得男性化（由于潜在的自卑情结，这会导致患有精神病的危险），或者通过顺从的性爱得到幸福。这种解决办法是由她对掌握支配权的父亲的爱所决定的。他才是她要寻找的情人或丈夫，于是她的性爱同想被力量支配的欲望交织在一起。她做了母亲之后，会摆脱这种困境，因为母性会带给她新的独立性。由此，这场戏便有了自身的冲突和动力，通过各种被扭曲的事实，按照它既定的航线前进，每个女人都身陷其中不能自主。


西蒙·波伏娃/著

性在人类生活中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它贯穿整个生命。从生理学来看，睾丸和卵巢的生命活动同整个身体的



生命活动是不可分离的。有生命的人拥有一个有性欲、可性交的躯体，因此他与另外一个具有可性交身体的有生命的人的关系始终和性相关。但如果身体和性是生存的本能，这就涉及到能否发现它们的含义的问题。由于漠视这个问题，精神分析学家们才将必须加以解释的事实看做天经地义的。例如，有人说小女孩对裸露着臀部蹲着小便感到害羞——但她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同样，在问及男性是

否对他的阴茎感到自豪，或他的自豪是否表现在他的阴茎上等等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知道自豪是什么，以及主体的欲望为何会在一个客体上得以体现。没有必要把性当做所有问题的挡箭牌，因为活着的人有更为基本的“生存要求”，但性仅仅是它的一个方面而已。

用女人自身的女性意识来解释女人，并不比用“雌性”来形容她更令人满意。因为她本身就处于社会的大环境中（她就是社会的一员），而且被灌输了这种意识。精神分析学的论调把潜意识和全部心理活动都内在化了，它意味着人生是在心理内部展开的——如情结、倾向等这类术语就是为此而设的。然而生命与世界紧密相连，个人通过周围的世界来确定自身的抉择。为了找到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面对世界。精神分析学尤其没有说明女人为什么是第二性。弗洛伊德本人认为可以用主权来解释阴茎的权威，可是他又表明他并不清楚男性霸权的起源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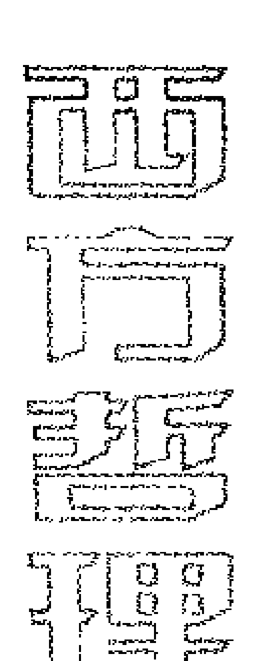
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去考察女性命运：把女人放在价值领域，赋予她的行为以自由。我相信，她能够在坚持超越和被异化为客体之间进行选择。她不是相互冲突的动力的牺牲品，她会根据道德法则找到各种排列组合的途径。

精神分析学以权威取代价值，以动力取代选择，为道德提供了一种人为的替代物，这就是所谓的“正常”。“正常”这个概念对治疗当然是有用的，但它被精神分析学泛化到令人不安的程度。这种描述公式被认定为准则。准确地说，它所能说明的是更少而决非更多的东西，它可以容忍修正，而并非创造。他们诠释个体时，总是在个体同过去的联系寻找根源，而不是根据其计划指向未来的目标。所以，精神分析学家们提供给我们的只是一幅虚假的图像，几乎没有为它提供任何与正常有别的标准。他们对女性命运的描述十分简单粗略。在精神分析学家看来，相信自己同母亲或父亲“一致”，这就意味着在根据某种原型异化自身，就是更喜欢一个外来形象，而不是更喜欢对自己生存的不自觉表现，就是虚假存在。这一理论中的女性，被两种异化方式诱惑——装成男人是她失败的根源，可装成女人也意味欺骗。做女人就将要成为客体和他者。不过，她的顺从仍然以他者为主体。

实际上，以男性的观点（它同时被男性和女性精神分析学家们所运用）衡量，被异化的行为就是女性化的，主体追求超越的行为则是男性化的。妇女史学家唐纳德森[①]说过，“男人是雄性人，女人是雌性人”。定义的含义实际上是一种不对称的歧视。在精神分析学家们看来，就是把男人确定为人，把女人确定为雌性，每当她的行为像一个人时就被认定是在模仿男性。精神分析学家们把女孩和少女说成是她们急于想认同父母，她们在“男性化”和“女性化”这两种倾向之间摇摆不定。我却相信，她们在所赋予她们的客体即他者角色和坚持自由的选择中进退维谷。所以，我们将会认同某些事实，特别是在我们就要研究展现在妇女面前的不真实的逃避途径时；但我们赋予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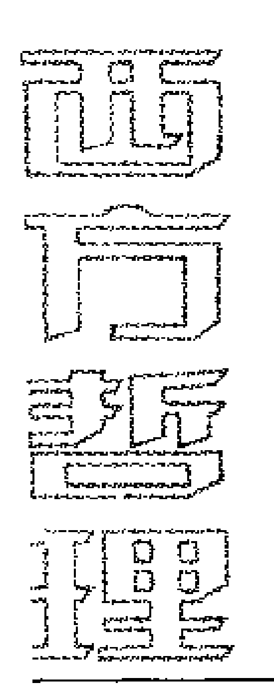
① Donaldson，1831—1915年，苏格兰教育学家。



些事实的意义，同弗洛伊德或阿德勒所定义的完全不同。对我们来说，把女人定义为人，是为了在外部世界，为了在人们必须了解的经济与社会结构的世界探索其价值。我们将以存在主义理论来探讨女人，对她们的全部生存处境给予足够的重视。

第三章　经济中心说：历史唯物主义的女性观

历史唯物主义发现了某些非常重要的真理：人类并非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人类社会是一种超越自然的客体——在某种意义上与自然对立。确切地说，它不是被动地服从自然世界，而是以本身的意志代替了自然的支配权。这种超越本身的行为不是依靠主观愿望，它是以实践活动客观地完成的。之所以不能单纯地把女性看成是性的有机体，是因为在生物学的特性中，只有那些能体现出其实际价值的性质才最为重要。女人的自我意识不是取决于她的性征，它实际上取决于社会经济环境，这一环境又反映了人类所达到的技术发展水平。从生物学上来看，女人具备以下两个主要特性：对世界掌握的广度不及男人，物种繁衍的压迫程度更深。在人类历史上，征服世界从来没有纯粹依靠赤手空拳：五指的进化已经在表明用来增强力量的工具将要诞生。从史前化石可以发现，人一开始就用工具武装自己。在手持大棒捕捉掉进陷阱里的野兽的时代，女人娇弱的身体无疑成为她显著的劣势——她会对稍稍超过她的使用能力一点的工具无能为力。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男女体力的差距变得无足轻重。只有特殊情况下，更强的体力才会显示出优越性，体力超强并不优于适度体力，因为对现代机器的操纵仅需少许体力。若是其所



需要的最低限度没有超出女性的能力，就此项劳动而论，女人和男人就在同一起跑线上。

恩格斯以此为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追溯了女性的历史。他指出，妇女的历史主要取决于技术发展史。石器时代，土地为氏族全体成员所有，原始的农业工具落后制约了农业潜力的发挥。这时，女人的体力完全适应家庭种植业。在这种原始劳动分工中，在某种程



度上两性构成两个阶级，这两者是平等的。男人狩猎和捕鱼，女人留在家里从事制陶、编织和家庭种植之类的劳动，女人在这一时期的经济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随着铜、锡、青铜和铁的发现以及犁的出现，农业领域扩大，垦荒和耕作需要采用集约劳动。于是男人便使用其他男人的劳动，一部分男性就这样成为奴隶。私有制出现了：男人成为奴隶或土地的主人，也成为女人的主人。这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可以归结为旧的劳动分工瓦解，而这种瓦解是劳动工具进步的结果。“从前保证妇女在家庭中占统治地位的同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庭劳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失去了意义——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于是母权被父权取代，财产根据父系传承，而不再由母亲传给她的氏族。因此，在私有制的基石上诞生了父权制家庭，在这样的家庭里，女人变成被征服者。成为主宰的男性沉湎欲海，放纵情欲，包括和女奴、妓女通奸，或是实行一夫多妻制。反过来，只要当地风俗默许，妻子就会以不忠进行反抗——婚姻以通奸的形式得以实现。这是女人反抗把她同奴隶一样关在家里的惟一办

法。女人如同被征服者的社会压迫是经济压迫引起的。除非男女两性在法律上规定享有平等权利，否则平等地位无从谈起。要获得这种政治权利，全体女性必须就业。“妇女的解放，只有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并使得家务劳动只占极少工夫的时候，才有可能。而这只有依靠现代大工业才能办到，现代大工业不但使得大量的妇女劳动，而且真正要求这样的劳动……”

女人的命运同社会主义的前途休戚相关，倍倍尔[①]在论述妇女的巨著中说过，“女人和无产者都在遭受蹂躏”。随着机器引发的社会革命，两者的命运都将伴随经济的发展而被解放。女性的问题可以归结为她的劳动能力问题。当技术与女人的能力相适应时女人获得权力，在失去利用技术的机会时权力就随之丧失了。在现代社会，女人再次获得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资本主义国家，古老的父权制依旧还有强大的阻力，仍在阻碍着完全平等的具体的实现。冲破这一阻力之时，便是男女平等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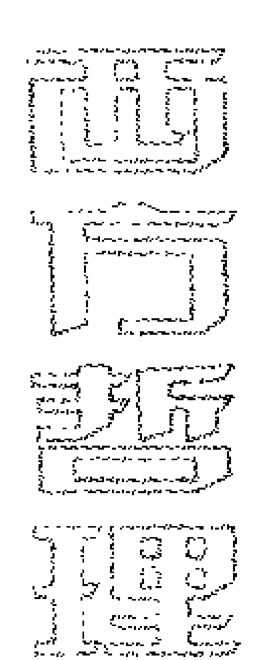


入睡的维纳斯

乔尔乔内　约1476－1510年　意大利　*落日余晖的映照下，梦乡中的全裸女神散发着青春和生命的活力。*

真正的社会主义伦理原则要求既要主持正义，又不能使自由被压制；既要让个人承担义务，又不能泯灭个性。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就会发现，妇女本身所提出的问题令它面临尴尬的处境：不可能将妊娠等同于一项任务，或者

① August Bebel，1840—1913年，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创始人之一，革命家。



类似服兵役这样的服务。要求女人生育给女人生活所带来的困扰，比改变公民职业所带来的困扰严重得多——没有哪个国家敢将性交作为公民义务。性行为和母亲的义务不仅关系到女人的时间和体力，而且还涉及她的基本价值。由于不可能把性本能以制度加以规范，理性的唯物主义枉费心机地想对性的这一问题故意不予理睬。

人们根本不可能直接迫使女人生孩子：可以做到的只

不过是规定了做母亲是她的惟一可能——法律或社会习俗迫使人们必须结婚，禁止节育和堕胎，禁止离婚。把女人单纯视为一种生产力是不可想像的，对于男人，她是性伴侣，是生殖者，一个他用以证明自己的他者。极权和独裁者不约而同然而又徒劳地去禁止精神分析学的传播，宣称个性的、个人的思想背离了忠实于个人服从于社会原则的公民们所确立的秩序。性体验就是这样一种体验：它的个性剥夺了它的共性。民主的社会主义以消灭阶级而不是消灭个人为目的，个人的命运问题最为重要，因此性差别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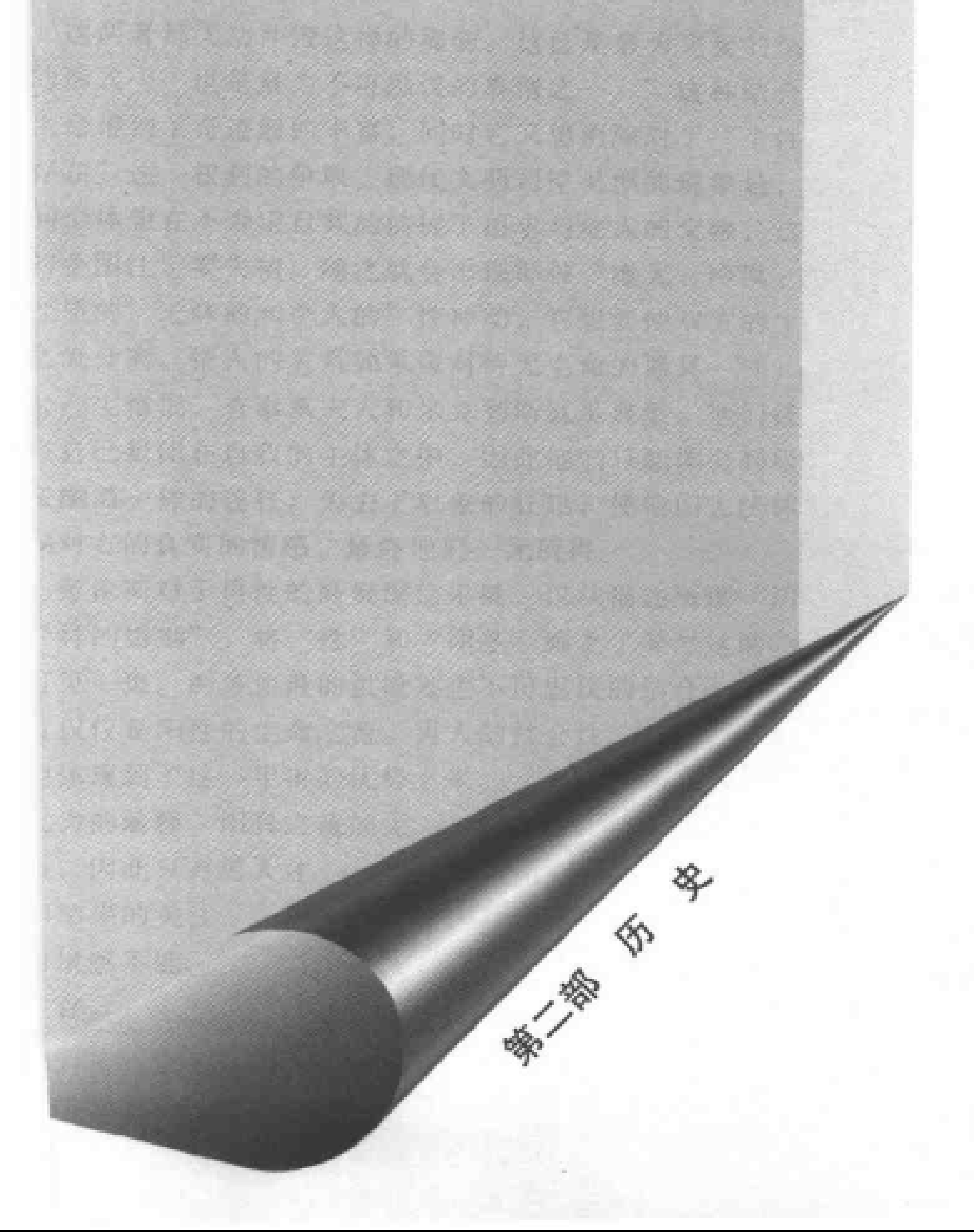
将女人与男人联系在一起的性关系，同男人提供给女人的那种关系并不相同。母亲同孩子连接的纽带，是一种特殊的、绝无仅有的纽带。女人并非用青铜工具创造的，所以靠机器无法将其消灭。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不放过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遇，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漠视她的特殊处境。要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跳出历史唯物主义的限制，因为它仅仅从经济角度看待男女两性。

同样的理由，我们既不认同弗洛伊德的性中心说，也不同意恩格斯的经济中心说。精神分析学家断定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可以用“男性化抗议”现象加以解

释。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女人的性欲只是她的经济处境的一种曲折复杂的反映。然而，“阴蒂”与“阴道”这些术语，和“资产者”与“无产者”等等术语一样，同样不能用来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性。惟有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不但是以全部个人的人生经历为基础，也是以人类经济史为基础。只有用它，才可以从整体上把握人的生命的特殊存在方式。弗洛伊德的正确之处在于证明了生存者即肉体的事实——作为一个与其他肉体相区别的肉体，生存者的感受具体体现了他的生存处境。与此相对应，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真理性在于，生存者生命本身的追求即依靠物质可能性特别是技术进步所提供的物质可能性，生存者制定的设计采取了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除非把这些愿望放人人的整个现实中考虑，否则仅仅使用性欲和技术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我们看到，弗洛伊德的超我的禁令与自我的动力仿佛都是与生俱来的，恩格斯对家庭史的论述中，最重要的发展好像都要用反复无常的神秘命运来解释。在试图探讨女性问题时，不可否认的是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成果，但只有从人的生存全方位考虑身体、性生活以及技术条件，对它来说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体力、阴茎和工具，它们的价值只有放在价值世界中进行评估；它的大小的确定，要由生存的人追求超越的基本目标来衡量。







第二部 历史



第四章 游牧部落中的女人

自始至终，这就是男人的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迄今为止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果我们以存在主义哲学来重新研究史前史和人种学的证据，就可以总结出男女两性等级制度建立的过程。前文已述，两种性别的人一起生活，每一种性别都想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如果两种性别的人都能够克制这种愿望，他们之间敌对和缓和的状态就会交替出现，相互间将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如果其中一方通过某种方法获得某种优势，那么这一性别就会压倒另一性别，令他（她）处于被役使状态。因此不难理解，男人希望能支配女人。但是，他用什么样的优势来实现自己这个愿望的呢？

人类学家对原始人类社会的解释矛盾百出，以至于用来解释的信息越多，信息越不系统，现象越令人迷惑不解。要得到女人在前农业社会时期处境的史料极为困难，甚至现在还不清楚，当时女人的肌肉组织或者呼吸器官是否像男人那样发育完善。她要从事艰辛的劳作，特别是要承担起做母亲的重负。最后一点意味深长，这很可能意味着，要是她被指派去完成母亲的使命，是因为男人为了抵御野兽或他人可能进行的袭击，掌控着随时跟踪反击的权力。男人的使命加倍危险，但也更加富有挑战性。情况也可能是，女人在多数情况下也是健壮坚强的，也可以参加

征战。从希罗多德的记叙以及他后来对达荷美女战士的描述中清晰地反映出，女人不但参加战斗，而且其勇猛残忍的程度不在男人之下。即使后一种情况属实，在用棍棒与野兽交战的时代，男人的体力优势极为明显。女人即使再强壮，在敌对的自然斗争的过程中，生殖的重负在任何情况下也都是一种可怕的负担。怀孕、分娩和月经让她们的劳动能力被削弱，为得到保护和食物，她们常常要完全依赖男性。因为无法实行节育措施，并且大自然为其他雌性哺乳动物提供了不孕期女性却没有获得，频繁怀孕无疑耗费了她们一大部分时间和体力，最终导致无力养活子女。这一基本事实可以推导出一系列结论：早期人类的生活极为艰难；从事采集、狩猎和捕鱼的人们拼命地劳作，得到的产品却十分匮乏；相对于群体获得的资源，出生的孩子过剩的情况极为明显。女人生育力显得过于旺盛，无法更多地参加能够增加生活资料的活动，由她而来的新需求，却又多得难以估量。尽管女人对种族的延续不可或缺，但她播撒生命时显得过于慷慨，导致男人不得不为保持生殖与生产的平衡疲于奔命。即使在人类十分需要生育和母性备受尊崇的母系时代，体力劳动也是真正最基本的需要，人们根本不会把女人当成头等大事。原始部落没有永久性的私产或领地，所以后代是无足轻重的，孩子对部落来说是一种累赘，绝非视如掌珠的财产。杀婴现象在游牧部落中非常普遍，那些幸免于难的婴儿，往往由于漠视和照料不周而死掉。



浴中的苏珊娜

丁托雷托　1518－1594年　意大利　*纯洁而充满活力的苏珊娜象征着贞洁，她与丑恶的长者形成了强烈的美与丑的对比。*

物种的重负，使得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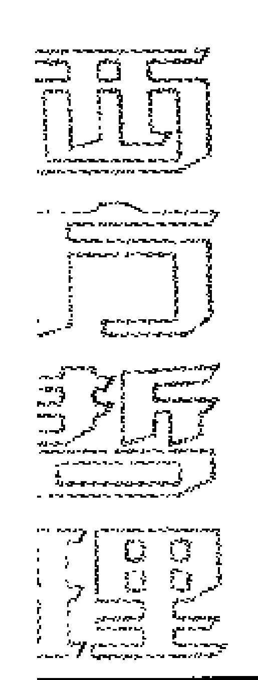
感觉实际上被某种神秘力量所摆布，根本无法体验创造生命的骄傲，而痛苦和折磨的怀孕分娩，成了一个令人厌倦而徒劳的偶发事件。在任何情况下，作为自然使命的分娩和哺乳都并非事先计划，都不是预先安排好的。女人无法从中找出高于生存的任何理由以获得生存正当性的证明——她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物种命运的支配。而家务劳动因为正好适合母性的天性，于是责无旁贷地由她来完成，这又让她陷人重复而内在性[1]的事务之中。家务劳动日复一日、几无变化地延续着，经过了多少个世纪依然如此。家务劳动没有发明。

男人的境遇则截然不同。他不是扮演工蜂的角色，他借助人类超越动物本能的创造来维持民族的生活，这本身已不仅仅是生物学的行为。他一开始就是发明者：为了自卫、捕获野兽和敲下果实而使用简单的棍棒，立刻成为他征服世界的最初工具。他必须将木头削成独木舟，去征服神秘莫测的水域，才能捕鱼回家；他要征服自然来获取财富。他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了目标，创造了达到目标的过程，从而验证了自身的力量，获得了作为创造者的成就感。他必须为了生存而突破束缚，创造未来，捕鱼与狩猎的神圣性就在于此。冒险的成功要用凯旋式和节日庆祝，社会由此对他作为人的地位予以确认。直到今天，当一座大坝、高楼或是核反应堆由他建成时，那种自豪依旧如故。他的劳动不仅仅是适应现有的世界，而且突破旧有的疆域，奠定崭新的未来。

早期男人的行动赋予它至高的光荣和尊严，获得这一荣誉通常是十分危险的。血液如果只是一种营养的液体，那么评价不过和牛奶差不多。但狩猎者要出生入死地同野



① immance，作者频繁使用这一术语，它代表着与超越性的对立或是对超越的否定，是对无创造性、重复的义务的狭窄范畴的限定。



兽搏斗。为了部落和氏族的利益，战士们将生死置之度外，借以证明生命并非男人的最高价值，而是应当为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的目的才被创造。带给女人最大的厄运是，战争这类事情让她走开，原因是男人高于动物之处并非创造生命，而是用生命赌博。这就是人类不认为分娩生命的性别具有优越性，而毁灭生命的性别却被认为具有优越性的原因。



由此我们便掌握了个中秘密的关键所在。从生物学来说，物种只有通过不断复制自身才能繁衍生存，但绝大多数生命创造的结果只不过是反复着相同的生命体。但是，男人在确保重复生命的同时，却又以存在超越了生命，并以这种超越创造了比纯粹重复生命的价值多得多的价值。在动物界，由于没有涉及思考，雄性活动的自由和多样性也就无从谈起。除了完成物种的使命，它的活动无关紧要。但人类中的雄性不但服务于物种，还为大地塑造了未来。他创新工具，他进行发明，他创造未来。在使自己成为主权者的同时，他也会得到作为伙伴的女人的支持。因为女人同样是生存者，也有超越的欲望，她的思想也不光是重复，而同样面对另一种形式的超越——她心里再次验证了男性的超越。她和男人一起庆祝节日，颂扬和证明男性的成就与胜利。然而她的不幸在于注定只能重复生命，甚至她自己也这么认为，生命本身并没有存在的理由，而这种理由甚至高于生命本身。

由存在主义的探讨，我们才能够真正认识游牧部落的生物学和经济学的根源如何导致了男性霸权的确立。与男性相比，女性为物种做出的牺牲更大，而人类一直在想方设法摆脱物种奴役的命运。由于发明工具，维持生存成了

男人的一种思考，一种超越，但女人的孕期却依然受到自然决定的桎梏，依然与动物一样。由于人类在生存方面开始反思生存本身——即寻求高于纯粹生命的生存理由——男人在女人面前体现出了优势。男人的设计并非重复生命本身，而是在刹那间把握永恒开创未来。男性的行为在创造价值的同时，也将生存本身变成了一种更高的价值；这种行为战胜了生命的无目的，也使自然和女性臣服在脚下。现在的问题是，为何这一情况延续下来，在漫长的历史中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人类为了这另一部分——她虽然是人类的一部分，却又被定义为他者——确定了什么位置？她拥有什么样的权利？男人又是如何看待她的？



第五章 农业社会早期的女人

到了游牧民族开始成为定居农民的时候，男性不再局限于只知道和敌人好勇斗狠，他开始通过对世界和本身的反思来表达自己，法律和制度开始产生。男女差别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在人群当中。女人曾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获得极大的尊崇，这是因为婴孩在以农耕时代的文明中有了新的重要意义。在定居下来获得某一块领地后，男人有了对其领地的所有权，这种财产需要所有者的后代来继承，母性的生育成了神圣的职责。

许多部族仍然处于公有制状态下，这并非意味着女人为全体男人所公有——几乎没有学者认同杂婚是一种普遍现象。这一事实意味着男女的个体性在部族中依然是独立的，仅仅在宗教、经济和社会方面才以群体方式来体验。婚姻可能采取的形式——无论是一夫一妻制，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妻多夫制，这说明婚姻并不是神秘的事情，它依然是世俗的，并不会因此将女性绑在妻子的地位上。整个氏族以同一个图腾为标志，获得了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这力量通过对领地的共有体现出来。氏族——如前文所述的过程，以这一领地获得了客观形式的自我意识。由此，土地的永久性成为氏族的象征，并不由于时间的消逝而消亡，而氏族也由此成为一个整体而永存。

相当多的原始人并不知道父亲在生育中的重要作用（这种情形在今天依然存在）。他们认为，婴孩是祖先灵魂的转世，幽灵游荡在圣地中，飘忽在树林岩石之上，然后穿入女人的身体之中。为此，有人相信为了繁衍，应该破坏女人的贞洁；也有人认为，这种穿入是由鼻子或嘴巴进入的。这时，破坏处女的贞洁倒是次要的，初夜权被神秘笼罩，这时丈夫很少能够享有这一权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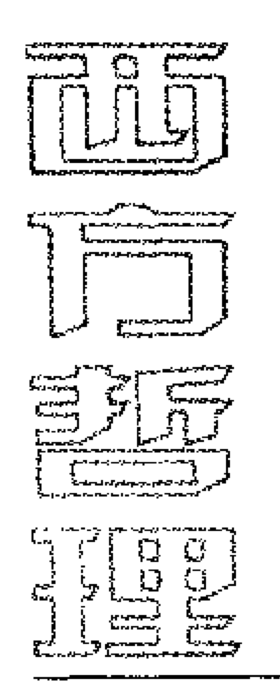
作为生育者的母亲无论如何不可或缺。只有她才能护卫和哺育体内那个小小的生命，只有她才可以使氏族代代延续下去，她的角色至高无上。孩子以母系的氏族决定归属，以母系氏族命名，拥有母系的氏族的权力，特别是在使用这一氏族的领地时作用更为关键。由母亲来确定氏族的成员拥有还是失去这块土地，氏族的人是否拥有土地和收获物也由女人决定，公共财产按照母系传承。由此可以得出一个假说，从原始信仰来说，女性有大地的属性——她们有权支配土地和收获物，这种权力是宗教与法律的双重肯定。女人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比女人同所有权的联系更密切，这就是母系制的关键特点：女人如同大地一样被象征性地神化。生命的延绵不断——也就是生殖力，在女人和大地那里，以生殖的个体和化身得以具体体现。



长颈圣母

帕尔米贾尼诺　1503～1540年　意大利

圣母怀抱小耶稣的姿势与耶稣殉教时圣母抱着他的尸体相似，暗示了耶稣未来的命运。



女人在缥缈的天国和地狱都是无上的象征，她在人间如同圣物有许多禁忌，她本身就是不可冒犯的。她是女巫和女法师，因为她有魔法，可以向祈祷者施法，如同古代凯尔特人的巫师一样，她有时是一位女祭司。她在部落中有很大的权力，甚至成为惟一的统治者。这种社会状态距今过于久远，以致没有任何文学作品流传下来。在漫长的父权时代，女性拥有统治力的记忆被留存在神话、文物和

习俗之中。从女性角度来说，婆罗门时代的传说梨俱吠陀[1]时代的回忆，而梨俱吠陀时代则是更早的原始时代的回忆。在伊斯兰时期之前，贝督因人里妇女的地位之高，比后来的《古兰经》所规定的简直是天地之别。尼俄柏、美狄亚（均为古希腊神话里的著名女主人公）不朽的形象，表现的是那个母亲将孩子看成是自己的私产，为自己的儿女骄傲的远古时代。在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安德罗玛克和赫卡柏的地位显然已不再是古希腊时期闺房中的女人所能比拟的。

从大量事实我们可以推断，原始社会确曾有过母权制时期。这一假设由巴霍芬[2]提出，恩格斯吸收了这一观点并认为，母权制被父权制所取代，是“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实际上，这个所谓的女性的黄金时代根本上就是一个神话。说女人是他者，这也就意味着男女间并没有什么关系。女性已经被神化成为大地、圣母和女神，她的力量已不是人类所能概括的，所以她也不再是人类。社会从来都是男人的，世俗权力一直掌握在男人手里，所

① Rgveda，是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的印度上古诗歌总集，包括了1028首诗，是印度文学的源头。

② Bachofen，1815—1887年，瑞士历史学家和法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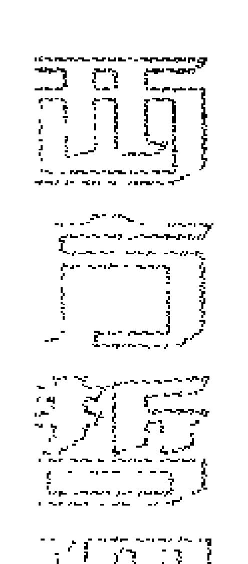
以列维·施特劳斯[1]最后为原始社会下结论说，“公众的或纯粹的社会权力自始至终都属于男人”。

实际上，女人的现实处境同神秘意义上的权力并无多大关系。她在母系制度中也许有极高的地位。客观地说，虽然部落中有一位居于最高地位的女性领袖或女王，但这不意味着女性就拥有权力。叶卡捷琳娜大帝在她的统治时期，俄国妇女的地位依然低下，女性的境遇依旧悲惨。那种妻子仍然和娘家氏族在一起，只允许丈夫匆匆来访的情形十分罕见。实际情况证明了男性的主导地位：女人离开本氏族，嫁到男方家里。既然女人让孩子和她住在一起，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部族的领地系统同它的图腾系统是不相同的：领地由环境决定，往往是偶然的；图腾则是严格的人为产物。前者更加重要，因为作为人们劳动生息的地方，无疑比神秘的象征更有实际意义。

神秘信仰同现实的经济的联系是不稳定的。男人和儿子的关系，一般要比同外甥的关系紧密得多。当他处有选择的余地时，他自然更愿意进入父亲的角色。男性的发展在进入具有自我意识并把自身意志强加于人的关键时刻，所有的文明都必然走向父权制形态。但另一个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即使他对生命、自然和女人的神秘力量迷惑不解，他也决没有失去过权力。当他为女人的危险的魔力所慑服时，他才将她变成了主导，将她奉为神明。他在这种自觉的转变当中仍是主要角色。尽管女人充满了生育的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他仍然是她的主宰，如同他是这肥沃大地的主宰一样。女人虽然有着生育魔力，她注定也要服从于、归属于男人，由男人利用。在男人眼里，她所有的权力和尊崇都由他而来。他们对她顶礼膜拜，尊敬她为母神。只有在男性头脑中虚幻的观念里，她才被承认是拥有


西蒙·波伏娃/著

① Levi—Strauss，1908—?年，法国最为著名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



这些权力。

女性在图腾中已经过了复杂的变化，而图腾本质上是在动植物形象下的男性标志。女人令它始终和肉体相连，但女人的作用是哺养，从来没有过发明。她是内在封闭的，代表了社会静态的方面，她为部族所做的贡献，仅仅是生孩子以及提供婴儿的食物。然而男人却在社会与自然、与其他部落交流的动态中占压倒性优势。他为之战斗

的是征服、打猎和捕鱼，为部落从外部世界获得战利品。他的所作所为是生存对世界的反映，是生存的扩张，男人独自对世界实现了超越。此时他还不敢向女性挑战，他尚不具备完全征服女人——大地的能力，但他的内心已经期盼着超越她。

由男性的这种心理冲动可以领悟母系社会一个最为普遍的习俗——异族通婚的深层次原因。当男人还不了解自身在生殖中的作用的时候，婚姻对他已是无比重要：异族联姻可以使他获得男性的尊严和一块他的领地。此前，他受到母系氏族的束缚——从母亲的祖先到所有可以给予他财产的事物的束缚。到了世俗事务上，他通过婚姻和劳动，挣脱这一限制，以超越内在性的限制，奋力地创造属于他自己的未来。由此也就理解了乱伦禁忌，这一习俗在不同时代由其当时对亲戚关系的不同确认而有不同的具体形式。但从远古到今天，有一种含义是始终存在的：男人希望和与他有别的他者结婚，他即将占有的是他不是的那个人。妻子对丈夫来说应该是一个陌生人，这样对于他的氏族也是陌生人，这样妻子才不能分享丈夫超自然的力量。原始婚姻的抢婚风俗有时是真实的，有时仅有象征意义。毫无疑问，对另外一人施以暴力是对其“外人”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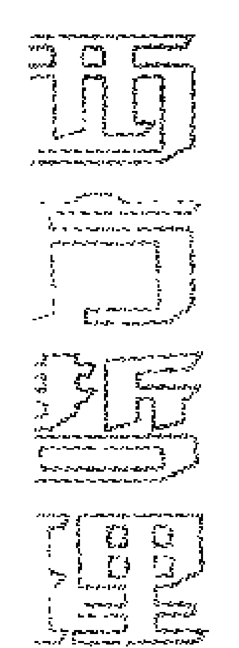
的确定的证明。勇士用暴力抢到妻子的同时表明，他有能力获得陌生人的财产，有能力突破命运所注定的限制。另外的婚姻形式——购妻通过缴纳物品和提供服务的方式，虽没有那么激动人心，含义同样重要。

在原始社会，父权制代替母权制是最重要的一次观念的转变。这之后，母亲被贬低为女仆和保姆。而权力和权威为父亲所有，他再将之传给后人。男人在生育中必不可少的作用得到确认，甚至进而被认为只有父亲才是生命的赋予者，而母亲仅是她的体内的幼小生命的接受者和乳母。在埃斯库罗斯[①]《复仇三女神》中就如此说过。亚里士多德宣称，女人不过是物质和运动，男性从本质上却比它“更好、更神圣”。在完成支配后代的进程中，男人也同时完成了对世界和女人的征服。在古代神话和古希腊戏剧中，父权制的胜利被描绘成通过暴力手段取得，其实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男人再度征服的只不过是他已占有的成果，他使得法律制度与现实保持和谐。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斗争，胜利和失败也就无从谈起。

但是，古老传说的深层寓意不可忽视。男人宣告自己是主体和自由者的同时，发明了“他者”（THE OTHER）的概念。从此他与他人的关系就发生了转变：他者是危险的并构成了一种威胁。古希腊哲学提出他性、相异性即是否定，即与罪恶无异。善恶二元说就是在他者的基础上确立的，于是宗教和法典以它们所制造的敌意来对付女人。人类发明了文字用以记载神话和法律之时，父权已完全建立：法律由男性来制定，他们当然要将女人置于从属地位。不要以为男人会如同对待孩子和牲畜那样仁慈地对待女人，事实决非如此。尽管压迫女人的机器已然建好，但


西蒙·波伏娃/著

① 前525—前456年，古希腊著名的三大悲剧作家之一，被誉为“悲剧之父”。



立法的男人依旧对她提心吊胆。她从前那令人不可思议的魔力，现在以恶的面目展现；她以前的圣洁已为现在的污秽所代替。送给亚当做为伴侣的夏娃，导致了人类永远的厄运；异教的众神为了报复人类才发明了女人；人类的第一个女性潘多拉，给整个大地和人类带来了灾难。他者是用来对抗主动性的被动性，毁掉统一性的多样性，与形式对立的物质，反抗秩序的混乱。女人就这样成为恶的祭祀

品。毕达哥拉斯就这样认为，“善的本原创造了秩序、光明和男人；恶的本原，创造了混乱、黑暗和女人”。《摩奴法典》[1]把女人定义为一个必须处于奴隶地位的恶人；《旧约·利未记》将她与家里的役畜相提并论；《梭伦法》[2]中根本没有她的位置；而罗马法判定女人“低能”，因而将她置于男人的监控之下；教会法宣称她是“魔鬼之门”；《古兰经》则极为蔑视女性。

不过，善需要恶的对比，正如观念需要物质，黑暗需要光明。男人为了满足性欲，同时也为了使种性绵延，必须要有女人。他必须要给她一条拯救之路，她才能接受男人统治的秩序，消除她的罪孽。《摩奴法典》表达这种观点最具代表性，“妇女以合法婚姻与之结合的男子……妇女本人也取得这些品德，有如河流与海洋的结合……死后抵达和丈夫一样的住所”。相同的，《圣经》也以赞美的腔调描绘了一幅“贞女”的画像。基督教敬重修女，也敬重贞洁的妻子，尽管它蔑视肉欲。女人甚至也能担当重要

① Laws of Manu，古印度历史上最重要、最完备的法律文献，它是维护古印度种姓制度的一部法典，摩奴相传为大神梵天之子和人类的祖先。

② Solon law，前 594—前 593 年，古希腊政治家和法学家梭伦制订颁布的法典。

的教职：如印度婆罗门教的女尼，罗马的女祭司，她们和丈夫同样神圣。男人在婚姻中处于支配地位，但男性与女性的结合，对于繁衍后代和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必不可少的。

对他者的、女性的这种矛盾的态度，折射在她后来的历史之中，她从此臣服于男人的意志，直到现在。不过，这一意志的树立并不牢固：无论男性征服和占有什么，他都要表现自身的尊严，虽然全部的占有和支配将把女性下降到如同物品一样，而在他眼中，她依然有着难以理喻的原始魔力。怎样才能让老婆既是伴侣又是奴仆，这成了男人的重要课题。几千年以来，男人的态度不停地变化，也使得女人的命运一直在变化。

第六章　父权社会与上古时代

私有财产的出现标志着母系时代的终结。那以后，她的命运和私有财产的关系不可分割：她的历史大部分就是世袭财产的历史。注意到财产所有人将自己的生存转变异化为他的财富的事实，不难看到问题的核心所在。他将财产看得重于生命，财产在死后依旧存在，它超越了人生的限制——它是不朽的灵魂与现实物质的结合。但只有财产还由所有人掌握的时候，这才可以实现。只有财产由他属意的能继承他的遗志、为他所有的个体时，他才可以超越死亡。继承人有同样的义务：耕种祖先的土地，崇敬祖先的亡灵，保障祖先在阴阳两界的存在。因此，不论是为了众神还是孩子，男人都决不愿意和女人同享。他无法永久而完全地实现其愿望，但父权社会



达娜尼

扬·戈沙尔特　约1478－1533年　尼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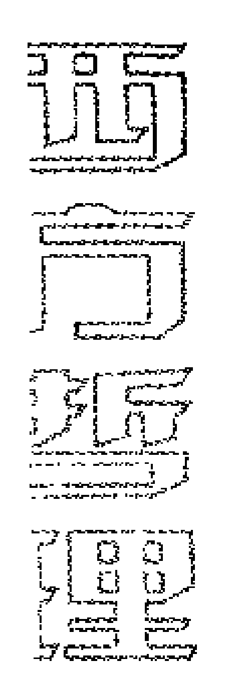
达娜尼被塑造成深情的少女，宙斯化的黄金雨丝丝地洒下来，画面细腻入微、美妙动人。

里，男人彻底地剥夺了女人的财产所有权和遗赠权。

表面看，这种做法好像是合乎逻辑。当孩子不再被认为属于女人之后，孩子同女人的娘家的联系也就不复存在。女人从此不再是一个氏族用婚姻租给另一个氏族；她和娘家的联系被切断了，被夫家所兼并。丈夫如同购买奴隶或牲口一样把她买来，将自家的神灵强加于她，她生育的子女属于夫家。如果将女人列为继承人，很可能她会把她父亲家的财产带到夫家，所以她不能成为继承的人选。女人一无所有，她做人的尊严也荡然无存。她本身就被看作某个男人世袭财产的一部分：最初是她父亲所有，后来是她丈夫所有。在严密的父权制下，父亲有权力把男孩子或女孩子处死。但对于男孩子，社会一般会限制父亲的权力，正常的男婴都有可能活下来，遗弃女婴的习俗却十分普遍。杀婴现象在阿拉伯世界并不罕见，女孩子刚出生就被抛弃到阴沟里。父亲接受女孩子被认为是慷慨大度的行为。男人进人社会是合法的，女人这样做是得到了赦免。无论何种情况，分娩女婴时留下的污物对母亲更加污秽：在希伯莱人习俗中就要求若是生了女孩子，母亲涤罪的时间比生男孩长两个月。在有“血亲复仇”习俗的社会里，女人若是牺牲者，只要求很小的数量，因为她的价值与男性的价值相比，就像奴隶的价值和自由人的价值。

她长成一个少女，父权的支配降临到她的头上。如果她结婚，权力将全部转交给她的丈夫。既然妻子和役畜或动产一样属于男人的私产，丈夫当然可以不受限制地娶多个妻子，限制一夫多妻制的因素只有经济。丈夫能随意遗弃他的妻子，而社会几乎没有给她们任何保护。但同时，对女人贞操的要求却极为严格。母系时代几乎并不要求少女保持婚前的贞洁，也不以通奸为重罪，即使有禁忌，但行动相当自由。但是当女人变成男人的财产以后，男人却要求她婚前必须是处女，要求绝对忠于丈夫，否则就将处


西蒙·波伏娃/著



以极刑。最大的罪行莫过于胆敢把继承权给予与某个陌生人生下的孩子，男性家长因此有权处死妻子。只要私有财产存在，妻子不忠于自己的婚姻，被当做最大的叛逆罪。直到今天，所有的法律在通奸问题上仍然固守着不平等原则。它们的法理都建立在这一推论上：哪个女人把私生子带到家里，其过错十恶不赦。

在妻子处于父系家族与婚姻家族之间时，她便设法在



两者之间保持一种相对的自由。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混乱的，甚至是对立的，每一种关系都足以支持她反对另一关系。比如，她常在选择丈夫时有相当的自由，因为婚姻是世俗的，并不会动摇社会的根基。然而在父权制度下，她一开始是父亲的财产，父亲以自己的意志让她嫁给某个男人。后来她又附属于丈夫的家庭，她是丈夫的一份动产，是她加人的夫家的一份动产。

只要家庭和私有财产世袭依旧作为社会的基础，女人就将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阿拉伯世界是一个典型。在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中，几乎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长期统一和统治其他部落，族长的权力显得没有任何的限制。伊斯兰教产生之时，阿拉伯人正以频繁的战争开始其征服的历程，这使得女人在教义中几乎没有位置。《古兰经》宣布："男人比妇女更优越，因为真主赋予他们杰出的品质，并且他们向妇女馈赠聘礼。"阿拉伯的女性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权力或者神秘的权威。贝督因女人能不戴面纱外出走动，原因是她们要从事艰苦的劳作——耕地和运输货物，因此与丈夫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而穆斯林女人则在大多数社会阶层中形如奴隶，与世隔绝。

以男性继承人为基础的社会也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

没有男性后代，那么财产怎么办？希腊以父系族内通婚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女性继承人必须和父亲家族里年纪最大的亲戚结婚，这样父亲留给她的财产就能由同一家族的孩子来继承，领地就仍然是家族里的财产。这一制度下的妻子不是真正的继承人——她只是男性继承人的生育工具。她成为男人的牺牲品，因为她被自动交到家族中最年长的男性手中，而这个男人通常是个老头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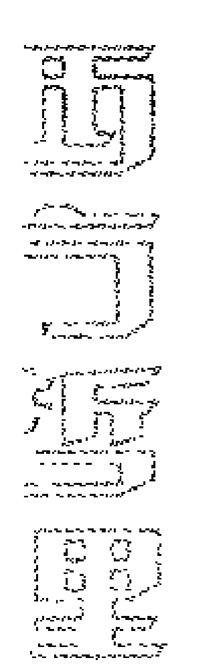
女人受到压迫的根源在于，家庭要恒久存在并保持着世袭财产。女人要获得彻底解放，就只有从家庭逃脱。在一个没有私有制的社会，家庭观念被打破，这个社会的女人的命运就有了极大的改观。斯巴达实行军事共产制，希腊城邦中惟有它给了女人与男人接近平等的地位。在斯巴达，女孩子和男孩子受到的教育相似，丈夫无权将妻子关在家里，而只能在夜晚与她偷偷地幽会，妻子不是他的财产，本着优生的原则，别的男人也可以和她交合。通奸的概念随着世袭财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所有孩子都归城邦所有，女人不必再担心受到一个主人的役使。另一方面，没有了私有财产，也就没有了特定的祖先，男人也就无权占有女人。男人要受战争的奴役，女人也要受到母性的奴役，此外，斯巴达人不受任何束缚。

在古希腊，特别是在沿海、岛屿和游客云集的城邦中，人们发现在一些所谓的神殿里有“招待陌生人的少女”，品达[1]给了她们如此的称呼。她们所得的收入只能用于宗教祭司们，以间接维持他们的生活。而实际上，在科林斯和其他城市，还有女人在满足水手和游客性欲，实质上是一种以金钱为目的的或赢利的娼妓制度。伟大的梭伦创建了这种机构，他把买来的亚洲各地的女奴关在“国营妓院”里，妓院位于离港口不远的雅典爱神神庙附近。


西蒙·波伏娃

---

① Pindar，前518—前438年，古希腊抒情诗人。



妓院由专门的妓院老板经营，他负责掌管财务。每个女孩子都有固定收入，其利润上缴给国家为税收。不久以后，一些被称为开普莱亚的私营妓院开张，用鲜红色的男性生殖器符号作为招牌。很快，除了女奴，希腊下层妇女也开始行娼。“国家妓院”被看成是神设的避难场所。但妓女的名声并不会因此而好一些，她们的社会权利全被剥夺，甚至连自己的孩子都不愿赡养她们。她们还要将头发染成

深红色，穿上镶花的鲜艳的行业服饰。

除了“国营”妓女，还有私营的妓女，她们可分为三种：一般妓女，这和今天领到执照的公开妓女差不多；艺妓，其实是舞蹈演员和表演音乐的演员；最后是名妓，她们大多数来自科林斯，并不公开卖淫，而是希腊最有名的男人的众所周知的情妇，扮演着摩登“国际女郎”的角色。一般妓女从获得自由的女奴和希腊下层的少女中选取，受到皮条客的盘剥，境遇悲惨。艺妓由于有音乐天赋，往往可以变得富有。最负盛名的叫拉密娅，她先是埃及王托勒密的情人，后来又成了托勒密的征服者、马其顿国王德米垂乌斯·波里奥塞提斯的情妇。而名妓中有的则与情人共享了富贵荣华。名妓们可以卖艺不卖身，自由支配自己的财富；她们天生丽质，谈吐高雅，有超人的艺术天赋，被崇拜者们平等对待。她们不受家庭的束缚，处于社会边缘，从而摆脱了男人的役使。而男人也喜欢将她引以为知己。从几位名妓的记载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看出这些自由女性的地位要比受全家尊重的母亲的地位更加优越。

除去这些辉煌的例外，希腊女人如同牛马，连抱怨也不准。在伟大的古希腊时代，女人被锁于深闺之内。伯里

克利[1]说："人们议论最少的女人才是最贤惠的女人。"柏拉图建议给女孩实施自由教育，并让有威望的女人来管理理想国，结果受到了阿里斯托芬的嘲弄。有人认为，妻子和丈夫其实是陌生人，一般对妻子的要求是做一个合格的家庭主妇，她应当精明持家，如蜜蜂一样勤劳，如女仆一样任劳任怨。即使女人十分端庄，希腊人仍对她怨恨不已。从古代的警句作家到经典作家，女人被他们不断攻击指责。这倒并不因于她的行为放荡——在这方面限制极为严格——也不是因她体现肉欲，主要是婚姻的负担和围城，让男人们不堪忍受。女人身份的低下并不妨碍她们在家中的地位。她有时可以大发雷霆，用撒泼叫骂、大哭大闹来迫使丈夫就范。这样，本来用以奴役女人的婚姻，现在却成为男人头疼的围城和射击男人的枪弹，克安缇皮[2]的形象包含了希腊人对泼妇和婚姻不幸的发泄和不满。

罗马女人的历史是家庭同国家的冲突决定的。艾特拉斯坎人[3]是母系社会，直到罗马王政时期母权制的异族通婚仍然实行：拉丁诸王的权力继承并非世袭制。可以肯定的是，父权制要到塔昆尼阿斯[4]被杀后才确立：领地，私有财产——由此家庭成了社会的一元化基础。女人因为世袭财产的缘故，而处于家族的严密的桎梏之下。曾为希腊女人所享有的受保护的权利，也被法律所剥夺。她被当成是一个永久的未成年人，过着无法律行为能力、如同奴隶的生活。她被拒绝于公共事务之外，一切"男人的"职位都不准她染指，虽然她有父亲给的世袭财产继承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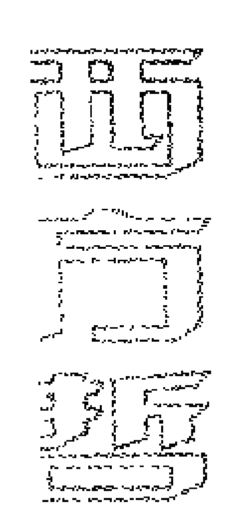


① Pericles，前495—前429年，雅典著名政治家，雅典民主派领袖和统治者。

② Xantippe，古希腊著名悍妇，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

③ Etruscan，古希腊罗马时期，位于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崇尚神祇的民族。

④ Tarquinius，前616—前578年，古罗马王政时代第五王，传说被牧夫所杀。



却要由监护人行使支配，她的支配权被间接剥夺。

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事实不可忽视：抽象的权利难以全面概括女人现实的具体生存环境，而她的经济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一环境；并且，抽象的自由和具体的权力经常呈反比。从法律角度来说，罗马女人比希腊女人的地位更为低下，面事实上，她和社会联系的程度要紧密的多。她处于家庭的正厅——住处的中心，而

不是躲在闺房中。她指挥奴隶们劳动，指导儿女受教育，儿女们常常在长大后仍受她的影响。主妇参加劳动，照料男人，是他的财产的共同拥有人。她被尊称为“多密娜”，她是家中的半边天，男人的宗教伙伴——不是奴隶，而是他的伴侣。她和他联系的纽带如此神圣，以至五百年内没有发生过一起离婚案。罗马女人没有被关在家里，她们能出席宴会，进剧场看戏，一起参加庆典。男人要在路上给她们让路，即使贵为执政官和侍卫官也得让她们先行。卡图[①]说：“全世界都是男人统治女人，而统治所有人的我们，却受着我们的女人的统治。”

家庭开始瓦解使古代私生活的美德变得陈腐过时，女人也不再受任何既定的道德原则的拘束，因为公众生活及其美德是她无法涉足的。女人能够在这两种解决办法之间进行抉择：要么仍牢牢地尊重祖母的价值，要么再不承认任何价值。1 世纪末到 2 世纪初，依然有那么多的妇女，是她们丈夫的伴侣和朋友，无可指责的妻子，具有献身精神的母亲。但同样也有许多女人拒绝接受母性的责任，这促使离婚率飙升。法律仍然禁止通奸，有些主妇为了给淫

① Cato，前 234—前 149 年，古罗马演说家。

欲找借口，公然把自己登记为妓女。

直到那时为止，古罗马的拉丁文学对女人还是十分尊敬的，但讽刺作家们可不管这一套。他们并不是泛泛地去攻击所有的女人，而是针对那个特定时代的女人发起进攻。朱维奈尔[①]讥笑她们淫佚、饕餮。他不无刻薄地认为，她们想要尝试男人的职业：她们参与政治，孜孜于法律条文，想要同语言学家、雄辩家一争长短；在打猎、战车赛跑、角斗和击剑等体育项目上过分狂热，她们成了要与男人一较高下的对手。在游乐方面，她们缺乏教养，也没什么目标以她们为对象，因为过分的举动依然禁止她们尝试。古老的共和国时代的罗马女人虽有社会地位，但是没有法律权利和经济独立，她就被固定在这种地位上了。到了衰落时代，罗马女人获得了虚假的解放；然而在这个事实上是由男人主宰的世界里，自由对她们如同虚无：她有自由，却没有目的。这时的罗马女人只是徒劳的解放的产物。



圣女巴巴拉

罗伯特·康宾　约1378－1444年　尼德兰

画中描绘的是巴巴拉静坐看书的情景。画面和谐、平静。

① Juvenal，？60—？140年，古罗马讽刺诗人。

第七章　中世纪到18世纪的法国女人

女人地位的变化过程时断时续。当蛮族入侵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价值观念都受到了冲击。罗马法自身也因为崭新的基督教意识形态而发生改变。随后的几个世纪，蛮族以自己的法律取而代之。由此带来了经济、社会和政治形式发生明显的倒退：女人的地位也一样发生转变。

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对压迫女人的作用毋庸置疑。《福音书》里上帝的一束仁爱之光，就像照耀在麻疯病人身上一样，也照耀到了女人身上。不要忘记，只有贱民、奴隶和女人非常热情地支持新法律。在早期基督教那里，女人服从教会的管束，她们比较受到尊重。她们和男人一样成为殉教圣徒。但做礼拜的时候，她们却坐在不起眼的角落，“女执事”拥有的权力只是关心病人和帮助穷人之类的事情。即使公认婚姻是需要互相忠诚的誓约，其实也是要妻子无条件地服从丈夫。最后它经由圣保罗[①]之手，通过犹太传统即野蛮的反女权观念得以确立。

从格里高利六世时期的神职人员必须独身开始，女人就受到更加严厉的指责：神父们宣布她天性下贱邪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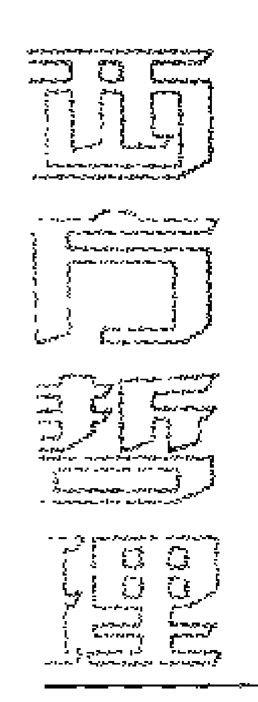
① St. Paul，？—67年，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基督教传播的关键人物，在罗马被害。

圣·托马斯狂热于这种观念，称女人被创造仅是一个“偶然”，她生来就不完整，是种有缺陷的人。他宣称：“男人在女人之上，如同耶稣基督在男人之上。女人处在男人支配下生活，这是注定的命运，她无权离开她的丈夫。”而且，教会法只承认嫁妆模式，其他一切婚姻制度都属于非法，女人在法律上无行为能力和无权力。不仅男性的职业不许她涉足，她还不能出庭作证，她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帝王们的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教会的左右：扎士丁尼一世的立法虽然对做妻子和母亲的女人表示尊重，但认为她应服从于这些身份。她在法律上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并非是根据她的性别，而全是因为她的家庭地位所決定。禁止离婚，结婚要以公开的仪式予以确认。父母亲对于儿女们有着同样的重要性，女人也有继承权。若丈夫死了，她可以成为儿女的合法监护人。随着元老院对维利安法的修订，女人后来又取得了可以基于第三者的利益订立契约的权利，但不准替丈夫订立契约。她的嫁妆不准她自行处置，因为这是子女要继承的世袭财产。

中世纪经过早期的大混乱之后，封建制度开始确立，但女人的地位并没有确定下来。封建制度下女人的地位时而上升，时而下降，是由于主权和财产权，公权、私权和强权之间谁来支配未能确定而引起的混乱。最初，她在政治上无权因而也就没有私权，直到11世纪社会秩序仍靠强权来维持，采邑是由军队控制的财产，女人对此无权过问。后来，女人如果没有儿子，也可以继承财产，但她同时又由丈夫来监护，由他对领地和收入进行支配，这样，她作为领地的一部分，行动根本无法自由。


西蒙·波伏娃/著

中世纪的女人曾一度残留某些特权，随着封建的社会习俗的产生而被清除。原本在整个制度中一直沿用的不成文法在16世纪汇总编纂成法典，女人随之失却了所有的保护，男人可以将她束缚在家庭中。法典将她完全置之于



男人地位之下，对她的公民资格和权利置若罔闻。她在未婚时由父亲监护，如果她不肯结婚，父亲就会将她送入修道院中做修女；如果结了婚，她的丈夫就拥有了对她、她的财产和她的子女的全部支配权。她的债务和品德都由她的丈夫负责，政府和外人，与她没有关系；她在劳动和成为母亲时并不是一个伴侣，而是一个女仆。她本人、她所做的东西和创造之物，都不为她所拥有，而是她的家庭所

有，也就是一家之长的男人所有。其他国家的女人的境遇也都大同小异：社会习俗十分严厉，政治权利完全剥夺。此时欧洲的所有法典都基于教会法、罗马法和日尔曼法的基础上而建立——统统对女人不利。各国全都以私有制和家庭为本进行调节。

在15到19世纪四百年之中，女人的法律地位没有大的改观，不过特权阶层的贵夫人的地位发生了悄悄地变化。直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那是一个个人主义至上的时代，它并不在乎性别，只推崇强者。女人在此时成为权势滔天的君王，艺术家、作家、音乐家以及武士和将领……这些著名的女人，她们的物质条件、精神和生活方式都无拘无束，她们大多数在实际上成了高级妓女，她们的经历和放荡在后来都成了传奇，以至于放荡成为以后几百年之中有地位的或是幸运的女人的一种特点，她们可以摆脱严厉的清规戒律的束缚。然而除了女王和皇后证明在有利的环境中可以取得不逊于男人的成就——凯瑟琳·德·美第奇王后[①]、伊丽莎白女王和伊莎贝拉女王[②]，以及圣女泰里

① Chatherine de Mwhci，1519—1589年，法王亨利二世的王后，以擅长宫廷阴谋闻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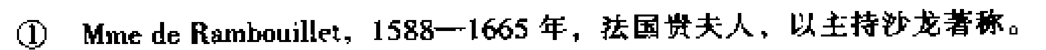
② Isabella，1451—1504年，西班牙女王，西班牙国家的奠基人。

莎、凯塞琳等人。女人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成就，原因在于16世纪她们基本上无法受教育和获得与男人一样的权利。

到了17世纪，特权阶层的女性常是艺术和文学的保护人，是上流社会文化沙龙里不可或缺的人物。法国的德·兰布埃尔特夫人[①]、德·思薇戈涅夫人[②]和其他女人名噪一时；其他国家，克里斯汀娜女王、德·舒尔曼小姐和类似的女人也备受推崇。以此为契机，有地位或名望的女性闯进男性的世界，而德·曼特努恩侯爵夫人[③]的经历最终证明，一个精明的女人能对国家大事施加重大的影响力。有的女人冲破道德框架的约束，以求不朽的声名，这时出现了当时不太为人熟悉的新女性——女演员。1545年出现了第一位登台的女人，直到17世纪初，大部分女演员还是男演员之妻；但后来，女演员的职业和她的私生活一起获得了独立。

18世纪的女人更加自由。这时的社会习俗对女人依然一点都不宽容：女孩子所受到的教育少得可怜，而将她嫁出去或是送进修道院都不用征求她本人的意见。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将各种各样的道德教条捆到妻子身上。实际上这一阶层的女人极为淫乱，中产阶层的上层为这种习俗所腐蚀，修道院与家庭都无法阻止女人的红杏出墙。不过对大多数女人来讲，消极的自由对她们只不过意味着放纵情欲和寻欢作乐。但有知识和抱负的女人开始行动起来，创造着机会。沙龙此时又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女人成为作家的保护人和激励者，并第一个拜读他的作品；她们开始钻研哲学和自然科学，兴建物理化学实验室。从德·蓬帕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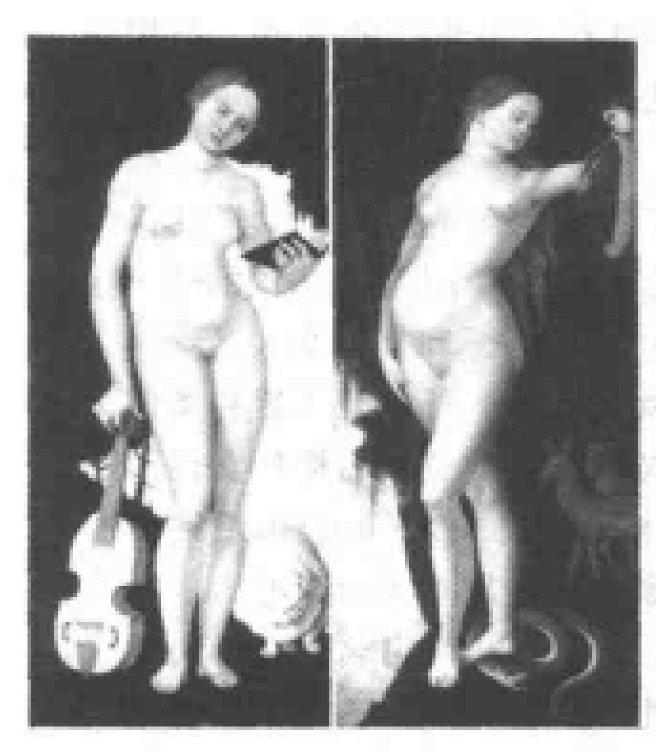


① Mme de Rambouillet，1588—1665年，法国贵夫人，以主持沙龙著称。

② Mme de Sevigne，1626—1696年，法国书信作家。

③ Mme de Maintenon，1635—1719年，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第二任妻子，在幕后操纵法国朝政。

夫人（Mme de Pompadour）和德·贝瑞夫人（Mme de Barry）的政治名望就可以看出女人的权力，她们掌控着国家。在旧时代，文化成为想出名的女人最容易取得成就的领域。不过还没有哪个女人可以与但丁和莎士比亚比肩，原因是女人的处境普遍太过平庸。除了女性中个别的天才，文化本身不是任何女性或女性群体所擅长的领域，与女人的特质相冲突，而男性天才却是经常脱颖而出。



持乐谱和持镜子的女子

汉斯·巴尔东·格里恩　约1484－1545年
德国

18世纪对待女性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见解。有的作家埋头论证女人没有不朽的灵魂，卢梭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将女人奉献给了丈夫和母性。他宣布："女人受到的教育应当都和男人有关……创造女人正是为了委身给男人，并忍受他给她的不公正。"但在18世纪，对女人十分有利的是个人主义和民主的理想。大多数的哲学家都相信女人和男人一样是平等的，伏尔泰为女人命运的不公平大声疾呼。狄德罗则认为女人的所谓的劣等性是社会强加给她的，孟德斯鸠的观点相当矛盾："女人被家庭所束缚违反理性和自然……她们从来没有统治过家庭帝国。"荷尔维提乌斯[1]看到了对女人受教育的谬论是造成女人低劣的原因。惟有梅士雅在著作《巴黎景象》中对女工所受

① Helvetius，1715—1771年，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

的非人待遇提出控诉，并明确指出了女性就业的问题。孔度塞特[1]要求女人从政，相信只要女人能获得相同的教育，就不会比男人逊色。他说："女人陷入家庭圈子的危险随着受法律压制的程度加深而增大……只有在维系这个家庭圈子和女人的利益不再如此联系紧密，这个家庭圈子不再成为她的惟一避风港，它才会消亡。"



① Condorcet，1743—1794年，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启蒙运动中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八章　后法国大革命时代：就业与从政

有人误以为法国大革命会改变女人命运，事实并非如此。这场资产阶级的大革命尊重资产阶级制度和价值观，男人基本上主导了全过程。应该注意到这个事实：在旧制度下，以性别来说，具有最大独立性的一直都是工人阶级妇女。女人有独立就业的所有法定的必要权利，也就是拥有自主经营的权利。她可以参加生产，可以做洗衣工、缝纫工、打磨工和店老板等等；她在家中或在小店里工作。她经济上的独立性，让她可以有很大的行动自主权。作为工人阶级的妇女，可以外出工作，经常在小旅店里，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肉体，几乎和男人相同。她与丈夫平分秋色，是丈夫的伙伴。她被压迫主要是经济上的，而不是性别上的。农妇在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相当重要，她的待遇如同奴仆，她一般不能和丈夫、儿子在一个饭桌吃饭，她比他们更加艰辛，如同牛马，除此之外她还要有母性的重担。不过与古代社会并无二致的是，男人要让她受到尊重。她在家中拥有重要的权威，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事情完全相同。生活的艰辛，使得女人也能表现自己的要求和权利，然而传统中要求她柔顺和懦弱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她们身上。大革命前的议会陈情书基本不涉及女人的人权，仅限于不要使男性占据女性的职位。当示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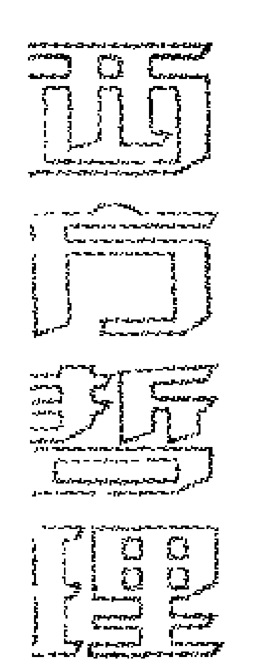
和暴动的时候，女人确实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不过女人们到凡尔赛宫为的只是面包房里的“面包师，他的妻子和学徒”。而领导大革命和享受成果的不是这些平头百姓。

在大革命的红色恐怖时期，女人获得了近乎无政府主义的自由。当社会恢复正轨时，她又重新回到原先的奴隶状态。从妇女运动史的角度来说，法国处于其他国家之前。但现代法国妇女的大不幸在于，她的地位已在军事专政时期被决定了，拿破仑法典大大推迟了她受解放的进程，让她的地位被锁定了百年之久。拿破仑和所有军人一样，宁愿女人只做母亲。即便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并没有破坏社会秩序，做母亲的地位明显超过做妻子的地位。他将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的确认给予严格定义，禁止对父亲身份的调查。已婚妇女并未因为做母亲而受到格外优待，不平等依然残留。女孩子和妻子的公民权利被剥夺，她们还是不能担当监护人，行使法律权利。相对于在婚姻上维护旧有制度的同时，独身女人和老处女却拥有一切公民权。妻子必须服从于丈夫，丈夫可以以通奸为由，自行将其囚禁，提出和她离婚。法律认为丈夫捉奸在床并杀死妻子可以赦免，而丈夫只有将情妇带回家才有罪，妻子也只有此时才可提请离婚。男人对子女的权威远高于妻子，居住地也由他决定。除了妻子经商外，她所承担的义务都要由他认可。女人的人身和财产受到婚姻的严密控制。

幸而，历史的发展不会因为顽抗而停顿。工业革命使旧有的土地所有制被取代，推动了伴随工人运动而来的妇女解放运动。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都要求女人获得解放，走出家庭：柏拉图的理想国中实行公有制，妇女将在这一制度中获得与斯巴达女人一样的自主权。伴随圣西门、傅立叶和卡比特[①]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出现了自由女



① Cabet，1788—1856年，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之一。



性的乌托邦。这一理论宣称，女人与男人都是人，所以工人和女人遭受的压榨应被废除。这一顺应潮流的思想不被空想社会主义者接受。傅立叶把妇女解放运动和放纵性欲等同起来，认为每个人都可以屈从自身的性要求，提出爱情至上，但只要求女人满足自己的性欲。卡比特要求实现男女的完全平等，但又对女性参与政治提出异议。其他人仅仅主张让女人受到好的教育，对女人获得解放不置一

词。由于改革的影响，19 世纪对女性持有高尚见解的不乏其人，如维克多·雨果。然而，妇女运动由于平庸之辈的参与而名声不佳。诸如俱乐部、杂志和女人的"灯笼裤主义"请愿之类造成了妇女运动笑话百出而被人耻笑，以致于当时的女性精英，如德·史达尔夫人[1]和乔治·桑，一方面在平等上进行不懈的斗争，另一方面又不愿与这些运动扯上关系。但总体说来，女权运动因追求公正平等而融入 19 世纪的改革运动的大潮中，这是可喜可贺的。

19 世纪初，女工受到比男工更甚的野蛮剥削。恩格斯称她们在家的劳动为"挥汗劳动制"。女工们忙得不可开交，收入仍然不敷需要。朱利斯·西蒙[2]的《女工》和勒鲁瓦·比利厄[3]于 1873 年出版的《19 世纪女性劳动》都对这些问题予以揭露。勒鲁瓦·比利厄发现，法国的 20 多万女工每天的平均工资不足 50 生丁。她们从家中小跑到工厂里上班，而不久以前，她们没有工作时，干的只是缝纫、洗衣和家务劳动之类繁重而报酬很少的活儿。现在工厂垄断了饰带、女帽这样的生产，在棉、毛纺织品和丝织

① Mme de Stael，法国著名文论家，主持当时最有影响政治文化沙龙。

② Jules Simon，1814—1896 年，法国政治家，哲学家。

③ Leroy - Beaulieu，1843—1916 年，法国政治学家，经济学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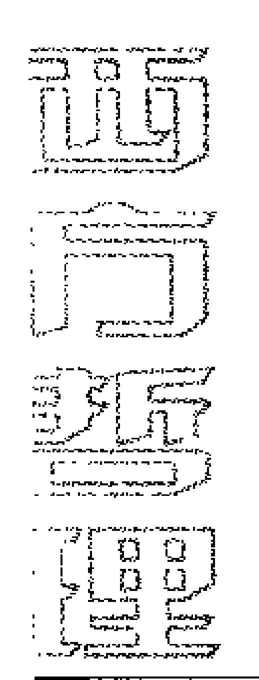
品行业有大量的职位空缺，纺织厂愿意雇佣女人，甚至只用女人而不雇佣男人。“她们的工作质美价廉”这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评价，表明了女性工作的两重性：女人终于通过劳动赢得了做人的尊严，但这一姗姗来迟的胜利来得如此艰难。

女人所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怎样协调她的母性功能和劳动功能。女人受到生育繁殖的奴役不容否认，这事实从人类之始就命定了她要做家务，阻碍了她与男人一道改造世界。雌性动物有一种自然赋予的保持体力的生理性和季节性规律。可是，女人从青春期到停经期之间，生理上却对怀孕频率没有任何节制。多少世纪以来，对女人的生育力没有什么限制。自古以来避孕法早已存在，一般都针对女人，如药剂、栓剂和阴道塞。不过这一技术往往只为医生和妓女所掌握。罗马衰落时期的女人或许也知道这些方法，因为讽刺作家们对她们的不育大加嘲讽。但中世纪欧洲并没有任何的避孕措施，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18世纪。对生在那些时代的许多女人来说，生活就是没完没了地怀孕。那些放荡的女人也免不了为她们的淫乱付出代价，多次生育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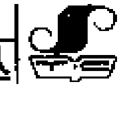
堕胎的问题在各国法律中均未正式准许。罗马法将尚未出生的婴孩视为母体的一部分，而并不将它看成是独立的生命，所以未给胎儿生命任何法律保障。到了衰落时期，堕胎变得如此寻常，连鼓励生育的立法者也不敢立法禁止。如果妻子不顾丈夫的想法弃婴，丈夫可对她进行惩罚，罪名是不服从丈夫。堕胎一直为法律所默许，整个东方和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是如此。


西蒙·波伏娃/著

直到基督教兴起，这一道德理念才发生革命性转变。它认为胎儿已经有了灵魂。这样一来，堕胎成为对胎儿的一种罪行。圣·奥古斯丁宣布：“任何女人，当她有能力生出那么多孩子，但却没有生出这么多孩子时，都是在谋



杀，怀孕后想自残的女人是典型例子。”随着对灵魂什么时间进入胎体的问题开始被讨论，教会法逐步得以完善。圣·托马斯和很多人把男胎儿有了灵魂的时间确定为怀孕后四十天左右，女胎儿则定在八十天左右。中世纪对不同的堕胎时间和原因规定了不同的刑罚。《忏悔书》规定，“在因无力赡养而终止婴儿生命的贫困女人同仅仅为隐瞒私通罪别无其他目的的女人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别”。亨



利二世于1556年颁布法令，将堕胎等同谋杀罪，为处死堕胎女人提供了法律依据。1791年法典则宽恕了堕胎者，但却惩罚了她的同谋者。到19世纪，视堕胎为谋杀罪的观念消亡了，却又把它视为反国家罪。1810年法国法律规定绝对禁止堕胎，违者将予以严惩；但每到挽救母亲的性命的关头，医生总是选择堕胎。这条法律过于严厉，所以到19世纪末，很少有人因此被捕，被定罪者更是寥寥无几。1923—1939年通过的新法在刑罚上有一些改进。1941年将堕胎定为危害国家罪。其他国家对该罪及其刑罚的态度不一，相对说，法律和法庭对堕胎的同谋惩罚严厉，对堕胎女人显得宽大。然而教会对此却决不妥协。直到1919年，教会法还要将涉嫌堕胎的人统统清除出教。教皇最近又宣布如果要选择母亲和婴儿的生命，那么母亲应牺牲自己。受洗的母亲必可以升入天堂，而胎儿将注定在地狱的边缘徘徊。有很短的两个时期堕胎被予以正式认可，就是在纳粹上台前的魏玛德国和1936年以前的俄国。但是尽管有宗教和法律的双重反对，堕胎在各国依然不可避免。法国每年的堕胎次数高达80至100万，已接近出生的人数。三分之二的堕胎者已婚，相当一部分女人已有了一两个孩子。

女人地位的变化要由参加工作和摆脱生育的重负两种原因的共同结果来解释。恩格斯曾预言女人的社会政治地位必将改变。法国的孔度塞特、英国的玛丽·沃尔斯通克莱夫特[①]在《为女权辩护》中都曾对女权主义加以预测。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旧话重提，但反响平平，某原因是并无实际的基础。伴随女人走进工厂和走出家庭，她终于开始提出了具体深刻的要求，它的重要作用涉及到了资产阶级的核心。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使地产不再是个人财产的重要部分，大家庭统一的传统效力成为过去。资本流动的本性，让资本所有人不再重视被资本所拥有而要拥有资本，他对财产随心所欲地运用，并不在意其所有权。在世袭财产的时代，女人对丈夫的依赖性极强；当世袭财产变得不再重要的时候，女人终于可以和男人并驾齐驱，即便是他们的子女，也无法拥有像财产那样的稳定性，而将他们牢固地结合在一起。个人由此得到了相对于群体的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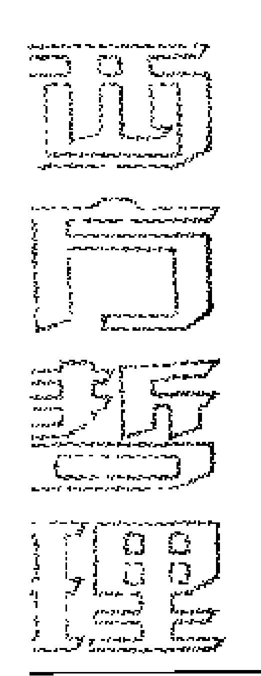


踏着烈焰的圣女

埃尔科莱·费拉塔　巴洛克时期美术
意大利

获得政治权利在法国、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艰辛的过程。约翰·斯图尔特有史以来第一次明确提出妇女的选举权问题，时间是在1867年，场合是英国国会上。他在著作中强烈希望家庭和社会彻底的男女平等。“我相信法律

① 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年，英国激进女权主义者。



规定一个性别屈从于另一个性别，这本身就有问题，而且是阻碍人类进步的重大问题。我坚信，它必将被完全平等所取代。”随后不久，富塞特夫人（Mrs. Fawcett）领导着英国妇女、玛利亚·德莱丝梅斯（Maria Deraismes）领导法国妇女成立了政治组织，后者在1868—1871年引导公众对女人的命运进行反思，并和小仲马进行了论战，起因是小仲马怂恿“杀掉”愚弄丈夫和别人通奸的妻子。莱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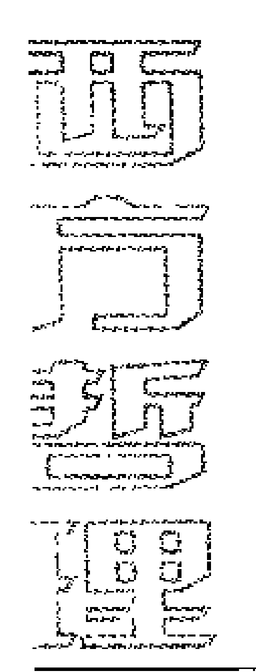
·雷切尔（Leon Richer）是真正的女权运动第一人，她于1869年正式提出“女权”的概念，发起举行了有关这一命题的国际会议。当时与会代表仅提出公民权的问题，选举权尚未提上日程。纵观30年的女权运动，就会发现女人缺少共同的性别责任感，导致这一运动在英法两国难以深入，成立的许多团体都不成气候。

1879年召开了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虽然宣布男女平等，但女权主义运动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而被确认为应归属于工人运动。相形之下，资产阶级女性却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仅仅要求把现有制度进行改良，支持像禁酒、毁禁色情小说和取缔娼妓等等道德改革运动。1892年举行了女权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次大会的惟一成就是给运动命名。女权运动基本在原地踏步，不过维维埃尼（Viviani）于1900年国民议会上第一次提出了妇女应同样具有选举权。女权运动的影响在逐步扩大，伴随卜伦丝维格夫人（Mme Brunschwig）组织的集会和游行示威，1909年法国妇女争取参政同盟成立，国民会议于1919年通过妇女参政的议案，但1922年被上院否决。当时形势十分复杂，在革命的女权主义与卜伦丝维格夫人的“独立”女权主义之外，191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五世又宣布支持妇女获得选

举权，从而诞生了基督教女权主义。天主教相信，法国女人在宗教上是保守的，而激进者的阻挠也正是为这一点担心。直到1933年，上下两院仍在进行着没完没了的辩论，50年以来的所有反女权的论点全都轮番上阵：貌似尊重女性的人相信，女人已经非常受到尊重，而她应该继续受到这样的尊重，并认为“真正的女人”不会因为呆在家里失去对选举的影响力，她不需要利用投票权来支配男人。他们危言耸听地预言，家庭会因为政治而瓦解，女人与男人毕竟不一样——她们能服兵役吗？还反问道：难道娼妓也应当有选举权吗？男人已受到良好教育，女人会听从丈夫的观点投票，她们如果真想自由的话，先从缝纫师那里得到自由吧！必须明白，法国女人占多数！即便是这些论点属于无稽之谈，法国妇女为了获得选举权还是要等到1945年。

考察这一时期的历史，首要的结论是，一部女性史其实是由男性写成的。恰如美国存在的是白人的问题而不是黑人问题，所谓的“反犹主义不是犹太人的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一样，女人的问题其实一直是男人的问题。可以看到，男人从最初就有着与体力相关联的道德权威的因素，他们创造了价值、宗教和风俗；女人对此也并不反对。个别的特立独行者——萨福、克里斯汀娜·德·比桑、玛丽·沃尔斯通克莱夫特和奥林伯·德·古杰——也曾与不公的命运相对抗，有时也进行示威游行。罗马的女人们没有团结起来反对法律，英国女权主义者也没有顺利达到目的。女人的命运始终由男人来掌握。他们在决定女人应该有什么样的命运时，是出于自己的恐惧和需要，根据自己的计划，而并非她本身的利益。他们崇拜大母神是因为害怕自然的力量。一旦他们有了青铜工具可以无畏地面对自然时，就确立父权制取代母权，在家庭和国家冲突的基础上决定了女性的地位。基督教给女人指定的处境，





反映了教徒对上帝、世界和他的肉体的观点；在中世纪的那场“关于女人的讨论”实则是宗教和世俗关于结婚还是单身的问题的辩论；由私有制而来的社会制度带给结婚的女人以监护制；而男人创造的技术革命又让现在的妇女解放出来；男人在伦理学上观念的变化，使用节育为手段使家庭模式缩小成为可能，由此女人减轻了物种的奴役。女权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不由自主的：它部分地成为政治家斗

争的砝码，部分是社会深层次问题引发现象的一种反映。女人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独立阶层，以性别而论，她也从未独立地登上历史舞台。种种反对以肉体、生命、内在性或他者为依据来讨论女人的理论，都是男性的观点，女性的意愿根本没有得到体现。实则绝大多数女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少数想摆脱女性特质的规限的女人，想不为它所征服，而是将它征服。就算她们使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有所改变，从根本上说，仍是依据男性的观点，与男人一致。

我们正处于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世界上，过去一直是男人的天下，现在依然是他们统治。父权制的观念与价值观仍然占主导地位，抽象的权利距离彻底的男女平等依然遥远：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直到 1942 年的法国法律，仍然保护丈夫的某些特权。抽象的权利不可能保证女人对世界的实在的控制，到今天依然没有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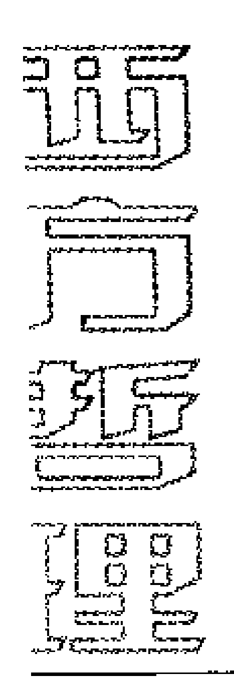
与男人相比，通过工作来追求获得独立的女人，她的前景远没有男人有利。她在大多数的岗位上工资低于男同事。她所从事的工作专业性较差，因此没有熟练劳动者的待遇优厚。还有就是同工不同酬。在男性世界中她还是个



生手，成功的几率比男人要低。实际上无论男女，都不喜欢由女人来发号施令，而对于男人更加信任。成为一个女强人，如果不算是遗憾的话，起码并不正常。大家公认的是，女人若要成功，男性的支持必不可少。男人担任的职务是最重要的，职位最为有利。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男人和女人在经济上形成了两个等级。

女人实际地位提高遇到阻碍的原因之一是：古老的父权文明传统影响着破晓而出的新世界。观察家们往往忽视这一点：他们以为女人尚不能承担新的前景，或是将这一前景视为危险的蛛网，而实际上她的平衡已被打破，使她难以适应。即便开放了工厂、办公室和大学，婚姻对她仍是有莫大吸引力的职业，通过它，她可以摆脱其他所有的集体生活。与原始时期相仿的是，从女方来说，爱情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服务，她从中得到一定的报酬。除了苏联，各国对于卖淫都采取默许的态度，允许现在的女人把身体作为交换的资本，从而鼓励了淫欲。结婚的女人要求丈夫养活自己，同时还可以得到比老处女高得多的社会尊严。老处女的性要求根本不像单身汉那样被社会承认，实际上剥夺了她怀孕的权利，未婚而孕依然是丑闻。当然，灰姑娘如果不是纯洁的处女怎能成为童话呢？所有的一切都并不鼓励少女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幸运与幸福，即使这一成就是艰难的、不测的，仍然让她们寄希望于一位白马王子。只有靠他，她进入比自己等级高的阶层才有了指望，那种奇迹的境界是她劳动一辈子都换不来的。然而这种期望是如此错误，她将自身的努力同她的利益分离了，也许这种分离才是女人最大的障碍。父母对女儿的培养最终依旧是为了嫁人，并非促进女儿人格的发展。结婚被认为有如此多的好处，以至于她自己也盼望结婚。造成的后果是她常常得不到足够的专门训练，没有她的兄弟基础牢固，对于其职业的专心程度也不够。她被固定在低级职位


西蒙·波伏娃/



上，注定了劣等，并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职业的劣等性反过来又加强了找一个丈夫摆脱的想法。

所有的好处都有负面的代价，然而这一代价如果太大的话，好事就变成了坏事。对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劳动是一种沉重的苦差使。相对于女人，虽然她赢得了社会的承认、自由的意志和经济上独立，但同样的情形对她也不例外。很多女工和女白领认为工作带来的只是压力，倒是婚

姻会帮助她甩掉这种压力，这一想法不足为奇。问题是，女性自我的意识日益觉醒，可以用工作挣脱婚姻枷锁的情况下，她就能够不再无条件地服从家庭中的一切命令。她就有希望使家庭与事业相辅相成，不会再疲于奔命。即便这样，如果工作不平等依旧存在，如果女人将自己出卖给某个男人，同时这个人有着社会公认的特殊地位，那么，她就需要比男人更多的精神自制力来坚持对个人独立的选择。她还没有充分地意识到，诱惑的阻碍作用，而诱惑往往伴随着骗局。在婚姻彩票里面，中奖率实际只有几千分之一。现在的情况是要求甚至强迫女人工作，而同时又给她们慵懒和幸福天堂的诱惑：中奖人的形象被描绘到了不真实的地步，仍在人间受苦的女人显得苍白渺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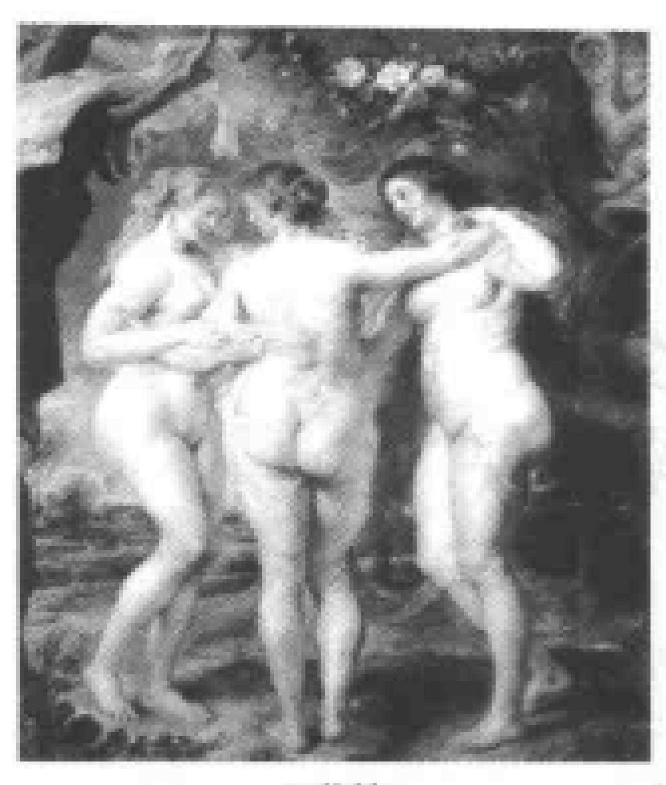
对多数女人而言，她们仍然受男人支配。因此，女人在对自身作出判断和抉择时，并不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而是根据男人评判的标准。由此，我们就首先来看一下男人的梦中情人是什么样的，因为，女人在男人意识中的影像，是她的现实处境无法回避的一个关键因素。

第三部 神话



第九章　梦想、恐惧与崇拜对象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最初没有男人奴役女人的事情，连基于性别的等级都没有，女人被当做奴隶是后世才出现的。无疑，奴隶之中有女奴存在，但自由的女人——具有宗教权威和社会尊崇地位的女人——同样一直存在。男人对她们并没有深感威胁，也没有想过她会把他置于客体的位置，她们则承认男人的主导地位。结果，女人似乎成了一个超脱于领导者之上的被领导者，是天生的他者，而这个问题对女人根本无所谓。男人坚信这种观念，并以各种各样的创世神话加以强调。影响西方文明至今的是基督教的创世记说。夏娃不是和她的男人亚当一起被创造的，造出她的既非其他的物质，也非造亚当相同的物质——泥土，而是用亚当——第一个男人的肋骨。她的创生也不是上帝的一时冲动，为了她而造出她，而是能够受到她的崇拜为目的创造了她，她从来都不是独立的，她是被上帝指配给男人的，上帝之所以将她赐到亚当那儿是因为亚当的寂寞，她的出生和目的都是因为她的男人。她显然是次要的，是他的补充。所以她实际是受到恩赐的猎物，经过提携而具有了明晰意识的自然，她成了一个具有意识的人，生就服从男人。所以男人理想中的女人常常是奇妙的：他要从肉体上占有她，使自己成为人，却又要以这个自由的



三美神

彼得·保罗·鲁本斯 1577～1640 年
佛兰德斯 *鲁本斯笔下的女神有着健美而丰满的形体和秀丽的面孔，形象充溢着激情与艺术魅力。*

人的臣服，来验证自己自由的感觉。所有的男人都不想成为女人，所有的男人都离不开女人。“感谢上帝，他创造了女人”，“大自然的慷慨在于把女人赐予给男人”……诸如此类的话语，全都是男人不停地用傲慢自大的腔调宣称，他必然会在世界上出现，而女人的降生只不过是个完全偶然的，但这倒是令人高兴的事情。虽然女人是“他者”，但她也能够使“存在”充实，这种充实感和男人感到的自身的生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神话的本原是男人将自己的希望和恐惧反映到神灵的世界。女人没有将自己塑造成主体，也就没有创造出体现她们的愿望的有关男性的神话。她们没有自己的宗教和诗歌，而是通过男人的想像来想像。男人创造的众神也就是她们的众神。男人塑造出伟大的男性英雄的形象来拔高自己：赫拉克勒斯、普罗米修斯、帕西法尔[①]，女人在这些英雄的命运中只能成为配角。当然，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也少不了他的通常角色：父亲，花花公子，丈夫，吃醋的情夫，孝子，任性的儿子。可是这些角色统统是男人创造的，并且呆板迂腐，缺少神话的庄严。至于女人，是依靠他和男人的关系来定位的。

① Parsifal，瓦格纳同名歌剧中的人物，描写的是一个天真、赤诚的青年帕西法尔拯救守护圣杯的国王。

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性在性神话的单向过程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有时男人直接把女人称之为“性”，代表着肉体，是男人快乐与危险的源泉。男人对女人也意味着肉体，而这一点从没有宣布，原因是没有女人来宣布。与这世界自身一样，表述这个世界是男人的权利。他们用自己的看法来描述它，还把他的观点视为绝对真理。

阐释一种神话是困难的，对它加以全面认识和把握是不可能的，它神秘莫测，飘忽不定。神话体系庞杂，相互矛盾，看不到它的统一之处：达莉拉[①]和朱迪丝（Jutith），阿斯帕西娅[②]和卢克瑞忒娅（Lucretia），潘多拉和雅典娜——女人是夏娃和圣母玛利亚的结合。她是偶像，又是奴仆，生命之源，黑暗之母，她代表真理的缄默博大，又是妖精、老母鸡和愚蠢，她是医生和巫婆，是男人的战利品，毁灭男人的毒蛇，她代表他无法变成而又渴求的全部，是他对立和存在的原因。

男人想从女人身上获得的东西，是大自然和他的同类。男人心中对大自然的感情十分矛盾。他剥夺它却又被它压榨，他生于它却又死于它；它是他的生存之源，又是他以意志征服的王国。自然是至高无上的现实，是粗糙的、桎梏灵魂的血管，它代表理念，是偶然的，也是有限和整体，它意味着精神本体，却又违反精神。它有时成为战友，有时又是敌人，就像是生命从中喷涌的沼泽，就像是生命莫测的本身，就像生命流溢到达了无限远处。将自然比喻为母亲，比喻为妻子和理性，似乎是贴切的，有时又是冲突的，每一个都有着两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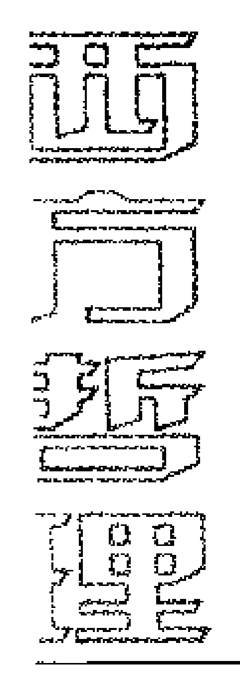
男人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有真正的根，他和其他生物同样被创造出来，而且他知道只有活着才算是生存。父权制



---

① Delilah，《圣经》中传说的人物，诱惑大力士参孙的妖妇。

② Aspasia，约生活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古希腊著名妓女。



诞生，生命对他有了两重含义：它既是精神，代表着意识、意志和超越；又是肉体，象征着物质、被动和内在性。埃斯库罗斯、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都相信，人间恰如奥林匹亚山，男性本原才是真正的创造力之所在。形式、数量、运动都是由此而生的，庄稼的生长和丰收得益于德墨忒耳[1]，但宙斯决定了庄稼的起源。女人的生育力被看作仅是被动接受的行为。她如同大地，而男人在上面

播种；她是水，他就是火。温暖和潮湿孕育了生命，创造被当成是水火的结合。太阳和火是男性神祉，太阳是大海的丈夫，大海成为被大量使用的、最一般的母性符号之一。象征着水通过接受灼热的放射源而被动地受精；大地被农夫用犁翻开后，也同样被动地在犁沟中接受种子。然而它的作用也不可或缺：它养育守护着生命的火种，供给着生长所需的养料。把母神赶下神位之后，男人依旧崇拜着生育女神。他为他的收获、他的牛群、他的所有财富感激着赛比利，甚至感谢她赐予了生命。他像崇拜火一样崇敬着水。歌德在《浮士德》第二部中赞美道："光荣属于大海！光荣属于环绕圣火的波涛！光荣属于波涛！光荣属于火！光荣属于那神奇的探险。"男人也同样崇拜着大地。布雷克（Blake）称颂的"像主妇一样安详的土地"。印度先知曾告诫他的门徒不可掘地，原因是"我们耕种时，对我们大家的母亲所做的任何破坏，切割抑或是挖掘都是罪恶的"。中印度的柏迪亚人（Baidya）同样相信"犁开我们大地母亲的胸膛"是种罪孽。埃斯库罗斯提到

① Demeter，古希腊神话中的农业女神。



俄狄浦斯①时说他“敢在将他孕育的神圣的犁沟中播种”。索福克勒斯提到过“父亲的犁沟”以及“只在播种时访问一次的耕种者，茫茫田野的主人”。埃及的诗歌中，被爱的女人宣布“我就是大地！”《古兰经》里将女人称之为“田野……葡萄园”。阿希希的圣·方济各②写的赞美诗中说：“大地，我们的姊妹，我们的母亲，你用盛开的鲜花，如茵的碧草保护着我们，照顾着我们，生长出无数的奇花异果。”米塞利特③在阿克基进行泥浴时欢呼：“亲爱的万物之母，我们终归于一体！我从你中来，到你中去……”在浪漫主义全盛时期，在希望生命能战胜精神的活力论甚嚣尘上之时，这种论点更加高涨。大地和女性那不可思议的繁殖力，较之男人的作用更使人惊叹，男人开始梦想再一次彻底地置身于母亲的庇护之下，重新找到生存的真正的根源。母亲深深地扎根于宇宙之中，可以从中汲取精髓的树根，是让生命的泉水喷薄而出的泉眼，同时也是滋补的奶水，温润的春天，是水和土一块儿和成的泥，有着神奇的健身之效。

然而肉体的实在性也常常令男人厌恶，他相信这是一种神性的堕落：由那普照万物、美妙的天堂，坠落进他的母亲的漆黑混沌的子宫里，罪孽由此开始。生命之火，本来能够独自的升腾，现在却被女人埋人土中。他原本是必然的，是和纯粹的理性、本者、绝对的精神相联的，现在他被禁锢在渺小的肉体中，禁锢在他无法选择的时空里，他成了多余、无用、肮脏、可笑的同义词。肉体的偶然决定了他本身的偶然，他已经被抛弃了，在无用中受尽折磨，她也注定了他的死亡的命运。他就是在如同坟墓般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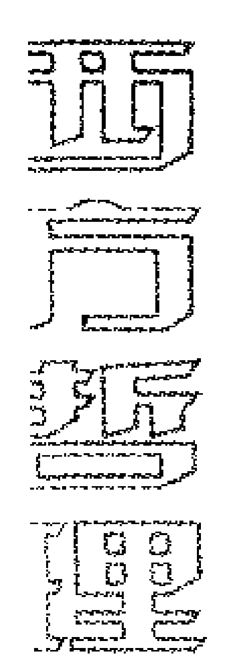

西蒙·波伏娃/著



① 希腊悲剧中的著名主人公，犯下了杀父娶母的罪行。

② St. Francis of Assisi，1181—1226年，天主教圣方济各会的创始人。

③ Michelet，1798—1874年，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人类反对宿命、争取自由的斗争史。



暗封闭的子宫里成形，那蠕动的胶状物体，明白无误地昭示了腐尸的结局，他为此而颤栗。无论生命如何被创造的，生长和发酵都如此使人恶心，因为它是从破坏中成形的。从胚胎中开始的生命的轮回，最终完成于生命的腐败。

这样，女人——母神也有了黑暗的一面。她代表着混沌，万物由那里来，最后又回到那里——她就是虚无。漫

漫长夜之中，世界的多重面目混杂一处：它是一个被物质所限定的普遍性与混沌性的精神长夜，是死睡与虚无的长夜。大洋深处的长夜，女人就是水手们恐惧的幽灵般的海妖，这就是地球深处的长夜。男人害怕这黑暗，它代表着生育力的另一方面，他面对着被噬没的危境。他仰望着碧空，渴求阳光，憧憬着耀眼的绝顶，渴望着蓝天的干爽。但在他的脚下，却只有潮湿、阴暗、温热又令他永远沉沦的深渊。许许多多的神话传说中都有这样的象征意象：主人公掉下了洞穴、地狱或深渊——母性的黑暗，就此消失。

所有文明社会中，即便到了今天，女人依然让男人恐惧：他对自身肉体的偶然性的恐惧在她那里的到了印证。青春期以前，小女孩没有威胁，没有神秘的性质，不会被禁忌包围。原始社会时期，她的性别无关紧要，此时允许小男孩和小女孩的性游戏。但月经初潮之后，她就不洁了，经期的女性为种种禁忌缠绕。《利未记》详细规定了隔离和洁身的方法，许多原始文明对此也有相似的规定。母权制时代，月经的魔力是双重的：既可以扰乱社会秩序，毁坏庄稼，也能用来制作媚药。到了父权社会，女性的月经就只剩下恶的魔力。普林尼认为处于经期的女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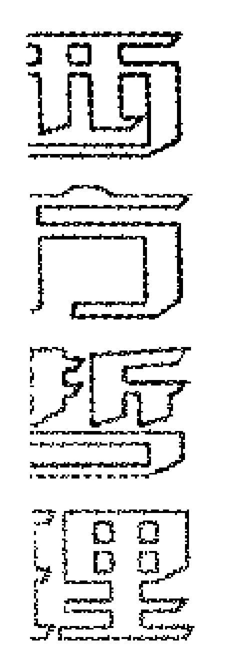
能毁灭农作物，杀死蜜蜂，毁掉花园；她碰过的葡萄酒会变成醋，摸过的牛奶会变酸等等。英国古代诗人的诗中说：

> “哦，流着经血的女人就是恶魔，
> 世间万物都会与你隔开，以免受到伤害！”

女性月经的时间神秘地和月亮的运行周期相同，使得月亮也成为不吉和反复无常的象征，女人是太阳和行星运行不可理解的机制的一部分，她体现了宇宙的能量，而这种能量决定了星系和潮汐的命运，男人必须接受它可怕的辐射。经血的神秘不在于它是血，而是因为它从生殖器流出，介于生命和物质之间，而对有机物的影响尤为明显：奶制品变酸，肉类腐败，食物发酵和分解。人们在不知道它的作用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生命的繁衍和它有关。古代人并不知道卵巢的作用，于是将月经当成是精液的补充。经血是女人不洁的证明，女人生育的神秘力量让男人恐惧，经血就是表现的形式。

男人为恐惧和欲望驱使，在害怕被神秘力量控制和渴望战胜这种力量的矛盾中摇摆，最明显地体现在关于处女的神话里。在男性恐惧和渴望交替出现的女性神秘中，处女应该是最完美的体现者。她令他感到害怕，又令他着迷。男人对新婚妻子是否是处女的态度，取决于他对这种神秘力量能否征服的信心。当母系原始社会时期，恐惧的心理占据上风，那么女人最好在新婚之前就已不是处女。马可·波罗提到西藏人说，男人不希望娶黄花闺女。这一风俗可以用男人不想要一个引不起男性欲望的女人为妻来解释。阿拉伯地理学家艾尔·柏可雷（El Bekri）说斯拉夫人：“一个男人结婚时，如果妻子被证明仍旧是处女，就会告诉她：‘只要你有一丁点可取，男人就会向你求爱，


西蒙·波伏娃/著



而你早就不是处女了。'然后将她遗弃，赶出家门。”甚至有的原始人结婚只选择已经生过孩子，证明确实具有生育力的女人。

处女的胴体如山中清泉般甘美，如含苞待放的蓓蕾一样娇嫩，闪耀着稀有珍珠般的光泽。秘洞、神殿、幽秘的花园——男人像孩童般深深地迷恋这不为人所知的、闭合的、幽暗之处，而这里也在等待着他的探险，他必须独自

占有、插人的地方，就像是他创造的一样。欲望中包含着破坏，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让这个被渴求的客体被榨干。对处女膜完整时的穿人的意义，更在于穿透处女膜时意味着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他夺去了处女的贞操，使那具胴体毫无疑问地成了被动的客体，验证了他的占有。这一观念在骑士传奇中显现出来。骑士历尽艰险地穿越危险的荆棘，去摘下那棵还没有飘香的玫瑰，他找到它，将它连根拔起，此时玫瑰才算归于已有。这一形象深入人心，使普通语言中的“采花”，成了破坏女人的处女贞操的代名词。这一表达方式也就是单词“defloration”[①]的字源学本义。

不过，处女只有和青春相联系时，才会有这种性的诱惑力，否则其神秘性会变得可怕。很多的男人从性上非常讨厌老处女，一般的看法是老处女的狭隘、遭人厌恶不仅是心理原因，关键是她的肉体原因。这是个不依靠任何主体而存在的客体，不曾为任何男人的欲望所打动，它已然花叶飘零，却依然未曾被世间的男人去采摘。它无法找到自己的存在目标，变成了怪物，就像没法交流的疯子，令

① 获得初夜权，本义是“deprive of flower”，意即采花，摘花。

人敬而远之。我曾经听到一个男人粗暴地评价一个40岁时仍驻颜有术、不过可能还是处女的人说："她的心里必定布满了蛛网。"是的，如果地下室和阁楼无人过问，毫无用处，就会充溢着让人不快的神秘，只有幽灵会时常光顾。而房子被遗弃之后，幽灵也会住进来。如果不把女性的贞洁奉献给神灵，人们就会认为它成了魔鬼的祭品。没有男人征服的处女和脱离了男人控制的老太婆，常常被人等同于女巫。因为女人生来就是为别人所支配，如果不接受男人的主宰，就要由魔鬼来主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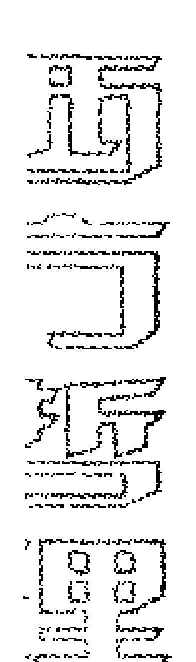


热那亚小姐

安东尼·凡·代克　1599－1641年
佛兰德斯

经过了夺去处女的贞洁的仪式，她就摆脱了恶魔的支配，或者说，彻底地结束了她的处女阶段之后，新娘就成了令人极为满意的猎物。丈夫怀抱她，拥有了整个世界。她是大地上全部的生命：是羚羊和母鹿，是百合和玫瑰，是鲜嫩的油桃和香馥的浆果，是宝石和蚌珠，是玛瑙、珍珠、丝绸；是蓝天、清泉、空气、火焰、大地和大海。东西方的诗人，都将女性的身体誉为鲜花、果实和小鸟。从古代、中世纪和近代文学作品中，信手拈来就足以汇成一部内容丰富的选集。在尽人皆知的《雅歌》里，丈夫对新妇说：

你的眼睛好像鸽子……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



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
你的鬓角宛如一片石榴……
你的双乳恰似一对小鹿……
你的嘴唇滴下蜜汁……
你的舌头下有蜜有奶……

男人从女人那里看到了闪耀的明星、如梦的月亮、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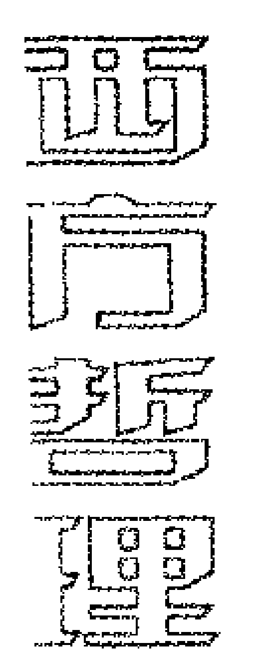
明的太阳和黑暗的深洞。女人是灌木丛里的野花，百花丛中的玫瑰。山林水泽里的仙女，动人心魄的海妖和妖精，常常在山野、丛林、江湖、大海和荒原中出没。任何理论都没有像泛灵论那样深入人心。对水手来说，大海就是女人，它如此危险，反复无常，难以驯服；但激起他努力征服的欲望。那不可逾越的、处女似的、险峻的、挺拔的大山，对那些不顾生命危险攀登的登山者来说，也是个女人。通常认为类似的比喻暗示着性的超越，倒不如说这是象征着性的女人和自然的力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男人这样希望，可以用占有某个女人的方式，来到达超越性本能的层次，以她为媒介，征服那神奇的大自然。有时别的媒介也可以满足男人的这一愿望，如有时男人对少年想入非非，从他那儿联想到温暖的沙滩，温柔的夜，花木的芳香。

社会风俗和审美观通常以令女人的身体和一切的积极性无关为目的：中国女人裹着的小脚让她们举步维艰，好莱坞女星的优雅的长指甲让她们手的活动大受限制，高跟鞋、裙箍、紧身胸衣、鲸骨衬箍和撑架裙子，说是使女人的身体曲线更加突出，其实是让她更加缓慢笨拙。女性的胴体，或者臃肿不堪，或是骨瘦如柴，加之烦琐的穿戴和

繁文缛节使她难以动弹，这样，男人就可以将她看作是自己的私产和所有物。梳妆打扮和披金戴银，使得她表情更加呆滞，身体加倍僵硬。衣物装饰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在原始人中间带有宗教色彩，普通的含义是将女人视为偶像，不过这个偶像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男人渴望她的肉体，她的美如鲜花美果；同时他也期望着她有如鹅卵石般光滑，恒久，坚挺。饰物的作用就在于此：她可以与自然的联系更直接，同时又脱离了自然的性质，让鲜活的生命中带有人工雕琢的冰冷质感。

然而即使是妻子，也带有不祥的征兆。当男人占有女人，从她的身体中获得快感时，引发的生育的力量连他也无法控制，他所进人的那个给他带来快感的器官，同时也是生育的器官。于是所有的社会中男性都要防范受到女性性器官的危害，制定了种种禁忌以保护自己。反过来，女人并没有对男人身上器官的恐惧，男人的性器官被当成是世俗神圣的东西，对男性生殖器只有崇拜并无任何恐惧的心理，它有着神圣的意味，始终是吉祥无害的，女性在生活中无须担心受到伤害而依靠神秘力量的护佑。必须修正一点，很多母系社会中的性生活极为开放，但惟有小女孩，即女人的青春初期，当性交和生育还没有扯上关系时，这种提法才可以说得上正确。马林诺夫斯基不无困惑地指出：无视礼法地在“单身间”里同眠的青年男女，津津乐道于他们的私通。其实，未婚姑娘被视为不能生育，而性关系也就成了一种无害的肉体快乐。女人结婚以后，丈夫和她在公共场所就不应该有什么亲昵举动，他不能公开爱抚她，夫妻的任何亲密行为都是如此神圣，她已经逐渐拥有了母亲的气质，性交成了一件神圣的事情。从此，性生活中的禁忌和防范越来越多，在播种、耕作和收获的时令性交成了大忌。此时的性行为会被看成是对生育力量的虚耗，这种生育力量和丰饶的物产是息息相关的，而生


西蒙·波伏娃/著



殖的魔力此时变成次要的。不过，节欲也在相当程度上确保了丈夫的强健的体力，这对于男人的狩猎和捕鱼，特别是战斗非常重要。男性的生命之源在与女人房事时会受到削弱，男人为保存最佳体力，必须禁欲。

另一方面，从对自己的性器官的双重态度反映出他对女人的矛盾的感情：他以它为傲，同时又以之为耻，对它加以嘲讽。男孩子在与小伙伴一起比量阴茎时，第一次勃

起的经验使他得意万分，也让他惶恐不安。成年男子把这一器官当做是荣耀和权力的图腾；它如同一根金箍棒，是不可思议的神赐，使他的虚荣心无比满足；它又代表自由，拥有了既成和可能发生事件的最充分的体现。在这种矛盾中，他为它而迷醉，又担心会受骗。这个可以代表自己的器官，却并非由他支配。它在未被满足欲望时，突然坚挺，有时在睡梦中遗精，所以它代表的是变化莫测、可疑的生命的力量。男人期望精神能够超越肉体，以行为超越命运，虽然他的主观与客观自然不一致，虽然他要改变它，但在阴茎上他还是意识到自身依然为肉体、命运和自然所困。

男人共有的梦想之一就是在女人身上打下自己的烙印，让她永远属于他。可是最狂妄的男人也明白，他留给她的仅仅是记忆，与真切感受相比，最清晰的回忆也让人觉得乏味。文学作品反复地描述着这种挫折感。于是男人对女人大肆攻讦，骂她水性杨花，人尽可夫，因为她的肉体竟可以普遍地奉献给男人们，而不是专属于某一个男人。

为了占有他者，男人必须永远控制着自身的全部。然而占有的失败，让他幻想能变成不可与之成为一体的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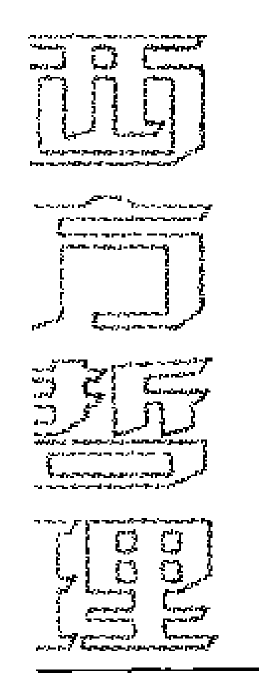
者。这样他就异化了，被诱惑了，服下了媚药，背叛了自己，堕落到深不可测、危及生命的水潭底部。母亲赋予儿子生命，同时也令他走向死亡。爱情中的女人蛊惑情人抛弃生命，拥抱最后的共寝的欢乐。爱和死亡的共存，在特瑞斯坦[①]的描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有相当的真实性。快感来源于肉体，男人在做爱时也是肉体的实现，而肉体则必然会消亡，这也证明了女人和死亡的关系。丰饶女神代表了生育力的不可遏抑，也是个有死亡气息的不祥的新娘，在她美妙虚幻的肉体背后，有着狰狞的骷髅面目。

因为这一原因，男人对女人（母亲或者妻子）身上那象征的、不变的展现出动物性的命运，既非常迷醉，又无比厌恶。生命是生存的标志，又昭示他命定的有限和死亡。男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在走向死亡，母亲就体现了这一事实。他从生殖中发现了生存的悖论：妻子的拥抱使他发现自己在物种延续中否定了自己。但伴随兴奋和快感，或许他早已迷失了自我。他极力将母亲和妻子的形象分开，但在她们身上却印证了一点：他迟早难逃一死。他虽然敬重母亲，爱恋妻子，但不能遏制憎恨和恐惧的心理与之对抗。

基督教再次给女人使人敬畏的权威做了注解，由女人而来的恐惧是男人善良的本性被困扰的痛苦表现。基督教本身就是矛盾分裂的，它使肉体和灵魂，生命与精神永远处于分裂中，肉体因原罪而成为灵魂之敌，和肉体扯上关系的统统都是邪恶。人生来就是堕落的，惟有基督的赦免和引入天堂，人的灵魂才能得到拯救。他生下来就因有罪而要下地狱，而不仅仅是注定死亡的命运。神的恩赐可以令他进入天堂，可他的各种各样的存在形式都有恶。邪恶无处不在，肉体则是罪恶之源。不过，女人永远是他者，


西蒙·波伏娃/著

① Tristan，荷马史诗《俄底修记》中的妖女，能把人变成猪。



因此男女并非彼此之间互为肉体的罪恶。在基督教的观念中，肉体代表的是敌意的他者，所以惟有女人才是肉体。基督徒相信她是尘世的诱惑，肉欲和魔鬼的化身。神甫们确定，是夏娃把亚当诱入了罪恶。特尔图良[①]说过："女人！你是魔鬼之门，你蛊惑了连魔鬼都不敢直接攻击的他。正是因为你，上帝之子才不得不死，你必须永远哀悼赎罪，永远穿着破烂。"全部的基督教文学都尽可能地渲

染男人对女人可以产生的最深的憎恶。特尔图良对女人的定义是"阴沟上的神殿"。圣·奥古斯汀则震惊地提醒人们生殖器官与排泄器官让人恶心的联系："我们在屎和尿之间诞生。"

令人可笑的是，又是基督教在某种程度上提倡男女的平等。基督教厌恶的是女人的肉体。而一旦女人抛弃了肉体的罪孽，她也还是上帝的造物，像男人一样被基督所宽恕：她处于男人之侧，在得到天堂通行证的人们之中也有她。男人和女人都是可以成为上帝之仆，就像天使一样无性别，而且同样能够拒绝人间的引诱。如果女人能超越自己的动物性，她罪孽的化身也能成为胜利最辉煌的象征，如同已战胜自身罪孽的上帝的选民。拯救人类罪孽的救世主是位男性，人们在拯救自身灵魂的时候必须忏悔，用最卑微、最屈辱的方式来表明他顺从的意愿。基督如同上帝，但是是圣母玛利亚，一个女人，在统治人类。不过，仅仅是边缘教派才承认女人的权威和女神伟大的魔力——主流教派仍然坚持父权制。这一制度下，女人还是依附于男人。正因为是男人驯服的猎物，女人才同样可以成为天

① Tertullian，150—225年，北非拉丁神学鼻祖。

使。这样，中世纪中期，一个完美无瑕的、为男人服务的女性形象出现了；圣母的头上有神圣的光环。她站在有罪的夏娃的对立面，她踩死了脚底的蛇，成了救世主和世间的调节力量，夏娃应该下地狱。

女人扮演母亲的角色是可怕的。母性会使她身体走样和备受煎熬。圣母玛利亚是处女这一现实有这样的一种消极含义：处女的肉体未被玷污而无罪，从而不再有肉体的性质，因为它从未被爱抚或是被占有。与之相类似，亚洲的母亲神也没有丈夫，她创造世界并牢固地统治着；她会为所欲为，母亲的权威性不会因妻子所受的奴役而受损。圣母玛利亚也不会被性所玷污。就像密涅瓦[①]，她也成为象牙塔和避难所，坚固城堡中的主楼。和许多基督教圣徒同样的情况是，古代的女祭司也要是处女，理由是为神祇献身的女人，身体必须是光洁无瑕的，以未被占有的完整性保持自身女性的本质。谁要是认为圣母玛利亚根本没有妻子的地位，其实是没有意识到这会更好地提高她扮演作为女人——母亲的地位。而她只有接受这个配角，才会被赞美。“我是上帝的仆人。”人类史上她第一次匍匐在儿子脚下，顺从地接受被指定的劣等地位并对此毫不在意，男性由此获得了最重大的胜利。之后用对圣母的狂热崇拜来确定胜利——既然女人已最终失败，她的名誉应该得以恢复。在基督教教义中，上帝才能决定生死，当人离开母体之后，与母体再无联系，他的尸体将由大地来埋葬。母亲的魔力被废黜之后，从此不可能再支配他的命运，那种将胎盘放人火中或水中的仪式与洗礼相比，显得无聊可笑。世界上从此没有魔法，有的只是上帝的权威。大自然最初的危害性因为神的力量而消除。母性是自然力量的一



① Minerwa，罗马神话中的雅典娜的名字，传说是从父亲朱庇特的头颅中蹦出来的。

种，也没有了权威。女人想要弥补她先天的缺陷，只能顺从于上帝的意志，成为男人的附属品。这样她就能在男性的神话中重新找到位置。她已完全臣服，只能接受被支配，否则就会被践踏，她安享仆人的地位才是惟一选择。她曾有的原始特性依然如故，但象征性已经恰恰相反：由原先的凶兆转化为吉兆，邪恶的巫婆成了善良的母神。她以仆人的身份，成为受到最高尊崇的大母神。



热那亚贵妇

安东尼·凡·代克　1599－1641年
佛兰德斯

女人现在已尊为母亲，她受到了母亲才享有的孝敬和尊崇。今天的男人知道的只是母性远古时代曾有的双重性中的慈祥、善良的一面。男人的身体受时空所限制，生命是有限的，在广袤的自然与历史之间，他只是微不足道的孤独个体，与自然和历史无联系。女人同样受其局限，她有着与男人一样的精神，但她属于自然，生命之河正是从她这里渊源流长。这样，她就成为个体和宇宙的协调者。此时的母亲已变成了感人的圣人，男人理所当然地要爱她。他在自然中迷失，他要逃避，而真的与她分离，他又想要回归母体。母亲受社会习惯和法律的限制，被牢牢地拴在了家庭和社会的固定位置上，成为善的化身。她在某种程度上成了自然的代表，况且自然已转化成为友善，与精神化敌为友。现在她的神秘感已经变成了温柔慈爱的神秘性，达·芬奇的《圣母》画像中将这种神秘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人虽然并不想成为女人，却又幻想自己可以体验全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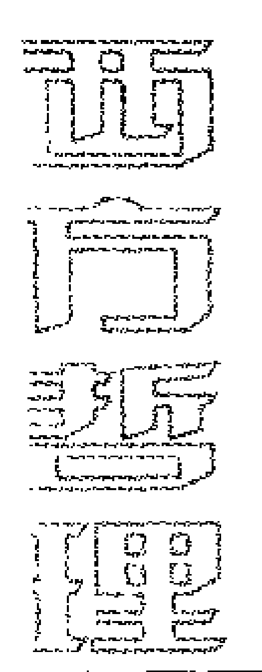
可能性，也就是感受男人和作为他人的女人的感觉。母性崇拜就是想要占有母亲的这份感受，将自己认同为母亲的孩子，意味着心理上的认同。因为女人已经和大地、生命、历史浑然天成地融在一起，这也就和女人融为一体。

在已经尊为圣人的母亲之外，还有一群为男人带来疗伤药和幸运的善良的女守护者：奶奶，慈爱祥和的老妇人，好心的使女，献身于慈善的修女，无微不至的白衣天使，沃伦尼魂牵梦萦的情人："你如此甜蜜、沉静，从容自若，人们轻吻你的额头，待你如同孩子"。

她们犹如弯曲的葡萄枝和小河般神秘，她们包裹并治愈了创伤，她们的心灵代表了生命无法言传的智慧，她们的品质与生俱有。男人在她们这里可以卸下自尊的重负，重新体会到作为孩童的甜蜜和温柔。和这些女性为伴，不需要勾心斗角，用不着害怕自然莫测的魔力。这些看护他的温柔女性，在奉献自身时已将自己置于女仆的位置，他顺从于她们的慈爱，原因在于即使服从她们，他还是她们的主人。姊妹们、童年时的玩伴、纯情少女，这些未来的母亲都属于这些仁爱者的行列。他自己的妻子当性爱的魔力消失之时，也会为大家视为他的孩子的母亲，而不是妻子。母亲曾在处于奴仆的位置时又被尊为圣徒，人们也就不再将她视为伴侣，而现在她的地位依然如此。母亲的名誉的恢复，也就意味着肉体以及代表着肉体的妻子的名誉的恢复。

随着她的神秘魔力在婚礼上消失，她在经济社会上从此成为丈夫的附属，"贤妻"也就成了男人最珍视的财产。她完全地为他所有，她的姓氏属于他，她的神也属于他，他负责她的一切，她就是她的"老婆"。他为房产、地产和牲口骄傲，也以妻子为荣，甚至更令他骄傲。他可以用她来证明自己的权威：她就是他的标准，他现实中的生活。东方人以丰腴的女子为美，她的营养充足，她就让


西蒙·波伏娃/著



丈夫面上有光。穆斯林男人所拥有的妻子数量越多，装扮得越漂亮，他就越能得到更高的认可。资产阶级上流社会里，女人必备的素质就是迷人的姿态：她所具有的美貌、头脑、魅力和高雅，也成为丈夫的财产的表现，就像他订做的轿车外壳一样。他如果有钱，她就可以穿裘皮大衣，身上珠光宝气；他如果是没太多钱，妻子的品德和精明理财就成了炫耀的资本。即使是一贫如洗的穷光蛋，如果能

找到一个伺候他的老婆，他就可以认为他还不是一无所有，《驯悍记》里男主角召集起左邻右舍，炫耀他用高明的手段制服了悍妇。男人多多少少地都有坎德拉斯王[①]的影子：当众脱光妻子的衣服，以此证明自己品德的高尚。

女人使男人在社会上的虚荣得以满足，还给了男人一种更为深层次的满足——他从塑造她之中得到乐趣。在犁地开沟这样的象征性之外，女人要是作为一个人象征着更神圣的意义：丈夫在性生活之外，即使是道德和头脑上也支配着自己的妻子。他给她教育，在她身上打下他深深的烙印。男人无法忘怀的梦想之一就是让事物在他的意志之下——他赋予它形式，并渗透于它们的本质之中。女人恰恰可以成为他手里的“橡皮泥”，他可以将其任意揉搓，随心所欲地加以塑造。她的有限度的反抗，使男人的创造性得以无限的发挥。一种可以随意塑造的物质，很快就可以完成加工，这项工作易如反掌。而女人身上的难得之处在于，她所有的特质让她想尽方法逃脱每一次的支配。这样，男人就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她更值得用心去征服，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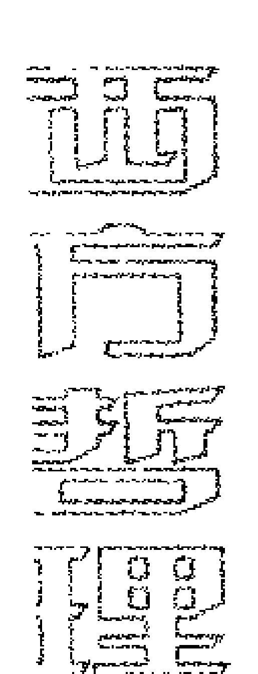
① King Candaules，希腊神话中吕狄亚国王，对当着众大臣的面让妻子赤身裸体的展示感到十分骄傲。

为她总是在逃脱驾驭。

女人于是唤醒了男人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他得意地宣称这才是他本人。婚姻这一公认的欢乐中，他发觉了自己作为动物性表现的优越：他是雄的，而且也发现了女人是雌的。但现在这个形容词已经全是赞颂：这个雌性动物精心照料着她的子女，为他们哺乳，爱抚着他们，守卫着他们，甘愿冒生命危险拯救他们——这个雌性动物堪称人类的典范。男人强烈地呼唤着妻子做这样的忍耐和奉献。她虽然还是大自然，但已深深被一种对社会、家庭和家长有利的美德所浸淫，男人知道该怎样把这样的美德带回家。男人和孩子在一个愿望上是相同的：揭示出事物内部隐藏的秘密，这样，事物就有了欺骗性。当被撕开的布娃娃暴露出内在的一切时，她的灵性也就失去了。动物的内在性质更为复杂，女性腹部象征着内在性和死亡，它有时显露出一些秘密，如女人脸上欢乐的神情，又隐瞒了很多秘密。男人将这一个微微颤动的生命诱拐到家里时，神秘的性质并不会由于占有而遭到破坏。女性将雌性动物的本能带进了社会，使生命延续，内在的世界由此确立，她带给家里犹如子宫般的亲密与湿润；她持家有方，使家中洋溢着生气，并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得到平衡。她生儿育女，养育他们。男人为了事业而在外面漂泊，正是她才令他回归于家的内在性中。他在夜晚回家，航船又可以进港了。他的工作状态的连续是妻子保持的，外面的世界风再高，浪再急，她也会保证他的日常起居，那用旧了或是损坏的东西由她修补，为劳累的工人做饭，照料病中的他，细心的缝补洗衣。整个广袤的世界就在她所建立并给予的婚姻天地里，她生着了火，在家的周围植花种草，利用着太阳、大地和水提供的材料。倍倍尔提到过的一位资产阶级作家曾这样概括了理想：“男人理想中的女人是只为他一人含辛茹苦，能抚平他额上的皱纹，带给他恬静、稳定和有



西蒙·波伏娃/著



序；当他回到家中，她能使他舒缓神经，自如地操控他带回的东西，家中的一切都飘荡着女人的馨香的气息，带着生机勃勃地活力。”

基督教兴起之后，在相当的程度上女性形象被精神化，男人所要拥有的女性的美、温暖和亲切的感觉，已明显超出了具体的实物。她成了事物的灵魂，并非是显示实际事物中可以直观亵玩的性质。她内心隐秘存在的本质不

可捉摸，肉体的神秘性相形见绌，反映出世界纯粹的实在。她是家人和家庭的灵魂所在，更是更大的集体如城市、国家和民族之魂。正如荣格所说，城市往往被比喻成母亲，是由于它包含着市民，因此塞比利被描绘为头戴塔型冠冕。人们形容国家为“祖国（Mather Country）”，不但是养育自己的热土，更是对象征女人的微妙的比喻。旧约和新约启示录中，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既是母亲，也是妻子。有的城市像处女，而有的则像妓女，比如巴贝尔和泰尔。因此法兰西被誉为“教会长女”，法国和意大利则被称为拉丁姐妹。在体现巴黎、罗马和日尔曼精神的雕像上以及协和广场上代表着斯特拉斯堡和里昂精神的塑像中，表现出来的实际并非女人的作用，而是她女性的气质。将这些城市比喻成女人，并非仅仅是象征意义上的，更是很多男人深刻的体会。观光客往往从女人身上发现所到国家的内核：一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女人的拥抱，令他感到拥有了意大利或是西班牙的温馨本质。有个记者说过：“当我来到一个新的城市的时候，我总是先要逛妓院。”要是一块金黄的朱古力使得基德展现出整个西班牙的话，那异国风情的吻就更能够让整个国家以及它的动植物、它的历史和文化，统统向着她的情人暴露。女人虽不是政治制度

与经济基础的体现，却是它们的物质本质和蕴涵其中的神秘超自然力量的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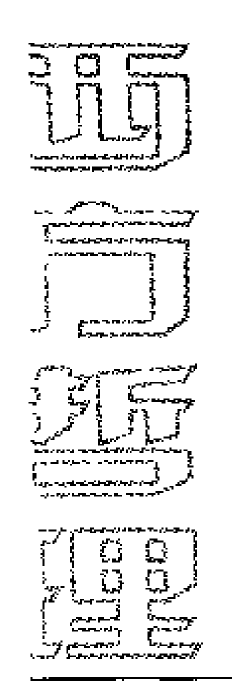
女人是男人诗歌中的主题，毫无疑问，她也是他的灵感源泉：文艺九女神缪斯就是女性。缪斯们处于创造者和他获取灵感的自然源泉之间。女人的精神深深地孕育于自然之中，以她为媒介，他就可以到达深沉和富饶的夜的深处。缪斯没有创造任何东西。她作为一个缄默聪颖的西比尔式的人物，温柔地服侍着主人。具体事务上，她的意见很管用。男人老是想独自一人达到成功，别人的帮助使他感到尴尬。不过他觉得：女人的意见别有一种价值，它有着她本能的一种智慧，与实际情况差不多。每当男人想要探求他自己的命运时，他往往依靠她的“直觉”，这一“直觉”的作用甚至运用到经济和政治之中。即使在今天，阿斯帕西娅和德·曼特努恩夫人也会有大获成功的职业。

显而易见，男人在做着一个恩赐者、解放者和救世主的白日梦时，希望女人的顺从是其中的一部分：只有睡美人昏迷不醒，才有唤醒的必要；只有周围存在着妖怪，才会出现被困的公主。而且，男人越要完成艰巨的任务，女人的独立性就越让他有成就感。征服要比恩赐或解放的成就更高。

总之，在西方男人的思想中女人就是这样的：她自由却又受他的支配；她有自己的观点，但最终顺从他的论点；她狡猾地抵抗着他，最后还是认输。他的自尊心越膨胀，他要冒的风险就越大：征服彭特西莱娅[1]比娶柔顺的灰姑娘更令人心驰神往。尼采说：“勇士热爱危险和运动，这就是为何他爱女人——一切运动中最为危险的运动的原因。”喜爱危险和运动的男人，可不希望看到他希望



① Penthesilea，希腊神话中善战的女性部族阿玛宗人的女王。



征服的女人变成一个勇士。他希望这场战斗对他是一场游戏，对女人却是命运攸关。无论男人的角色是解放者抑或是征服者，他的胜利最终只意味着一点：女人彻底承认他才是她命运的主宰。

男人征服女人获得了成功，但成功也让他的占有变得黯然无光。女人和家庭、社会融为一体，她的魔力也就消失了。她的地位下降成为女仆，而并非那个代表着自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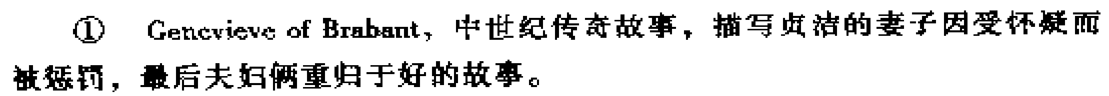
财富的尚未被征服的猎物。骑士制度勃兴之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成了普遍的现象。过分的鄙视，过分的尊重，过分的家庭琐事，都让妻子失去了性吸引力。婚姻原来是男人防范女人的手段，她是他的财富。但所占有的一切到头来也占有了他。婚姻也成为男人的一种枷锁。他就这样掉进了自然的圈套：因为他渴望着获得一个黄花闺女，最终不得不养活着臃肿的中年妇女或是干瘦的丑老太婆。曾是炫耀他的生存的奇珍异宝，变成了令人厌恶的重负：克安缇皮永远是男人最恐惧的老女人的形象。可以看到，她是古希腊和中世纪许多悲剧的主题。即使女人很年轻，婚姻中照样有欺骗，当社会公认性行为应当社会化的时候，婚姻就会将它绞杀。

某种程度上，婚姻的目的是使男人避免被自己的妻子影响，但别的女人却像磁石一样强烈吸引着他，所以他就转向了她们。女人也愿意为同谋，她们要反抗剥夺了自身一切武器的现存社会秩序。为达到将女人与自然脱离的目的，男人用礼教和契约来统治她们，她也就有了男人给予的尊严和自由。然而自由本身就意味着不被一切事物征服。自由给了具有可怕魔力的人，她就会变得更加危险。最为危险的情况是，男人对要不要采取折中的办法而犹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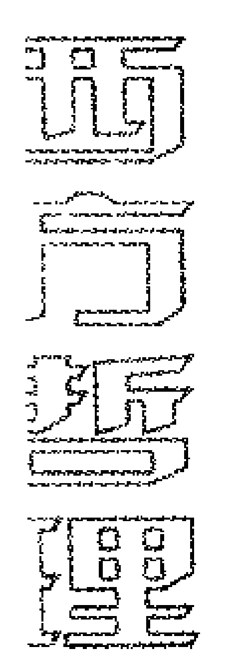
不决。他只好让女人成为奴仆，将她超越的性质压制住，在男人的世界才会承认她。她能拥有的自由仅仅用于消极方面，她可以心甘情愿地放弃这种自由。获得自由只有当她成了俘虏时才成为可能：为了可以再成为自然客体的权力，她不得不失去作为人的权力。白天时，她顺从的忍受仆人的地位，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一只猫或是鹿。她再次裸露出眩目的雪肌玉骨，或是骑着扫帚把上，飞到魔鬼的化妆舞会上。她对丈夫施展夜晚的魔法，更高明的花招是隐藏变换身体的魔法。她宁可以陌生人为猎物，因为他们无法统治她，她对于这些人来说仍旧是花草、山泉、星空和女巫。因此，她已经注定了不忠：惟其如此，她才能在自由的限度内实施行为。红杏出墙甚至并不以她的欲望、思想、意识为转移。这是因为她本身被视为客体，她能奉献给任意一个想占有她的主体。幽处深闺或是面纱遮脸都不能阻挡某些人的的欲望，她以唤醒陌生人的欲望来反击丈夫和社会。从更深层分析，她在扮演一个非常情愿的同谋的角色。她用背叛和通奸来表明自己的独立性，以此嘲笑男人的自大和虚伪，这也是丈夫的妒火一点即燃的原因。从传说故事中能发现，一个女人经常蒙受不白之冤，小小的可疑的火星就引发熊熊的谴责之火，典型的例子是布拉班特的蕾内沃尔芙[①]和苔丝狄蒙娜。甚至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格莱塞尔达[②]就付出了代价。故事的荒谬在于，女人事先并无疑点，而人们要去证实她的不贞，让她自己来证明自身的清白。

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强迫女性完全接受社会要求她所担负的角色。男人自相矛盾地希望迫使女人只有扮演双重角色：男人要让女人专属于他，又想女性与他无关，他理


西蒙·波伏娃/著


① Genevieve of Brabant，中世纪传奇故事，描写贞洁的妻子因受怀疑而被惩罚，最后夫妇俩重归于好的故事。

② Griselda，11世纪著名的贞妇，妻子美德的典范。



想中的女人既是女仆又是荡妇。当然表面上他仅承认前者，后者并不挂在他的口头上，而是深深的植根于他的肉体和灵魂深处。因为这种愿望和道德与社会水火不相容，如同他者，如同不可捉摸的自然，如同“坏女人”。男人没有为他建立并宣称要实行的善而献身，他和恶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联系。不过，若是恶敢于露出它狰狞的真相，男人就会群起而攻。朦胧的夜里，他要求女人作孽；而到

了白天，他却将那件罪行统统推到那个美丽的罪犯身上，声称自己与之无关。女人在床榻之上是罪人，却又造成了对女性贞洁的狂热崇拜。和原始时代一样，男人一直是世俗的，女性则有着宗教性质的神秘魔法，现代社会里的男人风流成性仅仅是小缺点，社会对此十分宽容。男人就算是做出不法之事，依旧是社会的成员。只不过是成了一个肆无忌惮的人，社会秩序不会因此受很大伤害。可是女人如果脱离了社会习俗，就能重返大自然，又一次变成巫婆，在社会中散发出无可救药的邪恶力量。于是恐惧一直伴随着对女人放荡生活的谴责。如果丈夫戴了绿帽子，就要承担妻子的罪责。

自从女人获得了自由，她的命运就已经注定，那就是为女人自身去自由创造。男女的关系由此成为了一种竞争。在成为同类之后，女人似乎依然让男人畏惧。当她还是作为异己的大自然的一部分时，同男人的情况一样。贪婪的雌性昆虫（雌螳螂和雌蛛）的传说取代了辛勤的蜜蜂和鸡妈妈的故事，雌的动物已不再是抚育小生命的慈母，而是吞噬着雄性动物的恶魔。卵子也不被承认是丰饶的源泉，而成了惰性物质构成的沼泽，精子陷人其中被阉割、没顶。子宫，象征着温润、静谧和安全的藏身之处，变成

了充满体液的肉质的陷阱，捕虫草，可以收缩的暗黑深渊，那里隐藏着一条毒蛇，能无休止地消耗着男人的生命力。顺着这一逻辑，性爱的伴侣成了施展妖法的女巫，奴仆变成了叛徒，灰姑娘变成了食人魔，女人全部成了敌人，当男性把自身虚伪地奉为惟一的主体之后，就得付出这样的恐惧的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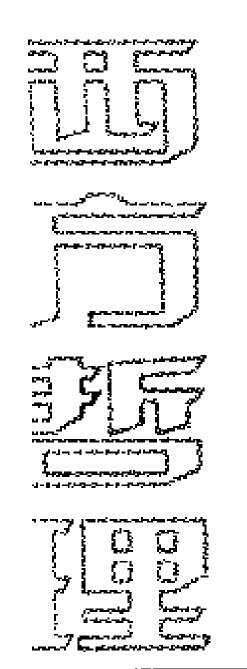
人们都很清楚性（一般来说是女人）在正常或反常这两种情况下的重要作用。有时也会发生别的客体被女性化。既然女人的形象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男人头脑中的虚幻形象，那在男性身体上将她虚构出来成了可能，鸡奸时仍然存在着某种性的差别。不过，女性被追求，在女性化的人们中是一样的。以她为媒，通过女人身上所能表现出来的最好的或是最坏的品质，一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才体味到了欢乐和痛苦，美德与邪恶，纵欲与节制，索取与奉献——作为初学者的他学会了认识他自身。爱恋女人是一种运动或冒险，同时也是一种考验。她意味着胜利的欢欣，也有战胜残存的失败感而带有某种苦涩的欢欣；她是堕落毁灭的晕眩，是对地狱和死亡的拥抱。整个世界的意义，惟有通过女人方能理解，她成了男人行为和感情的寄托，使他的心中所有的主动的自由价值被激活。不足为奇的是，最最深切的失望也不会使男人从囊括他全部梦想的美梦中苏醒。



梳妆的妇女

扬·斯丁　1626～1679年　荷兰

这也就是女人为何有着两重欺骗外表的答案：她代表着男人的一切梦想，同时



他也无法获得这一切。她成为慷慨的大自然和男人之间最为理想的纽带，也代表着还没有被征服的那部分自然的诱惑，一切与善的对立。善到恶的过程中，她是道德价值的象征，也是对抗所有价值的象征；她是行动的实施者，同时又阻碍着行动；男人以此掌握世界，而又因此受挫。因此，她是男人生存状态的起源和根源，代表了男人对他给予这种生存的全部反映。然而，她同时还蹿掇他舍弃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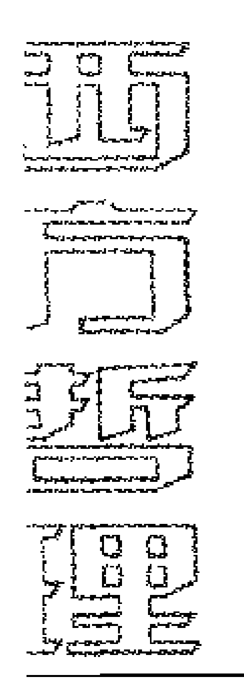
我，陷进庸碌无能和消亡。她是仆人和伴侣，他期待着她成为他的观众和评价者，以此来验证自己对生存的感觉。但是，她对此十分冷淡甚至进而以愚弄和嘲笑反对他。他的向往和恐惧、爱和恨都倾注到她的身上。如果他向她完整地表达某些很不容易的话时，是因为男人想以她来找到全部自我，因为她是一切。换句话说，她完全是他者，是完全的次要的全部。作为他人，她和她的本身是不同的，至少在男人想像中她是不同的。她既代表全部，又不是完全的全部，她成为永远的骗局，即无法顺利获取，同时也无法彻底地使全部生存者之间的关系得以和谐的存在的那种骗局。

第十章　五位作家笔下的女人神话

一、令人恶心的面包：蒙泰朗

有的男人信奉毕达哥拉斯的善恶对立学说，这有着悠久的传统。蒙泰朗[1]就是属于这一传统，他沿袭尼采的说法，坚信惟有衰落时代的那种“永恒的女性”才会被赞美，英雄好汉就应当冲破“伟大母亲”的樊笼。这位善于鼓吹英雄主义的旗手宣称应夺回女人的权力，因为女人的特性是黑夜、混乱和局限。他在《超越女人》中谈及托尔斯泰的妻子时叫嚣着：“这些混乱的影子什么都不是，只是纯粹的女人而已。”他认为，用男人的浩然正气来补充女性的贫乏，这是现代男性的愚蠢和无能。为证明女人缺少逻辑推理，脱离现实，执拗无知，通常人们便会议论起她们神秘的本能、直觉和第六感。认为她们实际上不是观察家，更非心理学家，不懂得怎样认识事物，更无法理解生命的奥秘，她们的神秘在于陷阱与骗局，她们无尽的宝库是无底的深渊，她们无法赐予男人任何东西，只会令他损耗。在蒙泰朗看来，首要的顽敌是母亲。他的早期作品

① Henri de Montherlant，1895—1972 年，法国作家，戏剧家和散文作家。



《流亡》里，母亲阻碍了儿子的订婚；在《奥林匹克运动会》里，由于母亲的卑小自私，一个投身体育的少年遇上了困难；到了《独身者》和《沙女们》，母亲的形象已经发展成为令人憎恶的人，她的阴谋是将儿子永远幽闭在自己黑暗的体内；她摧残着儿子，使他永远属于自己，并以此来充实她可怕而贫瘠的空虚。她成为一个最危险的老师，摧毁了儿子的生机，扯他的后腿，令他无法攀登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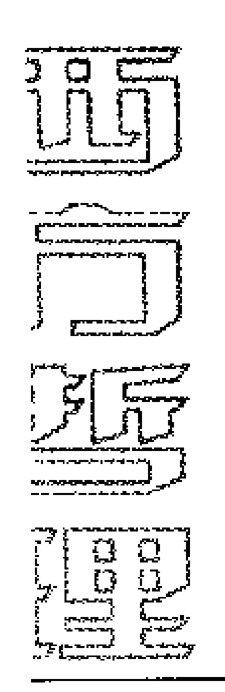
峰，最后堕落成愚蠢顽劣之人。

若是蒙泰朗真正地打破了“永恒的女性”神话，他的本意也只是证明他的成功：以否定女性的方式，帮助女人确立其人的定位。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他不是破坏了那个偶像，而是将它描绘成妖魔。他认定的女人的混乱的基本本质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论调一样，女人就应该从反面定义，女人所以是女人，是她的阳刚之气的匮乏，是每一个女人无法改变的必须承受的命运。反抗这种命运的女人，只能沉沦于人类阶级的底层：她们无法变成男人，又放弃成为女人，她就像漫画式人物般可笑，她们的表演也是矫揉造作的。这些无助于她获得与其身体相对应的自觉意识。蒙泰朗作为一位柏拉图主义者运用了这种理论，视阴阳两极的模式为真正的真理，没有阴阳的个体就像是个幻影。他无情地宣判那些胆大妄为装扮成独立的假小子，有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母夜叉”。对安德丽·哈格勃的外貌描写中就力图证明，想成为重要人物的女人全都会使自身成为装腔作势的傀儡。安德丽极为平庸，品位低俗，不懂打扮，肮脏邋遢，就是指甲和手腕也不像女人，她那点可怜的知识将她的女人味扼杀殆尽。考施妥斯认为她有文化，蒙泰朗则用书中可能的篇幅都来证明她的愚

囊。考施妥斯自己说十分同情安德丽，蒙泰朗却将她描绘得讨厌之极。用这种不动声色的阴谋，女性知识分子的愚蠢被显露无余，这样，别出心裁的陷阱设成了，在女人身上，它把女人能够拥有的所有男人气的特征全部丑化扭曲。

蒙泰朗首先追求的是没有风险的表现自我的自豪感。女人对于男人来说，“就像他正想要驯服的牲畜一样，这两者都使他感到犹豫不决和跃跃欲试”。他使用的方式和别的男人相比不同，就会被看作是莽撞，他们还会对这种尝试加以阻止，并会给他以不怎么受到欢迎的教导和狗拿耗子式的局外人的办法。以通常的做法来对付牲畜一般更为有用，对付女人也是这样：若是挑中的女人十分满意，就算和她处于面对面，男人也毫不在乎，旁若无人。“我才不在乎恋爱关系中的平等，因为我所要追求的女人就要头脑简单。”这句陈词滥调等于没说。为什么蒙泰朗追求的是头脑简单，而不要可与他相提并论的女人呢？说他找不出和他匹敌的女人，就更加近乎实情。准确地说，他可不希望会有与他相提并论的女人，否则会让他备受威胁。对于奥林匹克的竞技，他赞叹奥运赛场上的严格的规则和严肃认真的对立立场，他却从未以其为榜样。在他后来的生涯和作品中，他和他笔下的男主角都对真正的竞争望风而逃，他们只和动物、景物、孩童和孩童似的女人打交道，从不和势均力敌的对手照面。即使蒙泰朗后来迷恋纯粹的运动，但也仅仅是接纳作为情妇的女人，而对她们，他虚假的骄傲不会受到威胁：他选择的女人全是“被动的和脆弱的”，十分幼稚、愚笨，能用金钱支配。他小心翼翼地使她们的心智不能长大成人，一旦发现有成长的蛛丝马迹，他立刻害怕，逃之夭夭。于是不再存在和女人之间的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在男人的王国中，她永远只是一个活着的客体，根本不会成为主体，她的观点无足轻重。蒙





泰朗的男主人公信仰的是一种狂妄自大和只求简单的伦理学，重视的仅仅是她和他本身的关系。他为女人所容纳，或者说他爱怜着女人，都并非为了使她快乐，而是为了他自己寻欢作乐，女人是绝对的劣等阶层，她正好反衬出男人本质的和不可改变的优等性。

蒙泰朗觉得女人下贱和可怜还意犹未足，还要让她们任人蹂躏。甚至认为，仅仅欲望和蔑视的冲突就能成为动



人的戏剧："啊，渴望着被人轻蔑的东西是何等悲壮！……必须是一个手势就能勾搭上手，立刻引爆热情，随即弃如敝履，如同划着一根火柴一样——这就是我们与女人之间发生的悲剧！"实际上没发生悲剧，除非从火柴的角度来看——从一个微不足道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位划着火柴的人小心翼翼，避免烧到手指，无疑，这一举动使他迷醉。要是那个"渴望着被人轻蔑的东西"无法令他快乐，他也不会推拒能使他仰慕的事物了。倘若果真这样，埃尔柏就不会拒绝多米妮克，就会"平等的恋爱"；而且他也不可能对他渴求的事物产生如此强烈的蔑视。无论如何，一眼看出一位年轻貌美、纯真热烈的西班牙舞女身上可以被轻蔑的东西，毕竟不太容易。是否只由于她的贫穷、低微、没有文化才会受到蔑视呢？这一切或许蒙泰朗看来就是缺陷。但从根本上说，他蔑视她的首要原因是她是女人。他非常诚实地说，女性的神秘并不会使男人产生梦想，实际是男人的梦想创造了这这种神秘。他将主观上想要得到的事物引入对象中：并非是女人本身下贱，他才蔑视她们，而是他总是蔑视女人，他才感觉她们如此下贱。在他心目中，他的地位越高，女人和他的相差就越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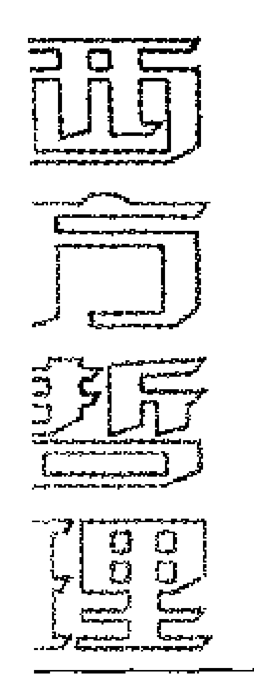
二、阴茎的骄傲：劳伦斯

劳伦斯[1]和蒙泰朗的情况刚好相反，他并没有给男女关系下定义，他将男女两性还原为生命的本原。这一本原不表现在表面上，也不是在意识中包含，而是人类生就的动物性的体现。劳伦斯坚决反对“性与理智”的对立关系，他所信奉的是和叔本华式的悲观主义截然相反的乐观主义宇宙观。他将阴茎代表的生存的意志视为欢乐，并称之为思想与行动的动机，当然，并不包括思想是空泛的概念，行动是无法生殖的机械性运动。纯粹的性行为并非完美，因为这会陷进命定的状态，而与死亡无异，即使是这样残缺的现实，性和死亡还是胜过所谓的纯粹的精神存在。除了如同安泰那样不断与大地接触获得力量之外，男人还有其他更多的需要，他的生命要表现出作为男人的强大的阳刚之气，以此来要求和设想女人。所以，女人既不是玩物，也不是猎物，更不是相对于主体的客体，而是与之相反的另一极，男人赖以存在的一极。没有理解这一真理的男人，例如拿破仑，就不会完成作为男人的使命，原因是他的缺陷。救赎个人光靠追求个人的独立是不够的，惟有尽量使自己融人普遍性之中，他才会得到救赎。男人抑或是女人，在性爱中自以为是或者洋洋自得都是错误的，将自己的性别当成是体现意志的工具，更是大错特错。人要突破自我的局限，甚至超越性别意识的限制，否定个人的统治。最美的莫过于那个分娩的孕妇的小雕像：“一张可怕的面孔空洞而虚无，它几乎被下边那感觉的重负抽象化为无意义。”


西蒙·波伏娃/著

这种迷狂不是牺牲和放弃，更不会出现男女双方其中

① H. D. Laurence，1895—1930，英国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和画家。



一方甘愿被另一方吞噬的可能。男女两性中，哪一方都不该像“被拆下来的碎片”。性角色并非是一块要咬牙忍受的伤疤，夫妻双方任意一个都是完整的，是完美的一极，当男方对其阳刚之气非常自信时，女方也会确信自身的阴柔之美，“每一方都会认为各自被极性化的性别结合得十分完美”。性行为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占有和屈服，两性都以对方达到了奇妙的境界。乌苏拉与伯理终于真正发

现对方时，他们将自由的完美进行相互的给予。“她在他的心目中和他在她的心目中完全一样，对双方来说，对方都是一个全新的丰饶的世界，是触手可及的，而又神秘莫测。”当一对情侣在热烈的欢爱中如胶似漆时，他们将自己互相奉献给了对方。“她意味着什么？一个鲜活、陌生、带有野性的生命，而这一生命此时正和他一道在黑暗中喘息着。它的广袤包纳了他们俩，他感到了如此宁静。他们曾共浴爱河，而这其中甚至包涵着草丛、鸟语和星辰。”查泰莱夫人和梅乐斯也得到了相同的快乐的天地：这对有情人水乳交融在一起时，他们也就和森林、光和雨露浑然一体了。在《为查泰莱夫人辩护》中，劳伦斯将他的理论又推进了一步：“若是婚姻并非长久和极具阳具崇拜意义的，若是它不与太阳、大地、星空、月亮和海浪的韵律一致，和岁月、世纪与光芒交融，它就成了虚无缥缈的事物。若是婚姻并非基于血液的交融，它就是虚无，因为血液才是灵魂本质的东西。”“男人的血液和女人的血完全不同，两者决不会相互混淆。”所以，两条生命之流蜿蜒地交汇到一起，从而共同构成了生命整体。“阴茎就是补充女性血的峡谷的另一种血液，强力的男性的血液洪流用其深邃的深度淹没了美丽的女性血液之流……无论如

何，这两者都无法冲毁这样的堤防。这已是最为完美的结合的形式……也是最为不可思议的事情之一。”这种结合使生命得到了奇迹般的丰富，同时它又想消除对于“个性的存在”这一权利的争取。现代文明司空见惯的现象是，不同个体想在不否定自我的前提下追求与他人的交融，这样的企图注定要失望。随之就会出现那种“虚无、冷漠、神经质的、乏味的和个人的”性冲动，它想要使双方的生命之流分离。情人的关系如果像对待无生命的器具一样，就会产生憎恨，查泰莱夫人和米克利斯就是典型。他们彼此将自己封闭在自我的主体之中，因此他们只能体会到吸毒或酗酒一样的迷狂。失去了对象的狂热，使他们无法体会到对方的真实的情感，最终他们一无所得。

劳伦斯对于男性的高贵深信不疑，仅从描述所谓“阴茎崇拜的婚姻”，将“性”和“阴茎”画上了等号这两点便可见一斑。两条血液的洪流发生不可思议的结合，而被赞赏仅仅是阳性的生命之流。男人的社会性优势被改头换面地体现到了这一宇宙的优势上来。劳伦斯对此做出了苍白无力的解释：阳具之流的无目的性和攻击性适应未来的发展，因此只有男人才能“扛起生命的大旗”；他对于目的和结果的关注，体现出他的超越性；女性一味沉湎于自己的情感不能自拔，完全的内向性使她只能在有限的存在中生存。男人的积极作用不仅仅体现在性生活，还可以从中得以超越。他植根于性的天地，又超脱其外；女人却只能封闭在性之中，她的思想和行动无不为阴茎所支配，没有了阴茎，女人或多或少地总是要出现问题。她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发挥作用，甚至相当出色，但那是游戏，没有真实的严肃性。“女人从根本上是向下指向地心的一极，她的深层的积极性存在于向下流淌的水和月亮的吸引力中。男人则是向上的一极，他则指向太阳和白日的行动。”女性“是以腰部和腹部来思考”，要是不同寻常，生命之流

向上到达胸部和头部，她就能变得聪颖、高贵、能干、杰出，能与男人相提并论；但同时劳伦斯又相信，她将很快自满，就此停滞不前，再返回到性，“性就是她这时的任务”。在行动方面，男人是发动者，起到积极作用，女人的积极处于感情层面。

主妇和女仆

彼得·德·霍赫　1629－1684年　荷兰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劳伦斯的小说被称为“妇女指南”了。他所要求的“接受这一天地”相对于女人比男人要困难得多，男人可以自由地从属于这一世界的秩序，女人只能通过男人为中介。对于女人来说，作为“他者”却依然要体现主体的意志和意识，这无疑是一种屈从。相反，男人拥有的从属的自由很明显的与独断的决定相类似。劳伦斯的男主人公在开头并不被指责，他在开始的时候就已经把握了宇宙的奥秘，他们对于宇宙的从属已经完成，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无比膨胀的自信，使得他们都像傲慢的个人主义者一样妄自尊大，而劳伦斯本人是一个以他们之口布道的神。女人呢，自然要在男人的神性面前拱手称臣。一个有阳刚之气的男人是靠阴茎而不是大脑，以此确立了男人的优势；女性并不是邪恶的，甚至是很好的，然而她必须是服从者。心甘情愿地将自身定位在“他者”的地位上，劳伦斯所提供的“真正的女人”的理想不过如此。

三、主的奴婢：克罗代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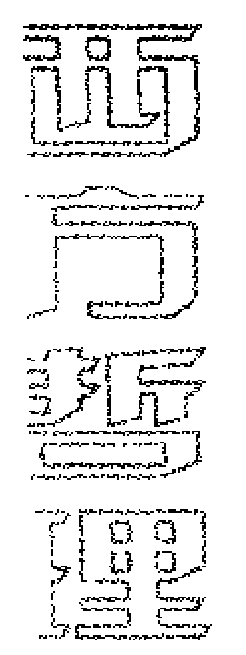
克罗代尔[1]信奉的天主教信条因为乐观主义的色彩而与众不同，甚至乐观到了坚信恶也可以转化为善的地步：恶本身就含有不可否认的善。克罗代尔对一切创造都予以赞美，理所当然的他沿用造物主的观点——这当然是因为造物主的全知全能，大慈大悲。不存在地狱和罪恶，更不会有自由的意志和拯救，上帝在虚无中创造出世界，他早已洞察了未来的堕落和救赎。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心中，夏娃的罪孽将她的女儿们推倒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每个人都清楚神父是何等严厉地指责女人。相反的情况也存在，只要她为了神圣的使命所服务，仁慈的神灵就会宽容。“女人！她在伊甸园的罪过向上帝报答，他和她之间有透彻的理解，在堕落中她以自己的肉体来赎罪！”她是罪恶之源。男人是因为她而被赶出乐园。不过男人的罪孽已然洗清，人类又重新为上帝所赐福：“我们决不离开上帝从一开始就为我们安排的乐园！”“整个大地都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国度。”

没有任何事物不来自上帝之手，他也没有创造任何本质不好的东西：“上帝从不制造无用之物。”甚至不存在没有用处的事物。“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需要的。”因此，女人在和谐的宇宙之中有自己的位置，决非普通的位置：“一种神秘的激情，在卢西弗看来，这是令人羞愧的激情，它使永恒和转瞬即逝的虚无联系起来。”


西蒙·波伏娃/著

绝大多数人相信，女人会成为潜在的破坏者：克罗代尔用莱珂这一人物刻画了那些能毁灭男人的坏女人；《正

① Paul Claudel，1868—1955 年，法国诗人，剧作家。



午的分界线》一书中，伊赛使迷恋她的男人陷人万劫不复的境地。然而，要是没有被毁灭的风险，又何需拯救呢？女人是“危险的因素，上帝故意在这一庞大的结构中设置了这一因素”。男人无法避免肉体的诱惑反倒是好事。“正因为我们有了这个危险的敌人带来的戏剧性因素，一种毒瘾式的刺激，若是心灵没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它就会丧失生机……只有通过考验才会获得胜利。”要唤醒男人

理解自己的灵魂，不仅要靠精神，而且还要借助肉体。一切能使他从睡眠和安逸中苏醒的事物都是好的：“在我们这个以普遍理性建立秩序的微不足道的个人世界中，”所有形式的爱情都作为一种重要的干扰因素起到这种作用。女人经常会带给人以虚幻的欺骗：“我本身就是可望不可及的愿望，我的魅力正源于此。我是实在的欢乐，带给人虚假的苦恼。”况且，幻觉也有自己的好处，正如天使回答唐娜·浦罗海斯时的对话：

——“即使是罪恶也是积德！”

——“那么他爱我也是行善了？”

——“你令他对你产生欲望就是行善了。”

——“令他渴望一种幻觉，渴望一种永远他追逐不到的幻影吗？”

“欲望追求的是存在的实物，幻觉追求的是并不存在的事物，通过幻觉的欲望经历了不存在的事物，去追寻存在的事物。”

通过上帝的神喻，浦罗海斯对罗准格就是“一把穿透他的心脏的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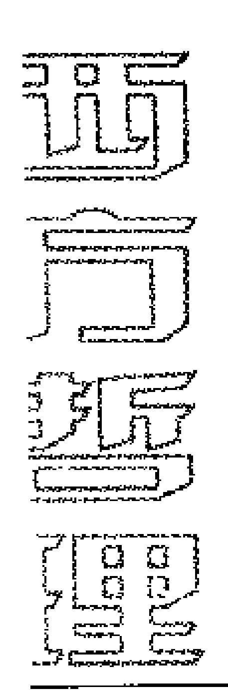
从某种意义上，女人好像不可能获得更高的地位了，克罗代尔仅是用较为现代的话语诗意地表达了天主教的传统。人们始终相信，凡间的女人的命运不会损害她超自然的自主权，天主教对这一点的承认反倒更能维护男人在人间的特权。男人在上帝面前尊重女人，在凡间却将女人视为奴婢。他们相信女人越是绝对服从，对她们灵魂的拯救就越有好处。将自身奉献给子女、丈夫、家庭、家族、教会、国家，这是她生就的命运，也是资产阶级要求她始终服从的命运。男人以他的行动为代价，女人以她的人格为代价。然后用上帝的名义使这一秩序神圣化，以此为依据令这一秩序永远延续下去。

四、女人如诗：布勒东

即使克罗代尔的宗教世界与布勒东[1]的诗意天地有着天壤之别，不过在指派给女性的角色这一点上倒是不谋而合：她作为否定的因素，将男性从其有限存在的混沌中唤醒，她代表着人口、钥匙、大门和桥梁，是将但丁引向彼岸的贝雅特丽丝。“如果我们在刹那间专注于健全的心灵，男人对女人的爱就会依然如金黄的鲜花充满苍穹。”但它对于那种一直认为自己处于一种安全位置的意念来说，仍然是一条恐怖的鸿沟，面另一种爱则导致了“他人”之爱。“向人类大敞的爱的闸门就是为了某种存在而选择的爱的巅峰。”布勒东的心目中，彼岸决非遥不可及的天国，而是在我们中间，同展现沉闷的日常生活那样显现出来。譬如，情欲就能使虚假的知识的诱惑消失得无影无踪。“就我的理解，我们的时代中，性的世界……总是在不断地以其无法揭开的黑暗内核和我们探索这一世界的


西蒙·波伏娃/著

① Andre Breton，1896—1966年，法国诗人，作家，超现实主义运动的领袖。



愿望相颉颃。”只有将自己献身于探索神秘中才可能了解它。女人如同一个谜，她创造谜雾，从很多方面共同反映了“这一奇异的现实，从中我们看到了斯芬克司的永恒神秘”，所以说，她就是泄露的天机。布勒东对她的一位情人说：“你就代表着神秘……我看到了你展现给我的东西，我只看到了它的表象，可无法理解它的结构。”

这意味着女人是诗。她的作用就像杰哈德·德·赖维



尔[①]的一样，但在布勒东的《西尔维娅》和《奥列丽亚》中，她还有着追忆和想像的性质，当梦比现实更加真实的时候，两者没有完全吻合。布勒东相信，吻合才是完美的情况：那里只有一个世界，诗客观地蕴涵于事物之中。女人是一个完全地有血有肉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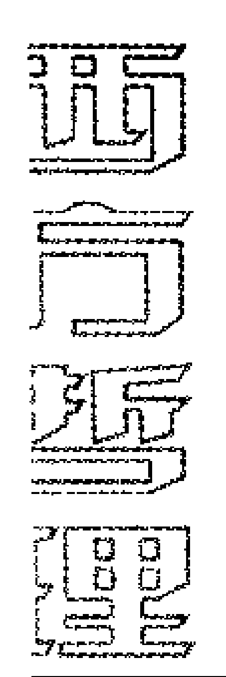
沐浴在爱河中，女人才被彻底地完成和达到。她的特殊在于体现了特殊的命运——没有在天地中随处游荡——而是包容了一切。子夜时分，“此时她成了那完美的镜子，镜中反映的和被召唤到存在中的一切都处在即将成为现在的东西中的时刻”，她的美真是无以伦比。布勒东深信，“找到位置和方式”与“体悟灵魂和肉体的真相”是同一件事。只有在相互的爱，也就是肉欲之爱中才可能体悟。“描绘一个人所爱的女人不应只是他向她发出微笑的形象，更应该是他所质疑的一个神谕”，要是这个女人本身就和一个概念或是形象不同，这幅画像就不止是神谕，她还必须成为“物质世界的基础”。这位洞察的智者认为，这一世界就是诗，他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真正占有贝雅

① Gerard de Nerval，1808—1855年，19世纪法国文学界最早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诗人、作家。

特丽斯。“相互爱恋最终产生的是无法遏抑的吸引力，它会让肉体经过阳光照射之后，在肉体上留下奇特的印痕：精神是永不枯竭的清泉，活力十足，长流不息，只在野百合花和湿地金盏草之间流淌。”

女人被证明了也是人，与男人一样的是，她也不能拯救多灾多难的人间；只有女性才为文明带来了另一种动力，这一动力才是生命和诗的真谛，惟有它可以拯救人类。

布勒东的话语极富诗意，用这种话语表达，女人如诗，因此也被当成他者。她个人的命运问题，和互相爱恋的观念相联系：女人就是为爱情而生存，这并不使女人的身份被降低，因为爱情也是男人的使命。但人们想知道的是，女人可否通过爱情达到通向人世的关键和显示出美？她能否在爱情中或是她自己的形象中发掘出那一种美？她能不能以作为主体人的身份来做出认识诗的诗意举动，抑或是仅仅只是赞美男性的诗作？对男人而言，她本质上是诗；她是否对自己而言也是诗呢？没有人说过。布勒东从来没有以主体的角度来评论女性，也没有塑造过坏女人的形象。尽管布勒东在一些宣言和小册子中对群氓进行了抨击，但他在作品中只表现出这个世界的神秘而真实的面孔，并不描写它的表面的离经叛道。女人只是因为其特殊的特质而引起了他的兴趣。她在大自然中根深叶茂，亲近大地，仿佛是通向彼岸的必由之路。从索菲亚身上得出赎罪和创造的诺斯狄教徒，以贝雅特丽斯为向导的但丁，以劳拉的爱情激发灵感的彼特拉克——他们和布勒东同样信奉着神秘自然主义。所以，深深扎根于自然和亲近大地的存在都是通往彼岸天国的必由之路。她就是真、美和诗，就是一切：又一次处于“他者”的形式下，惟独没有她自己的一切。



五、现实浪漫主义精神：司汤达

现在让我从现代作家中走出，回归到司汤达。离开那些充满狂欢节气氛的将女人装扮成复仇女神、山泽女仙、海上妖女和晨星的怪诞，重新回到一个生活在活生生的女人中的男人那里，让人感到轻松愉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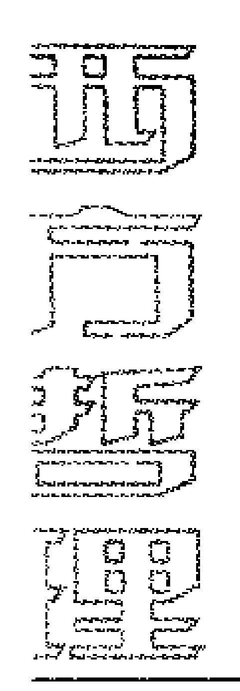
司汤达童年就对女人有肉体欲望上的爱，他的青春情感都倾注到了她们那里：他想像自己是将陌生的仙女从危险中拯救出来的勇士，赢得了她的爱情。进入巴黎之后，他最渴望的是“一个迷人的少女，我们深爱着对方，她成为我的红颜知己。”成年之后，司汤达以金粉来书写他最迷恋的女子的芳名。他坦承：“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性幻想。”他的梦想中，女人的形象必不可少，有了这些形象，那些景物仿佛也平添了趣味。“从杜尔到阿勒斯的途中，峭壁的轮廓在我眼里分明幻化出玛忒尔心的形象。”他的生命的每一件重要的事物——音乐、绘画和建筑，他都把郁郁寡欢的恋人的心情视如珍宝。在罗马散步之时，眼前的每一个场景都与一个女人的形象相伴。在她们引发的痛惜、悔恨、期望和快乐中，他意识到了心中的想法。他以她们为自己的裁判：他在她们的沙龙里流连忘返，在她们心目中竭力树立自己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享受到的最大欢乐和忍受的最深的痛苦都归结为她们的作用，他的事业主要就是她们，他重视她们的爱情更甚于任何友谊，珍视与她们的友谊甚于男人的友谊。女性激发他的创作灵感，他的小说中女性人物占压倒性优势，他就是为她们写作。“我最大的幸运就是我所爱的安琪儿——罗兰夫

人们、玫兰尼·吉尔伯特们到1900年仍在读我的书……”他的生活内容就是她们。她们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地位呢?

女性的这位漂亮朋友并不迷信女性的神秘，他所爱的是现实中的女性。在他心目中，没有什么特性可以一成不变地定义女人，所谓的“永恒的女性”的观念即过分又荒谬。“两千年的时间里，学者们不厌其烦地重复这样的观点：女性生性较为活泼，而男人则较为坚毅；女人的思考比较精密，男人则注意力较强。这种观点如同一个巴黎的有闲阶级者从凡尔赛宫走过时所说，经过他的分析判断，他看到凡尔赛宫里的树整齐地就像修剪过一样。”男女之间的差异是他们的环境不同的结果。例如，女人凭什么不能比她们的情人更加浪漫?“当女人为手工活和令人厌烦的工作忙碌时，她还在梦想着情人，她的情人正纵马驰骋于露天，除非因犯错而被关禁闭。”对女人的指责还有判断力的缺乏。“她们容易感情冲动，不善于理性思考，其实原因可一言以蔽之：传统的陋习不准许她们承担任何家庭责任，理性在此根本无用武之地……若是由你的老婆和佃户们打理你的两份家庭财产的事务，准保比你自己打理还要有利。”如果历史上有才能的女性很少，那纯粹是社会已经完全剥夺了女人可以表现自己的所有可能。“所有生为女人身的天才都不曾获得社会福利，当命运之神垂青时，她们将取得最为坎坷的成功。”

首先，司汤达告诫女人一定不要陷人重大事物的圈套。因为通常重大的事情都超出她们的能力之外，她们极少能冒她们心爱的男人所冒的风险，她们一般更能保留纯真质朴的性格和司汤达最为赞赏的慷慨开朗。他最喜欢女人身上的气质就是真诚，而这是他迷恋的或是作品中塑造的所有女性的共同特性，她们全部都是自由和真实的。其中一些还以炫耀自己的自由为荣：安吉拉·皮特拉戈是个“仪态万方的妓女，一副意大利式的风范，如同露克莱西


西蒙·波伏娃/著



娅·鲍吉娜一样”，艾祖尔夫人是“一个酷似杜·芭里的妓女……她是我所见过的法国女人中虚荣和浅薄的东西最少的一个”，她们公开向社会习俗挑战。拉米尔对习俗和规则冷嘲热讽，桑塞维那夫人得心应手地玩弄密谋，犯起罪来毫无愧色。别的女人自身的智慧和活力超出一般人，曼塔就是典型。还有一个是玛忒尔，她对于所处的上流社会的抨击和藐视，故意表现得与众不同。

德·瑞那夫人的身上蕴涵着独立的灵魂，尽管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她不愿任凭命运的摆布。她的优雅和多愁善感反映了她对周围那帮庸碌之徒的厌憎。她毫不虚伪，心胸开阔，感情热烈充沛，善于营造欢快的氛围。一颗火热滚烫的心从外表难以察觉，但一口气就足以让她燃起熊熊欲焰。

所有这些女性都纯真活泼：她们理解真正的价值并非从外在的事物而来，真正的源泉是人的心灵。这些价值使她们的天地有了魅力：她们一登上舞台，她们的梦想、愿望、欢乐和智慧就会逐走厌倦。吉娜这一“积极的形象”恐惧厌倦更甚于恐惧死亡。她认为，厌倦的麻木状态是“避免了死，却并不是活”；她“对各种事情永远热情洋溢，永远欢快、好动”。她们有的幼稚、不谙世事，有的十分深沉，有的快乐，有的优郁，有的开朗，有的羞怯，所有的她们都对抗着人类早已身陷其中的沉睡。当这些保持着自己的自由（即使这自由相当空洞）的女人追寻到自身的价值，她们就超越情欲，升华到英雄主义，她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量就展现出彻底的奉献精神。

司汤达从没有将他的女主人公仅仅描写成男性主人公的翻版：他赋予她们自己的命运。他尝试了一种极为少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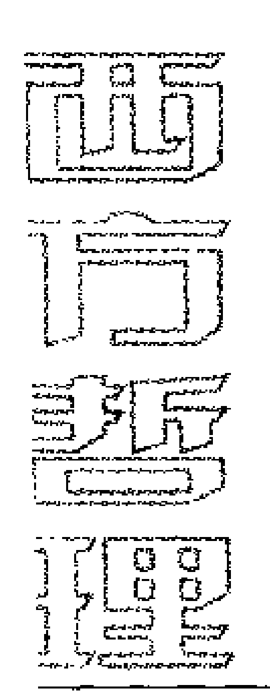
的创作方法，一种前无古人的创作手段——将自己映射到女性人物形象中。摩里弗驭使着玛丽安娜，里查森支配着克劳丽莎·哈罗，司汤达没有像他们那样凌驾于拉密尔，而是分担了她的命运，一如他承担了于连的命运。由此，拉密尔的形象中就带有深思的感觉，且极富韵味。司汤达给这个姑娘设下了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她出身贫寒的农家，没有受过教育，在一堆粗俗、充满偏见的人中间长大，当她真正地理解了“那可真愚蠢”这句话的含义，她就开始冲破成长道路上所有的道德障碍。她如浴火重生般的精神自由让她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她的好奇心、野心和快乐的欲望的支配下行动。在这样坚强的心灵面前，物质的障碍简直微不足道。她面临的惟一问题是平凡的世界中创造着她想要拥有的伟大的命运，她惟有以罪和死亡才能获得它，和于连的命运如出一辙。平庸社会根本没有伟大人物的位置，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



老鸨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年　荷兰

有一点必须充分注意，司汤达是一个坚决的女权主义者，而又不可思议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一般都非常理智，对各种问题的观点都很一致。司汤达却号召妇女解放不能仅以自由的名义泛泛而论，还应追求个人幸福。他坚信爱情不会使人失去什么东西。当男女平等时，她对他的理解程度越深，爱情就越真诚。女人曾被人称赞的某些特征无疑会消失，但它们将换来自由，会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浪漫主义的精神将在人



世间永存。两个人作为不同个体，生存在不同的环境中，自由地相互面对，通过对方，他们证实了自身生存的价值，他们一直在充满危机和希望的历险中生活。司汤达相信真实，没有了真实意味着活着就如同行尸走肉，真实在哪里发光，美、幸福、爱情和因此而来的欢乐就在哪里发光。所以，司汤达不同意严肃问题的神秘化，同他反对伪神话史诗一样，富于人情味的真实才符合他的口味。他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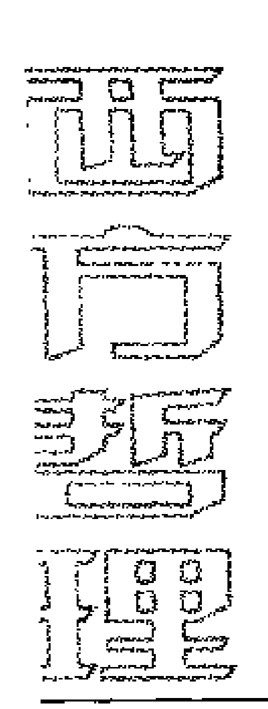
信，女人也是凡人，任何形式的幻想都不会令人们欣喜若狂。

六、小　结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每一位作家都以独有的方式反映了不同的集体神话：将女人等同于完全的肉体，男人的肉体从母亲的体内出生，又在情人的怀抱中得以重生。这样，女人和自然的关系就在于她体现了自然：血的峡谷、盛放玫瑰、海中妖女、山中灵魅，男人视她们为沃土、元气、事物的美和世界的灵魂。她掌管诗歌，成为人世和彼岸天国的桥梁；贵妇或是传达神谕的女祭司，影星或是女巫，她们都是通向超自然和超现实的门户。她命中注定的被限制的存在，她正是以被动性成为和平与和谐的代表，如果她拒绝这一角色，就会成为“祈祷的螳螂”，食人女妖。她永远是特权的他者，以她为媒介，作为主体的男人实现了目标：她是男人的一种手段，对抗他的力量，他的救赎、历险和幸福所在。

当然，上述作家编织的神话各有其独特的方式。此者为确立自己，采用独有的手法独特地定义着他者。五位作

家全都确信自身的自由和超越，不过对这两个词语他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对于蒙泰朗，自由是某种境界：他是超越者，在众多英雄的天地间自由地翱翔，女人则俯首帖耳拜倒在他的脚下，他审视着自己和女人之间的差距，这令他感到有趣，他不时将她拽向他，扶起她，再将她摔向后面，决不让他自己沉沦到她那幽暗的世界中。劳伦斯的超越建筑于阴茎之上，只有通过女人的赐予，阴茎才代表生机和力量，所以内在性就成为有益和必要，这位大模大样地高居于王座的英雄实际上决非半人半神，他还仅仅是个孩子。女人不该被蔑视，她是财富之源，但她只能帮助她的男人的超越，自己个人的超越必须无条件放弃。克罗代尔要求女人具有这种热情：他希望男人用自己的行为扩展生活的领域，女人使生活维持现状。天主教认为，人间的所有世俗事务最终都是有限的存在，必将成为虚无，上帝才是惟一的超越者；在上帝看来，行动的男人和服务男人的女人都是平等的，双方都从世俗状态中得到拯救，拯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可以自主的。布勒东则把性别的等级颠倒过来，他认为，男人想要超越的行动和自觉的想法构成了愚蠢的神秘化，它带来的是战争和愚昧，造出了官僚体制和人情的冷漠。由此，被限定的、纯洁的、没有显露的现实反面成为了真实，真正的超越因此得依靠被限定的存在完成。他的想法与蒙泰朗恰恰相反：蒙泰朗信奉战争，因为战争会让女人走开；布勒东崇敬女人，则是因为女性可以带来和平。蒙泰朗将精神和主观性混为一谈，拒绝认同既定的宇宙，布勒东相信精神客观地在世界的中心存在；女人使蒙泰朗感到危险，她使他的孤寂被打破；而女人则是布勒东令人惊奇的显现，她将他从他的主观性中拖出来。关于司汤达，可以看到，女人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神秘力量：他认为她同男人一样存在，也是超越者，在这位人文主义者看来，两性的自由存在是在相互关系中实现



他们彼此的价值。他觉得，如果他者仅代表另一个人，在生活中带来了“刺激性特强”的感觉，就已经很有意思了。他从不寻求“完美的均衡”，也不用那令人恶心的面包充饥，他不寻找奇迹，对宇宙或者诗漠不关心，他关注的只是自由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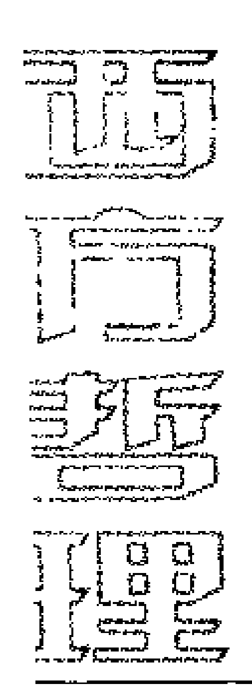
列举了这么多例子之后，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每一位作家描绘女性的时候，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观念就会流

露出来。从女性形象上，经常不由自主地暴露了他的世界观和他的梦想之间的裂隙。在作家的作品中自始至终都没有贬低女人的痕迹，这本身就说明有问题。而像劳伦斯的作品那样，女性气质包括了“他者”的所有特性，那它就极为关键了。当女人只是作为另一部分人，像司汤达作品中所做的那样，作家关心的只是她的生活中的个人历险的经历的时候，它仍然是关键的，而在今天这个个人问题已不再是焦点的时代，它的重要性已大大减低。无论如何，女人仍然在相当的程度上起着“他者”的作用，当男人还在以超越自己为自身的目标时，他还是要更透彻地理解他是什么样的。

第十一章　神话与现实

女性的神话在文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神话在日常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地位？它怎样影响着人们的习惯和行动？只有明确了神话同现实的关系，才能作出回答。

现实生活中，女人的面目多种多样，但以女人为中心的每一个神话，都想彻底概括她，都要成为惟一的解释。所以，许多相互矛盾的神话流传着，男人困惑于女性这个观念下多样的不连贯性。由于所有的女人都与这些原型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并且每一种原型都宣称自己揭示了有关女性的惟一真理，现在的男人也就在女朋友面前又感到诧异，如同过去的诡辩家不能理解白种人和黑种人面感到的惊讶一样。社会习惯早就向着绝对的方向转变：如同幼稚的人相信事物的关系固定不变，阶级关系、社会功能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举个例子，父权社会以维护世袭财产为核心目的，它必然意味着：不但拥有和遗传财产的人存在，同样存在的还有窃走所有者财产并让财产流通的男女。冒险家、骗子、扒手和投机者诸如此类的男人，为社会唾骂；而利用性魅力的女人，也能在不受法律制裁的情况下，让青年甚至长辈拿出他们的世袭财产。这些女人，有的以不正当手法窃取遗产，有的在挥霍她们的猎物的财产。这种角色通常是邪恶的代名词，这种女人也被称之为“坏女人”。然面矛盾的是，在有些情况下，如她们和父



亲、兄弟、丈夫或者情人在一起时，她们又化身成守护神。名妓“敲诈”腰缠万贯的富豪，却往往给予画家和作家慷慨的支助。现实生活中，阿斯帕西娅和蓬帕度夫人的双重人格比较容易被理解。然而如果女人被描绘成螳螂、毒草和魔鬼后，同时又证明女人也是缪斯、大母神和贝雅特丽丝，那就会把人的头脑搅得混乱不堪。

一般情况下，群体象征与社会形态用相反的对立面进

行定义，矛盾将成为永恒的女性的本质。神圣的母亲和残忍的继母相关联，天使般的少女和邪恶的处女密不可分，因此人们有时认为母亲代表生命，而有时认为母亲意味着死亡；有时相信所有的处女象征着纯洁的精神，有时则确信所有处女都是献给魔鬼的肉体。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确实神秘，用麦特林克[①]的话就是“像整个世界一样神秘”。每个人对他自身才是主体，只有自己才能内在地认识自己。他者永远意味着神秘。男人认为能了解的那种自我具有的不透明的程度，在作为他者的女人身上更深。男人无法以任何共同感觉的方式来了解她的独特体验：他们对女人性快感的感受、月经的不适和分娩的巨痛一概不知，这成了他们的惩罚。事实上，两性都是神秘的：身为男性的他人，每个男人也有自己的存在，一种女人难以理解的内在自我，她们也不了解男人的性快感。根据我所说的普遍规律，男人思考世界的概念范畴，是用他们的观念作为绝对的体系而建立起来的，与所有的情况相同，他们在此也误解了相互性。这是因为女人对于男人是神秘的，她被认为在本质上也是神

① Maeterlinck，1862—1949年，比利时象征主义剧作家。

秘的。

在各种神话里，最为牢固地树立在男人心中的，莫过于女性“神秘”这一神话。它带来了无数的好处。首先，它让所有的费解都变得易于解释，在用客观来对抗主观精神的贫乏的时候，“不理解”女人的男人有了绝佳的理由。他不承认是自己无知，而解释为除他之外的另一种“神秘”，这也是吹嘘惰性和虚荣的借口。一颗被爱情折磨的苦不堪言的心灵，由此少了许多痛苦：要是他的情人任性，说话浅薄愚蠢，这种神秘性可以使他原谅一切。多亏了这种神秘，那种消极的关系因此而不朽。

女人与一切被压迫者一样，有意掩盖她客观的真实性。奴隶、仆人和穷人，那些看主人眼色行事的人，都明白用一直的微笑或是深浅莫测的无动于衷去对付主人。他们的真情实感以及真正的行动都被小心翼翼地隐藏起来。同样的，女人从小就学会了欺骗男人，玩花招和诡计多端。她的脸上总是带着不自然的表情来谈论男人，她如此谨慎、虚伪，永远在演戏。

神话中包含的“女性神秘”的思想，有更深远的含义。它直接隐藏在绝对他者的神话里。倘若承认这个次要的有意识的人也有不容置疑的主观性，也可以自我思考，实际上就承认了这个他者也有主权，可以重新成为主体。为了彻底消除所有相互性的可能，就要让他者相对于自己也成为一个他者，使他的主观性受制于他的他性。在纯粹的内在世界里，这一被异化成为一种意识的意识就成了一种神秘。相对于他者自身这一神秘也成了神秘，他在本质上的神秘使它成为绝对神秘。



我们发现了女人神话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以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女性神话有着奢侈品的性质。只有男人不再迫切需要他所需的东西的时候，女性神话才会出现。关系越是具体，这些关系的观念化成分越少。古埃及的农

民、贝督因人的牧民、中世纪的工匠和现在的工人，他们对于工作和不再贫困的要求，和他们的女人不无关系。对她们来说这些关系一清二楚，无须什么预兆来表明，更不用说这些预兆是凶是吉。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空闲时代和社会阶级，才是邪恶或善良的女性形象的创始者。伴随奢侈的也有实用的因素，这些梦想不可避免地为利益所左右。无疑大多数神话的根源都与男人对自身生存和其周围世界的态度有关。然而，超自然的理念则被父权社会当做辩护词。这些神话，让父权社会以强有力的方式，将它的法律和习惯灌输到每一个人心中。通过神话的形式，集体无意识强行施加到所有人的头脑中，以宗教、习俗、语言、寓言、歌曲和电影等为媒介，深化浸透于被物质现实极端奴役的劳动者的意识里。从此，每个人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乏味体验的象征：他被所爱的女人欺骗时，她被称为狂妄的子宫，他因为自己的性无能而痛苦时，她就成了一只螳螂。当丈夫为妻子的陪伴而快乐时：噢！她竟是那和谐、平静和慈爱的大地！大多数男人对于讨价还价乐此不疲，绝对完美的梦想，在神话中得到补偿。即便是最微不足道的激动，最不值一提的烦恼，也要用永恒的理念所反映。这个理念实则是一种虚荣心的幻想。



读信的女子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年　荷兰

女性的神话，是用虚假的客观性做成的陷阱，以现有评价标准为信条的男人，毫不犹豫地跳进这个陷阱。现

在，我们又要运用不同于现行标准而是自身对现实的认识，以及替代这种认识所需要的自身判断力了。女人神话全力制造出幻想的意象，掩盖了和自主的生存主体的真实关系。拉夫格[1]疾呼："全是幻象！我们不可能以此理解她们，所以应该杀死她们。最好还是让她们平心静气，使她们受到教育，使她们不再狂热于珠宝，成为我们平等的伙伴、我们的亲密朋友、在同一天地中的真正的伴侣，让她们爱穿什么就穿什么，剪短长发，和她们无所不谈。"事实恰好相反，如果男人不再视女性为一种象征，他并不会失去什么。要是梦想与正常的日常事务没什么两样，就成了老生常谈，它们与鲜活的现实相比，无疑显得沉闷乏味。对善于做白日梦的梦想家来说，对诗人来说，女人决非邋遢得不修边幅的家庭主妇，而是永不枯竭的清泉。对女性极为真诚并护之如宝的时代，并非封建的骑士年代，更不是向女人大献殷勤的 19 世纪，而是将男女视为同类的某些时代。那时代的女性是如此的浪漫，在《危险的私情》、《红与黑》和《永别了，武器》中表现的极为明显。拉科罗斯[2]、司汤达和海明威笔下的女主人公不表现神秘的性质，她们依旧非常迷人。承认女人的人的地位，对男人的体验毫无改变，它不会使体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丧失，也不会使它的强度削弱，如果这一体验发生在两性之间的话。舍弃女人神话，决非是为了彻底破坏两性关系的戏剧性，也并非对那些向男人揭示的女性现实的真实意义的否定，更不是为了将诗歌、爱情、历险、幸福和梦想扼杀，只是为了将行为、感情和激情的大厦修建在真实的地基之上。

① Lafrgue，1860—1887 年，法国诗人。

② 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法国作家、剧作家，代表作是《危险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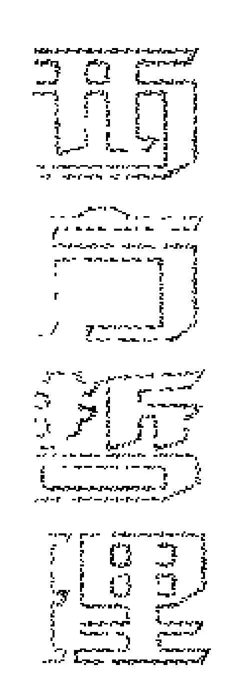


第四部　女性的形成



第十二章　小女孩

女人是逐渐形成的。从生理、心理或是经济因素，没有任何的既定的命运可以决定人类中的女性在社会中所表现的形象。决定这种处于男人和阉人中间的、有着所谓女性气质的人种的是整个文明体系。只有另一个人蓄意所为，一个人才会被确定为他者。就存在的主体和为自身的存在来说，一个儿童可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和别人有性别之分。无论男孩儿女孩儿，他们的身体先是一种主观力量，他们认识世界的工具：靠眼和手，而非是性器官来认识世界。不同性别的婴孩经过相同的出生、断奶的过程，他们的兴趣相同，快感也相同。最初，他们最大的快感的来源是吮吸，而后经历了肛门期，此时排泄带给了他们最大的快感。他们生殖系统的发育过程相类似，他们因为一样的好奇和冷漠，对自己的身体进行着探索，从阴蒂和阴茎上获得似有若无的快感。当这种感受发展到需要外在客体来转移的时候，母亲成了转移的对象：那柔软光滑、富有弹性的女性肉体引起性的欲望，这种欲望表现出来就是抚弄。女孩子在亲吻、拥抱和爱抚母亲时，同男孩一样表现出带有攻击性的姿态。他们同样嫉妒着新出生的弟妹，并以相同的行为表现出来：焦躁、忧郁和尿床。此外，他们使用同样的小伎俩向大人撒娇，讨大人的欢心。到十二岁为止，小女孩仍然与她的兄弟一样的强健，智力也相



同，任何方面她和他都可以相提并论。如果说青春期之前，甚至早在婴儿时期，她的性征看起来就已经定型的话，这不是什么神秘的本质直接使她天生被动、爱撒娇、富有母性，而其他人对这个女孩的影响几乎一开始就是重要原因，她从小就被灌输完成女性天职的观念。

要解释儿童的行为必须用下列观点：他从肉体的形式发现了自己的有限和孤独，他被遗弃在陌生的荒漠世界之

中。于是他将自己的存在引入一个影像中，企图以此摆脱这一厄运，这个影象的真实性和价值有多大，由其他人决定。当他从镜中辨认出自己的影像时（这一过程和断奶的时间基本一致），他的同一性便可能开始证实了：他本身和这个影像一模一样，而且只有在被镜子反映时才会形成。无论镜子是否真的起了这种作用，有一点可以肯定，孩子将近6个月的时候，开始模仿父母的行为，并在他们的注视下，把自己当成了客体。这时他已经成长为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的过程中，他以映射的形式反映自己。

儿童再长大一些，他就用两种方式反抗他最早受到的遗弃。他想要反抗这一分离：他奔进母亲的怀抱中，寻求母亲的温暖，请求她的爱抚。他还希望通过别人的赞赏来实现自我的确认。在他眼中，大人如同神灵，因为他们巨大的力量支配他的存在。他能感觉到他们注视的魔力，注视的奇特在于有时使他成为小天使，有时又让他变成小怪物。他的这两种自卫方式互为补充、相互结合，而不是相互排斥。他被确认的企图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感觉就能以亲吻和爱抚的方式在肉体上得以确证：这纯粹是种儿童单方面的在母亲慈爱的目光下和温暖的怀抱中体验到的被动

的幸福感。三到四岁之前，女孩子和男孩子的态度一样，他们都希望断奶之前的那种被动的幸福感永远保持下去，都会做出诱惑和炫耀的行为以引起注意。男孩子像他的姐妹一样想讨大人的欢心，引得大人发笑，得到夸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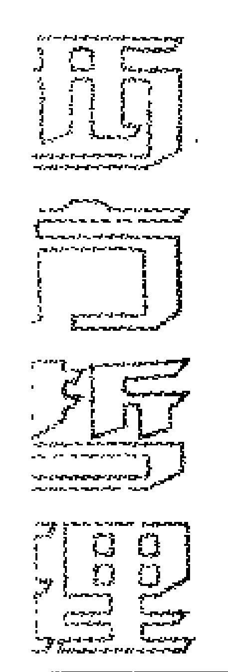


持水壶的少妇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年　荷兰

也就是这一阶段，小女孩第一次看似有了特权。心理的"断奶"使孩子从母亲温暖的怀抱中走了出来，和第一次相比，不再那么残忍，过程也相对缓慢。但是，特别是对男孩子来说，却是一点一滴地失去了以前习以为常的亲吻和抚爱。而小女孩却还可以受到温言抚慰，她继续紧紧依偎在母亲身旁，父亲会将她抱在膝上，梳理她的头发。她的花衣服漂亮可爱，大人对她的眼泪和任性十分宽容，她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她的表情和撒娇使大人们感到有趣——身体的触摸和温柔的眼神保护着她，她可以免受孤独的侵害。相形之下，小男孩就没有了撒娇的权利，他努力做出的诱惑和装模做样的行为，只会得到大人生气的结果。人们这时会告诫他："男子汉不应该要别人亲自己……男子汉不应该每天照镜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人们对他的期望总是成为"一个小男子汉"，而如果他不依赖大人，独立行事，大人就会对他表示赞许。要是他不想讨大人的欢心，他们也会感到高兴。

说男孩子开头不如他的姐妹们受到宠爱，原因是人们对他有成就大事业的期望。对他的苛求也就是对他的高度



评价。莫拉斯[1]曾在回忆录中提到他曾妒忌过自己的弟弟，因为母亲和奶奶只温柔地抚慰弟弟，父亲则牵着他的手，一边从房间里出来，一边对他说："啊，我们毕竟是男人，还是离那些女人远点吧！"男孩子终于确定，他们更加优越，所以受到更加严格的要求。为了使他具有战胜困难的勇气，人们逐步向他灌输男人地位和身份的自豪感。抽象的观念以具体的东西表现出来：他的阴茎就代表

了它。对这个又小又软的性器官的自豪，他并非自发地体会到，而是从周围人们的态度中感觉到的。母亲和保姆一直就有这样的传统，认为男性生殖器和男性的观念本就是同一件事。它对于爱情来说十分重要，它对于征服女人的过程中非常关键，抑或是发现它在小男孩的身上显得如此谦卑，感到一种报复的快意，她们都很得意地对待小男孩的阴茎。拉伯雷曾描述过高康大[2]的保姆们有关他阴茎的各种评论和捉弄，历史上也有路易十三的保姆们相似做法的记载。甚至保守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阴茎起绰号，当与他谈论它时，仿佛说的是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人儿。如前所述，她们使它成为"第二自我，它往往比他本人更加聪颖狡黠，更诡计多端。"

从解剖学的角度，阴茎似乎与这个角色不谋而合：它自由地突出于身体的外部，如同一个天然的小玩具和小木偶。大人们给予了阴茎价值的同时，也提高了男孩的身份。一位父亲曾说过，他的一个儿子已经3岁，还蹲着撒尿，而且整天和他的姐妹和表姊妹们厮混在一起，性格羞

① Maurras，1868—1952年，法国政论家、学者、散文作家。

② 拉伯雷小说《巨人传》中的主人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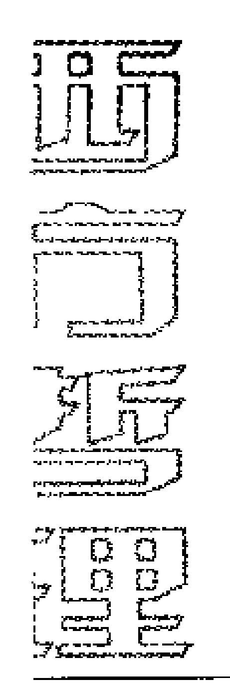
怯而忧郁。有一天，父亲带他上厕所，对他说："现在我就让你看看男人是怎么撒尿的。"从此，这个孩子为站着撒尿而骄傲，并嘲笑女孩子"从一个小洞中撒尿"。使他抱有这种傲慢的态度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因为女孩子们缺少那个器官，而是只有他被父亲单独给予指导，她们都没有这样的机会。并非是阴茎所象征的直接的优势，使得孩子产生优越感，恰恰相反，阴茎获得高度评价可以看成是对第二次"断奶"的痛苦的某种补偿，它是由大人们发出的，然后男孩子高兴地接受。男孩子以此得到保护，不会因为自己失去婴儿的地位和没有变成女孩儿觉得遗憾。他开始将他的性器官视为超越性和引以为豪的主权的象征。

小女孩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她的生殖器不会让母亲和保姆们感到有什么可以敬畏或敏感之处。她们不准许她关注那个被覆盖不见的、更不能握在手中的神秘的器官。从某种意义上讲，她根本就没有性器官。她没有体会到这种欠缺算是缺陷，她一直认为自己的身体十分健全。但她又发觉自己和男孩子在世界上的地位不一样，她确信种种因素相加让这一差别衍变成劣等性。

大多数的精神分析学家最广泛讨论的问题，莫过于著名的女性"阉割情结"了。他们认为，在不同的情况下，阴茎嫉妒的表现也千差万别。许多小女孩好多年之中一直并不清楚男性生理结构。作为孩子来说，她觉得世界上有男有女是天经地义的，就像天上有太阳和月亮一样，她所能明白的仅仅是字面含义，她的好奇心尚不具备分析的能力。对许多的女孩子来说，这个悬在男孩子两腿间的小肉块，毫无意义甚至有些可笑。它的特别之处和有些人的衣着打扮或发型的特别没什么两样，。小女孩一般在刚刚诞生的小弟弟的身上头一次看到阴茎，海伦·多特奇[①]曾指


西蒙·波伏娃/

① Helen Deutsch，1884—1982年，美国女精神分析学家。



出："年龄非常小的小女孩对于弟弟的阴茎并无深刻印象。"她举例说：一个一岁半的小女孩，第一次看到阴茎时毫不在意，觉得它没有什么要紧的，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如此。有时，阴茎甚至被当成了畸形物：这种赘生物悬在体外有什么作用，就像肿瘤、乳房或赘肉一样，只会引起厌恶。不可否认，也有相当多的小女孩对于兄弟或是小朋友的阴茎很感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在性的层面上

对它感到嫉妒，更说不上她深深地为缺少这个器官感到苦恼。她期盼着自己也有一个阴茎，不过仅停留在感性上。

对孩子们来说，排泄机能特别是排尿功能是非常有趣的。尿床有时是孩子对父母过于偏爱另一个孩子的抗议方式。有的乡下的男人蹲着小便，也有乡下的女人站着小便，排除了其他原因，这也是许多农民的习惯。但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习惯上一般要求女人坐着或蹲着小便，男人才会站着撒尿。对小女孩来说，这构成了最为明显的两性差别。她小便时必须蹲下，裸露着臀部，之所以要藏起来是因为这种方式既令人尴尬又不方便。面那种羞耻感，往往因为女孩子的一些特殊情况而变得更加强烈，如笑得过于剧烈导致的小便失禁。她的控制能力一般没有男孩子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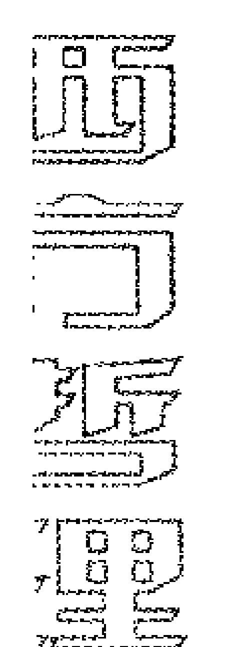
然而，就算是少女没有对阴茎产生妒忌，缺少这一器官也会对她的命运发生无可置疑的深远影响。男孩子的优势主要是，由于这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官，他最少可以通过它部分地确认自我。他可以将身体的神秘和威胁排除到外部世界中，以此来保持和它们的距离。虽然他也带有由阴茎而来的危险，他担心它被割掉。不过，这种恐惧和小女孩对于她那"内部的"无穷无尽的恐惧比起来，和常常会萦绕一生的恐惧相比，很容易摆脱。小女孩对自己体

内发生的一切极为关注，在她的内心深处，她从出生就不像男性那样透明的，而是更深地陷人生命的奇异神秘性中。由于有了一个可以反映自我的第二自我，小男孩可以放心大胆地表明自己的主观想法。那个反映他的自身存在的客体，就成为了自主、超越和权力的化身。他测量自己的阴茎的长度，和小伙伴比试谁能尿得更远。最终，勃起和射精就会成为满足和挑战的依据。而在小女孩身上，任何器官都不会成为她自身存在的象征。为弥补这一缺陷，把自己当做一个第二自我，就要依靠属于她的一个外来的客体——布娃娃。可以引起注意的是，法语中 poupee[布娃娃]这个单词，同时有包扎受伤的食指之意。被包扎过的手指同其他手指明显不同，孩子既感到它有趣，又同时为它而自豪，对它说话就是表示认同的痕迹。不过，这个有着人脸的小塑像，或者没有面孔的谷穗甚或是木头片，对于女孩子也是非常令人满意地替代了那个替身，那个天然的生成物：阴茎。

其中主要的区别是：布娃娃既指代着整个身体，同时又代表着被动客体。小女孩对它完全认同，把它视为没有生命力的特定客体。男孩子以阴茎为手段寻求的是作为自主主体的自我，而小女孩宠爱、打扮着她的布娃娃，也梦想着自己被这样的溺爱和打扮。或者干脆认为自己就是个活动的布娃娃。透过赞美和责备，形象和言语，她明白了美和丑所代表的含义，她已经明白，要讨人欢心，她必须“美丽如画”。她渴望自己能如画般美丽，她穿着艳丽，在镜子前反复打量，与公主仙女们争奇斗妍。


西蒙·波伏娃/

所谓“女性化”的女人本质的被动性特征，是从小就灌输给她的特性。认为它和生物学的事实相关则大不然。它实际上是大人和社会共同强加给她的命运。男孩子的优势条件是，他的生存方式与其他人的联系，可以让他在主观上维持自己的自由。他受到的生活锤炼的目的就是为了



向外部世界自由地探索。他与别的男孩比赛谁更加坚强独立。他看不起女孩子那一套。他玩爬树，打架，玩战争游戏。他认为自己的身体是支配自然的和战斗的武器。

与此同时，女人自主生存和作为客观自我——“成为他者”的矛盾一直存在。人们灌输给她的观念是，要讨人欢喜，就要尽力来讨好，将自身放在客体的地位，因此，她需要放弃自主的愿望。在人们眼中她就是个活的布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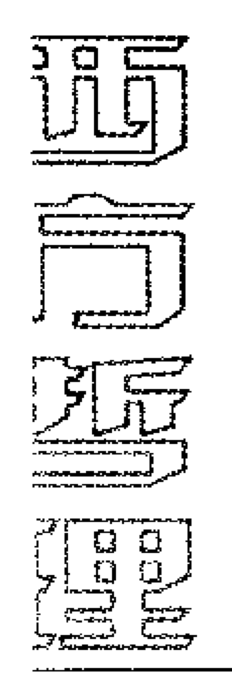
娃，没有自由。这样形成的恶性循环就是：她发现、认识和掌握的身边的世界的自由越少，她对于自身潜力的发掘也就越少，她就更加不敢确定自身的主体地位。在受到鼓励时，她就能表现和男孩子相同的活力、相同的好奇、一样的探索精神、一样的坚强。在把女孩子当做男孩培养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情况。

后文我们会谈到母女关系的错综复杂：女儿对母亲的意义在于，她是母亲的化身，又是一个与之不同的人，母亲既溺爱着女儿，又本能地带有敌意。母亲将自己的命运深深地烙在女儿身上：她以发现和宣称女儿身上的女性气质为傲，同时又以此为自身复仇。这种心理状态，也能够在鸡奸者、赌徒和吸毒成瘾的人身上发现，他们的共同心理是对于自己隶属某种特定群体既感到自豪又引以为耻，他们极力游说别人改变信仰，努力搜寻新的信徒。女孩子要是由女人来养育，女人就会极力使她成为和自己一样的女人，并表现出一种兼有傲慢和怨恨的态度。即便是母亲心胸豁达，真心地盼望女儿得到幸福，一般情况下她也会觉得最好还是让女儿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这样的女性更易为社会接受。由此女儿只被准许和小女孩一起玩耍，由女老师来管教她，她只会在年纪大的女性中成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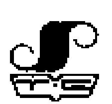
一如古希腊女人被关在闺房的天地中。书籍和游戏是专门为她准备的，这样可以使她更好地迈进公认的标准中。她被塞进满脑子有关女性的智慧箴言，人们近乎苛刻地要求她应有女性的美德。教会她做饭、缝纫和理家，如何保养容颜，怎样保持魅力，如何显现端庄。她的穿着奢华而又累赘，要时刻小心；她的发型时髦；她的行为还要遵循种种规范的制约："站着姿态要笔直，走路时不要和鸭子似的"；为了培养优雅的气质，她那自然的举动必须加以限制，给她的禁忌有：她的举止不能像个假小子，不能参加剧烈的运动，绝对禁止打架。人们逼迫她像她的女长辈一样成为仆人和偶像。今天，随着女权主义运动的深入进行，人们在少女接受教育方面已经达成共识，鼓励她进行体育运动。不过，要是她无法在这些领域获得成功，会比男孩子更易得到宽容。成功对她非常困难，因为她还有另一项事业需要完成：不管怎样，她同时又是一个女人，不可以失去女性的气质。

在年龄幼小的时候，女孩子容易顺从地接受种种摆布。儿童一般只会游戏和梦想，装扮成某种人，装扮成某种角色。一个人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想像中的成就里的话，他并不清楚扮演的角色和实际上是什么人。小女孩就用未来的希望来补偿男孩子现在的优势地位。这种希望是她身为女人而命中注定的，在扮演的游戏中已实现。她到目前所了解的还仅仅是她的童年世界，一开始她相信母亲有着比父亲更高的权威，她以为世界是母权至上，她模仿着母亲，以母亲的形象确认自己，甚至会将两个人的角色颠倒，她会对母亲这样说："当我是大人，而你是小孩时……"布娃娃不仅作为她的化身，也是她的孩子。这两种功能并不矛盾，因为真实的孩子同时是母亲的第二自我。她责罚布娃娃，又会抚慰它，就像在母亲面前替自己辩解，同时自己又表现出像母亲一样的尊严，她就这样将母亲和


西蒙·波伏娃/



女儿结合到一起。她对布娃娃倾诉着心中的秘密，她又抚养着布娃娃，在布娃娃身上体现自己的至高的权威，有时还会扯掉它的四肢，打它，折磨它。以布娃娃来感受到主观的肯定和确认。母亲有时也会在这种想像生活中扮演角色：女孩和母亲一块儿扮演布娃娃的父母，成了没有男人的一对夫妻。在此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神秘的“母性本能”。小女孩由此确定了照料孩子是母亲的天职，她就是



这样受到教育的，她所听到的故事，读到的书籍，以及童年所有的经历，全部印证了这种想法。人们暗示她体会这一未来财富的魅力，送给她布娃娃，以便这些价值在未来实现，她的“使命”被深深烙进脑海中。

孩子们都感到“深处”有莫大的诱惑，认为事物内部隐藏着神秘的财富。他们对诸如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小布娃娃，大箱子套小箱子，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他们都喜欢观察绽放的花朵，出壳的小鸡和漂在水盆中的“日本花”。一个小男孩打破一个复活节彩蛋，看到了里面塞满的小糖球时，高兴地大叫：“哇，就像个母亲一样！”人的身体中竟然可以有一个婴儿，简直像变魔术一样神奇，母亲好像拥有着神奇的魔力。许多男孩子遗憾自己没有这种权力。后来，他们掏走鸟蛋，踏坏幼苗，如同疯狂一样的摧残着周围幼小的生命，正是源于对他们无法创造生命的感觉的发泄。而小女孩则在想到有一天她能创造生命的时候感到心满意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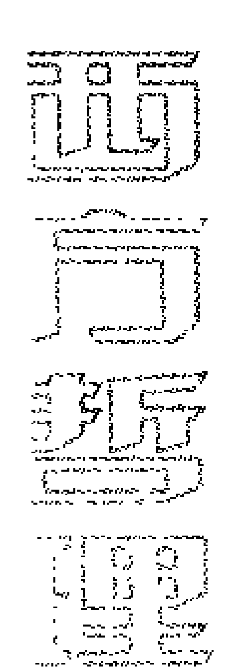
从布娃娃游戏中就可以体现出这一希望。此外，家务活也使小女孩拥有了自我表现的机会，大部分的家务活可以由年龄很小的孩子承担，诸如洗刷、扫地、摘菜、给婴儿洗澡、煮饭等等的活儿，人们一般不让男孩子做，却准

许甚至要求他的姐妹去做。特别是大姐时常要分担母亲的家务。无论是方便的原因抑或是出于敌视和虐待，母亲因此减轻了不少重负。而女孩子则被迫就这样过早地感受了这个被繁杂事务所充斥的世界。这无疑对表现她的女性气质有利，然而却剥夺了她的欢乐、自由和无忧无虑的童年。她过早地失去了童年，过早地明白了女人的地位给予人的那些限制。当她进入青春期之时，就已经像一个成年人，这些在她的生命历程中留下特殊的烙印。一个孩子要是承担过于沉重的劳动，就很可能成了一个早熟的奴隶，从而也就注定了会过没有快乐的生活。不过，若是让她完成力所能及的事情，她就会为自己和大人有同样的能力而自豪，并非常乐意承担大人的责任。这种分担不难实现，因为从女孩到主妇只有咫尺之遥。一个在职业上有特长的男人，他告别童年是在学徒时期。因此小男孩认为他父亲的行动很神秘，他不可能根据父亲描绘出他未来成为男人是什么形象。与此相反，对于女孩子，母亲的行动完全能够理解。就像她的父母所说："她已经成了一个小主妇了。"有时人们也同意这样的观点，即女孩子比男孩子成熟得早。其实，与其说她更接近成年时期，是因为大多数女人都在此阶段，传统上依旧还是带点幼稚的时期。事实上，女孩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早熟，她为自己在比她更小的孩子们那里扮演小母亲的角色深感骄傲，她非常愿意使自己变得重要。她的话语通情达理，她



戴红帽的女孩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年 荷兰



发号施令，显现出比小弟弟更优越的姿态，还以平等的身份和母亲进行对话。

女孩子这时的处境已经有了深刻变化：总有一天，她将成为与万能的母亲同样的女人——但她永远不可能成为拥有特权的父亲，她和母亲的联系是关于主动的竞争——而面对父亲，她所拥有的仅仅是被动地等候父亲的赞许。男孩子带着竞争的感觉考虑着父亲的优势地位，而女孩子

则在承认的同时，只能无奈的羡慕。前文已经指出，弗洛伊德称之为厄勒克特拉情结，实际不是他所设想的源于性欲，面是对主体的完全放弃，处于顺从和崇拜之下，心甘情愿地成为客体。如果父亲有喜爱女儿的表示，她就会认为从中得到自身生存的极为有力的证据；这样她就有了其他女孩很难具有的优点；她可以藉此实现自我并受到崇拜。她或许一生都在极力追求那种失去充实和宁静的状态。要是女儿没能获得父爱，她或许终其一生都会觉得自己有罪，应受到惩罚；也有可能会在另外的地方寻求评价，而对父亲采取冷漠进而敌对的态度。毕竟，掌握通向世界的钥匙并不仅仅为父亲拥有，通常情况下，男人都享有男人的权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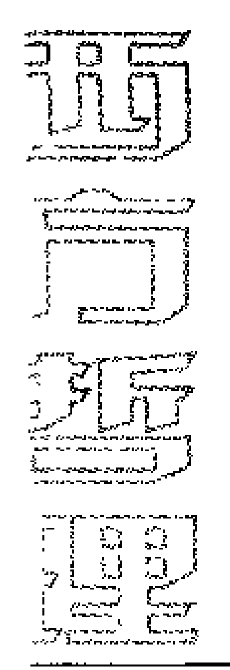
在小女孩的心灵中，一切事物最终都在证明着这一等级制度。她周围的历史和文学的文化氛围，睡前催眠的童谣和故事，全是对男人无休止的赞美。男性创建了古希腊、罗马帝国和法国等等所有的国家；是男人在世界上探索，发明工具和开发世界；这个世界是男人统治；最后一点，也是男人用雕像、绘画和文学充实了世界。无论儿童书籍、神话、故事和童话，都是反映男人自尊和欲望的神话。因此，小女孩是用男人的眼光来观察这个世界，并发

现自己的命运的。

女人的最高目的就是迷住一个男人的心，这是所有的女人渴望获得的回报，即使她们或许勇敢、不怕冒险。而通常所看到情况是除了美貌，男人对她们别无所求。由此就很容易理解，为何少女如此痴迷那些和自己的身体容貌相关的事情。不管是公主或是牧羊女，只有美丽才可以得到幸福和爱情。丑陋永远和邪恶与凶残相关，在厄运雨点似地落在丑八怪的身上时，人们禁不住要问：这是为了惩罚她们的罪恶，还是为了惩罚她们的丑陋？年青貌美的少女，虽然前途光明，开头经常是作为受害者的身份出现。布拉班特的蕾内沃尔芙和格莱塞尔达创作的故事，并非像它们表面上那么简单。爱情和折磨，在故事中紧紧联在一起。女人只有坠入不幸的深渊之后，才能得到最为奇妙的胜利。在上帝或者男人面前，小女孩都知道，惟有完全地服从，才可以使她无所不能；她从受虐中获得乐趣，因为受虐可以令她征服世界。在狮爪之下那雪白的胴体是鲜血淋漓的圣·布兰丁娜（st. blandine），了无生机地躺在水晶棺内的白雪公主，长眠的睡美人，昏死的阿塔拉（Atala），一个个遍体鳞伤、被动的、受伤害的、柔顺的、受辱的美丽动人的女主人公，都告诉她们的年轻姊妹们，惟有殉难、受苦、顺从的美德才能得到令人崇敬的显赫。不足为奇的是，在少女的兄弟扮演英雄的角色时，她乐意于扮演殉教徒：异教徒将她投诸狮吻，荒淫的男人抓住她的秀发，她的国王和丈夫将她放逐森林深处；她服从，她受苦，她死去，在她的头顶却有着神圣的光环。德·诺阿利斯夫人（Mme Anna de Noaillese）写道：“在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就已经想获得男人的爱情，使他们焦虑，被他们拯救，在他们的怀抱中死去。”


西蒙·波伏娃/著

绝大多数少女所渴望的戏剧事件，与她们的家庭都有



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她们企图切断和母亲的联系：有时表露出针对母亲的敌意，有时又流露出想要获得母亲保护的强烈渴求。她们试图独占父爱，她们嫉妒、敏感、苛刻。她们时常沉湎于想像，幻想她们的父母并非亲生父母，而是收养了她们。她们将秘密生活归之于父母，沉思于他们的关系。她们时常幻想，父亲一直被误解、是不幸的，他认为妻子并非他的理想伴侣，但女儿却能胜任这样的角

色。或是相反，幻想母亲要忍受父亲的粗俗、残忍是应该的，母亲害怕和他发生一切肉体关系。幻想、演戏、孩子气的悲剧、虚情假意和孤僻的行为——所有这一切的根源，不是所谓的女性的神秘在起作用，而诞生于女孩子的环境和生存处境中。

一个人本来相信自己是自主和超越的主体的人，却发现自己的劣等是先天的固有本质，这种体验非常奇异：对于任何将自己视为主体的人，发觉在自身中有他性和差异性，这种感觉很奇怪。当小女孩开始学习怎样在世界上生活，理解了在世界上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时，就产生了这种体验。她的生活领域，男性的界限、限制和支配无处不在，无论她达到多高的地位，到多远的地方探险，她的头顶始终有一个顶棚，四周总有围墙挡路。男人信奉的诸神在遥不可及的天国，所以对男人来说诸神事实上并不存在，而小女孩却要在男人的诸神中生活。

女孩子无奈地承认了她的被动地位，也就等于顺从地接受了外界强加给她的命运，这是一种令她恐惧的灾难。年轻的男孩子，无论他野心勃勃还是淡泊处世，或者胆怯，都有着理想的未来。他能成为一个水手或是工程师，可以留在乡下或跑到城市，他也能周游世界或是成为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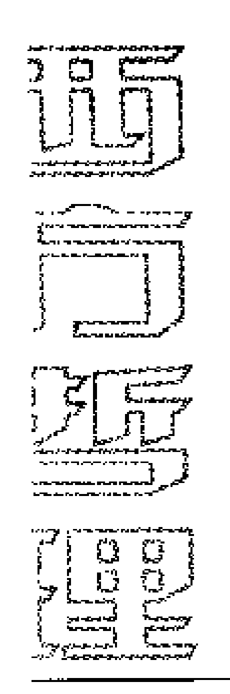
翁，面对充满未知数的未来，他感觉到自己是自由的。少女则会成为妻子、母亲和祖母，她会像母亲一样持家，如同自己小时候受到照料那样照料自己的孩子——仅仅十二岁的时候，她的未来已经在天国里注定了。她根本不需要虚构，这样的例子天天在她身边发生。她思索着这种时刻可以预见的、每天都在无法抗拒地向她走来时，既困惑又恐惧。

这也就解释为什么小女孩较之她的兄弟，更加注意性的神秘。不错，男孩子们对此类事情也相当感兴趣。不过，他们对于将来要承担的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漠不关心。而对于女孩子，结婚和做妈妈将关系到她的整个命运。从她隐隐感觉到它的秘密的时候开始，她的身体就似乎受到了可怕的威胁。母性魔力此时荡然无存：不管女孩子获得信息的来源是否恰当，或早或迟，她终究会明白，婴儿不是偶然进入母体，也不是因为魔法的缘故，她会忐忑不安地扪心自问。一般情况下，她并不觉得体内生长着一个寄生体是多美妙的事情，反倒是惶恐不安。一想到这怪异的突起，她的内心就充满恐惧。

更让小女孩备受煎熬的是，她实在是搞不明白在她身上压着的未知的祸根的具体情形。她接受的信息并不连贯，书上的东西也自相矛盾，就是专门的解释也不能驱开笼罩心头的重重疑云，不计其数的问题困扰着她：性交时会疼吗？性交会令人兴奋吗？一次的时间有多长——5分钟或是持续一夜？有的书上写着：女人经过一次拥抱就会成为母亲，而别的书上却说：她经历了数小时的快感之后，依然没有怀孕。人们每天都"做那事"，还是偶尔为之？为找答案，女孩子就翻看圣经，查词典，询问朋友，在懵懂和厌恶中摸索着。



对还没有情欲的儿童，该如何解释亲吻或爱抚会产生快感呢？家中人时常亲吻，有时甚至是吻在嘴唇上。为何



黏膜的这种接触，可以产生使人晕眩的感觉？这就像对着瞎子解释颜色，没有对性欲的意义和兴奋与欲望在直觉上的统一，构成性欲的各种因素就显得令人惊异和不可思议。当小女孩意识到她是处女，处于封闭状态，而要成为女人，就要让男人的阳具插入她的体内时，她特别感到厌恶。因为裸露癖作为一种性变态十分常见，许多少女都看到过勃起的阳具。况且，她们都见过雄性动物的性器官。

不幸的是，马的阴茎时常会让她们盯着看，这东西令她们惊恐。对生育的恐惧，对男性阳具的恐惧，对威胁着已婚男女的“危机”的畏惧，对猥亵行为的厌恶，对无意义的行为的嘲笑——一切的一切都会让小女孩发誓：“我永远都不结婚！”或许这是保护自身不经受那种痛苦、愚蠢行为和猥亵威胁的最可靠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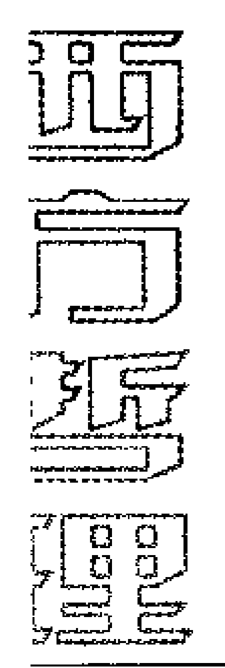
当青春期发动的时候，小女孩的身体开始向女人的身体转变，开始有了性感。除了性腺仍停留在幼年时期，功能发育不良，孩子的青春期危机将在十二三岁时到来。女孩们危机的到来要早于男孩，所引起的变化也更剧烈。少女在惶恐、沮丧中面对它。乳房、体毛此时开始发育，她的心情有时骄傲，但更多的还是羞怯。女孩子突然之间害羞起来，甚至不愿在姐妹或母亲眼前裸露自己，她观察自己的胴体时，又惊又怕；她看到那坚硬、微微涨痛的乳核变大之时，十分痛苦，乳核在乳头下方，此时还和肚脐一样不怎么让人厌恶。但她担忧地想到：她有一个经常疼痛的部位，这个部位的疼痛和烧伤痛或者牙痛相比，虽然是微不足道，可疼痛终究是反常现象。人们知道，正常情况下尚未发育成熟的乳房，不会轻易发生癌症。这是一种暗示，在生命规律中正发生着某种突变，即使这不是一种

病，但还带有挣扎和撕裂的特性。女孩无疑要从儿童期发育到青春期，但她自己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发育：日复一日，她的身体始终如一，这是定型和健全的，“发育”这个词语有着令人害怕的含义。生命只有到达一种平衡状态时，像花一样娇嫩、玉一样润滑地到达彻底固定的外貌时，才令人感到安心。而女孩子乳房发育的时候，就会感觉“活生生”这个词语的含义模糊不清。她既非黄金，也非钻石，而是一种奇异的物质形态，永远处于变化之中，而且难以言喻，内部的不干净的成分也在制造过程中。她已经习惯头上飘荡着一头丝缎一般的长发，但现在腋下和阴部又长出新的体毛，使她变成了和动物或是海藻一样。无论有没有受到足够的教导，她都能通过这些变化感到自我彻底地失去已无法挽回：她看到了自己落入了生命的循环之中，这种循环使她个人的生存发展被吞噬，她预感到依附于人，她在这种依附中，注定从属了丈夫和孩子，注定了死亡。就她的乳房本身来说，就像是某种没有用的、强行加诸于她的赘生物。手臂、大腿、皮肤、肌肉，甚至于那丰满的臀部——此时这些还明显有自身的作用。惟独她的性器官，排泄无疑是一个用处，其他的作用还有些暧昧，但它是隐藏的秘密，别人无法看到。而在毛衣或外衣之下的乳房，却炫耀着自己，女孩子相信它属于自己肉体的一部分，现在意识到它们代表着肉体。这个肉体现在成了其他人注视和瞩目的对象。

许多少女都以减肥的欲望表现出这种厌恶。她们对食物不感兴趣，强迫她吃，她就会间歇性呕吐，她们对自己的体重过分关注。另外一些少女则表现得极端羞怯。在她们的心目中，就算走进客厅，甚至逛街都变成了某种折磨。精神疾病常由此萌生。


西蒙·波伏娃/著

这种羞耻感常使女孩的举止笨拙可笑，经常感到害羞。害羞又加剧了她的胆怯，而胆怯本身就是种病态恐



惧。斯特柯尔[1]谈及一个少女时说：“作为一个女孩子，她的羞怯过于强烈，甚至这一年里，她都用牙疼的借口在脸上缠上绷带。”

也有的时候，女孩子在通常称之为“前青春期”的阶段，即月经初潮之前，尚没有为身体的发育感到羞耻，则以变成女人为傲，高兴地观察着胸部的隆起。她还把手绢垫在衣服里，在大人们面前炫耀。而她尚不理解她身上所

产生的变化的意义。月经初潮给她显示出这种意义，她开始变得羞怯起来。如果这种感觉业已存在，未来就会更加强烈甚至变得异常了。

小女孩要长大成人，必然要受制于她的女性气质所决定的领域范围。男孩子从新生的毛发中，惊奇地发现了模糊的未来远景。面女孩子只能对她的命运所决定的这个“注定的野蛮戏剧性事件”羞愧。和阴茎从社会习惯中得到了一种特殊的评价相类似，月经成了祸根也是社会原因。这是男性气质的象征，面那正是女性气质的象征。而女性气质意味着相异性和劣等性，这样它被当成是耻辱。在女孩子的心目中，生命永远被难以表述的本质所决定，因为这种本质中缺少阴茎，所以不会有主动性的形式，但从她的大腿之间流出的经血使她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如果她承认了她的处境，就会高兴地迎接月经来临——“你现在成了真正的女人了！”假如她一直否认她的处境，这种血的判决就会令她备受打击，她就会彷徨失措。每月一次的不洁之物，令她有厌恶和害怕的感觉。“‘做女人’原来就是意味着这样！”那一直是隐隐感觉到的外部压迫她

① Wilhelm Stekel，1868—1940年，德国精神病学家，学者。

的注定的命运，此时就潜伏在她的腹中。她无处逃避，感觉在劫难逃。

在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女人仅将月经视为进人成年的特殊仪式。无论男女，他们的身体都有着某些令人难受的要求需要满足。这些都容易适应，因为大家都有此要求，它们对任何人都并非一种污点。进人青春期的女孩子对月经的恐惧，是源于它使她被列人一种劣等、有缺陷的性别。社会地位的降低令她感到沉重的压抑。如果她没有感到失去做人的自尊，她就会以流血的身体为傲。完全地保持这种自尊，对于自己肉体的羞耻感将大大减弱。而一个可以依靠体育、社会、智慧或宗教使自己实现超越的少女，不会觉得她的性特征是一种不健全的发育，并且很快就不再为此所困扰。少女在这一阶段往往出现的神经过敏的情况，是她在自己将要经历无法想像的折磨的命运面前，深感孤立无援的缘故。在她心里，她的女性气质代表着疾病、痛苦和死亡，她为命运陷人深切的苦恼。

不光是月经，还有其他的生理变化，向女孩昭示作为女人的命运的来临。到此时为止，她的性冲动依然体现为阴蒂的，无法弄清女孩子的自慰是否像男孩子一样普遍。在她两岁以前，甚至从开头几个月，她就出现手淫。她放弃自慰大约是在两岁左右，之后又再次开始。从解剖学角度来说，起源于男性肉体的阴茎，比隐藏在粘液区域中的更有诱惑力。然而偶尔的接触——女孩爬绳爬树，或者骑自行车，衣服的摩擦，游戏时的抚摩，甚至朋友、年长的孩子或大人的教唆，让女孩子感受到那种努力用手来再现的感觉。



不论怎么样，这种快感一旦被获得，就变成了一种独立的享受：它与一切孩童玩耍的游戏一样具有轻松天真的特性。女孩子很少觉得这种个人隐私和她的女人的命运有什么联系。她和男孩子就算是发生了性关系，也往往是出

于好奇。她在此时感觉慌乱、激动、无法控制，简直身不由己。她身体上性感应区的敏感程度在提高，女性的性感应区多至可以把她的整个身体都看成是性感应区。这可以通过抚摩，玩笑般的亲吻，裁缝、医生或理发师的无意接触，通过朋友放置在她的头上或后颈上的手，使她感觉到。在性游戏中，和男孩子或女孩子扭在一起厮打的过程中，她渐渐明白并常常有意地追求这种强烈的刺激。吉尔伯汀和普鲁斯特在香榭丽舍大街的扭打即属于这一情况。当她在母亲毫无疑心的目光下跳舞时，她在舞伴的怀抱中感受到一种奇特的情绪。这样，连守护严密的处女，也经历过较为具体的体验。



花边女工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年　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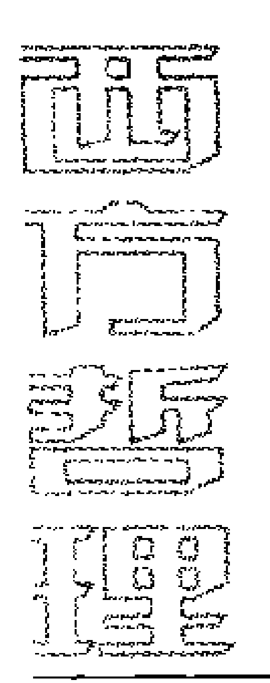
此外，通过阅读、聊天和各种耳濡目染，少女对于她肉体的激情有了明确的概念。她开始变得楚楚动人，渴望激情。她的兴奋、极为热烈、湿润和隐约的不适中，她的身体表现了新的令人不安的一面。少男公开表明对自己的性冲动十分自豪，他以此来高兴地接受他的男性地位。他的性欲本质上是带有攻击性、如饥似渴的，他从中认识到自己的主观性和超越性并予以肯定，他向同伴炫耀它，他的阳具是他自豪的象征。那种驱使他追求女性和面对世界的两种冲动，从类型上说是相同的，他也是以这两种冲动来认识自己的。与此相反，小女孩的性活动从来都是神秘的，她的性冲动一旦爆发并席卷她的全部肉体，她的隐秘就会成为一种极其让人痛苦的经历：她被这种骚动深深地折磨着，

就像在承受着某种令人耻辱的疾病。它是被动的，是一种即使在幻想中也无法自我解除的状态。她不会梦想过占有、塑造和侵入，她已注定了等候和渴望的角色，她从中理解了依附，在她被异化的肉体中体会到了危险。

在她的千变万化的希望中，她对于被动的接受幸福的梦想中就可以看出：她的身体是注定要属于另一个人的客体，所以她愿意只以它的内在性来实现性体验。她渴望着另一个人的手、嘴和肉体的爱抚，而并非那个人的手、嘴和肉体本身。她的性伴侣的形象模糊不清，或在梦想中虚无缥缈。然而，她摆脱不了萦绕在她心中的他的形象。她对男人的幼稚的恐惧和厌恶，比以前更为模糊，更使她痛苦。此前，这些感情源于她童年的身体并与她成年的未来背道而驰，现在，它的根源则是少女从自身的肉体中感受到的复杂性。她意识到她注定被占有的命运，她渴望着被占有，而她心理上又厌恶自己的欲望。她既在渴望，又恐惧着那甘愿扮演猎物的被动性角色。在一个男人面前赤裸的想法令她极为兴奋，而她又恐惧在他的注视下的无助。那只锁住、抚摸着她的手，比他的眼睛更专横、更贪婪，使她惊恐万状。而最为明显的、最可恨的占有她肉体的象征，是男性生殖器的插入。当少女想到男人竟然如同在皮革上戳出一个洞似的，在她的胴体上戳出一个洞，或是像撕开一块布一样将身体撕裂，就愤恨不已。与之相比，随之而来的剧痛还在其次。最让她气愤的是，她应该承受这种伤害和疼痛。一个少女曾告诉我："一想到要被一个男人刺穿，真是太恐怖了。"不是恐惧男性生殖器而导致对男性的恐惧，但是这种恐惧代表了对男人的恐惧的实证和象征。通常的想法是，"插人"意味着猥亵、令人感到耻辱的意义。这种意义又成了这种想法的主要的组成部分。


西蒙·波伏娃/著

少女的焦虑以可怖的梦魇和困扰她的幻觉表现出来：当她在心中有一种危险诱人的意愿蠢蠢欲动时，就说明她



在很多情形下陷入了一种被强奸的幻觉中。这种意识往往以某些有固定意味的象征通过梦境和行动体现出来。晚上睡觉前，女孩子探察床下，生怕某个居心叵测的流氓躲在那里。她倾听着家中是否有盗贼的动静：一个恶棍破门而入，手持利刃威胁她。男人多少会让她害怕，她对父亲有了某种讨厌的心理：他的烟味难以忍受，她也十分反感在他之后进洗澡间。即便她对父亲的深情一如既往，但她在

生理上的厌恶却无法消除。女孩子装做生气，好像是对父亲有了敌意，这种情况在妹妹那里屡见不鲜。精神病学家发现，年轻的女病人做同一种梦：她们在幻想自己被一个男人当着一个岁数比她大的女人的面强奸，而这个女人却认同这种行为。显而易见，她们用象征的方式要求母亲同意自己放纵自己的欲望。

产生这种幻觉的原因是，她们遭到一种不合理的压抑，即虚伪的道德压抑。当少女从自身的变化和周围环境中发觉生命和性的神秘涌动时，人们却强迫她“纯真”、“贞洁”。她应当如雪般洁白，如玉般晶莹。她身着轻纱，房间布置高雅，走进时要柔声细气，黄书绝对禁止阅读。然而，没有一个“好女孩”能超脱到从不曾沉湎于“可恶的”念头和欲望中。她尽力对最好的朋友隐瞒它们，甚至自己都不敢承认。她试图只用日常规律来生活和思考。对自己的背叛让她看上去狡猾、郁郁寡欢、满面愁容。最终，她会觉得没有什么比压抑这些念头更为困难了。

较为合适的教育方法是，在教会她接受自己时，既不自满，也不为之羞愧。现在我们已经明了了少女青春期要忍受的戏剧化冲突：她不可能在不承认自己的女性气质的

前提下，就变成“大人”。她终于理解，她的性别以一种不完善的、固有的生存方式来惩罚她，现在她还要面对一种下流的疾病和模糊的罪恶形式的生存状态。她的劣等性，开始仅是感觉到某种剥夺，现在因缺失阴茎而成为污秽和罪恶。因此，她在走向未来时，是残缺的、耻辱的、带着原罪的。

第十三章　少　女

整个童年中，小女孩都处于被欺辱和被剥夺主动性的状态，但她还是认为自己是个自主的人。不论是家庭和朋友的关系还是学习和游戏中，她似乎还是有超越性的人；她那被动的未来像梦一般不真实。青春期的到来，使这一未来越来越近，并深植于她的体内，从而展现出极为具体的现实性。它拥有一直以来就存在着的主宰命运的性质。进入青春期的男孩子是主动迈向成人的，而少女只能等待这个全新而又难以预料的时代的到来。从现在起，它的故事将是被编好的，时间会裹挟着她进入这个漩涡中。她要向童年的过去告别，现在似乎仅仅是个过渡时期。她没有任何实在的目标，只是在消磨时间。青春在被掩饰的外表下，在等待中消逝，她在等候男人。

进入青春期的男孩无疑也梦想着女人，也有对她的渴望。但她仅仅是生活的一部分，不会涵盖他的命运。而对女孩子来说，自童年开始，不论是承认女性的气质，还是想超越它，要实现或是逃脱，却全要由男人决定。他有着珀尔修斯或圣·乔治[1]一样耀眼的容貌，他就是解放者，有财有势，他拿着打开幸福之门的咒语，他是迷人的白马王子。女孩子甘愿屈服在他的爱抚下，感到为生命的狂澜

① St. George，公元三四世纪之间，传说为古代基督教殉教圣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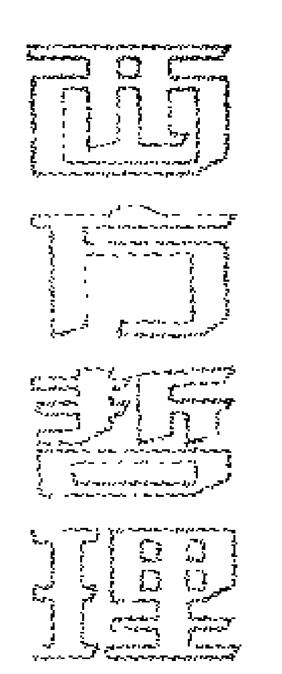
所淹没，好像在母亲怀抱中的感觉。屈服在他温柔的权威之下，从中重现父亲怀抱中的安全感：拥抱和关注的魔力将会令她又一次呆若木鸡。她确信男性更优越。这种男性的权威并非孩子的幻觉，而是有确切的社会和经济基础，男人是世界的主人。周遭的一切都向少女表明，成为他们的仆人才是她的最高目标，父母如此教导她，父亲将女儿的成功视为骄傲，母亲从中看到的是远大前程，朋友们对她受到男人的关注而感到又妒又羡。

婚姻不仅是一种光荣的事业，而且不会如其他的许多事业一样使人有厌倦感，它不但可以使女人完整地拥有自己的社会尊严，而且可以从性的角度获得爱人和母亲的实现。这既是周围的人为她设想的前途，又是她本人的梦想。所有人都持以下观点：找到丈夫，或找一个“保护神”，是她最为重要的任务。在她心目中，男人代表着他者，如同她对于他也是他者。但不同的是，男性的他者位于主要者的地位，相对来说，她自认处于次要的地位。她能挣脱儿童教化院式的家庭，摆脱母亲的控制，她将能够开创自己的未来，然而她并非主动地去征服，而是屈膝投降，以求被动的、温驯地接受新主人的控制。

人们相信，她以听天由命的姿态对待这种服从，就意味着她从身体和精神上都劣于男孩子，无力与之相竞争，而一旦彻底放弃无望的竞争，她就会将保障自身幸福的希望寄托在比她优越的等级成员上。她之所以抱着这种认命的想法，不是源自于所谓的先天的劣等性，正好相反，是这一劣等性导致了她的所有缺陷，这种想法的根源在于处于青春期的少女的过去，源于社会环境，特别是已被决定的她的未来。


西蒙·波伏娃/著

不足为奇的是，对于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来说，他可以强烈要求别人重视他的存在，而相对于与其看法从未产生直接作用的处于青春期的女孩子来说，世界的面目也不



一样。前者不断对世界进行质疑，无论何时何事，他都可以进行反抗，所以他确信，他对它的接受是主动地认同。后者却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解释世界不关她的事，她所关心的范围内，世界的面目永远不变。体力的受限更使她全方位的怯懦，她无法相信自身存在着她从未体验过的力量，她无力进取、反抗和创造，她已注定了温驯顺从，只准备着接受社会为她设定的位置。她相信事物的现状一成

不变。

青年男子的性冲动，只会证明了他对于自己身体的骄傲，他从中发现了自身的超越和权力的象征。少女或许会不困难地接受自己有欲望的事实，但这却代表着某种羞耻。她的整个的胴体是令她羞涩的本源。小时候她对于自己"内部"产生的怀疑，最终发展成月经危机中产生的令她厌恶的可疑性质。也是因为月经带给她的桎梏和随之而来的那种心态才变成一种巨大的障碍。少女有时感到的威胁，令她无法忍受，导致她被迫放弃郊游与其他娱乐活动，免得她的耻辱为人所知。因此产生的恐惧，影响她的整个生理结构，加重了肌体的紊乱和痛苦。前面已经提到过：女性心理的一个特点即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的调节联系紧密，它们在相互作用着。这就意味着，由于心理和生理活动密切相关，女人的身体，特别是少女的身体处于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青春期紊乱因为心情烦躁而加剧，而这种心情又因为少女觉察到这种紊乱面引起。她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狐疑，她惊恐地注意着身体的每一个微妙变化，所以她以为它有病，它确实有病。可以看到，这具胴体如此娇嫩，而且它的内部的确在发生着内分泌紊乱。而妇科医生公认，他们的病人里，十个有九个是自认为有病

的人，即她们的病根本不是生理的因素，而是由心理因素造成生理紊乱，也就是心理疾病。可以说，做女人的焦虑情绪在损害着女性的身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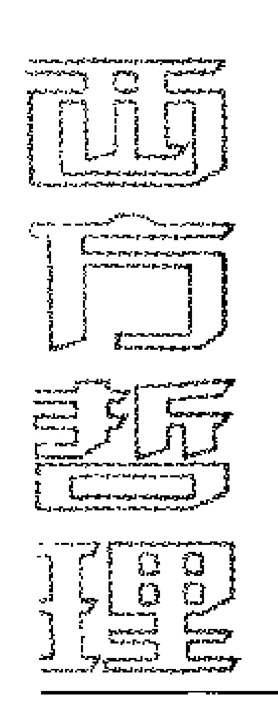


坐在风琴前的少女

约翰内斯·维米尔　1632～1675 年　荷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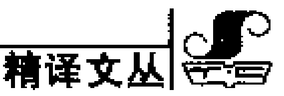
女人受到的教育使她缺乏主动精神，习俗也令她们雪上加霜。她们漫步街头，便会引来注目礼，就会有人前来搭讪。我曾认识的几个少女，天不怕地不怕，然而独自漫步在巴黎街头时，却毫无乐趣可言，因为她们被人骚扰，时刻保持警惕，使她们兴致索然。要是女学生也像男孩子一样，成群结队地嬉笑着招摇过市，必然会被侧目相视；走路时昂首阔步、唱着小调儿、高谈阔论，或嘻嘻哈哈，或吃着苹果，就会激怒别人。这样的女学生会招来侮辱、被人尾随或有登徒子上前搭话。放纵的欢乐本身就意味着行为的不检点。强行加诸女人以使之成为“有教养”的少女，这种变成了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杀了自然本性，压抑了生命活力，导致了紧张、厌倦。

这一厌倦极具传染性，少女不久就会彼此厌倦。她们坐困牢笼，不可能为共同的利益团结一致，因此她们不能离开男孩子的陪伴。这种沾沾自喜的无能，带来了贯穿于她的一生、表现在她的工作中的怯懦。她们相信只有男人才会取得辉煌的成就，她们生怕自己好高骛远。可以发现，14 岁的少女在比较自己和男孩子的时候，就认为“还是男孩子的条件好”。这种毫不迟疑地相信自己的虚弱，导致了懒惰和平庸。一个并不怎么敬重男性的少女，会讥



笑一个男人的胆小怕事，如果别人说她自己就是个胆小鬼时，她会得意地声称：“哦，女人，当然不同了！”

这种失败主义的根源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女并不认为应该对自己的未来负责。她认为无须对自己提出那么多要求，她本人的努力并不能决定自己最终的命运。她不是因为自己的劣等性而将自己交给了男人，而是因为她将自身的命运交到男人手里，从而接受了她的劣等的观念，确立



了自己是劣等性的真理。

进一步说，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事实上并非由增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来获得，而是以塑造自身来符合男人的梦想来获得。当缺少经验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她可能和男孩们一样好斗，或许也想拥有一种粗暴的权威、一种引为自豪的坦率来征服他们。但结局不言而喻：这种态度注定了她的失败。所有的女孩子，从最低贱的到最清高孤傲的迟早都会明白：要想得到别人的好感，她们就要放弃自己的权利。母亲叮嘱她们：再不能将男孩子作为伙伴看待，不要主动献殷勤，而是要扮演被动的角色。不管她们是想建立友谊或是准备调情，必须要小心翼翼，不要露出主动的神态。男人对假小子式的女孩子、女学究或是过于聪明的女人都敬而远之，女人胆子太大，受教育程度太高，太有个性只会吓跑男人。

所谓的有女性气质，也就是要表现得柔弱、无用和温顺，她要梳洗打扮，时刻准备，要克制她的本性，用长辈教导的典雅和矫揉造作伪装起来，任何的表现自我都会对女性气质和魅力产生损害。因为做人和做男人的使命之间并无矛盾，相对于女性，少男的生命转变较易完成，这种优势童年时期就已暴露无疑。在独立和自由的自我表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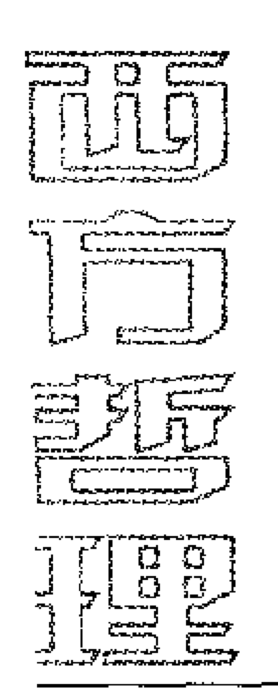
后，他获得了社会承认，同时建立了他作为男性的威望，他就像是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拉斯蒂涅那样野心勃勃，财富、名声和女人都是他的目标，他努力的动力之一，就是做女性崇拜的、有权有名的男人。

对少女来说，情况相反，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人的使命之间有着矛盾。青春期是一个女人非常关键而困难的时期，个中原因只有从这里寻找。此前，她一直是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必须放弃主动权。她像她的兄弟一样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形成分裂，但要痛苦得多；在她对成为主动、自由的主体的自我要求，和她的性觉醒以及迫使她承认自己是被动客体的社会传统之间，掀起了剧烈冲突。她的生命倾向要她将自己视为主体，如何立下决心转变成一个次要者呢？然而，如果我只能完成我作为他者的命运，我又如何放弃我的自我呢？这就成了做女人无法逃避的痛苦的两难抉择。她在欲望与厌恶、希冀与恐惧之间挣扎和斗争，她被迫降低自己的期望值，在自主的童年时代和被动的女人时期中间徜徉犹豫。也正是这种冲突，使她并未成熟的青春期中，品尝了苦涩的青果。

随着早年倾向的发展，少女对这一命运的反应多种多样，难以预料。这位“小妈妈”，未来的主妇，可以并不在意自己的变化。但作为“小妈妈”，她或许拥有了对权威的爱好，由此导致她反抗着男人的枷锁：她所要做的是创建一种母权制，仅仅是为了不成为泄欲器和奴仆。

她超越自恋过程之后，有的少女感觉到自己需要一个导师，一个引导者。逃离父母的掌握，她们感到了这种难以习惯的独立的窘迫，她们可以做的几乎只有消极地利用它，在任性和放纵中不能自拔。她们开始期望放弃这种自由。一个娇纵的、傲慢的、敢于反抗的、令人不可容忍的野女郎，由一个通达时务的男人在通奸时所驯服，这一主题成为了廉价文学和电影的样板，也成为既奉承了男人又





讨好了女人的老生常谈。虽然美国女性自尊心很强，好莱坞影片仍然不断重复着这些难以征服的女孩为丈夫或者情人以恰到好处的暴力所制服：挨几个耳光，最好是挨一顿打，好像很容易勾引她。

实际上，理想的爱转变到性爱远非如此简单。很多女人都曾坦承，她们和自己所爱的男人小心翼翼地避开亲热的举动，是担心被骗。要是这个英雄、巨人、半神人对她

激发的爱热烈回应，使之变成现实的体验，少女就会害怕，她的偶像就被贬值为下流的男人。有的风骚女孩极力勾引“风趣”或“有魅力”的男性，然而一旦他真的表现出对她非常感兴趣，她们则反常地烦躁不安。他的吸引力就表现在他的遥不可及之上，要是变成了情人，他就太过平庸了——不过是个男人而已，和别的男人一样。女孩子为他使自己失去尊严而恼羞成怒，以此为借口逃避让她十分敏感的失去贞操的肉体接触。即便是向她的意中人献出全部，她依然在他的怀抱中表现出冷淡。就像斯特柯尔说的那样，“发生关系之后，一个清高自傲的女孩子可能走上绝路；或是，她的意中人就如同一个‘野兽’，她曾有过的爱情大厦在瞬间崩溃了。”

这种无法实现的梦想，经常使少女和原本是她的朋友的恋人相爱，他往往还是个已婚男人。她极易投入唐璜式的花花公子的怀抱，她梦想着可以征服并控制这个没有女人曾经羁绊住的勾引者。她有改变他的企图，她也明白她注定会失败，这恰恰是她为何选择他的原因。有的少女永远无法体验真正的爱情，因为她们一生都在追寻着缥缈无迹的幻影。

她为自己能使男人感兴趣和爱慕追求而自豪，却害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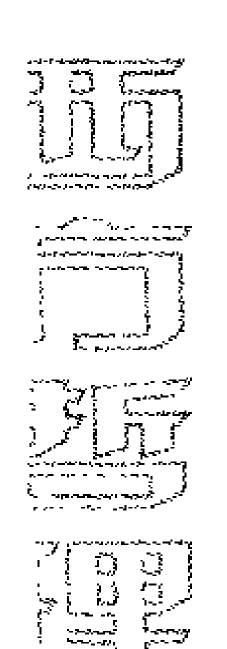
被他们猎获。伴随青春期而来的羞耻感，会长久的存在下去，夹杂着她的骚首弄姿和虚荣心。男人注视她的目光，既令她得意又令她生气。她希望男人只看到她愿意让人家看的地方，而人们的目光老是带有穿透力。这就使男人对这种矛盾困惑不已：她袒胸露背，露出双腿，而人们要是注视着它们，她却会恼羞成怒。她刺激着男人，但要是发现她激起了他的渴望，就会对此厌恶，远远逃开。男人对她的欲望既是奉承，又意味着侵犯。从她创造出自身的魅力和自如地运用这一魅力而言，她为自己的成功而高兴，但同时她又要忍受美貌、体态和肉体带来的负担，她不想让那些下流而陌生的登徒子窥视它们。

这就是所谓的羞怯的深层次含义，它阻碍了最为大胆的骚首弄姿。一个少女或许会令人咋舌的大胆，此时她尚没有意识到主动的行为会使她暴露出被动的一面。意识到这一点，她才会感到烦恼和恐慌。没有别的事比被瞟过一眼更暧昧，它远远地存在着，距离感使它似乎代表着尊重，但它又悄无声息地占有了所注意到的形象。未成年的女性挣扎在这些陷阱中。

她放纵自己，但马上又自责和压抑自己爆发的欲望。她那还在骚动的肉体，有时从爱抚中感到奇妙的快感，有时又认为它像搔痒一样让人讨厌。亲吻开始让她颤抖，接着她又纵声大笑。刚刚还是屈从，紧接着又是反抗。她允许别人的吻，却又以遮掩嘴唇来掩饰。她巧笑倩兮、含情脉脉，却又突然冷嘲热讽、满怀敌意。她作出允诺，然后又故意将其遗忘。


西蒙·波伏娃/著

这就是少女的特点，我们也正是通过这来认识她的绝大多数行为。她反抗着自然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却又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它。她身上自相矛盾之处太多，所以她无法与世界抗争。她只能逃避现实，或仅仅进行象征性的斗争。她唤起的每一种欲望都相应地引起焦虑；她期盼



拥有自己的未来，却又对决裂过去心怀恐惧；她梦想有个男人，又不想为他所猎取。每一种恐惧之后都有欲望的蛰伏，征服令她惧怕，却又盼望着被动。她因此注定了虚假，而且有无数的借口。她命中注定了为种种焦虑和欲望交织的消极情绪所折磨。

这时期的少女们笑声轻浮放荡，言行十分粗俗，甚至有的少女用一些连她的兄弟听到都感到脸红的脏话。对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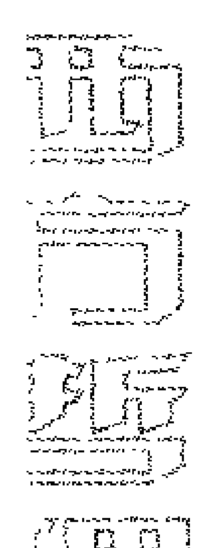
种言辞，她却并不在意，因为在她一知半解的头脑中，这些词语并未产生准确的联想。何况，她们的本意也并非引起这种联想，而是要抵制它们，或最少是可以削弱这种联想。女生们互相讲着下流的故事，相当的程度上并非是满足她们的性幻想，而是对性冲动的压制，她们希望通过嘲笑性的可笑方面，视性为某种机械或是像外科手术式的行为。就如同笑声的作用，这种淫词秽语既是反抗的方式，又是对成年人的挑衅，是种亵渎，是表现自身反常的行为。对自然和社会表示轻蔑的同时，少女用千奇百怪的方法进行反抗和挑战。人们经常发觉她有古怪的饮食习惯：她吃下铅笔芯、装订纸、木头屑和活虾；服用几十片阿司匹林；甚至吞下苍蝇和蜘蛛。我认识一个少女，她的智力很正常，却逼着自己喝下用咖啡和白葡萄酒混合而成的可怕液体，她还吃在醋里泡过的糖。我亲眼所见另一个少女，吞下了在她色拉里发现的一条小白虫。一切儿童，都用眼和手，更进一步，用嘴和胃来体验世界。在没有成熟的青春期，少女更喜欢探知她尚未理解和令她作呕的世界。她所讨厌的东西反常地吸引着她。一个女孩，她如此美丽娇柔，穿戴整齐，但只要觉得自己也是肮脏的，就确实为各种“肮脏的”东西深深吸引：她玩弄着昆虫，凝视

有经血的衣服，吮吸伤口的血。少女对被性欲所控制的身体，对自己的月经，对大人的性交，对她命定的男人都很厌恶，为了对抗这种感情，她故意欣赏、接近自己讨厌的东西。她似乎以此证明："既然我每个月都得流血，那我吸吮自己伤口的血，证明我不害怕我的血。既然我未来不得不忍受令人作呕的事，我也就不怕现在吃下一条白虫子。"

虽然女孩子注定要成为男人的被动的猎物，然而她还是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利，甚至为痛苦和厌恶折磨也在所不惜。她伤害自己的目的是抗议自己处女贞操被夺走，她以宣称无效作为抗议的手段。因为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痛苦，她就成为被虐待狂，而首先她是个施虐狂：以独立的主体的名义，她鞭笞、轻蔑和折磨着这依附的肉体，这个她所愤恨的服从而受到惩罚的肉体——然而她也不愿意自己和它分离。不管怎样，她不想彻底放弃她的命运。她虐待—受虐狂的变态倾向牵扯到一种根本的虚伪：要么她彻底的沉沦，这意味着她用放弃来承认她注定的女性命运，要是她最初没有承认自己肉体的欲望，她也就不会如此失常地折磨自己的肉体。

甚至她使用暴力的根源也在于服从的深处。一个男孩反抗父亲和世界，他的暴力很有用。他和伙伴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用自己的拳头证明他的主体位置，他强行进入这个世界，并超越世界。然而青春期的少女没法这样来证明，这样强行进入。因此她充满了幽怨：她既没有希望改造世界，更不能指望能超越世界。她明白，起码是相信，她被束缚着——也可能她会期盼着这样，她只能破坏。她的愤怒中包含着绝望，她气急败坏，扔杯子，砸玻璃，摔花瓶——这并非反抗命运，而是象征性地抗议。少女因为此时的无力而反抗未来的奴役，她的发怒纯属徒劳，根本不会挣脱束缚，常常会适得其反。


西蒙·波伏娃/著



她所做的对自己或是对周围环境的暴力行为，自始至终都是消极的，虽然喧嚣一时，却收效甚微。好斗的男孩，将他受的一般伤害作为他主动出击的微不足道的结果，所以，他并不追求争斗，也不回避它（除非自卑的心理使他有女孩子那种心理）。少女则时刻感受到折磨，她心里反复咀嚼着暴力和反抗的感觉，对结果并不在意。她的异常，是因为她仍然被禁锢在童年世界中，她无法或是

不想完全逃离童年。她只想在牢笼中挣扎一番，并没想过逃出去。她思考的方式是消极、条件反射的、象征的。

内心的虚伪使正常的少女和某些精神疾病有联系。从狂躁症、痉挛、谋划不轨或行为反常等情况里可以发现，她的很多精神病症状是由我曾指出过的欲望和恐惧的冲突所致。比如，少女常常离家出走，出走可能并无特殊目的，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游荡几天，又跑了回来。无疑，这算不上真正的出走，更不是她真要和家庭断绝关系。它仅仅是上演一出逃离的喜剧，要是有人真想带她离家，少女就会彷徨失措：她又想离开，又害怕离开。离家出走有时又伴随着卖淫幻想：她想像自己沦为妓女，在饰演这一角色时依然有一些胆怯，她装扮得花枝招展，在窗台栏边，对行人大抛媚眼儿。有时，离家出走的戏演得如此逼真，使人难辨真假。这通常是对性欲的厌恶的表达，体现出某种负罪感。她认为："既然我会这样想，带有这种欲望，我差不多也是妓女，我本来就是个妓女！"有时她会任凭自己堕落："我们就做到底吧，我们罪有应得！"她如此说。她会献身给第一个到来的男人，以此证明性关系无关紧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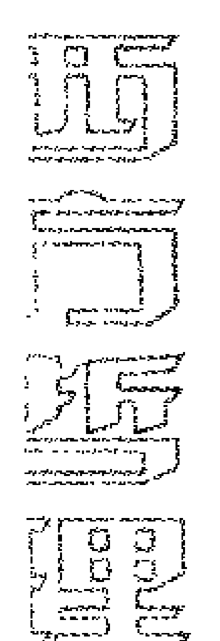
必须注意的一点是，所有的行为都体现出，少女没想

过突破自然和社会法则，她不想扩大可能性，也并不准备重新估价，她只准备在已经固定的疆域和法则的世界中进行反抗。这一态度被看成是“邪恶的”，它标志着从根本上的伪装：承认善是要藐视它，确立法则是要破坏它，面对神圣是想亵渎它。少女的态度应该由这个事实解释：虚伪的阴云笼罩着她，使她既拒绝世界和自己的命运，又承认和接受它。

然而，她并不仅仅消极地反抗着注定的命运，她也在竭力弥补自己的缺憾。要是说未来令她不安，那现在就是令她不满。她在成为女人的道路上彷徨，又不耐烦总是个孩子，她将过去抛诸脑后，也没有准备新的未来。她无事而忙，却一无所成，也正是因为一无所成，她又一无所有，一无是处，她惟有靠矫揉造作和伪装才能填充这种虚无。人们常常指责她的狡猾、虚假，是个“总是撒谎的孩子”，实则她注定了要隐瞒、撒谎。一个女人16岁时就已经饱受痛苦：青春期、月经、性启蒙、最初的冲动、恐惧和厌恶、还有朦胧的体验。这一切全部隐藏心里，还要小心翼翼地保护自己的秘密。仅仅藏好月经带和隐瞒自己身体的不适等事情，就会让她惯于撒谎搪塞。凯瑟琳·安妮·波特[①]在小说《老人》之中，描述了20世纪前后，美国南方少女为了参加舞会而服下恶心的盐和柠檬做的混合液体，以推迟月经的到来。她们恐惧着年轻男人能从她们的眼神里，接触她们的手里，或是某种气息中发现她们身体的异样，这种想法令她们胆战心惊。当一个女孩察觉双腿之间夹着有血的月经带时，干脆说，当她意识到肉体本能的不幸时，却要饰演一个偶像，一个仙女，一个高傲的公主，这实在是太困难了。羞怯是对要认同自身的肉欲的一种本能的拒绝，这和虚伪几乎一样。



① Katherine Anne Porter，1890—1980年，美国女小说作家。



少女的内向和青春骚动，是尖锐冲突的牺牲品。另一方面，这种复杂令她内心丰富，她的心理活动因此比她的兄弟们细腻深邃，她更加关注自己的感情，因此它更微妙地变化无穷。与男孩子相比，她的心理感悟能力更强，男孩子感兴趣的只是外部世界。

绝大多数的成熟的少女，无论她们辛苦劳作或者百无聊赖，无论是幽处家中或者自由自在，找一个丈夫——起

码是有个固定的男朋友，显得越来越迫切，这种迫切时常令女性之间的友谊黯然失色。“最要好的朋友”的地位大大降低。少女视她的朋友们为敌手，而不是盟友。一个我认识的少女，聪颖有天赋，在她的诗和散文中，她将自己称之为“心不在焉的公主”，她坦诚地说，对童年的朋友已经没有了任何感情，她讨厌她们的蠢笨和丑陋，要是很有魅力，她又感到备受威胁。在争夺男人的时候，经常会陷入阴谋诡计和遭受羞辱之中，这令少女变得心胸狭窄、自私和冷酷。如果白马王子来得太迟，更会加剧她的厌倦和凄凉的心理。

少女们的心理和行为是她的环境造成的，只要环境变化，青春期少女的状态也会发生变化。今天，她不再寄托于男人，而是开始把握自己的未来，这一点正成为可能。要是她可以专注于学习、运动、职业技能，或从事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就不会整天考虑男人，面临的情感和性的冲突也会随之减弱。当然，要实现自我价值而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她依然要面临比少男多得多的困难。正如上文指出的，家庭和社会舆论都不会支持她从事这一努力。

即便她选择要独立，也会在生活中给男人和爱情留下一席之地。她或许在担心，要是彻底投身于某种事业，她

可能要错过自身的女人命运。即使是她否认这种感觉，它也确实存在着。它瓦解了业已确立的目标，限制着她的发挥。任何时候，职业女性都想把事业成功和纯属女性的成功完美地结合，这不仅意味着她不得不耗费时间梳妆打扮，更关键的是，它表明她的主要兴趣无法一致。男性学者循规蹈矩的工作时，还使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天地之间，由此产生了无穷的灵感。女人遐想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她要关心自己的容颜，考虑男人和爱情，她只能给学习和事业腾出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多余和不必要的。这无关于智商和注意力集中，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目的难以协调的问题。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很多情况下人们吃惊地看到，女人在结婚之后，是何等轻易地放弃音乐、学习和事业。在她的设想中，她关心自己利益的方面明显太少了，甚至计划成功之后她也不会得到多少好处。所有的一切都在共同阻碍着她的个人野心，强大的社会传统依然迫使她用婚姻的手段来获得社会地位和合法保护。何况，她也没想以自己的努力，来创造她在世界上的地位，即使是想，也信心不足。只要社会经济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只要社会习俗依然允许女人以妻子或是情妇的身份获取某些男人的特权，那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依然存在，她自己取得成功依然会受到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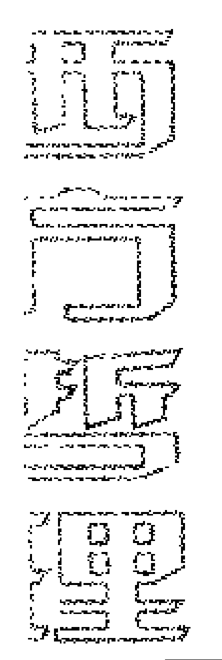


镜前的维纳斯

迭哥·德·席尔瓦　1599～1660年　西班牙

维纳斯对镜而卧，细嫩的肉体生机勃勃，充满青春气息。表达了画家对人类美感的赞颂。

不过，不管少女是用怎样的方式成年的，她实习的阶段都在延续。无论是缓慢渐进还是突变，她必然要经历性觉醒的时期。有的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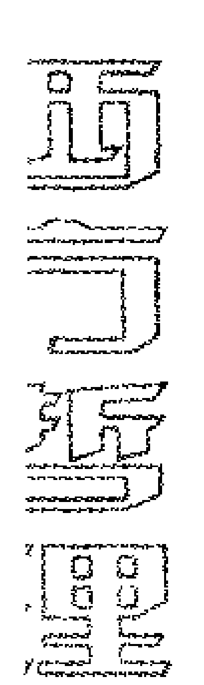
逃避这个问题，如果她们在童年时经受过不愉快的性事件，或者不当的教育加深了她们害怕性行为的恐惧感，她们有可能一直延续着讨厌男性的感觉。有时，由于环境的原因也可能在女性不情愿的情况下，被迫延长她们的处女时期，然而，一般少女迟早要实现自己的性的命运。怎样面对它，主要由她过去的经历来决定。无论如何，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无法预料的情况下出现，她必须独立地对此作

出反应。

第十四章 性觉醒

从某种意义上说，女人的性觉醒和男人相同，起源于童年的最早期。一个实践的实习时期，从口腔期、肛门期、生殖器期一直持续到成年时期。但是，少女的性体验不仅是她过去的性冲动经历的延伸，它往往突如其来、使人不快，总是带有一种和过去断裂的新体验的特性。少女真实地经历这些体验时，她所有的问题都体现得剧烈而紧迫。有时这危机能平安度过，但不排除发生以死或是疯狂来消解矛盾的极端悲剧性的事例。无论何种情况，女人的未来都深深被这次反应的方式所影响。精神病理学家一致认为，女人的第一次性体验极为重要，它的影响将贯穿一生。

男女两性在我们所考察的生存处境中有巨大的差别，无论是生理方面，抑或是社会与心理方面。对于男人来说，童年的性状态转变到成熟阶段较为简单：性快感指向客体，欲望是针对另一个人，而并非自我范围的实现。勃起就代表着这种要求，男人使用阳具、手和嘴，用整个身躯触摸性伙伴，他本人处在性活动的中心。一般情况下他是主体，和他所观察的客体，他运用的工具相对。他把自己投射到另外一人身上，并不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女人的肉体是他的猎物，他使用它来了解渴望的特性，就如同他使用任何东西。尽管他没能真正地占有它们，但最少是已



经拥抱过它们。

女性性冲动复杂得多，它体现出了女性生存处境的复杂状态。我们已经分析过，雌性不是使物种的强大生命力融入它的个体生命，而是成了物种的牺牲品，物种的利益和个体的利益并不一致，这一矛盾在女性中最为突出。诸如，它体现为两种性器官的对立：阴蒂与阴道。阴蒂是女性童年性快感的中心，即使个别精神病学家认为有的女孩

的阴道是敏感的，对此问题还有争议，可它毕竟是次要的。阴蒂的结构在成年后仍然没有变化，女人将终生保持阴蒂性冲动的独立性。与男性性高潮一样，阴蒂性高潮也以近乎机械的方式进行勃起和消退。但这和正常性行为的联系并不直接，而且在生育中没有任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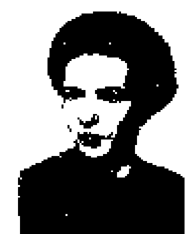
女人被进入和受精的方式是通过阴道，它只在男性的合作下才成为性冲动中心，这始终意味着侵犯。“人体结构决定的命运”对于男女截然不同，这也表现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处境上。父权制将女人奉献给贞操，它半公开地承认男人有着性自由，却把女人关进婚姻的牢笼中。性生活，如果没有世俗、教典的承认，对她而言，就是过错，是一种堕落，一种挫折和缺陷。她要保护自己的贞操和名誉，她“屈从”，她“堕落”，就将为人唾弃，但对她的征服者的指责中却夹杂着羡慕。从古到今，性交一直是一种“服务”，为此男人要以赠送物品或保障生计等形式来回报女人。然而，性服务是出卖肉体给一个主人，这种占有中毫无相互性。婚姻的实质和妓女的存在同样证明了女人卖出身体，男人要付给她报酬并占有她。任何事都妨碍了男性成为主人，去占有低劣的创造物。和女仆通奸从来就受到宽容，但下嫁于马车夫或是园丁的中产阶级女

性要失去地位。美国南方的社会习俗从来就准许种族主义者可以和黑人女性上床，直到今天都是如此，他们带着贵族式的傲慢使用着这种权利。相反，与黑人男性发生关系的白种女人在黑奴时代将会被处死，即使今天也有死于私刑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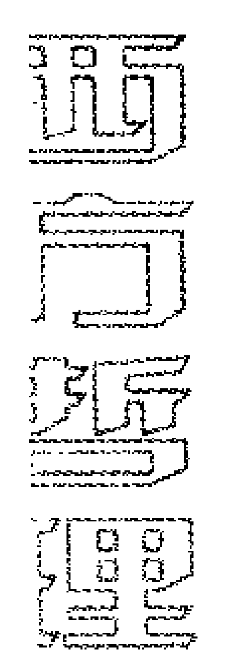
为了描述他和女人的性行为，男人会使用“占有她”，或是“拥有”她这样的字眼。希腊人将没有过性关系的女人称做没有被制服的处女，罗马人称呼麦萨丽娜[1]是“没有被征服的”，因为没有一个男人可以让她彻底满足性欲。对于男人来说，爱情就是为了征服，就是胜利。

女性性觉醒所面对的社会环境与习俗，同处于青春期的男性的条件完全不同，女人对待自己性冲动的态度在第一次和男人上床的时候就非常复杂。处女并非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对自己的性欲毫无所知，只有在男人的引导下才会发生性感受。这种神话还是表现了男性生来就具有的支配本能，它传达出他的愿望：她根本不应当有独立性，是她渴望着他。实际上，男人最早的性欲也往往是被异性引起，与此相反，大多数少女还没有接触到那只爱抚的手之前，就热烈地期望着爱抚。

事实是，处女的欲望不是表现出某种确切的要求，处女并不明白究竟想要什么。她的身上依然还有童年时期带有攻击性的性冲动的痕迹。她一开始的冲动是要抓住什么，此时她想要拥抱和占有。她所觊觎的猎物，有着某种特性，她可以通过味觉、嗅觉和触觉仿佛能感觉到其中的价值特性。性冲动不是孤立的活动，而是对早年肉欲的梦想和快乐的延续。两性的儿童和青少年都喜爱柔软、像奶油一样的、光滑的、圆润的和富有弹性的物质，喜爱受到


西蒙·波伏娃/

① Messalina，公元25—48年，罗马帝国皇帝克劳狄一世之妻，以放荡淫逸扬名于世。



压力时不会变形或折断的、看起来或摸上去都很滑腻的东西。女人和男人一样，也喜欢沙丘所富有的那种柔和的温暖——很多时候它被比喻为乳房，被比做如丝绸一般的轻柔，鸭绒一般的精细，果实一般的粉柔，少女尤为喜爱轻柔素雅的色彩，喜欢绢纱和轻罗的朦胧。她不喜欢粗布、沙石、假山、苦味和酸气。她和兄弟一样，最早所抚摩和喜爱的是母亲的身体。在她自恋或同性恋的体验中，无论

含混或明确，她饰演的都是主体的角色，想拥有一个女性的身体。面对男性时，她会觉得手上和嘴唇都产生一种主动爱抚猎物的渴求。然而膀大腰圆、皮糙肉厚、体毛如猿、体臭很重、长相粗俗的莽汉，激发不起她的欲望，甚或让她感到厌恶。

这样，她自身就是分裂的人格。她期待着能使她颤抖有力的怀抱，然而暴戾和粗俗使她产生了受伤的威胁。她的体验既由她的肉体决定，也由支配她的力量所决定，两方面的要求有一部分是冲突的，她想方设法协调起来。她要屈服于有阳刚之气的男人，但他需要年轻、充满活力，可以作为一个使人满意的客体。从年青英俊的男人那里，她能够发现她窥看到的全部魅力。《雅歌》中夫妇的欢乐有一种对称感。她在他那里寻找到他要在她身上渴望得到的东西：大地上有生命的动植物、稀有的宝石、碧溪和星辰。她找不到方法取得这些财富，她的身体构造使她像太监一样笨拙、无力，占有的欲望由于缺少一个可以展示它的器官而无法实现。况且，男人是无论如何也不想成为一个被动者的。环境通常使少女屈服于以爱抚令她兴奋的男性，但她不能从注视或爱抚他的行动中得到快感。人们忽略的一点是，在她搀杂着欲望的讨厌里，有着对男性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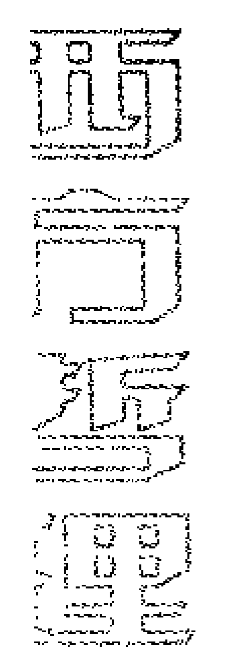
的恐惧，也带有深深的挫败感。女人的性兴奋，惟有在她和她的自然性冲动的矛盾中取得，而男人因为抚摩和观赏产生的性兴奋，与其特定的性快感的基础是一样的。

然而，平稳的被动性冲动的构成却很含混，触摸的含义是最为暧昧不清的。相当多的男人接触各种器皿时没有厌恶的感觉，却讨厌碰到动植物。女人的身体接触到丝绸或是天鹅绒的时候，可能兴奋地发抖或颤栗。我青年时代的一位朋友，她看到桃子就会起鸡皮疙瘩。由不适感到舒适的搔痒，由焦躁到兴奋很容易转变。抱住身体的双臂能够成为保护的避难所，也会成为令人窒息的监狱。处女所以能保持这种含混，是由于她自相矛盾的处境，她那个即将发生变化的器官处于封闭状态。她的肉体模糊而强烈的渴求席卷全身，却没有传递到那个要发生性行为的器官。没有一个器官能满足处女自身的主动性冲动，而关于那个注定要被动的器官，她对如何使用它毫无经验。

由此就能够理解，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激发女人的性冲动十分困难。像我们所说的，童年或少女时代发生的事件，屡次在她身上引发强烈抵抗，有时甚至无法克制。少女一般对这些事件不很在意，但因此产生了剧烈的冲突。她曾受过的保守的教育、她所恐惧的罪恶、对母亲的负罪感都形成了了沉重的枷锁。很多阶层如此重视处女的问题，甚至到了不通过合法婚姻而失去就仿佛成了弥天大罪的一般的地步。因为冲动或是意外而屈服的少女也会认为自己的名誉受损。新婚之夜对她可不是幸福的体验，原因是它让处女尝尽了她没有找到真正令她满意的男人的苦头，还因为人们企图在几个小时甚至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使她完成全部的性觉醒。一般说来，任何转变都是个痛苦的过程，因为它明显的无法逆转的性质：成为一个女人就将永远和过去决裂。不过这种特殊的转变，比其他任何转变都更有戏剧性。它造成的不仅仅是昨天和明天的决裂，



西蒙·波伏娃/



还把她从置身在其中很久的幻境中拖出来，来到现实世界。米歇尔·雷希斯[1]用牛进行推理，宣称婚床是“货真价实的”。对处女来说，这一说法恰恰具有最丰富、最可怕的含义。订婚、调情和求爱就像是个前奏，这一阶段的她还在一直习惯的礼仪和幻想世界中生活。求爱者的甜言蜜语那样浪漫，最起码是文雅的，玩爱情游戏依然可能。但忽然之间，她感到了自己被真实的眼睛死死盯住，被真

实的手紧紧握住，这毫不留情的现实的盯视和抓握，使她遍体生寒。

被注视意味着一种危险，而受虐待是另一种危险。女人一般很少经受暴力，童年和少女时代的她们没有类似于男人打架那样的体验。女孩子通常是此时才受制于男人的身体对抗中，于是很快被征服。她再也不能去自由梦想，去拖延和玩弄花招；她处于他的掌控之下，逆来顺受。这种拥抱和短兵相接的搏斗没有两样，让她害怕，因为她从没有打斗的经验。她看惯了未婚夫、朋友、同事、一个彬彬有礼的男人的爱抚。然而此时的他却是一副可怕的样子，自私并且任性，对着这个陌生人，她柔弱无力。

少女第一次性体验实际是一种真正的强奸，男人的行为粗鄙可憎，这种感受屡见不鲜。在农村和存在野蛮习俗的地方，少女经常在沟渠中勉强地、又羞又怕地失去处女的贞洁。毫无疑问，有一种各个阶层、各个阶级都比比皆是的现象：处女被只顾自己满足性欲的自私的情人突然占有，或是被享有婚姻权利的丈夫突然占有，要是妻子拒绝，他会觉得羞辱，要是破坏处女贞操的行动受到阻碍，

---

① Leiris Michel，1901—1990年，法国人类学家、诗人和自传作家。

他甚至会怒不可遏。

无论男人多么尽可能地小心翼翼，第一次进入毕竟还是一种侵犯。她在渴望着嘴唇上或胸脯上的爱抚，或者更进一步渴求着曾经历过或曾幻想过的更加不寻常的性快感，而事实却是，男人的阴茎刺穿少女的胴体，插入她不想被插入的部位。很多作家都描绘过痴痴地躺在情人或丈夫怀抱中的处女所体会到的痛苦和惊讶。她起先以为自己的春梦终于能够实现了，最终却是在性器官的深处经历意外的疼痛。她美梦破灭，兴奋消退，爱情在这一刻像是动外科手术。

她从此就只有被动感：她被抚摸、被插进，她承受性交，男人却极力体现主动。确实，男人的阴茎并非一个有纹路的随意肌体，不是犁也并非短剑，只是一个肉体。但是，男人以自己的意愿使它运动，将它反复抽动，周而复始，女人只能顺从的接受。特别是要由男人决定做爱的体位姿势——尤其在女人的初夜，正是他来决定做爱的持续时间和次数，更令她感到自己是个工具，自由完全由他人决定。有这样一种说法，说女人就是小提琴，男人则是令她奏出音乐的弓弦，这种用诗般的语言所要表达的就是这种意思。巴尔扎克说过："除了灵魂有什么问题，做爱时的女人就如同七弦琴一样，仅仅将秘密透露给知道如何弹奏她的人。"他使她获得他的快感，他赐予了她快感，这两个词的运用暗示了缺少的相互性。

女人从小就被灌输男性的情欲是光荣的前进，女性的性体验是羞耻的退缩这一观念，是女人通过切身体会证明了这种不对称的现实。不要忘记，两性青少年对自己身体的认识方式完全不同：男人较为容易承认自己的身体，视性冲动为骄傲；女性虽然有自恋倾向，仍然将身体看作是陌生而令她担忧的负担。男性的阴茎像手指头一样简单灵动，它一眼就能被看见，常在伙伴前裸露出来，进行骄傲的较量；而女性的阴道就连女人自己也视为神秘，它隐藏


西蒙·波伏娃/著

着、产生黏液、湿滑，每个月流一次血，会被体液玷污，它有着自己隐秘和危险的生活。女人无法从它那儿认出自己，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拒不承认它的欲望就是她的欲望，这种欲望出现使她很尴尬。男人是在“变得坚硬”，女人却是在“变得潮湿”。

女人的性欲像蜗牛一样慢慢地蠕动。男人在冲动，女人仅仅在渴望。或许她的期待也会转为热烈，但依然是被动的性质。男人像苍鹰扑食般冲向猎物，女人的等待却如同吞掉昆虫的捕蝇草，或是使孩子没顶的沼泽。她吸收着，是被动的入口，在暗中行动，带有粘性，起码她朦胧地感觉到自身的这一性质。她的心中既有对男性征服心理的反抗，也有本身的冲突。除了教育和社会所制定的禁忌和压抑，还有来自于性感受本身的反感和拒绝，在这些影响的交织下，女人完成第一次性交后，她对性命运的厌恶常常比过去还厉害。



油灯前的玛达莱娜

乔治·德·拉图尔　1593～1652年

法国　*油灯映照着基督救赎的妓女玛达莱娜深思的面孔和丰满的酥胸，画面显得和谐而静穆。*

最后，还有一个因素让女人对男人有敌意并给性活动带来风险——怀孕的可能。私生子对未婚母亲在社会和经济上极为不利，以至导致有的女孩子得知自己怀孕后自杀，有的未婚妈妈会扼杀刚生下来的婴儿。这一威胁为性行为带来强有力的制约，也足以让很多少女保持社会风俗保持她们的婚前贞操。就算这种制约不那么严格，少女也会对情人身上潜伏着的巨大威胁怀有恐惧。斯特柯尔通过一些事例认为，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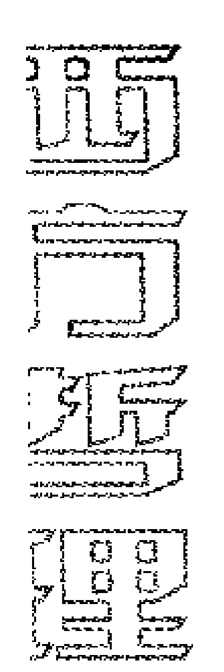


种威胁完全已被意识到，当做爱的时候，就会想："最好是没事！但愿安全！"结婚之后，因为健康或经济原因，也会不想生小孩。

要是女人对她的性伴侣并不绝对地信任，无论他是情人还是丈夫，她的性快感都会因为谨慎而失去。她心神不宁地注意着男人的行为举止，或不得不在做爱之后起身清理他强行射人的精子。这个清洁过程和爱抚产生的感官魔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刚才还彼此之间亲密无间地结合的肉体一下子完全分开。此时，男性精子仿佛是种有害的细菌，是种可厌的东西，她得像清洗脏盘子一样洗干净自己，而男人却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躺着。一个离过婚的少妇对我说，在那个不见得美好的新婚之夜，她不得不在事后去浴室，她的丈夫却在满足地吞云吐雾，使她产生了极强的反感，这似乎预示着她的婚姻注定要毁灭。对射精的阴茎和清洗的厌恶，往往成为女性性冷淡的重要原因。

有的少女为了解决自身的性饥渴，一再进行着性生活，企图以此解除她们对性的好奇和新鲜感。但她们的行为还带有抽象性，与少女有关于未来的其他幻想一样的不真实。出于挑战、恐惧或者清教徒式的信仰而献身他人并非是对性的现实体验，这种方式获得的只是没有什么冒险的刺激的替代品。性行为需要摆脱焦虑或羞耻的原因，在于这种状态下的情感冲动还只是表面层次，不是肉体产生极度的渴望。这些失贞的处女依然是少女，很多时候在面对一个好色、专制的男性时，仍会产生处女般的厌恶。此时的她们还处于尚未成熟的青春期，爱抚让她们感到瘙痒，亲吻令她们发笑，做爱被视为游戏。并且，要是她们有兴趣进行这种游戏时，情人突然提出粗鲁、贪婪的要求，她们对此还会有厌恶、害怕和羞怯感。如果她们一直不能脱离这种阶段（美国人认为许多美国女性永远都无法脱离），她们将终其一生都在性爱活动中呈现出半性冷淡


西蒙·波伏娃/



的状况。真正的性成熟，只有在女性彻底接受性欲望和快感的肉体中才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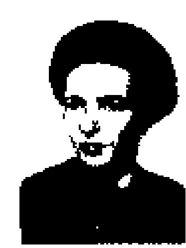
然而，性欲强的女人也有障碍。事实或许会正好相反，女人的性高潮能够达到男人无法想像的强烈。男人的性兴奋非常强烈，但却是局部的，男人可以完全主宰自身，除了达到性高潮的时刻；而女人完全迷失了自我，很多人认为高潮效应就是做爱达到最明显的亢奋时刻，然而

它又是不可思议的可怕，男人在此刻或许会对他怀中的女人产生恐惧，她是如此的疯狂，失常到这样的程度。与男人具有攻击性的疯狂产生的失常不同，她的骚动加剧了她的失常。她已狂野地忘却羞耻，事后想到这一点她就会羞愧和害怕。要高兴甚或自豪地接受这种情况，她就要在性快感的兴奋中自由地畅游。惟有她的性欲获得极大的满足，她才会承认它，不然她就会愤怒地极力否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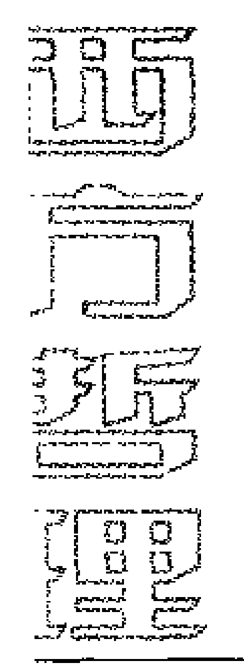
当然，无法得到正常的满足的话，男人就会用刺激阴蒂的办法来使女性获得快感，尽管道德上对此予以反对，但女人仍然可以通过这条途径达到性高潮和放松。很多女性不接受这一途径，因为与阴道快感相比，这更显得是强加给她的。要是女人和只关心自己满足的男人们同样自私，她也会为了那让她兴奋的太过明显的企图感到反感。斯特柯尔认为，令他人得到快感，就意味着支配他人，向某人献身就代表放弃自己的意志。若是女人的性快感就像男人的性快感一样是自然流露，像正常的做爱时一样，女人就会很容易地接受。斯特柯尔相信女人如果觉得性伴侣没有想征服她们的企图，就会高兴地顺从，相反，如果感到他们想征服她们，就会极力反抗。许多女人之所以厌恶手的刺激，是因为手是工具的关系，并不与它赋予的快感

有关，因为它看上去并不代表肉体，而是主动性的象征。即使是阴茎，要是它不代表肉体，而是像被熟练运用的工具，女人一样对它产生厌恶。另外，所有这样的补偿在她看来，都像是她不能像正常女人一样获得满足的证明。斯特柯尔在观察了大量事例之后得出结论：所谓女性性冷淡的整个欲望都趋向正常，她们希望用她们觉得的正常女人的方式达到高潮，其他方式无法满足她们的精神需求。

女人的性快感和男人的完全不同。我说过，无法肯定的一点是，阴道能否引起确切的性高潮，因为女性极少对此有所描述，即使想描述也是含糊不清的，似乎这一反应因人而异。但是，对男性来说性交无疑有明确的生物学目的——射精。当然，达到这种目标有相当多复杂的意向，不过一旦达到，它就算是个明确的结局，即便没有完全满足欲望，至少是个终结。反之，女人的目标最初就不那么确定，实际也不是生理上的，而是心理上的。她渴求所谓的性兴奋和性高潮，然而她的身体却从没有给做爱一个明确的目标，这就是性交对她没有真正终点的原因，它不可能存在终点。男性的性兴奋像箭一般窜升，当到达一定的程度或关头，就会在性高潮中突然停止。这一性行为模式有限、不连续。女性的性快感遍布全身，而不是仅仅集中于生殖器。即使集中于生殖器，阴道痉挛也不构成真正的性高潮，而是某种波浪形运动。它有节奏地周而复始，忽隐忽现，一波又一波达至阵发状态，模糊、轻微，但不可能完全平息。正因为如此，女人的性体验的持续是无止境的。限制女人性冲动可能的是神经或心脏的精疲力竭，或心理上的满足而并非是有止境的特定满足。即便被打垮，力倦神困，她或许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满足。


西蒙·波伏娃/

女人性快感的不可思议在于它的阵发性，需要彻底的放纵。假如语言或动作破坏了抚摸的魔法，阵发性就会消散。女人闭上眼睛的原因之一就在这里。从生理学的角度



看，这可以被看作是补偿瞳孔放大的一种反射效应，即使在黑暗中她也会闭眼。她要忘记周围的一切，忘记这奇异的时刻，忘记她和她的情人，宁愿迷失在母亲子宫一样的黑暗的肉体之夜中。她特别渴望消除她和这个男人之间的分隔状态，渴望着和他融为一体。可以说，她在成为客体的同时依然盼望自己是主体。她的整个身心都在欲望和兴奋中颤抖，她已经比男人还疯狂，惟有和性伴侣的交合才

可以使她保持自身的主观性。相对于双方，给予和接受是双向的。要是男人只想接受而不给予，或他只赋予快感而不接受快感，女人就会认为自己正在被控制和被利用。

受虐狂一样的女人虚伪的放纵，引起了她和快感之间新的阻碍，她也利用这种体验快感的无能来实施自我报复。由性冷淡和受虐心理之间的恶性循环可能成为永久性疾病，由此引发补偿性的施虐狂行为。成熟的性冲动，有时候可以让女人从性冷淡和自恋的包围中挣脱出来，她只要接受自己的被动的性欲，就能够现实地而不是虚假地来体验。因为主体的行为会通过竭力的退缩不断表现她自己，这就是受虐狂的心理矛盾。惟有将自己的奉献视为天经地义，自然地和他人接触，人才能达到忘我之境，因此可以说，女人比男人更容易具有受虐狂的心理。她已注定的在性冲动中的被动性客体位置，使她虚假的被动，这种游戏由她的自恋性厌恶和由此引发的性冷淡而产生自我惩罚。事实是，很多女人特别是很多少女都是被虐待狂。这是青春期性心理的一种变态，它不是解决女人的性命运冲突的办法，而仅仅是以沉沦来逃避性命运，这一事实再明显不过。受虐待狂决非女人的性冲动应有的正常、快乐的结果。



女性要在爱情、感情和性欲方面成功地克服自己的被动性，才能使性冲动得以充分发展，和性伴侣建立双向的关系。只要两性斗争依然存在，男女性冲动的差异就将引发不能解决的矛盾。假如女人从男人那里得到欲望满足之外，还得到尊重，解决这些问题就将变得十分容易。

无论女人如何适应她的被动角色，她作为一个主动的人永远是受挫的。她所嫉妒男性的不是他那个象征着占有的性器官，而是作为他的猎物。男性处于一个甜蜜、温馨和柔情似水的肉体天地，而女人却要落入坚硬、粗野的男人天地，这一矛盾由来已久。她的双手还在希冀触摸娇柔滑腻的肉体，渴望着轻抚青春期男孩子、女性、花朵、细绒、儿童。她的身体内部还有一个完整的角落依然完好，这个角落期待着拥有她赐予男人的那些珍宝，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多女人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同性恋倾向。在各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这种倾向表现得极为明显。不是全部女人都能够并愿意用标准的、社会惟一同意的形式来解决她们的性问题。下面我们将关注这些选择为社会所禁忌的方式的女人。



第十五章 女性同性恋

在我们的印象中，女性同性恋的形象是头戴礼帽、短发、打领带的女人，她那男人的外貌似乎说明了荷尔蒙分泌的一种反常。将同性恋和“男性化”女人等同起来是大错特错，在后宫的姬妾婢女与妓女之中，在极力想彻底“女性化”的女人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同性恋者，相反，大多数“男性化”女人其实是异性恋者。性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都已证明了这一共同的观察结果：大多数“女同性恋”的身体构造与其他女人完全一样。她们的性取向决非是人体结构的“命运”所决定的。

女人必须要使自己成为客体的生存者，但是她作为主体，肉欲中含有攻击性的因子，这方面未能从男人那里得到满足，这样就出现了在她的性欲中必须加以克服的矛盾。在通常视做正常或天经地义的制度中，她是作为某个男人的猎物被抛弃后，同时还让她有了一个孩子，以此恢复她的主体地位。然而这种“正常”，被许许多多明显的社会利益所影响，即使是异性恋也被允许用其他方式解决问题。女性同性恋，是一种将她的独立自我和肉体加以协调的一种企图。从本能来讲，可以说所有的女人天生就是同性恋者。女同性恋者的重要特征是拒绝男人，喜欢女人的肉体。所有的青春期女性全都害怕插人和男性的支配，对男性身体有所厌恶。反之，她和男人相同的是，女性肉

体都是欲望的对象。

女性同性恋者分成两种类型：“男性化”，她们“期望模仿男性”；或者“女性化”，她们“畏惧男性”。总体上来讲，人们可以通过同性恋发觉这两种倾向：有的女性拒绝被动性，而另外一些女性则甘愿用女人的本钱来被动地放纵自己。这两种态度相互作用，就可以相互解释被选客体和被弃客体的关系。不过从下面提到的多种因素来讲，我认为以上划分过于武断了。

以“模仿男性”来定义“男性化的”女同性恋者，是在表明她的不真实性。精神分析学家用社会最新的定义来研究男性化和女性化等等范畴时，造成了无数歧义模糊之处。现实是，男人在今天代表着积极的人，属于中性，即他代表男性的同时也代表人；但女性只是消极的人——女性，她进行人的行为时候，都要用与男性一致的话语，在政治、体育和学术领域的活动，以及她对其他女性的性冲动，统统解释为“男性化抗议”。这种不将她追求的或她自身超越的价值考虑在内的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下列结论：她要想扮演主体角色，实际选择了不真实。

要是两性真正实现了平等，上面所说的障碍很多时候就不复存在。然而男人还在为优越感潜在意识影响，要是女人没有分享这种优越感，她就会为这种心理愤愤不平。公平地说，绝大多数任性跋扈的女人，遇到男人时基本上没有什么犹豫的，“男性化”女人经常是真正的异性恋。她们要保住做人的权利，更不想失去女性气质。她于是涉人男人的世界，甚至利用它。她的性欲的强烈使她不害怕男性暴力，她从男人身体上找到快感时，厌恶感没有羞怯的处女那样强烈。一个生性粗鲁、野性十足的人，不会因性交感到屈辱，一个胆大包天的知识分子不承认有这种屈辱，一个充满自信、生性好斗的女人，将很乐意加人稳操胜券的搏斗。


西蒙·波伏娃/著

就算情况再有利，主动独立的个性和性角色的此种结合，对女人来讲总是比男人困难得多，相当多的女人宁可不涉足这一尝试，不想白费气力。女艺术家和作家当中有很多都是同性恋。问题的核心并非是她们的性取向是创造力的源泉，或是这一取向代表着这种优越的天赋，不如说是她们因为要专心于艰苦的工作，而不愿意以女性身份和男人捉迷藏而浪费时间。她们否认男性优越，但也不假装承认或者自找麻烦地和它冲撞。她们渴望在性快感中能够得以松弛、快慰和玩耍，她们拒绝作为对手出现的性伙伴，这样她们挣脱了包含在女性气质中的种种束缚。而促使主动的“男性化”女人选择或放弃她正常性取向的因素，是她的异性恋的体验的具体情况。男性的轻蔑，证明了丑陋女人自认没有魅力的想法；自尊心强的女人被傲慢的情人所伤害。这就要再度提到上文所说过的性冷淡的原因：愤怒、怨恨、怀孕恐惧、以往流产的创痛等等。女人越是对男人的接近疑心，这些因素就越重要。



两位女演员

让－巴蒂斯特·桑泰尔　1658～1717年　法国　*两位女演员丰润、明亮、富有生命力，使庄重、典雅、优美的形象在画面上格外突出醒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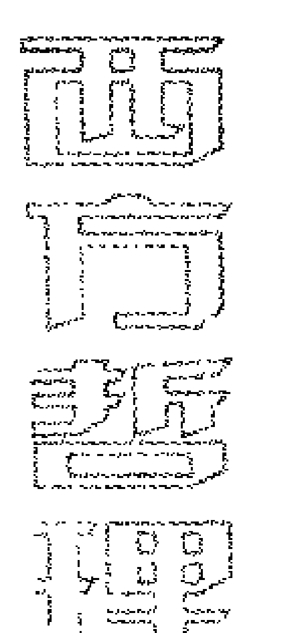
一个天性有支配欲的女人也未必以同性恋作为完美的解决方法。她始终追求对自我的肯定，无法彻底实现女性功能她十分遗憾，她的心目中，异性恋会使人感到自卑，又使她感觉充实。她拒绝接受自身性别隐含的限制的同时，往往又会囿于另一种方式。就像性冷淡的女性想得到性快感又拒绝它一样，女同性恋也挣扎在希望自己是

正常健全的女人和宁可不是正常健全的女人之间。

女性同性恋会很容易地认同自己的女性气质已经丧失，希望可以借此拥有男性气质的话。然而就算她可以用人为手段夺走她情人的贞操而占有她，也改变不了她是个阉人的事实，她意识到这一点后非常痛苦。她不能以一个女人的身份也不能真正作为一个男人而实现其性行为，她的紊乱的心态可能导致精神病。一位病人对代尔比茨（Dalbiez）承认："要是只有我才有用来插人的某个器官该多好。"而另外的一个病人则渴望自己的乳房坚挺。女性同性恋常以傲慢和赤裸来代替她男性化上的不足，暴露出一种心态的失衡。有时她会和别的女人形成这样一种关系，与娘娘腔的男人或还没有显露出男性气质的年轻人可能与她们形成的关系相类似。

精神分析学家极为重视同性恋女人和母亲早期的关系，两种情况下，青春期少女觉察到很难摆脱母亲的影响：她被母亲过分溺爱，或是为"坏母亲"所虐待，导致了她强烈的负罪感。前者之间的关系近乎同性恋，她们在一起睡觉，相互爱抚，或着喜欢轻轻地触摸乳房，这样的少女未来躺在别人怀抱中也会感到这种快感。后者则会对一位"好母亲"有强烈的渴望，以求让"坏母亲"永远无法再伤害她。

应该强调一个重要的事实：女人转向同性恋的原因并非都因为拒绝使自己变成客体。相反，绝大多数女同性恋都希望将自己女性气质发掘出来。想变成一个被动的客体，并非就是想完全放弃对主观性的要求。女人希冀以这种方式，在自己作为物的表象下，达到自我的实现，同时，她也试图以她的他性，她的相异性来认识自己。当独自一人之时，她无法形成双重自我。如果她抚摩自己胸脯，她还是不知道陌生的手对自己乳房的感觉，这乳峰将会在陌生的手下产生何种反应。男人可以为她揭示出她的



肉体是为她自己而存在，换句话说，她本人可以由此察觉，她并非为他人而存在。只有她的手指滑过一个女人的身体，并且这个女人的手指也在抚摩着她的身体的时候，才会出现镜中的奇迹。爱在男女之间是一种行动，失去自我的一方都成为了他者。做爱中的女人惊讶地发现：男性的急躁映射出她那被动地接受缠绵的肉体。但自恋的女人从男人勃起的肉体上仅是模糊地看到了她本身的诱惑力。

女人之间的爱情是沉稳的，爱抚的目的并非占有对方，而是以此再创造出自我。分离被消除了，斗争不复存在，也就没有了胜利和失败。因为相互的作用，每一方都扮演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角色，既是君王又是奴隶，使二元性成为了相互依存。

实际上从来都不存在单一的决定性因素。问题取决于各种复杂因素交织的大环境下，自由决定的选择。性的命运并没有支配女人的私生活，是她的性取向表明她对生活的总的看法。

我们已经看到，大部分女性同性恋者都会默默地逃避着男人，她们有一种幽怨、胆怯和自尊的感觉，这与性冷淡的女人相类似。她们并不认为自己可以和男人匹敌，她们在女人幽怨的情绪之外，还有着男人的自卑情结，男人对她们来说是竞争者，他们在引诱、占有和保持他们的猎物上更有优势，她们憎恨男人对女人的“玷污”。她们愤愤不平地注视着男人拥有的社会优势，感觉到他们的强势，她无力和他交手，明白他可以一拳将自己击倒在地。

这种复杂的心境，是迫使某些女同性恋者故意引人注目的动因之一。她们汇聚一堂，组织起女性俱乐部，以此证明她们在性甚至是社交方面都不需要男性。在这一点



上，她们极易坠入夸大其词和虚伪的装腔作势。女同性恋者开始是装作男人，后来甚至做女同性恋本身成为一种游戏，男性服装开始伪装，后来变成了制服。女性在逃离男性压迫的借口中，又成了她扮演的角色的奴隶，她不想被女人的处境所束缚，却又受到同性恋者的处境约束，这些解放了的女人给人以心胸狭窄、残缺不全的印象。还应指出的是，许多女人自称是同性恋，仅仅是为了对自己有利的需要：她们搞同性恋，是因为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模糊的诱惑力，她们甚至借此引诱可能对“坏女人”感兴趣的男人，这些叫嚣的狂热分子（她们是女性同性恋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部分），使社会舆论原来就认为是邪恶和装模做样的形势雪上加霜。

事实上，同性恋并非是一种厄运，更不是故意恣意狂欢的变态，它实际是特定环境下所选择的一种决定。换句话说，它可以是被激发的，也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各种令主体作出这种抉择相关的因素——生理条件、心理背景和社会环境，哪一种都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使这些因素都有助于解释同性恋倾向。除此之外，同性恋也意味着一种方法，女人以它来解决生存处境，特别是她的性处境所引发的问题。与人的所有的行为一样，同性恋究竟是带来虚伪、挫折、失衡、谎言，抑或是相反会带来有益的体验，则要由它在现实生活中的表现方式来决定——是阴沉的、懒惰的、虚伪的，还是开朗的、慷慨的和自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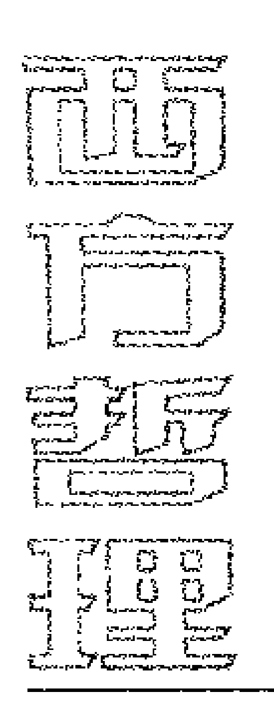
第五部 处境



第十六章 少 妇

婚姻相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含义是完全不同的。男女两性确实是彼此必需，然而必需却从来没能使之产生平等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到，女人从未成为一个等级，从而无法与男人的等级在交换、订立契约等方面平起平坐。在社会中，男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视为生产者，他为群体所做的工作可以证明他生存的必要性。女人在父兄所支配的家庭中，处于奴隶或是仆人的地位，她始终是由男性做主而嫁给另外的男性。她可以被养活的惟一方式就是婚姻，也是能够证明她那正当的生存的惟一途径。下面的两点是她必须结婚的理由：

首要的原因是她要为社会生育下一代。例如在斯巴达和纳粹德国的统治下，国家直接对女人实行监控，仅仅是要她成为母亲，这种情况比较极端。然而，就是在不了解父亲在繁衍中的作用的原始社会，女人同样被要求有一个丈夫。结婚的另一个必要的理由是，女人有满足男人性欲的义务和做家务的职责。女人身上的这些义务，成了她为丈夫的一种服务。作为回抱，他需要送给她聘礼，明媒正娶，或者养活她。社会以他为中介，偿还他转移给他的女人的债务。妻子的权利从履行自己的任务得来，表现为男性所承担的必要义务中。由此，他不可对婚约随意反悔，只有经由社会机构的认可，他才能遗弃妻子或者与她离



婚。到了那时，丈夫也可能要支付妻子一定的补偿金：这种制度最早在伯乔瑞斯（Bocchoris）法老时代的埃及就成为习俗，而今天的美国称之为赡养费。一夫多妻制从古到今不同程度地被社会宽容：男人能够同女奴、婢妾、情妇和妓女上床，但也要尊重合法妻子的某些特权。若是她被虐待或是侮辱，她有权（这也是不同程度地受到明确保护的）回娘家，自行提出分居或离婚。

这样，婚姻对于双方都有负担和权益的双重性质。然而对双方并不存在对称性的环境。对于女孩子来说，婚姻是为社会所承认的结合的惟一方式，要是没有人愿意娶她，从社会意义上来说，她的生存意义差不多就等于零，这就是为何母亲老是对安排她的婚姻如此热心的原因。19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里，订下女儿的婚事几乎无需征求她们的意见，经过预先安排过的“拜访”，女儿就送给了求婚者。

结婚之后，女人在社会上获得了她的一份权利，法律可以保障她不被男人肆意行为所伤害，但她变成了他的财产。她必须将她的身体、处女的贞洁和绝对的忠诚奉献给他。因此，她丧失了少女时曾有的某些法定的权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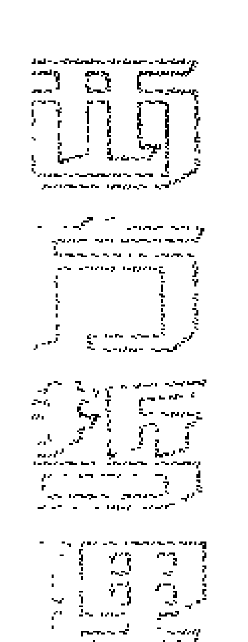
因为丈夫是生产劳动者，他已超出了家庭的利益，而面向社会的利益，为集体未来工作，也以合作创造着他的未来，他成了超越的化身。女人命定要繁衍后代和料理家务，换句话说，命运是内在的。延续和发展包含在任何生命的活动之中，对男人来说，更有可能通过婚姻使两者完美的结合。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活动中历经变化和进步，感受到自身在时间和世界的范围里扩展。在这些活动中感到疲惫时，他可以回到家中，那个固定的地方，能够

停泊的港湾。夜晚他在家中恢复精力，妻子只能料理家务和照看孩子，保管她过去存下的东西。她的工作是没有变化地延续和抚育生命。她要使物种得以延续，保证日常生活的节奏和家庭的连续性，小心地把门锁好。然而，她却不可能直接地影响未来或者世界，而是以丈夫为中心，借此超越自身，和社会群体相连。

男人因为是要"娶"女人，他选择的余地就大，特别在很多女人向他求婚的时候。而性生活是女人被安排好的一种服务，她可以通过这种服务得到利益，所以漠视她本人的选择权利顺理成章。婚姻并没有赋予她和男人享有同样自由的权利，然而没有自由就没有爱，个性当然就无从谈起，她只有放弃对特定的某个人的爱，来确保自己终身被某个男人保护。

女人对与其所选择的丈夫确立特殊的性关系并不感兴趣，仅仅关注以其普遍性来运用女性的功能，只能以特定的方式来获得性快感。她的性冲动将出现两个后果：第一，她完全没有婚外性活动的任何自由，性交因此成了一种制度，两性的欲望和满足都同样服从社会利益，但男人因为超越成为劳动者和公民，他能够在婚前和婚外享受偶尔的刺激。任何情况下，他都可以以某种途径获得辩护，而这个世界将女人定义为女性，惟有做女性，女人才可以得到辩护。第二，前文已述，根据生物学角度，普遍性和个人性的联系，男女两性之间是有差别的：前者在以丈夫和生殖者的角色完成他的物种使命的同时，无疑是获得了某种快感；反之，女性的生殖使命和她的性冲动快感却经常是分离的，因此，婚姻虽然为女性性生活赋予了伦理的合法，实际上却是要压制它。

新婚之夜的性体验就像是一次考试，夫妇俩都担心自己会性无能，对可能会出问题感到不安，导致顾不上好好替对方着想，以致于初夜的气氛严肃得使人压抑。要是女



人由此而产生了持续性性冷淡，自然不足为奇。亚里士多德就说过，丈夫此时面临的难题在于：若是“他过分放荡地挑逗妻子”，可能导致她的反感和恼怒。譬如美国丈夫们就因为担心这种后果而手足无措。特别是他们的新婚妻子受过高等教育，婚前又极度克制自己的情况加重了这种尴尬。

如果爱或者性渴望令双方完全是情愿的，初夜体验可



能遇到的障碍就荡然无存。情人之间相互确认彼此的自由的同时给予和得到快乐，为肉体的渴求带来了力量和尊严。这时他们所做的任何事都不是羞耻的，因为这不是在被迫的情况下，是自愿的情况下做的慷慨行为。要是婚姻将本来是建立在自发冲动基础上的相互关系变成了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它在性质上就是可恶的。原因是婚姻给予两个身体一种工具的性质导致了人格的损害，它们注定了作为一般的身体而非个人的彼此体验。丈夫一想到他是尽义务就会索然无味，而妻子则在意识到自己委身于对她实施权利的人时感到羞愧。当然，也不排除两人的关系在新婚伊始就有个性化，性生活的实习有时缓慢向前，具有渐进性；也有可能新婚之夜就体现欢乐的肉体吸引。婚姻可以让女人自由放纵，逐渐消除从前的那种和肉体相联系的罪恶观念。有规律地经常做爱，能够形成肉体的亲密感，促进性成熟。很多妻子结婚最初几年获得了最大的满足。引人注意的是，正是她们对丈夫的感激，令她们在未来可以较容易原谅丈夫的过错。

支持理性婚姻的人可以振振有辞地说，爱的结合也不一定可以保证夫妻美满幸福。第一，少女常有的理想中的爱情并非总有性爱的意思，她对于柏拉图式爱情的幻想，

她的白日梦，她所表现的童年或少女梦幻中的情欲，经不起日常生活的检验，也不会持久。即使她和未婚夫有着强烈而真诚的性吸引，也并不意味着终身大事有了牢固的保障。



梳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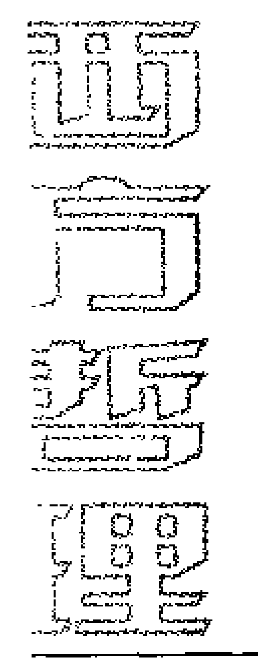
让－安托万·华托　1684－1721 年

法国　*画中的裸女神态具有典型的罗可可责奔风格特点，以迎合追求行乐的贵族子弟的审美情趣。*

况且，即便是性爱早在婚前就激发或是蜜月时期已经产生，它也会在未来的岁月中永恒不变。无疑，忠诚在性爱中必不可少，因为二人世界在爱情中的欲望仅仅和他们本人有关，他们厌恶第三者的插足，彼此都希望别人无法取代。可是，这种忠贞只有在一时冲动时才有意义，而一时冲动会使性冲动的魔力迅速消退。不可思议的情况是，一时的冲动将每个情人短暂地、肉体地变成了一个其生存能够以无限的超越而延伸的人，占有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的，但起码可以用一种很特殊的、非常刺激的形式建立起关系。双方因为敌意、厌倦或是冷漠终止这种关系，性冲动的魔力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是友好和尊重的氛围中它也将消失，他们共同的进入外部世界的计划，进而以超越精神而交往的两个人不需要肉体的结合，当这种结合的意义不复存在时，他们甚至反感它。

事实上，肉欲的爱既不是目的，也不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它无法为生存辩护，也无法接受外界的辩护。换句话说，它在人的生活中应该是起到独立乐章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自由的。

这样，资产阶级的乐观向订婚的少女提供的决非爱



情，它向她描绘的光辉远景是幸福的理想。具体地说，就是内在和重复的生活中所追求的乏味的平衡理想。在歌舞升平的时代，这是整个资产阶级特别是地主们的理想，他们的目标并非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平静地持续过去，维持现状。男人被鼓动起来行动，他的使命是生产、战斗、创造和进步，对整个宇宙和无限未来的超越。传统的婚姻没有准许女人和他一起超越，它将她局限于内在性之中，

她被桎梏于她自己的天地里，因此她的计划只有建立稳定而平衡的生活。现在是过去的延续，以此避免了明天的威胁，换句话说，计划只能是创造幸福生活。她将发现，一种通常称为婚恋的温柔而尊重的情感代替了爱情，她将封闭在她管理的家庭中，她需要一直为物种的延续而努力。

如今，家庭曾有的宗族意义的光辉已荡然无存，对大多数男人来说，没有了对祖辈曾有的回忆，它只是一处住宅罢了，未来的岁月也不包括其中。但女人还是希望家庭在她的心中具有曾有的意义和价值。

可是，为了在内心深处找到一个家，必须要在成果或行动中实现自我价值。男人因为可以通过计划表现自我，所以对周围世界没有多大兴趣。女人却在婚姻中被拘囿一隅，她要将这个牢笼装饰成一个王国。她对家庭的态度，可以用解释她的生存处境的辩证法来注释：她以变成猎物的方式来猎取，她以放弃自己来换取自由，她为了征服世界而放弃了这个世界。

将自己锁在新家里对她来说不无遗憾。童年时期，整个乡间都是她的家院，森林也不例外。如今她限制于一个狭小的天地中，大自然对她来说只有一个花盆那样大小，她的视野被四面墙壁所阻隔。但她正准备克服这些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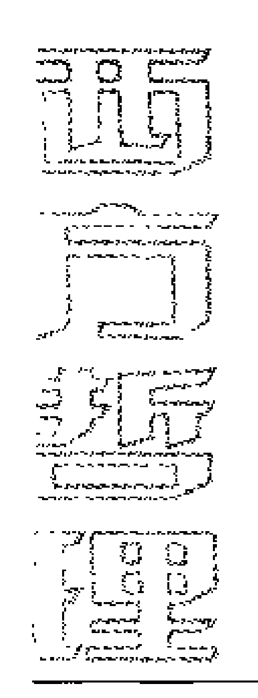
她在家中摆设奢侈的古董，这样她也拥有了世界上的动植物，也可以体验到异国情调和重温流金岁月。丈夫就代表人类社会，她自己的孩子可以不费气力地赋予她整个未来。

家庭现在成了世界的中心，甚至成为它惟一真实的存在。家是“相反或对立的宇宙”，家就是避难所、后方基地、洞穴和子宫，为躲避外来危险提供藏身之处，混乱的外部世界由此变得不真实。特别是晚上，门窗紧闭，妻子感到自己就像是女王，白天普照万物的阳光令她心烦意乱，晚上不会感到沮丧，不属于她的东西都被清除了，她知道灯罩下的光是为她所有，照亮的只是她的住宅，其他的一切不复存在，现实汇集在家里，外部的世界似乎就此消逝了。

几乎没有其他工作会比无止境的家务活更类似西塞福斯[①]受到的折磨：干净的东西用脏，脏的再弄干净，周而复始，无休无止。家庭主妇通过原地打转消磨时光，她毫无进展，永远在维持现状。她永远无法感到争取积极的善，而是与消极的恶没完没了的斗争。

主妇往往因屈服于这种命运而处于近乎变态的疯狂状态，一种虐待——受虐待狂的状态。神经质的主妇开始向脏东西宣战，并因所有生命的副产品都要带来废物而诅咒生命本身。一旦任何有生命的东西踏进家门，她的眼中就闪烁着巫婆般的光芒：“快点把你的脚弄干净，别把那个地方弄脏了，别碰那东西！”她希望家里的东西最好丝毫不变。她严厉、神经过敏、时刻提防，毫无生活乐趣可言，她挡住阳光，因为小虫、细菌和灰尘将随之到来，阳光更会破坏丝制挂毯，让沙发套褪色，她到处喷着香水，

① Sisyphus，古希腊神话中的克林斯暴君，将自己的儿子杀掉宴请众神，死后被罚在地狱中将巨石推上山顶，当到顶的时候巨石滚下，永无休止。



屋内满是香气。她对一切生命都埋怨、看不顺眼和带有敌意，经常杀气腾腾。

相对于打扫卫生，做饭和准备吃饭的工作更主动，也更让人高兴。首先，这意味着要到商场采购东西，通常这是一天最快乐的时光。而在门口一边挑菜一边聊天，这是对孤独的一种解脱。女人在市场和商店里闲话家常，志同道合，感受到自己是群体的一员，而这一群体在此刻是和

男性群体对立的，如同主要者和次要者的对立。购物是极大的乐趣，它像是某种发现，甚至是发明，这是商业文明的赞歌和历险。主妇们几乎不懂得如何赌赢，不过一棵实心菜、一块熟奶酪就是她用智慧从不情愿的店主中赢来的财富。她的赌博就是用最少的钱换来最好的货物，节俭与其说为了收支平衡，倒不如说是为了赌赢。看到家中存有满满的食物时，刹那的胜利让她由衷的高兴。

即使煤气和电气使火的魔力不复存在，但农村还有很多女人体验着用无生命的木头燃起了有生命的火的乐趣。女人随着火的燃起成为了魔术师，只要一个动作，比方说打鸡蛋或是或火的魔力，她就能够令物质产生奇妙的变化：物质成了食品。这种炼金术有一种迷人的魅力，做果脯更充溢着诗意，主妇了解糖能够保鲜，所以她将生命密闭在罐子中。烹饪是偶然的创造和发现，烤得恰到好处的蛋糕和薄馅饼让女人有特殊的成就感，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制作它，此人必须有天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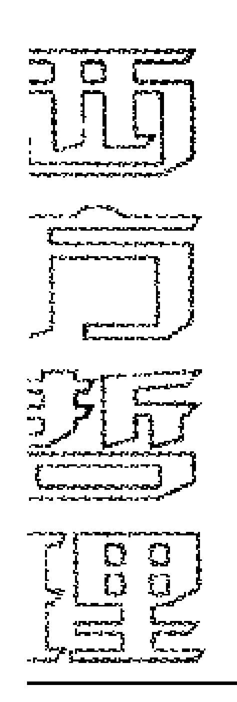
将家务活视为职业的话，将是乏味无聊和空虚单调的。不过，要是做这些工作的人同时又是个生产者的角色，对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来说，它就像是有机功能一样顺理成章地与生命融合。所以，男人做家务的心情远没有如

此灰暗，对他们来说，这是个他们接着就可以脱身、否定、无关紧要的时刻。劳动分工使得妻子——仆人的命运令人厌恶，它让她注定彻底成为一个一般的人，次要的人。住所和食品对生命有用，但不对她有深刻的含义。主妇的直接目标只是手段，不是真正的目的。不错，她能努力使她的工作具有某种个性，让它看起来似乎是主要的。她会感觉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做的像她这样完美。她会执行她的仪式、迷信和做事的方法。实际上她的"个人风格"只是将混乱重新做一番模糊、没有价值的理顺。

总的说来，婚姻在今天是已消亡的生活方式的残留物。妻子的处境比前更加不如，在她履行相同的义务的同时，曾有的相应的特权和荣誉却没有了。今天男人们结婚，是想要寻到一处栖身之地，但并不想为之所限；他希望有一个家庭，又随时能够摆脱那里；他有了家，心灵却依然在流浪；他并不排斥家庭幸福，却不将其视为追寻的目标。平淡重复令他厌倦，他喜欢猎奇、历险、反抗命运，希望找到可以使他脱离孤独的伙伴和朋友。孩子甚至比他的父亲更想摆脱家庭的羁绊，对他们来说，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在前面，孩童们总想历险。女人企图创建一个永恒、连续的宇宙，但丈夫和孩子们却要超越她创造的天地，因为这个天地对他们意味着固定的环境。而这才是她虽不愿意承认自己终身从事的事业性质可疑，却还是要逼迫他们接受她的环境的原因，她就由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变成了后母和泼妇。

因此，女人做家务不能为她带来自主性，这对于社会不产生直接的效益，既无法扩展未来，也不会生产产品。仅仅在和超出自我的生产活动中面向社会的生存者联系在一起时，才有实在意义和得到尊重。换句话说，她的工作远远达不到使她独立的地步，不过是让她依附于丈夫和孩子存在。她只有靠他们才证明自己生存的必要性，在他们





的生活中她仅仅是个次要因素。即便是法律上不再规定“服从”的义务，也不会使她的处境有所变化，原因在于这并非是夫妇俩的主观愿望所决定，而是婚姻群体的结构所致。女人被禁止从事某些积极的工作，不能赢得做一个完整的人的资格。她受到的尊重的程度再高，也无法改变她的附属、次要、寄生的地位。她无法领悟她的生活的意义，所以她身上包含着沉重的负荷。而这也是婚姻的成败

对她来说，比对她的丈夫更加重要的原因。他首要的身份是一个公民，一个生产者，然后再是一个丈夫，而她首先是一个妻子，而且有时仅仅是个妻子。她的工作不会令她脱离她的生存处境，反而正是她的处境才使她的工作得到高低不同的价值。如果她有爱情，她可以无私奉献，那她就会高兴地完成她的任务；要是她带着怨恨的心情来完成工作，她就会感到工作的单调无聊。工作在她的生命中只能发挥次要作用，婚姻的成败和它关系甚微。所以，就要考察在生活中女人的处境是如何具体感受的——这种处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床上“服务”和家政“服务”，女人只有承认她的附庸身份，才会获得她的尊严。

惟有美满而激情的性生活，才能可以重新令她感受到宁谧和谐。开始她一般不会对此感到愉快，而是为之烦恼。她的反应与月经初潮时相类似：她厌恶对她的女性气质如此的表露，并想到它一再重复出现是恶心。经期的形成令少女伤心地感觉到自己还不是成人，在结婚和处女贞洁失去之后，她成为了一个成年人，最后的过程也完成了——现在怎样呢？一种极为失望的感觉伴随在处女贞操丧失的同时，她也成为婚姻的依附品。一个女人即使和她的未婚夫或是其他男人发生过“关系”，婚姻对她来说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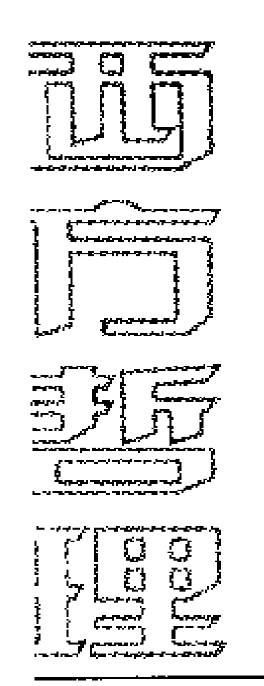


然是代表着完全的成人生活，女人通常有这种反应。一个人在事业开始时总是意得志满，但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命运无法控制时却是十分沮丧。在这一决定性的、无法改变的环境中，自由根本无足轻重。之前，少女还处在家庭的羽翼守护之下，她尽可能地运用她所拥有的自由来抗拒和期待变化，赢得婚姻。她结婚之后，这就是她在世界上的全部命运，没有其他前途。她彻底明白了她将会承担什么样的任务：和她的母亲的任务一样，同样的过程将永无休止地重复。做闺女时她一无所有，但她可以在梦幻中期待未来。现在的她算是有了一点自己的领地，可是却为此苦恼："永远都只有这样一丁点儿！永远和这个丈夫，这个屋子一起生活。"她没有了未来，也没有任何重大的事情可以期盼了。

婚姻一般使得妻子成了丈夫的附庸，这样他们的相互关系就极为尖锐地摆在女人面前。婚姻的矛盾在于，它包含着性爱和社会双重的功能这一事实，少妇心目中的丈夫形象就体现了这个矛盾。他是个有男性权威的、注定取代父亲角色的半神人，是保护者、赡养者、导师和指路人，妻子的生存要依靠他的护佑，他是价值的维护人、真理的创造者和伦理的维护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她不得不与之一块儿分担耻辱的、可笑的、令人厌恶的或是让人不安的，是附属的体验的男人，他与她一起共赴巫山，同时他又坚定地指引她为理想而奋斗。

而最关键的是，传统习俗将"管理"男人的技巧生硬地放在妻子的身上，一个妻子必须找出并迁就他的弱点，必定要明智而恰到好处地使用奉承和讽刺，顺从和反抗，警惕和宽容。最后一种态度的结合最为复杂精妙——给丈夫的自由不能太多，也不可太少。要是她不许他冒任何风险，要是她的妒意、争吵和苛求令他忍无可忍，就明确地将他推到对立面上。





这真是一门让人难以掌握的学问——装聋作哑，运用权谋，在沉默中恐惧和怨恨，挑起男人的虚荣和弱点，学会阻止他、欺骗他，控制他。为此她有一个有力的理由来辩护：就是她要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婚姻。她没有可以获得薪水的工作，没有法定行为能力，没有社会关系，甚至连姓氏都冠以夫姓，除了作为丈夫的“一半”之外一无是处。如果他和她离婚，她通常是既无法自食其力也不会获

得外界援助。托尔斯泰的老婆索菲娅受到批评是很好理解的，但若是拒绝虚伪的婚姻，她能去哪儿？她又能得到什么样的命运？她的表现确实像个可恨的泼妇，可是又怎能要求她深爱她的暴君、为她受到的奴役而高兴呢？夫妻间的忠诚和友谊从根本上说，是双方之间关系的自由和具体事务的平等。由于男人有独立的经济地位，由于法律和社会习俗上他有着男性的优势条件，因此他成为暴君和由此产生的女人的反叛和掩饰，都是顺理成章了。

不同情况下，婚姻有着不同的形式。对绝大多数女人来说，过日子的方式大同小异。在早上丈夫离家的一刻，妻子高兴地听到他关门离去。这意味着她的自由，孩子们上学去了，她单独一人，要做的家务事数不胜数，她的手忙忙碌碌，但头脑中空空如也。她所有的小算盘全是为了家里人，她活着仅是为了他们，她的无聊直到他们回家才消失。她的丈夫经常带给她鲜花和小玩意儿，可这在此时显得何等可笑！他并不着急回家，因为对成天的争执吵闹感到厌烦，而她只是为她的无聊进行小小的报复，以此表明在她的不屑表情中流露出来的、不出人们意料的失望。丈夫更加失望，即使是她因为犯了错而不唠叨，他因为工作疲惫不堪，这样就有了既想休息又想寻求某种刺激的矛



盾想法，可是妻子却无法满足他。夜晚单调乏味：读书、听收音机，漫无边际地聊天，就在表面亲密的伪装下，双方都感到是孤独的。妻子带着愿望和担忧，期待着今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她在上床就寝的时候是失望、恼怒，还是欣慰，就要看具体情况了。第二天早晨听到丈夫关门声时，她又会感到高兴。贫困和辛劳的女人的命运难以忍受，有空闲和消遣时间的女人则会愉快一些，但无数的女人都在反复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无聊、期待和失望。

女人也有几条可以逃避的道路，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特别是在农村，婚姻的枷锁沉重，妻子可以做到的只是适应她不可逃避的处境。有的人（尤其要注意）成为刁钻的主妇，有的人则千依百顺，成为虐待的受害者和家庭的女奴。也有的人仍然保持着在少女身上有过的自恋的痕迹，实际上一事无成、一无是处，她们忧郁地自我崇拜，又认为自己“受到误解”，于是在浪漫幻想、矫揉造作中逃避。然后沉湎于此，大发雷霆，依靠虚构的戏剧性故事、俗艳的衣服作为逃遁。女人借此逃避的象征性行为，有时会引起精神衰退、强迫症甚至犯罪。作为摆脱忍无可忍的处境的最后方法，她们也会杀死令她憎恨的丈夫。

一个不在意自己的处境，决定用豁达和真诚的方式来生活的女性，或许只有借用苦行僧式的自尊，此外无路可走。她在所有的物质性上都是依附的，因此只能理解内在的抽象的自由，她不肯接受现有的原则和价值，她使用自身判断力，提出问题，借此逃避婚姻奴役。她的这种超然，她恪守的“容忍和节制”的原则，只是一种消极态度。她缺少行动力，自暴自弃，怨天尤人，不积极发掘自身的力量；她帮助别人，抚慰别人，保护别人，赐予别人，忙忙碌碌，她因为找不到真正挑战自己的任务、真正的人生目标而痛苦。她在孤寂和贫乏中消磨生命力，有可



能因此而否定和毁灭自己。

有一些青年女性正在努力为这一积极主动的独立而斗争，但极少有人坚持她们的学业或职业长期不懈。她们很明白，她们的利益和她们的工作息息相关，而这利益又往往因为丈夫的利益而被轻易放弃，她们带回家中的收入只可以补贴家用，她们表面上投身事业，而这无法让她们脱离婚姻的枷锁。甚至有着严肃职业的女性，也得不到和男人同工同酬。诸如法国律师的妻子能在丈夫死后领到一笔抚恤金，但女律师死后她的丈夫却没法得到相应的抚恤金。也就是说，工作的女性并不像男人一样被当成配偶的赡养者。有的女性通过职业获得了真正的独立，但对于大部分女人来说，婚姻之内的"外部的工作"仅仅是疲劳的追加。另外，生育的重担也逼迫她们定位于主妇的角色。现有条件下，很难协调工作和生儿育女的责任。



浴　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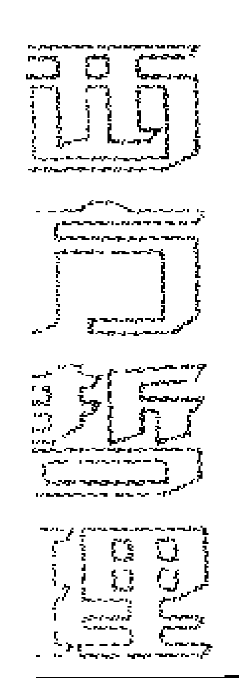
弗朗索瓦·勒穆瓦纳　1688－1737年
法国　*画面主体形象是位丰艳婷婉的裸女，在侍女的服侍下试探着下水的姿态神情。*

从传统来说，孩子能够保障女人真正独立的地位，这一独立可以让她不需要努力追求其他任何目的。如果她从妻子角度来说不是完整的人，但从母亲的角度来说却是完整的：孩子就是她的幸福，就证明了她生存的正当性。她可以用孩子在性和社会两方面取得自我实现。可以说，生育使婚姻制度获得意义，达到了它的目标。因此，考察女性生活史中的这一最高阶段极为重要。

第十七章 母 亲

女性通过做母亲来实现她的生理命运，是自然赋予她的“使命”，她的全部生理机体都为物种延续做准备。我们已认识到，人类社会决不会任由自然支配。近一百年来，生育功能不再完全受生物学机能摆布的迹象特别明显，开始由人类主观意志进行控制。有的国家已经正式使用科学避孕法，天主教国家则在不公开地进行，或者由男人采用“中止性交”，或是由女人在性事之后洗掉体内的精子。而这些避孕形式经常是情人或是已婚夫妇产生不满和冲突的根源：男人不愿意在那高潮的片刻还要小心提防，而女人则讨厌烦人的清洗任务；他埋怨女人身体的生育力太强，她则恐惧男人不小心将生命的火种射人她的体内。要是她在采取种种预防手段之后，结果发现自己还是“中奖”，双方都将大惊失色。这样的情况在避孕手段尚处于原始的国家屡见不鲜。这就只有一条很无奈的补救方法：人工流产。

避孕和合法堕胎的使用，让女人自由地选择接受做母亲的义务成为可能。现在，女人的受孕一部分是自愿的，一部分是偶然决定的。由于目前人工授精还不是普遍的方法，想成为母亲的女人——因为没有和男人接触，或是她的丈夫没有生育能力，或是她本人无法怀孕，可能不会得偿所愿。而另一方面，女人常常发现自己被迫生育，而不



是出于自己的意愿。女人对于怀孕和成为母亲的感受因人而异，而且差别很大，这种态度有满不情愿、听天由命、心满意足或者热切盼望等形式。还应注意，年轻的母亲公开的决定和声明并非总是和内心想法一致。

当轮到自己来做母亲的时候，女人从某种程度上就会取代她的母亲，意味着她本身的彻底解放。要是她真心希望成为一个母亲，就会为怀孕感到高兴，鼓足勇气独自经

受怀孕的整个过程；要是她依旧在母亲控制之下，并愿意接受这一支配，她就会正好相反，让母亲来掌控自己，此时她会觉得如同初生的婴儿，同兄弟姐妹完全一样，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要是她既有渴望而又不敢放纵自己，就会惟恐孩子不能解放她，而重新将自己封闭起来，这种焦虑甚至会导致流产。对童年时代曾仇恨母亲的负罪感也多少给怀孕以不利影响。

女人和准爸爸的关系同样有重要意义。一个已经成熟且独立的女性或许会希望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孩子。我认识的一个女人，她一看到英俊男人，两眼就会放出快乐的光芒，不是因为情欲，而是她想当然的认为他会是个好父亲，这一类人是总想做妈妈的英雄母亲，她们关注人工授精的奇妙前景，要是这种类型的女人嫁了孩子的父亲，她会排斥他对于他们的后代的任何权利，通常情况下，女人承担新的责任时，需要来自男人的支持，只有当男人对她一心一意，她才会对刚生下的婴儿一心一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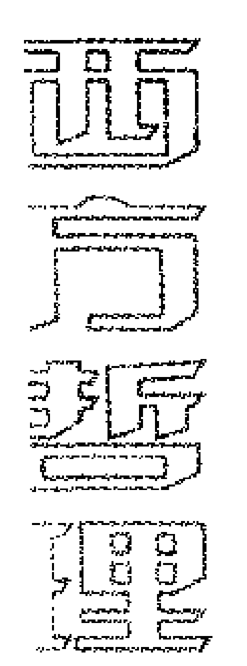
然而怀孕首先是女人的身体内部上演的一出戏剧：她会认为这是一种富足，又是一种伤害。胎儿是她身体中的一部分，也是依靠她的身体而生存的寄生物，她既占有它，又被它所占有，它昭示着未来，怀上它的时候，她感

觉自己浩瀚丰富如同宇宙，可是这种丰富却又意味着她本身被否定，现在的她等同于虚无。新生命即将诞生，而且要证明独立存在的权利，她以此而自豪。但同时她又深深地感觉身不由主，自己的被动性，成了黑暗中的力量的祭品。特别要关注的是，当孕妇怀孕的时候，她对身体的感觉是内在性的：它的妊娠反应是对自身的攻击，它已不再为自身存在，它比之前任何时候都要庞大。工匠和劳动者的超越性带有主观性的色彩，而即将做母亲的女人的主客体对立已不复存在：她与她体内的孩子成为一体，是为了生命摧毁的一对。孕妇为自然力量所俘虏，就成了植物和动物，成了储备的能量库，成了孵化器，是个卵子。有着青春平直的身体的孩童把她吓坏了，年轻人更是嘲弄她的身体，因为原本是个人，一个有意识的自由人，却成了生命繁衍的被动工具。

妊娠期的推移使孕妇和胎儿的关系也随之改变。胎儿牢牢地吸附于母亲子宫里，双方的机能彼此适应，两者相互的生物学代谢令女人重新建立了平衡，她再没有物种支配的感觉，是她占有了自己身体中的结晶。开始一段时间内，她还是个普通女性，她体内神秘的活动持续进行着，别人认为她即将做母亲了，娇弱成了她的另一种荣耀。当她的虚弱愈加明显时，一切都可以被谅解。很多女人都会发觉妊娠后期自己的心情异常平静，这时她们生存的必要性得以证实。此前那种观察自身、验证自己欲望的想法因为受社会习俗所限，使她们一直不敢太过认真地正视这一好奇心。现在这是她们的权利，她们为了自身做出的一切也是为孩子做的。人们不要求她们再工作或努力干什么事情，她也无需为别人的事情操心，她们对未来的梦想此时有了载体：让自己好好活着，她们在休假。


西蒙·波伏娃/著

即将临产的时候，母子出现了分离的迹象。孩子的第一个动作，朝着世界的入口并向子宫壁（它是他与世隔绝



的障碍）踢动，女人对此感受不一。这预示着一个独立生命将会诞生，有的女人对此无限惊奇，有的女人或许会讨厌肚中的陌生生命。胎儿和母亲的结合再次被干扰：子宫的下坠使孕妇有受到挤迫、紧张和难以呼吸的感觉。她不再被一般的物种占有，而是被即将诞生的胎儿占有。此前，它是个心灵中的幻象和希望，此时他成了近在眼前的不可改变的现实，这就形成了新问题。每一个转变都有极

大的忧患，分娩特别让人恐惧。当孕妇临产的时候，每一种童年的恐怖全都重现眼前，要是负罪的感觉使她出现母亲诅咒她的幻觉，她就会相信自己即将死亡或是婴儿将死去。

在不同的情况下，分娩的意义大相径庭：孕妇希望可以保存作为她自己一部分的可爱又珍贵的肉团，同时又想摆脱掉这个不速之客；她的梦想终于可以变成身边的现实，却又害怕母性到来将给她新责任。两种欲望在脑海中此来彼往，令她烦恼。当这种令人担忧的灾难越来越迫在眉睫时，她也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她希望可以向自己和周围的人——母亲和丈夫证明，她可以独闯难关；但也会怨恨自己的被动性，因为自己遭受的苦难而怨恨生活，怨恨家庭，怨恨整个世界。有着独立性格的女人——主妇或是有男性气质的女人，快要分娩或生产时，就愿意扮演主动者的角色；而幼稚的女人，则因为托付给产科大夫或者母亲而显得十分被动，有的人会骄傲于没有哭喊，也有的女人对所有的命令都不听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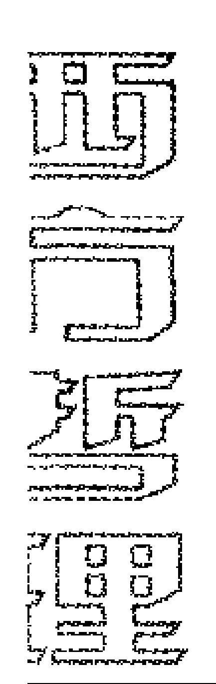
女人可以通过生育的过程体现出她们对一般世界，对她们成为母亲的总的态度：她们可以是忍耐的，认命的，苛求的，蛮横的，反抗的，被动的或是紧张的。有的女性

认为，分娩使她们感受到了创造力，她们自愿完成这一富于成效的任务。反之，有许多人认为自己是被动的、遭罪的工具。

不过，所有的年轻母亲都会有极大的好奇心。可以看到和抱住一个在自己身体中成长并由自己生下的生命，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然而，将新生命带到世界上这个非比寻常的事件里，母亲究竟发挥了什么作用？她并不明白。如果没有她，新生命就不可能出现，但现在却离她而去。眼睁睁看着他的出世，和她的联系切断了，她伤心而且近乎失望。女人极力盼望这个新生的婴儿完全属于她，就像她的双手完全属于她，然而他的各种感受却为他所紧闭着，他并不透明，无法进入，是自成一体的；她甚至因为不了解而不承认他。她一个人忍受怀胎的过程，她与这个陌生的小生命没有共同的经历。她企图能立刻熟悉他，事实却并非如此，他是新生的人，她对自己接受他时的冷淡感到惊讶。在怀孕的幻想里，他是心理上有着无穷可能性的形象，准母亲思考着享受成为母亲的未来，此时他成了一个有限的小个体，这个个体呆在那里，实际上他是附属的、娇弱的、贪得无厌的。伴随着他终于到来母亲有发自内心的快乐，同时掺杂着某种遗憾：他不过如此而已。

或许很多母亲都忐忑不安于要承担新的责任。这种女人怀孕时完全跟着肉体的感觉走，没有任何主动的精神。面对着她哭闹着要求重视自己存在的人，有的女人还是快乐无忧，笑口常开，在医院时她们欣喜地爱抚着自己的孩子，回家之后，孩子却被当成了一种负担。甚至喂奶也无法给这个女人带来任何高兴的感觉，恰恰相反，她害怕这会使她的乳房变形，她恼怒地感到自己的乳头被弄伤，乳腺被弄疼，孩子的吮吸对她有害，她感觉孩子正在吸走她的力量、幸福甚至生命。孩子使她变成了刻薄的奴隶，不


西蒙·波伏娃/



再是她的一部分。她就像个暴君，对这个陌生的小家伙生出了敌意，因为他对她的肉体，她的自由和她整个自我产生了威胁。

一般情况下，母亲不会忘记责任，借此抵制着对孩子的敌意。她的内疚引起了焦虑，这是怀孕期忧郁的延续。精神分析学家相信，母亲要是始终不能摆脱要伤害孩子的想法，随着臆想就可能发生严重的意外，甚至她们会将孩

子视作敌人，硬着心肠对他们实行压制。

母亲被迫打交道的不再是男人、英雄或者半神人，却是十分脆弱、依赖于她的呀呀学语的小不点儿。孩子不曾占有任何价值，他无法给予任何东西，即使和他在一起，女人还是感到孤独，她不指望她的给予可以得到回报，她自己证明这种无条件给予的正确性。这种慷慨值得讴歌，男人对此更是全力鼓吹赞美，然而，当母性的宗教宣称所有母亲都神圣时，某种曲解也就产生了。母亲的奉献或许是完全的真诚，但这种情况较少。大多数情况下，母性往往包含着自恋、利他主义、慵懒的白日梦、诚实、狡诈、贡献和玩世不恭的奇异混合。

我们的文化中孩子面临的危险是：那些被托付养育的完全没有自立能力的孩子的母亲，实际上差不多老是心怀不满的女人：不是性冷淡，就是在性方面没得到充分满足；社会上她认为自己不如男人，她从来没有独自掌握过世界或是未来。她想用孩子来填充一切的挫折。人们如果真正理解女人的生存处境给她的自我实现造成了多少困难，在她心中隐藏着多少欲望、反抗的怒火和要求，就会理解那种她来照管毫无自卫能力的孩子的想法何等可怕。

人们早就知道母性带有残忍的一面，却总是虚伪地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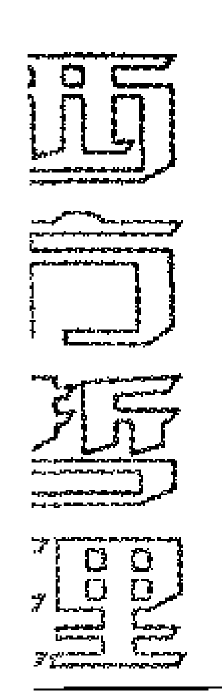


这是暴戾的继母才干的事情，她在“好”妈妈死后虐待她的子女。现在的文艺作品中常有这样的“坏”母亲，这一类型有些例外，大多数女人的道德教育和端庄能够压制她们的本能冲动。尽管这样，冲动在暴怒、辱骂和惩治等类似情况下依然会时常爆发。除公开虐待子女的母亲之外，还有很多非常任性和专制的母亲，她们眼中的孩子有时是布娃娃，有时是柔顺的小奴隶。如果虚荣，她们就会炫耀孩子；要是嫉妒，她们会将孩子藏起来。教育上的偏执和反复无常的虐待交织，让妈妈以借口“教训”孩子，来掩饰自己的勃然大怒，不成功就会令她增添敌意。

另一种同样会毁掉孩子的常见态度是近乎受虐的奉献，母亲甘愿成为子女的奴隶，以此弥补自己内心的空虚，惩罚自己不可告人的敌意。这种妈妈超乎寻常地忧虑，始终让孩子处于视线之内。她放弃所有的娱乐，所有自己的生活，担当牺牲者，因为这些牺牲，她们认为有权力要求孩子永远不能独立。这种牺牲极易成为专横意志的支配。受苦的母亲用自己所受的苦难锤炼出的武器，发疯般用它戳向孩子，她身上体现出的听天由命的性质给孩子一种终其一生都很难消除的负罪感，而这一方式甚至比打孩子的害处更大。孩子全然身不由己，觉得手足无措、难以招架，忽然拳脚相加，忽然涕泗横流，令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罪犯。

弗洛伊德的观点是母子之间的矛盾心理最少，实则大不然，女人做母亲和恋爱结婚时相同，用模糊的态度对待男性的超越。要是爱情或婚姻中曾令她对男人有敌意，那么以专横的态度对待还是个小孩子的男性，会带来满足感，她用嘲讽和无礼的态度来对付这个傲慢的性别。比如有的时候她吓唬孩子，不听话她就会割去他的小鸡鸡。即使她较为谦和温柔，视自己的儿子为未来的英雄，她也要先将他作为眼下现实的他来对待，这样他就实至名归地成


西蒙·波伏娃/



为她的附属：如同她视自己丈夫为孩子，她更将自己的孩子当作婴儿。这是如此的天经地义，如此的顺理成章，不需要设想她有阉割儿子的想法，她的想法自相矛盾：她要令他有无限的权力，又想让他在自己的掌握中。她希望世界处于他的掌握之中，却又想让他匍匐在自己脚下。

出于对自己性别的怨恨，她们可能会让女儿受到男性化的教育，不过这样的胸襟在她们之中极为罕见。因为生

了一个女人而发愁的妈妈，往往用这样类似咒语的话来欢迎她的降临："你将成为一个女人。"她渴望填补自己的劣等性，用她自己的化身去创造出一个优越的产物，更希望她体验自己曾遭受的损失。有时，她将完全是自己命运的问题让孩子也体验一遍："对我有用的经验对你也将很有帮助，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你也应该分享我的命运。"有时，她却完全反对自己的孩子和自己相像，她希望孩子不要走上自己的道路。

当女孩子长大一些，就出现了真正的冲突。通常可以看到的是，她开始想摆脱母亲，获得自己独立的地位。母亲则会把这种想法视为典型的忘恩负义：她想方设法地消除女儿企图逃避的想法，她无法容忍她的化身变成他者。女人只有在孩子特别是女儿面前，才终于感受到男人才感觉到的在女人面前的绝对优越的快感。在她只能放弃自己的特权和权威时，她不可避免地产生受挫的感觉。无论母亲慈爱或是敌意，她的梦想都将在孩子的独立地位面前破灭。她的妒忌是双重的：妒忌世界，因为它夺走了女儿的缘故；妒忌女儿，因为她在征服一部分世界的同时，也带走了她的一部分。

她更不能容忍的是，女儿骄傲地宣布自己是一个他



人，一个独立地位的人。她一直讨厌那些会对女儿反抗家庭压制起作用和“对她的感情有影响”的朋友。她十分刻薄地对待他们，借口是对女儿产生了“不良影响”，甚至反对女儿与他们交往。只要不是来自她的影响，统统属于不良之列，尤其是她对她的同龄人——老师，小孩子的母亲，更是深恶痛绝，因为女儿和她们关系亲密，她称这种感情为荒谬或者病态。有时，孩子的快乐、过错、游戏和欢笑都会惹起她的怒火，如果这是男孩子做的，很容易被谅解，这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男性特权，她早已放弃了无望的竞争。但是另一个女人，她的女儿凭什么应该有她根本不具备的优势呢？她自身已经陷入“严肃”的事务泥潭中无法脱身，因此，她嫉妒女孩子可以逃避家庭中的烦恼的一切职业和娱乐，在这种逃避中，她用牺牲换来的所有价值都暴露出了虚假性。

从上面关于早期关系的探讨中，能明显看到；两种流行的看法的危险和虚伪。第一种看法认为，母性任何情况下都能使女人的生活得到回报，事实决非如此。很大一部分母亲是不幸和怨恨不满的。孩子无法取代人们失意的爱情，无法代替人们生活中破灭的理想，他们不仅仅是填补生存空虚的物品。孩子是一种责任，一种机会的象征。孩子是自由之爱的树上长出的最为高贵的鲜花……他们并非玩物，也不是填补父母需要的或是实现他们勃勃野心的工具。孩子就意味着义务，他们应该被抚养长大，做一个幸福的人。


西蒙·波伏娃

这种义务并非自然形成：自然根本不可能支配道德的选择，这是一种契约，一种必须兑现的承诺。怀孕履行的是一项神圣的义务，母亲逃避了这一任务，就意味着她在对一种生存、一个独立的人犯下罪行。然而任何人都不会将这种契约强加给她，如同夫妻关系，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也是自愿的。但把怀孕看成是女人非同凡响的成就，在一

切其他的成就之上并不确切。人们谈论女性时，常常认为她的轻浮、淫荡或是同性恋倾向，是“由于她没有孩子”。以此推论，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和她追寻的价值全是为了取代孩子。事实上，这一问题原本就模糊不清和难以确定。人们也可以这样说，女人想要孩子，是她缺乏爱情，没有职业，或缺乏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的名义下，潜藏的是一种社会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仅仅有广告的意义。

第二个错误的偏见就包含在第一个之中，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孩子在母亲怀抱中必定幸福。是的，和母爱相关的一切既然都并非自然，那所谓的“非自然母亲”也就不存在了，惟其如此，坏母亲才存在。精神分析学的一个成果是：孩子面对的危险或许在于“正常”的父母。成年人的情绪、欲念和神经疾病的根源都在于他们早年的家庭生活。经常发生争执和悲剧性冲突的父母是孩子们最坏的朋友。因为早年的家庭生活带来了精神上的深刻创伤，他们抚养孩子的时候，以情结和受挫的形式作为交流的方式，并且这一不幸的锁链将永远延续下去。最为典型的是母亲的受虐——施虐狂心理带给女儿负罪感，而这种负罪感再表现给女儿对自己孩子的受虐—施虐行为，导致这种状况无休止地传承下去。



公园里的浴女

让－巴蒂斯特·帕黎尔　1695－1736年

法国　*这是一个非现实的富有梦幻境界的画面，一群丰艳多姿的贵族女子在女佣陪伴下嬉戏于浴池边。*

轻视女人的普遍观念和对母亲的尊重简单地调和在一起的方法具有很大的谬误。最为荒唐的是，不允许

女人参加任何的公务，将男性职业列为她的禁区，断定她在所有可以努力的领域中将一事无成之后，再将最为复杂、最重要的任务——塑造一个人交付给她。有相当一部分女人，习惯和传统不准她们接受教育，不准她们有文化，不准她们担负责任，不准她们接触由男人控制的活动，却毫无疑心地将婴儿放在她们怀里，如同童年时代，为了补偿她们与小男孩之间微小的劣等差距，塞给她布娃娃一样，她们有活生生的玩具可以玩了。

即便是孩子成为掌上明珠，他也不会是母亲眼界的极限。他无法使她脱离自身内在性的局限，她创造了他的身体，哺育他，照料他。然而她却只能营造出一个只有本身独立的孩子才会超越的处境，就算她将赌注押在孩子的未来上，她可以超越时空的可能也只有依靠作为化身的孩子，也就是说，她本人依然是附属的。不但她的儿子会令她失望，并且他的失败也会证明她的全部希望成为泡影：就像在爱情或婚姻之中，惟一可靠的办法是自己承担她本人的义务时，她却选择了用别人来证明她生存的正当性。

事实说明，女人的劣等性在于她从出生就受到重复生活的局限，而男人则出于过一种他觉得比不断延续纯粹的生存更加重要的生活，而制造出各种理由，使女人处于母性的枷锁中，并使这一处境永远存在下去。今天，她要求在很时髦的活动中成为一分子，在这种活动中，人类以不断的超越，通过向新目标、新成就的努力，找到自身生存的意义。除非生命有了意义，否则她不会同意孕育生命，若是不能在当代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她就不会成为母亲。


西蒙·波伏娃/

第十八章　交际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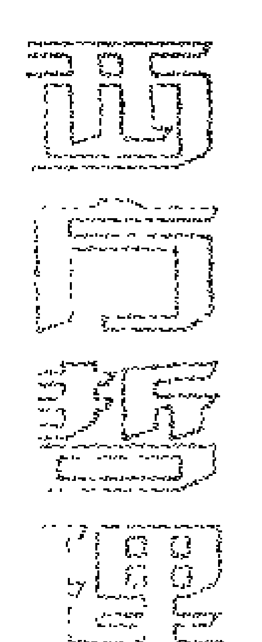
家庭并非完全是封闭的天地，和其他的社会单位不可避免的联系，使它的封闭性减弱，家不光是把夫妻捆绑其中的“内部世界”，更是夫妇的生活标准、财产状况、爱好情趣的体现，家需要别人来观察。女人在指导社交生活中发挥主导作用，男人是生产者和公民，以社会分工为基准产生的强有力的凝聚力的联系，进入这个结合体。夫妇俩都是社会性的人，他们由自己所属的家庭、阶级、社交圈和种族，通过婚姻的凝聚力来联系，从属于与之类似的社会环境的群体。妻子能够非常单纯地体现出这一关系，因为丈夫的职业联系往往和他的社会地位并不符合，妻子则因为没有职业的要求，跟和她的社会地位相当的人们交往。此外，她也有空闲时间以“回访”和“请客”的方式来保持这种关系，即使这种关系没有实际的用处。所以，理所当然的仅仅在其家庭成员极力坚持他们的社会等级的阶级中，换句话说，在家庭成员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优越的阶级中，它才是重要的。她乐于炫耀她自己的“小世界”直至自己的美貌，这些对于丈夫和孩子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不会十分在意。她的社交任务就是“充门面”，它和抛头露面而取得的乐趣结合一起。

她优先考虑的是与自己有关的场合“充门而”，在家做家务时，她能够穿着随意；到了外出会客时，“盛装打

扮”就非常重要。礼服的功能有两重：它表明了这个女人的社会地位（她的生活水准、财富以及她的社交圈子），也是女性自恋的具体体现。它既是服装，又是装饰。借助它，无权做任何事情的女人，会感觉她展现了她扮演的角色。关心美貌和盛装打扮就是工作的一种，她能够以此占有自己的美貌，就像以做家务占有她的家。这样，她的自我是她自身选择的，自我再造的。社会习惯则对这种以貌取人的倾向推波助澜。

服装能够掩饰体形，能够改变形体，或追求迷人的曲线，所有时候它都可以使身体处于供人观赏的位置，这也是小女孩迷恋梳妆打扮的原因。她愿意凝视自己，随着她童年的独立性的增长，她讨厌浅色细布和皮鞋带给她的束缚，到了尚未成熟的青春期，女孩子在展现自己和拒绝抛头露面之间摇摆不定，只要她接受了自己作为性的客体地位，就会愿意打扮自己。

我曾指出，女人以打扮的方式来保持与自然的联系，由此也为自然带来了人的需求。对男人说，她就是花朵和宝石——而对她自己也有相同的意味。她在送给他荡漾清波和轻暖毛皮之前，已经让它们属于了自己。她和与她的身体浑然一体的羽毛、珍珠、美衣华服的关系之密切，远胜于属于她的那些地毯、椅垫和鲜花。它们的五颜六色，柔软质地，弥补了她注定所属的性爱生活的粗冷生硬。她对它们的重视程度和肉欲的满足成反比例。很多女性同性恋者喜欢男性打扮，在于模仿男人和挑战社会，她们对天鹅绒和丝绸不感兴趣，因为女性肉体也能发现这一被动性质。而异性恋女人在身处男性的强硬怀抱中时，除了自己身体之外别无其他肉体能拥抱（就算她喜欢这拥抱也同样如此，如果不喜欢更是这样），因此她才给身体洒上香水，使它如同花朵，她颈子上的钻石项链和她的雪白肌肤交相辉映，占有它们，她就感觉自己是世上最富有的富



豪。她所希冀的不仅是它们赋予她的感官上的快感，有时更是贪图它们所能带给她的情感和梦想的价值。这件首饰是纪念品，那件珠宝则成了象征。有的女人使自己成了一束鲜花，一个鸟笼，有的女人使自己成为博物馆，另一些女人使自己成了难以索解的符号。

化妆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使女性用穿着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的态度成为可能。她服从既有的秩序，就能展现出小心

翼翼和优雅动人的气质。这其中包含了非常多的微妙区别：她能表现出娇弱的、天真的、神秘的、坦诚的、自制的、欢乐的、坚韧的、贤惠的。也可能恰恰相反，她如果蔑视习俗，以奇装异服来使自己的观念一目了然。应当注意的是，很多小说中的“新潮女性”，用大胆的穿着来显示自己的标新立异，突出体现她性客体的性质，以此体现出她的附属本质。

这样就完全能够理解，女人因为她的客体性，使她的内在价值受到她的着装习惯的影响。她这样重视长丝袜或者尼龙袜，这样重视手套和帽子，决非什么用处都没有，而是要保证自己的地位是她别无选择的义务。这种情况越普遍，打扮越漂亮的女人就会得到越多的殷勤；她越是要找工作，美貌绝伦带给她的利益就越大。花容月貌代表着一种武器，一面锦旗，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优美也意味着束缚，它的利益要用一定的代价换来，因为它价值不菲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商店保安经常将偷香水、丝袜、名贵内衣或者类似物品的上流女人或是女明星人赃俱获。相当的女性为了漂亮的打扮卖淫或是接受钱财“馈赠”，服饰要花费她们另外的开销。梳妆打扮的恰到好处要付出时间和精力，不过这样的任务也能带来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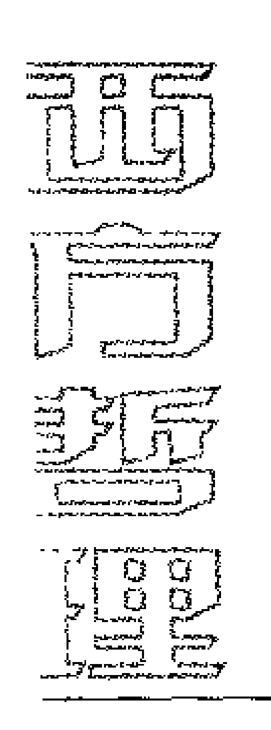
面情绪。现在的女性比过去更知道以运动、体操、洗浴、按摩和美容食品来开发身体的快乐，她可以自行决定自己的体重，选择体型和肤色。现代美学能够让她将美和运动结合起来：她可以选择锻炼肌肉，能自主减肥，她以体育锻炼的方式确定自己的主体地位，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令她摆脱肉体的偶然性的束缚，不过这种解放又有了重新陷入依赖性的危险。好莱坞明星战胜了本性，同时又成了制片商支配的被动客体。

有的女人宣称她们“是为了自己打扮”，但从中可以发现的是，即使是自恋者，也包含着想被别人欣赏的意味。爱打扮的女人不能为别人看到，将永远不能获得完全的满足，除了她们有精神疾病，一般她们都希望有见证者。

最令女人生气的情况是，丈夫对别的女人的服装举止大加赞扬，对她的同样的服装举止则进行嘲讽。公允地说，他与她太近的距离使他无法看清她。从丈夫的角度来说，她的容貌永远没有变化，他根本没有在意她穿着新的装扮还是发型发生变化。深情的丈夫或是殷勤的情人，也经常忽视女人的服饰。要是他们最为着迷的是她的裸体，那最合身的衣服也只能掩盖她的肉体，而不论她究竟是讲究打扮，或是慵懒，还是使他眼花缭乱，他们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可爱。若是他们不再爱她，就是最完美的使人惊喜的衣服也毫无效果。服饰可以作为征服的武器，但不是防御的工事，它的作用在于创造出幻觉，能够提供一种梦想的实体，但在肉体厮磨中，与人们熟悉的日常生活一样，幻觉全部消逝了，夫妇的爱情就像是肉欲的爱，在现实的层面上清晰可见。


西蒙·波伏娃/

一个惯常的说法是，女人打扮的目的是挑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这种嫉妒事实上代表了她的成功。可这决非惟一的目的。在别人的妒忌、艳羡或赞赏的目光中，她想获得



对于她的美貌、她的优雅和品位——对于她本身绝对的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现自己。她陶醉在赞美之中，但失败能毁灭她的一切。而绝对的肯定只有一次次无休止的例子才能得以证明，这样她将永远不可能获得最后的成功。这就是为何时髦女性和卖弄风情的女人极易被伤害的原因，这也可以解释有些美丽而且非常为人崇拜的女人偏偏悲观地认为，她们既不漂亮也不优雅，她们缺乏的是一

位未知的法官的终极评价，更因为她们所追求的目标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永恒状态。

惟有自信而大度的女性，在这种考验面前才会应付自如。成功给她们的满足是十分巨大的，要是她太在乎成功，就无法真正地享受它们。并且，她的内心将永远受到无法满足的虚荣的折磨。仅仅是极少数的女人才能成为幸运儿，可以使交际功能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那些完全为社会献身的人，一般来说不仅将这种理想变成自我崇拜的迷信，并且试图超越这种聚会的方式，追求更崇高的目的。纯粹的沙龙带有文学或是政治的性质，女人的权利在此获得了对于男人的优势，并体现出她们的个人作用，她们以此超脱出已婚女人的处境。而已婚的身份很难令她通过暂时的快乐和胜利感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在她的眼中，实际上经常在消遣的同时，更意味着疲惫。交际生活要求她“充门面”，要求她将自己成为公开展览的角色，而不是让她和自己以及她和其他人之间有任何的沟通。它无法令她脱离孤独的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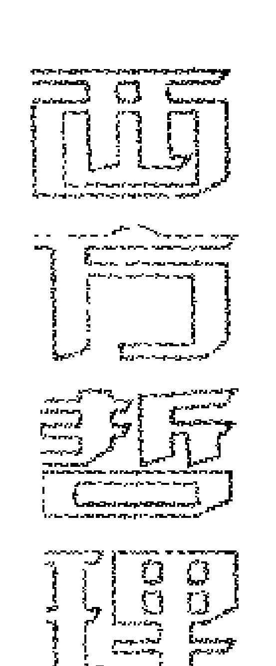
女人的友谊要是能成功地建立并持续下去，是难能可贵的，不过这种友谊和两个男人之间的友谊从性质上来讲有相当大的差异。男人计划着自己的个人爱好和想法并进

行着交流，女人却被她们同样的女性命运所束缚，从而为某种类似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交往时首先要确定的是她们共同的天地，她们并不讨论某种观点或一种想法，而是彼此交流着私人的隐秘和食谱，她们要携手共创一个颠覆价值的世界，这一个世界的价值要超越男人的价值。出于集体的力量，她们有了挣脱锁链的能力，她们相互承认性冷淡，不承认男人的性掌控，讥笑男人的性欲或他们粗俗的举止，她们冷嘲热讽，质疑她们的丈夫和所有男性在道德和智力上的优势。

但是，女人的伙伴感情几乎不会升华为真正的友谊。女人会认为她们的团结比男人还有自发性，然而在这样的团结中，所有女人的超越都无法指向另外的人。她们共同面对男人世界的时候，每个人都企图独自占有支配这种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她们各自的性格基础之上，而是直观的共同体验的结果，由此敌意的潜在因子随之产生。女人对彼此的理解是建筑在相互认同的基础上，同样的原因，每个人都因此反对他人。女主人和女仆的关系比任何男主人同男仆或司机的关系更加紧密——他是同性恋的情况除外。她们交流着彼此的私人隐秘，有时是同谋的关系，她们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因为女主人既希望摆脱实际工作，却又想享有完成实际工作的责任和荣誉，她的愿望是别人确信她有着不可替代的或是不可缺少的作用。

特别是在卖弄风情和爱情方面，女人更是将所有其他的女人视做敌人。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新潮女性和社会名媛所渴望的是永远的赞美，无论何时没有了光彩都会令她痛苦万分，她嫉妒地注意着另外的人身上最微小的光环，她要抢去别人所有的风光，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评价，她又有何价值呢？深陷情网无法自拔的女人会以驾驭情人的心而心满意足，她或许不会因为朋友的成功而妒忌，可是





会感觉自己的爱情备受威胁。实际上，女人被自己最要好的朋友背叛的经历决非仅是文学上的常用题材，两个女人越是感情深，她们的两面性的可能就越大。很多女人开始恋爱，和亲密女友的关系就开始疏远。这种矛盾的心态会使女性相信她们之间的感情成为近乎不可能的事，男人的阴云始终笼罩在她们的心头。

在大多数女人眼中，这个男性的世界即使是婚后依然



存在着神秘，不过他的威望有所降低，妻子感觉到她的观念中，男性纯粹的性质已经下降。然而男人还是代表宇宙的真理，最高的法则、奇迹、主人、眼睛、目标、欢乐、探险和神灵，他依旧象征着超越，是可以解答所有问题的智者。就是最诚实的妻子也不愿抛开这个奇迹，实行自我封闭，和一个偶然的、被限制的个人进行迟钝的对话。

更有甚者，有的妻子已不再满足道德的法则成为生存的信条，她们要使自己的生活有着浪漫的情调。若是她们并不想背叛或者离开丈夫，她们就会采用和对有血有肉的男人恐惧的少女同样的办法——沉湎于狂热的想像中。

当妻子的周围也有真正的、活生生的男人时，不论她处于性满足或者性冷淡，抑或是受挫状态，只要不是狂热的爱和绝对的排它这种少见的情况，她对他们的赞美都非常在意。丈夫的目光现在司空见惯，无法激发她的想像力。她渴望的是充满神秘的眼睛能够发现她的神秘性，她只能从作为主权的意识里获得自信，追逐已经消逝的青春，只有恢复脸颊上的酒窝和眼睫上独一无二的颤动，只有被人渴望和被爱情重燃，才能让她心满意足。要是她对婚姻驾驭自如，那她在其他男人身上想要得到的就是虚荣心的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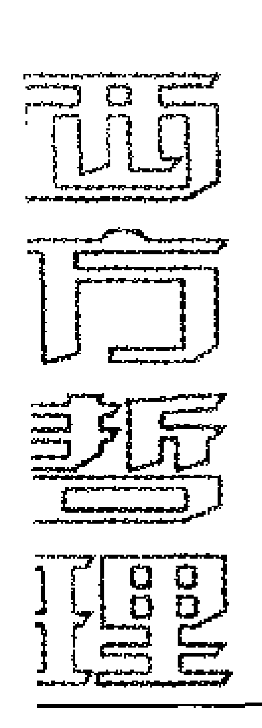
戴安娜的休息

弗朗索瓦·布歇　1703～1770年　法国

布歇最醉心于描绘轻浮的女神，她们有着柔滑的、玫瑰色的肉体和娇嫩的皮肤。

经过长短不一的忠诚时期之后，妻子或许终于不再满足这种打情骂俏和搔首弄姿的小儿科行为，她决定要欺骗丈夫，原因通常是因为怨恨。阿德勒总是相信，女人的不忠是报复的一种方式。这一观点未免有点夸大其词，但毫无疑问的是她经常并不光是被情人所眩惑，而是出于要公然反抗丈夫的欲望的指使："他可不是天底下惟一的男人——别的男人也可以发现我的魅力，我并非他的奴隶；他自我感觉聪明过人，可还是被愚弄。"不过受到蔑视的丈夫在妻子心中或许依然是最重要的，就像少女有时出于反抗她母亲的目的，为了证明父母的错误，而不听父母的话为了选择自己的权利，寻找情人的行为一样，怨恨丈夫的妻子也会试图将情人作为知己，而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的证人角色，来做给丈夫戴绿帽子的同谋。她与情人议论她的丈夫，故意煽起情人的轻蔑，要是她的情人在扮演这种角色的时候不那么称职，她就会转过头去，不再理他。她或者重新投入丈夫的怀抱，要不就另找一个情人。不过，往往不是因为怨恨，是由于失望，使她投进情人的怀中，她没有从婚姻中得到爱情，只能身不由己，再让自己重新体味年轻时曾如痴如醉地向往着的兴奋和欢乐，可又发现要这样做如此困难。婚姻不幸的女人处于沮丧中，性满足的权利全被剥夺，因为不愿承认她们感情上的自由和自我，婚姻以颇具讽刺意味和不可避免的辩证法，使她们走向通奸。

如今，很多阶层的女人都拥有了某种程度的性自由，



不过将婚姻和性的满足协调起来对于她们依旧是个难关。婚姻无法使肉体的爱得到普遍的满足，坦诚地把它们分离好像就成了合情合理的选择。

通常的看法是，男人能够成为一位好丈夫，但他却带着轻浮：他的偶尔偷腥实际上并不会妨碍与妻子的和谐生活，这种和谐甚至因此会更纯洁，矛盾更少——在她并不是代表着束缚的情况下。

我们同样也应对妻子作出让步，不可否认，她经常希望分享着丈夫的生活，给孩子一个温暖的家，她又盼望和别的男人体验爱情。通奸的可耻之处在于，虚伪和小心翼翼不可避免地将使名誉受损，以自由和真诚为出发点的契约能化解婚姻的不幸。

不得不承认，现在那句讨厌的老话——“这对女人可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着真理性的。而关于这种差别的解释无一令人满意。有的人坚信，女人不像男人那样对性生活要求频繁，但不能认为是确定无疑的。性压抑的女人会以泼妇、虐待倾向的母亲、狂热的女主人、不幸和危险的女人的方式反抗。总而言之，就算女人的欲望没有时常体现出来，这也不能作为满足这些欲望纯粹是多此一举的证据。

任何时候，通奸、友谊和交际都是作为婚姻的转移，它们对接受婚姻的束缚具有缓解作用，但无法消除。它们并不是安全的逃避方式，女人也绝对无法以此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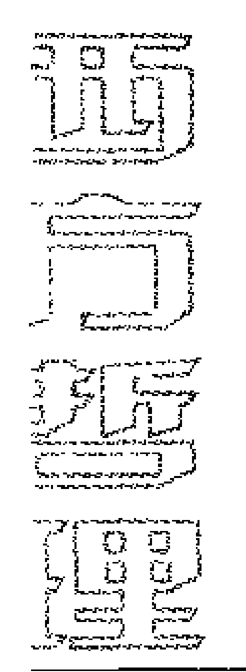
第十九章　妓　女

婚姻制度和娼妓问题的关系密不可分。有人曾说，娼妓的存在就像是家庭如影似形的孪生子，一直伴随着人类的左右。男人硬逼自己的妻子发誓保住清白，而男人在建立这种强迫她们遵守的制度之后仍然意犹未尽。

现在依然不明白驱使女人卖淫的原始动机是愚蠢的，我们已经不会相信郎布鲁索[①]的观点，也就是不再将妓女和罪犯并列，认为他们都不是进步的人。也许有的统计表明，妓女的智商比一般人稍低，其中一部分确属于智障，因为智商低的女人选择不需要专业训练的职业顺理成章。然而她们中的绝大多数智力很正常，某些人还非常聪明。正是因为没有任何先天的遗传原因和心理的缺陷才令她们深深痛苦。在一个不幸和失业一直存在的世界中，人们将会选择任何可能的职业。只要警察制度和娼妓职业需要，就会存在警察和妓女，这些职业的报酬相对于其他的职业更高。男性的需求刺激着妓女的出现，而惊讶于这种情况是百分之百的伪君子。这只是基本的普通的经济过程的体现。帕朗·杜夏特莱子 1857 年写成的报告中说："导致卖淫的各种原因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失业和低收入引起的贫困。"有正义感的道学家冷笑着回应：妓女编造的悲

---

① Lombroso，1836—1909 年，意大利精神病与犯罪学家。



惨故事，往往是想迎合头脑简单的嫖客的口味。而实际上，妓女经常能够用其他方式谋生。如果她选择的职业在她眼中并不是最糟的，就不能说她是生就堕落的，真正要谴责的倒不如说是社会，因为社会上娼妓好像是最不让女人反感的一种职业之一。与其如人们经常问的那样：“她为何要从事这种职业？”倒不如这样问：“她为什么不选择这行当？”

可以确定的是，那些被迫献身的女孩子会始终为处女贞操丧失的创痛所折磨。人们想要了解的是，悲惨的经历将对她们的未来产生何种心理影响。可是人们一般不给妓女进行精神分析，并且她们不善于自我表达，经常是陈词滥调的搪塞敷衍。有时，随时想献身于第一个到来的人的女孩可以用前文所述的卖淫幻想进行解释，因为相当一部分年青女孩，出于对家庭的不满，对正在发育的性征十分恐惧，或者想对偷食禁果的好奇而模仿妓女。她们如孩童般幼稚、并不性感、冰冷的女孩子，相信自己不会玩火自焚，迟早一天某个男人会相信她们的话，这样她们就将梦想付诸行动。

关于妓女和嫖客的关系历来各执一词，所举的例子也大不相同。人们通常相信，作为发自内心的情感的表达，妓女将嘴唇的吻留给了情人，强调她对于爱情的拥抱和职业的拥抱的态度截然不同。男人的这种证据并不可靠，他们的虚荣心经常被女孩子装出的快感所轻易愚弄。或者换种说法，一次又一次迅速而疲惫地应付不同嫖客，和同一个熟识的嫖客反复地发生关系情况大不相同。

绝大多数的妓女从精神上对她们的生活已经适应。这决不是她们不道德，而是因为她们相信可以和需要她们服

务的社会融为一体。她们再清楚不过，警察在给她们注册时的教训根本是在打官腔，嫖客出了妓院后唱的高调更让她们嗤之以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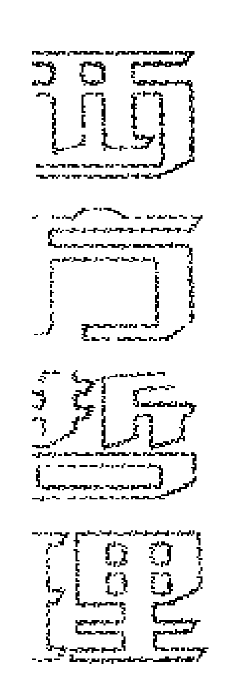
妓女命运令人无法忍受，这并不是因为道德和心理的原因，她们的物质条件往往相当可悲。她们要受到皮条客和鸨母的盘剥，生活毫无保障，有四分之三的人一贫如洗。普通娼妓的职业极为悲惨，女人受到的不仅是性和经济上的剥削，还有警察专横的盘查，医生体检的羞辱，被嫖客任意凌辱，不可避免地被传染上细菌和疾病，注定的饥寒交迫，实际上她的地位已经等同于物的水平。

普通妓女和高级妓女还有很多的区别。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用她的纯粹的女性功能（作为女人）作交易，竞争的后果带来的是悲惨的生存层面的代价；后者则全力争取对于她本身（作为一个个体）的承认，如果取得成功，她就能得到极大的报酬。美貌、魅力和性感是必不可少的前提，这些还不够，作为一个人，这样的女人必须在公众的心目中有与众不同之处。当然，她的品格通常要以男人的某种欲望引发出来，但是准确地说，只有男人使她的价值举世瞩目，她才会“飞黄腾达”，才能够发迹。19世纪，占有豪华住宅、四轮马车、珍玩宝器，成为“情妇”对保护人影响的证明，使她上升到交际花的位置，只要男人继续为她而堕落，她就能进一步升值。社会与经济的巨变，使这种浮华奢靡的摆设已经被废除，交际花也不能继续赢得名声。野心勃勃的女人要获取名望就要以其他的方式。高级妓女的最新的表现形式是电影明星。



妓女和艺术的分界线始终模糊不清，因为美和性快感之间有着不易说清的联系。实际上并非是美唤起了欲望，不过柏拉图式的爱情关于好色的辩解，依然有着虚伪的意味。

想要取得名声的妓女，不仅是被动地裸露肉体，更追



求表现自己特殊的天赋。古希腊演奏长笛的女孩子，用音乐和舞蹈令男人神魂颠倒。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女性跳起肚皮舞，西班牙少女随着巴里奥奇诺的乐拍翩翩起舞，人们可以细致入微地观赏自己。左拉笔下的娜娜在舞台上搜寻和诱惑保护人。有的音乐厅与夜总会的性质相同，如同妓院。一切暴露女人的职业都可与淫荡相联系。无疑，有的女孩子，诸如舞女、舞星、路边女郎、广告模特、时装

模特、歌星和影星，将爱情和职业视为两码事，她们的生意越是和技巧与创造力相关，就越会将本身视作目的。为了生计而抛头露面的女人，常常试图直接运用女人本身的美丽进行交易。高级妓女则想用职业来掩盖她真正的交易。

通常人们相信高级妓女对性十分冷淡。她对自己的心情和性感觉操控自如。这是由于，如果她过于多愁善感或是沉湎欲海，就有被男人控制的危险，他就能要挟她或是支配她，或者给她造成痛苦。她所经受的许多怀抱中，相当多的拥抱（尤其在她刚出道的时候）令她蒙受羞辱，反抗男性的傲慢就通过性冷淡体现出来。高级妓女与主妇在这一点上相同，也会随时玩弄“小花招”，这使她的举手投足显得虚伪狡黠。对男人的这种轻蔑，这种厌恶的态度，清楚地体现了这些女性在老板和雇员的竞赛中并没有多少取胜的机会。公平地说，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处在依附的命运之中。

没有任何男人能成为她们的主人，但她们却非常迫切地需要男人。要是他对于她的欲念不再，高级妓女就没有任何谋生手段。一踏人这个行当的女人都明白，她所有的未来都由男人掌握，即使是大明星，要是失去了男性的支

持，她的声望也会日益黯淡无光。就算是最美丽的女人，她的明天也不是她所能把握的，因为她的武器具有魔力，但魔力却变化莫测。她就如同“贤妻”被丈夫所约束相类似，牢牢地为她的保护人所束缚。

出于“支配”她的保护人而又牺牲自己欢乐的目的，这种女人会使用破坏婚姻的诡计、招数、谎言和虚伪，即使她仅仅伪装奴性的存在，这种游戏的本身就意味着奴性。只要她拥有美貌和名声，她就能在厌倦临时主人的时候用另一个取代他。然而美貌不是永恒的物品，它作为一种财富是如此脆弱，高级妓女极为倚赖她的肉体，而她的身体在时光流逝中无情地贬值，在她身上，同衰老进行的斗争体现出最有戏剧性的场面。她如果具有很高的声望，就能抵消容颜的苍老和形体变形的影响。

高级妓女最大的不幸之处不光是她的独立实际上是她极度依赖的欺骗性反映，更在于这种自由本身的消极性。即使是瑞琪尔[1]那样的演员，像伊萨多拉·邓肯这样的舞蹈家，即使受到男人的帮助，也依然需要一个能施展才华并证明她们生存价值的职业。她们在选择爱和工作的同时，也得到了具体和积极的自由。大多数女人的眼中，艺术和职业仅是一种手段，其他的时间里，她们并没有真正的设计。特别是在演艺界，明星常常只是导演的附属品，这让她们无法在创造性的活动中能发明和超越。

高级妓女付出快乐、爱情和自由为代价的神灵摩洛克[2]就是她的事业。主妇的理想是她和丈夫、孩子之间形成稳定健康的氛围。事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展，但它只是内在的目标，事业集中于名望。能在社会的等级上爬得越高，广告和人们口碑中的名声就越大。攀爬者在发展事业的过


西蒙·波伏娃/著

① Rachel，1821—1858年，法国著名女舞蹈演员，表演艺术家。

② the Moloch，古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火神，祭祀时用儿童为祭品。

程中采取谨慎还是鲁莽的态度，以她的性格而定。有的女人在她从事自己的事业中将产生如同在家中整理漂亮衣服的家庭主妇一样的满足感，有的女人则会在冒险中沉醉。有的女人只能做到总是处于危险中的、有时会崩溃的处境勉强保持平衡，有的女人无止境地追求更大的名声，就像通天塔无用地指向苍穹似的。有的女人在她的各种行为中夹杂着风流韵事，她们仿佛是真正的冒险家：这些人是间谍，像玛塔·哈丽[①]，或是潜藏的卧底。她们对计划并不负责，确切地说她们是男人手中的工具。



梳妆的维纳斯

弗朗索瓦·布歇　1703－1770年　法国

布歇就这个画题作过多幅变体画，这幅梳妆的维纳斯最具典型性。

从整体来说，高级妓女和冒险家的想法有些不谋而合。准确的说法是，她和他相同的是往往介乎认真和冒险之间，她的目标直指代表身份的现实价值，比如说金钱和名声；同时她非常在意它们的实现，就像十分重视对它们的占有，对她来说，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她主观的成功。她以虚无的态度辩解这种个人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多少是推论得来的，运用起来却让人更加确信她对于男人心怀敌意，把其他女人看成敌人。另外，要是她感觉到需要得到道义上的支持，她就能不同程度地借助于引申的尼采主义

① Mata Hari，1880—1917年，生于荷兰，是荷兰和爪哇人的混血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具有传奇色彩的“谍海女王”，为德国人服务，后被枪决。

论点：她所维护的是高于普通人的优越阶层的权利，维护超出于平民阶层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她感觉身体是一种财富，而这一财富的存在是为人类而奉献的礼物，她将身体为自己利益服务的时候，却宣称是服务于社会。献身男人的女人注定了爱情的困扰，但利用男人的女人则在自我崇拜中感到了迷惘。她重视自己的名声，不止在经济因素——这是在名声中找到对她的自恋的神化。

第二十章　中老年女性

女人的女性功能一直在发挥，女人的个体生活的历史对生理学命运的依赖要远大于男人，女人命运的发展轨迹比男人更加不规则，更不具连续性。女性生活中的每个阶段同样的相同而单调，然而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折，却非常突然而且危险。这种突变暴露出的危机——青春期、性觉醒、停经的意义比男人更有决定性。男人的衰老是逐渐的，女人却在突然之间失去了性特征，当她丧失了性的吸引力和生育能力（她本人和社会一致认为，是这两者才为她的生存的正当性提供证明，她的幸福也源自于此）时，她的年龄还不是很大。她丧失了未来，她的中老年还要有一半的时间要在这种状态下度过。

中年男人献身于比爱情更为重要的事业，他对性爱的兴趣已不像年轻时那样强烈，并且他身上并不具有客体的被动性质，他的容貌和身体的变化无损于他的吸引力。相反，女人往往要到接近35岁时才可以克服各种压抑，充分发展了性爱的潜力。此时她的性欲最为强烈，她对满足这些欲望的渴求最旺盛，她对于自己拥有的性潜力，比男人更能充分的把握。为了控制住丈夫，为了确定为他所保护，为了保留她的大部分的工作，她必须有魅力，可以受人宠爱，除了通过某个男人的中介，她本人是不可能控制这个世界的。要是她无法再控制住他，她将会变成什么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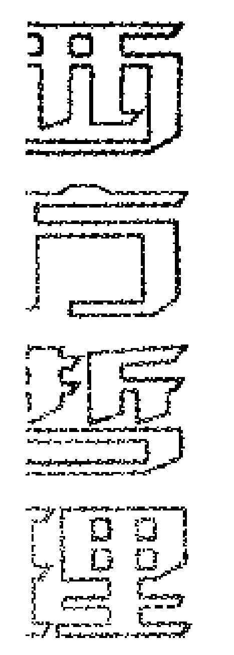
子？在她无奈地注视着她的这个能够确认她自己的、肉感的客体在日渐衰老时，她在焦虑地自问，于是和衰老进行着搏斗。然而染发剂、护肤霜和整容术都仅仅只能延长她正在飞逝的青春，或许能欺骗她的镜子。随着那即将摧毁她在青春期曾建造的整个大厦的、为命运决定的、无法逆转的过程出现了第一次预兆时，她感到了死神的阴影。

她因为她的不再完整而痛苦，但起码并不诧异，她很快会适应。女人要是具有忘我的献身、自我牺牲的精神，会为这种明显的突变伤心不已："我的一生只能活一次，想想我以前的命运的样子，再看看现在的我吧！"让所有人惊愕不已的是，她的身上突然出现了完全地变化：她脱离了带有保护性的职业，中断了她的计划，突然间她发觉自己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变成了孤家寡人。在那个里程碑意义的时刻给了她重重一击之后，她觉得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只能安心地过她的日子。她的身体再也不能许诺，她那尚未实现的梦想和渴望，永远也不会实现了。在这一背景下，她回忆过去，此时生命的账本上已经划下了一条线，正在和她清算总账，结算了各种账目之后，她惊心于过去的生活强加给她的狭小空间。

面对她短暂而令人失望的韶华，在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的门槛上，她少女时代的行为又恢复了：她不肯承认这就是全部，她将生存处境的贫乏和性格的多愁善感作了比较。作为一个女人，她毕竟被动地经历了她的命运，她似乎觉得别人夺去了她的机会，她被人愚弄，在不觉中从青年就到了中年。她发觉丈夫、生存环境、她所为之忙碌的一切，对于她统统没有多少价值，她感觉自己好像从未得到别人的感激。她疏远了没有她优越的身边的人，她将自己和心中的秘密（这是她不幸的命运的难以理喻的关键）封闭。


西蒙·波伏娃

童年和青春期关心的事情浮现眼前，女人一遍遍地回



忆年青的往事，尘封已久的对父母和兄弟姊妹的感情此时也不时激起涟漪。首先，她迫不及待地要挽留正在飞逝的光阴。居家型的女人坚持认为她还可以再生个孩子，她渴望着重新创造生命；放荡的女性会企图再次诱惑情人；轻浮的女人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想讨人欢喜，她们宣称从未感觉到这样的年轻，她们要让别人认为时光的流逝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她们。岁数大的女人清楚地知道，要是她不

能再成为一个性爱的对象，不仅是因为她的肉体已无法诱惑别人，还因为她的过去和经历（无论是否出自她的意愿）带给她的独立性。她出于自身的原因争取过，爱过，梦想过，痛苦过，享受过。这种独立性如此可怕，她想要否定自己拥有过这样的独立性，她刻意突出女性气质，打扮自己，使用香水，使自己看上去迷人典雅，具有发自内在的美。

然而实际上，真正重新开始是不可能的，她看不到世上还有她能自由而有效地实现的目标。她的活动用一种古怪、断断续续的并且是徒劳的形式表现出来，她所能做的只是象征性地补偿错误和失败。

这一紊乱时期内，想像和现实的分野甚至比青春期更要模糊。上了岁数的女人的明显特征是，失落感使她完全不能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这些很健康但又为死亡的阴影所笼罩的人，会有一种奇特的双重感，在一个人感到自己是个有意识、主动、自由的人时，似乎那个被命运支配的被动客体是另一个人：我可没有被汽车撞倒，这不可能是我，我不会是镜子里的那个老太婆！一个自称“一生中从未感觉到像现在这样年轻”、而且从未看到过自己是这样衰老的女人，不可能顺利地理解这种矛盾，时光飞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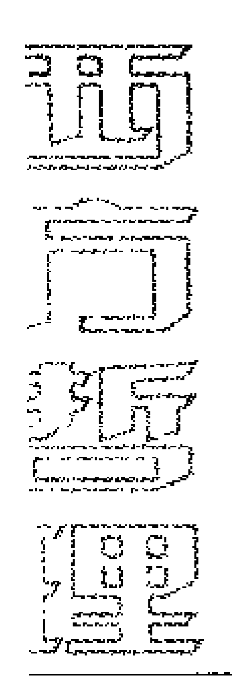
和时间的延续给她带来的损害仿佛都在梦中，现实也在感觉中隐退和远去，和幻觉再也没有明显的区别。这时的女人宁可认同那个内心的幻觉，也不愿相信这个陌生的世界。在那里，时间向后流去，她的镜像不再像她，这样产生的结果背叛了她。她从中获得狂喜，渴求着灵感，渴求着如痴如狂的激动。此时爱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成为她注意的焦点，她很自然地投入到被爱的幻觉中。

对现实感或多或少的丧失，处于危机中的女人轻而易举地就会接受各种指示，作为一个忏悔者，她极易接受对于她灵魂的强烈影响。并且她还会接受极具争议性的权威，她也就注定了是各种教派、唯灵魂论者、先知、巫婆和形形色色的江湖骗子的猎捕对象。原因是她不仅在与现实世界接触时失去了所有评判的辨别能力，并对终极真理的探索充满了热情：她必须有一种药方、一个公式、一把钥匙，会在拯救世界的同时，轻而易举地拯救她本身。她从未这样蔑视逻辑，现在对她来说已经不适用了，惟有对于她有着特殊含义的证据才能令她信服，这样神谕、降灵、先知预言直至奇迹都在她身边兴盛起来。她的发现有可能使她付之行动：她从事商业、企业、风险事业，这是某个顾问或者内心的声音所驱使的。其他一些情况下，她满足于被描绘成接受绝对真理和智慧的虔诚信徒。

无论是行动还是思考，她的态度都和歇斯底里的激动相伴。停经带来的危机蛮横地将女人的生活截成两段，而这断裂带给了女人对“新的生活”的错觉，另一个时代展现在她的面前，她以皈依宗教般的虔诚投入其中，她转向爱、转向虔诚、转向艺术、转向人性。这些存在使她失去自我，也扩展了自我。她获得了重生，用已经洞悟了彼岸秘密的眼光来观察世界，相信自己将要飞升到以前从未达到过的颠峰。


西蒙·波伏娃/著

从女人终于开始承认变老的那刻开始，她的处境就会



发生变化。此前她还是年轻女性，她还在全身心地和神秘地令她的容貌变丑、身体变形的不幸进行斗争，现在她则成为了另一个人，失去了性征但仍健全：一个老太婆。现在可以确定她的“危险年龄”的危机确实过去了，她的生活并因此变得轻松。她在放弃了与衰老进行斗争的同时，另一种斗争的序幕拉开了：她要使自己在这世界上保留一席之地。

女人在生命的秋冬两季终于摆脱了她的枷锁，她用年龄的优势卸下了她的重担，她对丈夫了如指掌，他无法再吓住她，她巧妙地躲开他的拥抱，用友好的、冷漠的或者敌对的方式在他身旁导演着她自己的生活。要是他比她老得快，她就能支配夫妻生活。她会无视时尚，对“别人会说什么”毫不在意，她不再被社交活动、节食和美容保健所束缚。而她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已经独立了，孩子将要结婚，将要离她而去。

摆脱了义务，她终于自由了。不幸的是，每个女人的经历都印证了我们以整个女性的历史所证实的事实：她只有到了不再有用的时候才获得了这种自由。这种重现决非碰巧：父权社会把服务赋予了所有女性，因此只有当女人完全没有任何作用的时候才能摆脱女奴隶的地位。她在年近半百的时候终于完全拥有了她的能力：她感到自己阅历过人，此时的男人有着极高的地位、极高的工龄，而她，却只能退休了。她习惯了将自己奉献给别人，然而现在别人已经无须她的奉献。她没用了，她生存正当性的理由已不复存在，于是只有在风烛残年之中苟延残喘，她只能喃喃自语：“所有人都不再需要我了！”

她不会立刻适应这种情况。有时她会因为痛苦纠缠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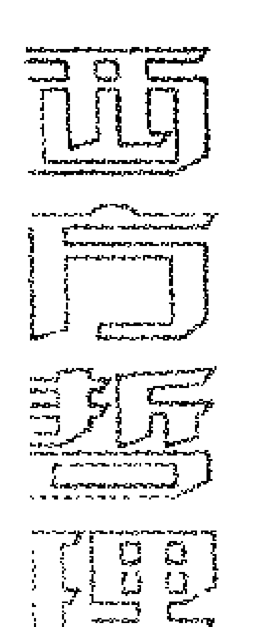
丈夫，她对他的管制之专横超过以往，使他喘不过气来，可婚姻的常规实在是过于固定，她明白丈夫早就不需要她了，而且对她的努力漠然视之。与单独变老的情况一样，维持共同生活已降为次要地位。她将目光转向孩子，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没有成为定局，世界和未来依然向他们敞开，她非常乐意和他们一起向前冲锋。晚育的母亲的优势是：其他女人做了祖母的时候，她还是个年轻的母亲。但一般母亲看到她的小宝贝长大成人是在她四五十岁之间。而正因为他们即将离她而去，她才对他们充满热情，靠他们努力生活下去。

女人都用自己的想法来理解心上人的幸福：妻子希望他是个男子汉，靠他征服社会，母亲希望保护着他，将他带回童年。年轻的妻子盼望丈夫成为富翁或是名人，母亲则信奉他本性难移，以此反对妻子的计划：他很娇嫩，决不可以劳累过度。在新来的女人怀孕时，过去和未来的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孩子的出生意味父母的死亡"，此时这一真理显现出所有的残酷性。指望儿子活下去的母亲意识到，他将要宣判她的死刑。她赋予他生命，生命生生不息，对她来说却是死亡的到来。她不再是那位大母神——仅仅是其中一个环节而已。她从永恒的神的天国陨落，以后只是个无用的、属于过去的人。

母亲对于成年的女儿的态度十分矛盾：她盼望儿子能够成为一个神祇，而女儿成为自己的化身。这个替身十分可疑，往往会伤害原型，从爱伦·坡的小说和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就可以看到。所以，女儿成为女人之后，同时把她母亲判为死刑，可她却让自己依然活着。母亲的眼中从孩子的鲜花初放中看到的是毁灭还是重生因人而异。



有的母亲带着冷酷的敌意，她无法接受一个欠她一条命的忘恩负义之徒代替她。人们经常看到风骚的女人对相



形之下衬托出她的矫揉造作的青春少女的嫉妒。她视所有的女人都是讨厌的竞争者，她自己的孩子也被当作竞争对手，她可能将她撵走，或是不让她处于自己的视线之外，或是想方设法剥夺她的社交活动。她虽然以自己身为妻子和母亲堪称楷模、独一无二为傲，但因为不甘心被废黜而继续残酷的斗争。她始终认为她的女儿还是个孩子，她所做的事情是小孩的玩意儿，她过于年轻，还不适合结婚；

太过柔弱，不适合生育。要是她坚持要有丈夫、家庭和孩子，那肯定是言不由衷。母亲在挑剔、讥讽和预测要出问题上永远不会嫌多。要是有可能的话，她会让女儿永远地停留在童年时期，就算是没有这种可能，她也想要摧毁女儿努力争取到的成年生活。对此她一般能成功：因为这种做法，很多年轻女性总是不育或者流产，不懂得怎样抚养孩子，或是没有学会理家。夫妻生活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不幸和寂寞，她会在母亲权威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要是她反抗母亲，她们将永远的冲突和对立，挫败的母亲会把对女儿刁蛮无礼的愤怒转移到女婿那里。

处于中产阶级的女性在漫长时间里，经常面对的一个可笑问题是怎样消磨时间。而当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丈夫也功成名就或者至少不再冲动之时，她们的时间必须要动一番脑筋才可以打发了。刺绣编织就是为了消磨令人恐怖的空闲。手在刺绣、编织，在活动着，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工作，原因是生产的产品并非想要完成的目的，它的主要作用只在消磨时间。刺绣品最后被用在哪儿也常是个难题——或许只是将它们送给朋友或慈善机构，或是随便地摆在壁炉台上或桌子上，反正能把它摆脱掉就行。这不能算是种虽不实用却可以作为纯粹消遣的游戏，更算不上是

种逃避，因为头脑在这活动中始终是空虚的。这就是被帕斯卡尔称之为“荒唐的娱乐”的东西，女人就是用织针或钩针悲哀地编织着的空虚。水彩画、音乐和读书，也起到这样的作用。无事可做的女人在使自己适应这种事情的同时，并没有以此来扩大对世界的把握，这仅仅是想打发她的无聊。一种活动如果不是为了开辟未来的目的，就会回到空虚的内在性之中，慵懒的女人翻开书又将它扔开，打开钢琴只是为了再关上它，然后做着刺绣活儿中间夹杂着哈欠，最后拿起了电话筒。

实际上，她极有可能会以社交生活来解脱空虚，她拜访、回访，她将请客视为大事，她参加每一次红白喜事，不再拥有任何属于自己的生存，就以热心于交往来弥补。原来的骚娘们，现在成了长舌妇，她观察着每个人，对他们的言谈举止品头论足，她补偿自己惰性的办法是向周围所有的人散发批评和忠告，对每个人传授她的宝贵经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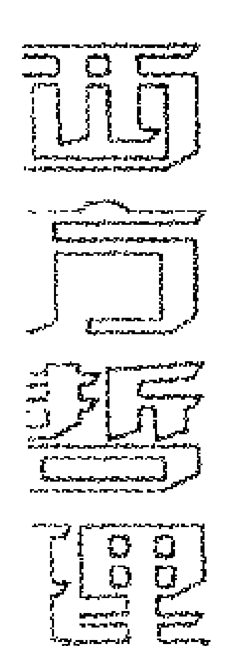


邦伯里小姐为三美神而牺牲

乔舒亚·雷诺兹　1723－1792年　英国

画家塑造了一位完美的女性形象，即优美的形态、庄重的精神气质、朴素雅致的服饰。

老太太一般在风烛残年变得安详，此时的她完全放弃斗争，死亡的临近让她对未来不再关心。她的丈夫通常更加衰老，她看着他暗地里幸灾乐祸——这就是她对他的报复。要是他先她而死，她会不怎么难受地迎接这种不幸。通常的情况是，晚年丧偶带给男人的烦恼比



女人更多。他们从婚姻中得到的东西要比女人更多，特别是在晚年。因为此时的整个世界全部都浓缩在家庭里了，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已经如此脆弱。这时的妻子掌管着日常生活，维持着夫妻的平稳节奏。男人放弃了他的社会职责之后，他已彻底报废了，可妻子起码还能让家庭正常运转，她对丈夫不可或缺，而他却成了令人厌烦的人。

老太婆骄傲于她们的独立，终于开始以自己的眼睛来

观察世界，她们醒悟到她们被自己全部的生活所愚弄和欺骗，她们的头脑清醒，不再轻信任何事，常常变得尖酸刻薄，玩世不恭。纵观她的一生，她在任何时候都没成为一个有用又是独立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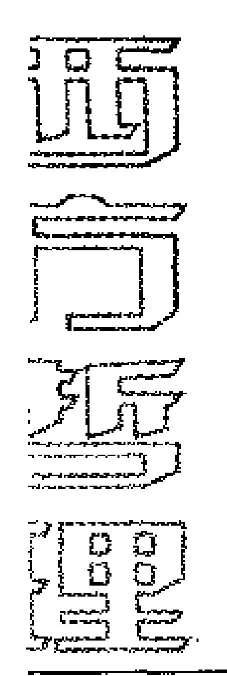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章　女人的处境与特质

有时把“女性世界”作为男性世界的参照物，但必须重申这种观点，女人始终没有真正作为封闭、独立的社会而存在，她们是人类社会无法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群体由男人支配，在社会中位于附属地位。她们的联合仅仅基于她们的相似所形成的机械式的团结，而缺少可以让她们有机结合而形成团结的共同体的基础。从阿琉西斯神秘的祭典时代[1]直到今天的俱乐部、沙龙、社会等服务机构中，她们的联合总是被逼形成的，为的是建立一个相反的世界，可是她却只能永远在男性世界的框架里创建。这就产生了她们处境的矛盾：她们既同时属于男性世界，又成为向其挑战的力量，她们局限于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所包围，她在任何地方都无法找到安宁。她们的温顺永远伴随着拒绝，她们的拒绝又永远伴随着接受。她们在这方面的态度类似于少女，但坚持下去更难，因为对于中老年妇女来说，它不仅是个以象征想像她的生活的问题，更有一个在现实中使生活延续到终结的问题。

很容易解释为何女人愿意墨守陈规，时间不能带给她任何新鲜的感觉，时间对她不是一种流动的创造性，因为

---

① 指古希腊时期在阿琉西斯城祭祀谷神得墨忒耳的神秘的仪式。



她注定要重复，她认为未来意味着对过去的一种复制。要是一个人掌握了这个词语和这种程序，延续的时间就能将自身和生育力相联系——不过这要被月份和季节规律支配，每个怀孕周期，每次花开的周期，都是周期的精确再现。当周期的现象一次次表现时，时间的惟一作用是延缓衰竭——家具和衣服因它而破旧了，容颜被它所损毁，生育的力量为消逝的岁月逐渐摧残殆尽。女人根本不相信这

种以破坏为目的的无情的力量。

她根本不懂得真正能改变世界面貌的行动，在世界中迷失方向，似乎在浩瀚无垠而缥缈的星云中央。她不能熟练运用理性逻辑，司汤达坚信如果出于需要，她可以和男人同样熟练地掌握它，然而它作为工具，对她来说没有机会运用。三段论对做蛋黄酱和哄哭闹的孩子有什么帮助？逻辑推理更不适用于她所而对的现实，她在这个男人的世界上无所作为，她的头脑中没有形成任何设计，仿佛是做白日梦。她缺乏洞察力，无法判定事物的真相，除了空话和梦想，她不会对什么事情较真，这就解释了为何极为矛盾的观点也不会令她烦躁的原因。她能够毫不费力地解释天体的奥秘，虽然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都超出了她的能力之外。为了实现自已的目的，她使用极其模糊的概念，将政党、观点、地点、人物和时间搞得乱七八糟，她的头脑中充斥着千奇百怪的混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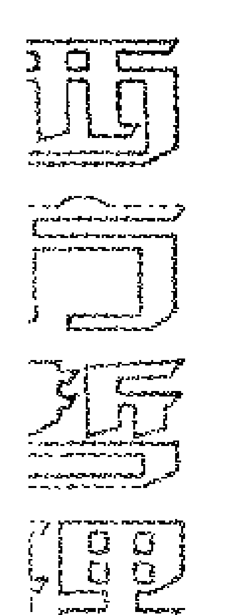
只有在十分完整的文明和社会阶级中，女人才会体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通常说来，她遵纪守法仅仅是因为那是法律，她的信仰十分盲目，即便法律出现了变化，依然有它的吸引力。女人视强权为公理，她从男人那里得来的公理就是以他们的权力为根基的。一旦社会崩溃，女人最

早匍匐于征服者的脚下。总而言之，她们承受现存事物，她们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听天由命。在发掘庞贝城遗址时，人们发现这样的现象：烧焦的男人的尸体保持着反抗的姿态，显现出对诸神的轻蔑或企图逃走，而女人的尸体却蜷曲成一团，脸孔朝下，表现出屈服的姿势。女人感觉她们对事物无力反抗，无法反抗火山、警察、保护者和男人。她们的论据是："女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就是生活的真理——又能怎么办呢？"

听天由命的态度带来的是女人被人惊羡的忍耐度。她们比男人忍受肉体痛苦的能力更强，在环境需要时，她们有勇气禁欲，即使没有男人带有攻击性的鲁莽，很多的女人还是以她们在被动的反抗中显现出的坚韧镇定而闻名。她们面对危机、贫穷和厄运的时候，通常表现出比丈夫们更积极的态度，她们注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之下无法取得成功的——她们做事情并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她们以沉稳顽强的态度从事一项事业时，可能会大获成功。"决不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的态度在宽容的女性身上体现为克制：她包容一切，从不指责任何人，因为她相信人或者事物只能是现状下的状态。但它也会引发一种过度的谨慎，女人所希望的就是维持、适应和规划，不是破坏和重建。她们宁可妥协和整顿，也不想进行革命。

女人备受指责的很多缺陷，例如平庸、懒惰、轻佻和奴性，是她们眼界太小的现实造成的。女人被指摘为生性淫荡，沉醉于内在性里，事实却是她始终在这其中禁闭着。后宫的宫女并没有表现出对玫瑰蜜饯和香水浴的病态热衷，她们只不过借此消磨时光。女人被禁锢在沉闷的闺房中（妓院里或是中产阶级家庭），只能遁入宁静的内在性之中。另外，要是她对性快感急切地渴望，往往是由于她被剥夺了性快感的权利，性生活无法满足，命定里为男人粗暴地对待而"被描绘成男性化的丑八怪"，她惟有在


西蒙·波伏娃



奶油色果汁、烈酒和天鹅绒里，或是在水、阳光、同性朋友和年轻的情人的爱抚中寻求慰藉。如果男人感到她的“性欲”极为强烈，那是因为她的处境使她将动物的本能看得极为重要。她对肉欲的需要并不强过男人，仅仅是由于她将获得的一丁点进行了放大。性快感和撕裂的痛苦同样令人在晕眩中神智迷茫，瞬间的高潮里，未来和世界都已不复存在，肉欲的烈焰之外什么都不存在，欲仙欲死的

刹那时光中，女人不再感觉残缺不全、受挫。然而，她重视这些内在的胜利，归根到底还是由于内在性已注定了她的命运。

她的轻佻和她“肮脏的物质第一原则”出于同样的理由，因为没有接近大事的机会而重视小事。她眼中，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琐碎小事，往往是最为严肃的重要事务。她将她的魅力和机遇，归功于她的装扮、她的美丽。她经常看起来慵懒、无精打采，但对她重要的忙碌和纯粹的时间消逝没有意义。要是她絮絮叨叨、粗心大意，往往是借此消磨她空虚寂寥的生命。既然付诸行动并不可能，她只有用讲话来代替。事实上，一旦女人可以从事一项值得人为之奋斗的事业时，她能够像男人一样表现得主动、有效率、惜言如金和禁欲。

她被谴责为奴性十足，说她随时准备匍匐于主人脚下，亲吻他那只殴打过她的手。通常说来，她确实缺少真正的自尊心。“对失恋者的忠告”专栏里给那些受骗的妻子和被遗弃的情人的劝诫，充斥着卑微屈服的态度。女人高傲地在争执中使自己精疲力竭，最终还是拾起了男人有意扔在地上的面包渣。可是，一个将男人作为生活的惟一手段和生命的惟一理由的女人，在离开男人的支撑时，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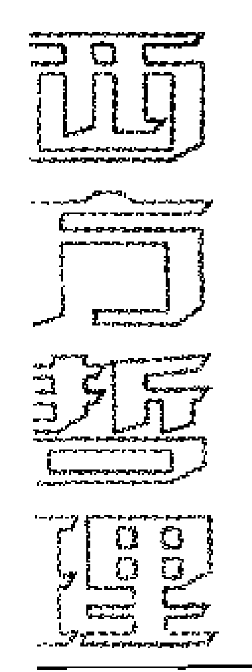
能让她做什么呢？她注定了要受尽羞辱，奴隶怎么会拥有人的尊严呢？只要在放弃尊严时不会颜面尽失就行了。

最后一点，如果指摘女人世俗、平庸，本质是功利主义的，那是由于她被迫使生命被做饭和洗尿布所包围——她根本不能从中取得崇高的感觉！担负起乏味重复的生活，在近乎麻木的实在性中过日子，是她职责所在。女人只能重复，要在毫无新意中重新开始，时间似乎是没有目的地原地转圈。她如此忙碌却永远没有什么成果，这迫使她认同于现存事物。这是男人使她处于那种依赖性的结果，这也解释了她吝啬和贪婪的原因。她的生活没有目标：她全身心地投入抚育或照料，例如食物、衣服和住宅等仅仅是作为手段的物的方面。这些物是动物生存和自由生存之间的次要的媒介，与此惟一相关的价值是实用性，家庭主妇在实用的层次上生活，她没有指望自己成为一个不仅仅是对家庭有用的人。

相同的矛盾还表现为，人们既将她关在家务事的狭小天地里，却又用她的自恋，她的自私，和以此引起的后果，诸如虚荣、冲动、恶意等等来指责她。她任何的与其他人具体沟通的可能性都被剥夺，她无法感觉到团结具有的吸引力，更不会体验团结带来的利益，她将自身彻底奉献给家庭，近乎与世隔绝。所以，人们对她能够超越自己，追求同样的权利不报什么希望。她在熟悉的领域中固步自封，在那里她可以控制一些东西，还能拥有一种不怎么牢靠的主权。


西蒙·波伏娃/著

她听信谣言，传播恐慌。即便是太平无事她也总是焦虑不安，夜晚她似睡非睡，被那与噩梦纠结在一起的现实搅得无法入睡，对于注定了被动的女人来说，神秘莫测的未来被战争、革命、饥馑和贫穷的幽灵袭扰，她无能为力而十分烦恼。她的丈夫和儿子在从事事业或面对危急情况时敢于冒险，他们的计划，他们遵循的原则指示着穿过黑



暗的可靠途径。而女人却只能在困惑和黑暗中摸索挣扎，她已经习惯于这种状况，因为她无事可做，她想像中的一切都可能成为现实：列车或许会出轨，手术也许会出差错，生意可能会破产。她在忧虑中努力驱除自己无能为力的念头。

她的焦虑证实了她对现有世界的怀疑。它如此危险，随时处于崩溃的可能之中，是因为她在其中生活是不幸

的。她并不愿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她很明白正在忍受的一切与她的愿望相违。就此而言，她求助无门，不敢贸然反抗，她的屈从不是出自本心，她怨天尤人。那些可以被女人信任的人（医生、牧师、社会工作者），都知道她们所唱的曲子的基调就是抱怨。身处朋友之间，女人不停地倾诉她的烦恼，女人们如同合唱团似的一起埋怨命运的不公，埋怨世界，埋怨所有的男人。

女人喜欢哭的习性可以由她的生活处于无力反抗的事实来解释，但下列观点也有一定的正确性：生理学的角度来讲，她的神经控制能力明显比男人差，她被灌输的教育也令她能够毫不犹豫地放纵自己感情。教育或习惯的影响显而易见，譬如过去的本杰明·康斯坦丁[①]和狄德罗[②]这样的男人，经常就泪眼婆娑，后来男人不轻易流泪是由于他们感到这种做法已经落伍了。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女人一直没有真诚地接受世界，她做好了随时向它妥协的准备。男人确实认同这个世界，即使是不幸也不能令他态度转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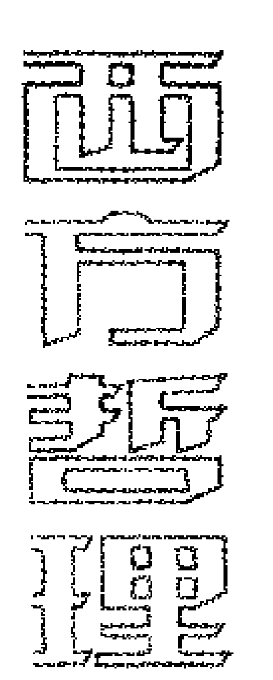
① Constant Benjamin，1767—1830年，法国自由主义思想家，著有《论适用于一切政治的政治原则》和《古代与现代自由之比较》。

② Denis Diderot，1713—1784年，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著名的百科全书的总编辑。

变。他会迎接挑战，而不会屈膝投降。女人联想到世界对她的敌意和命运对她的不公时几乎毫不费力，所以她慌忙退守到她最可靠的庇护所——她的自身。她面颊上残留的泪痕，通红的双眸，不都表现出她被悲痛所伤害的灵魂吗？泪水滴到她的面庞上，流在她的嘴里略带咸味，它是一种虽酸楚但温柔的安慰。她的面容在这温柔的波光下闪闪发亮，眼泪既代表哀怨却也有安慰，它带来的抚慰既热情又平静。眼泪成为女人最有说服力的借口，它似倏忽而来的狂风，阵阵发作的台风，四月天的冰雹，女人就这样成了哀伤的源泉，风雨交加的乌云。她的眼睛无视一切，雾水蒙蒙，双眸看不到了，迷失在雨水中，她也看不到了，又变成了自然物的被动状态。她深陷失败的泥潭中。她难倒了注视着她的男人，对此他束手无策，如同面对瀑布。他觉得这种表演不公平，她却认为这种斗争一开始就不公平，因为她从来没有掌握别的有效武器。她想借助巫术咒语。她的哭泣使男人怒从心起，这更令她有了痛哭一场的理由。

当眼泪不足以表现她的反抗时，她开始大发娇嗔，这种颠三倒四的冒犯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使男人更加惭愧。有的阶层中，丈夫真会给妻子一通拳脚，另一些圈子里，因为他是强者，他的拳头就是有力的武器，所以他不想诉诸武力。然而，妻子会像孩子一样着迷于象征性的发作：她会扑到男人身上，拳打脚踢，又抓又挠，但归根到底不过是种姿态。重要的是，她要以歇斯底里的形式表达她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抵抗。除生理的原因之外，她对痉挛表现出的敏感还有其他原因：痉挛是能量的某种内在释放，而这种能量对外指向环境时，不会对任何客体产生影响，这是对生存处境引起的各种消极力量的释放。母亲和孩子在一起时很少会歇斯底里，因为她能够惩罚他们，打骂他们。准确地说，正是没有真正获得权力，女人与长大


西蒙·波伏娃/著



的儿子、丈夫或情人在一起时，才会控制不住暴跳如雷。

女人的反抗达到顶峰时，只有一个办法还能够使用——自杀。不过女人使用这种办法好像并没有男人常见，自杀方面的统计数字的意义很模糊。自杀身亡的男人比女人更多，但是企图结束自己生命的女人更为普遍。或许因为女人满足的是演戏：她们经常装作要毁灭自己，而不是真的要毁灭。部分原因是通常所用的残酷手段使人厌恶，

女人几乎不使用刀和火器自杀，她们最可能的方法是溺水自杀，就像俄菲丽亚，表明了女人和水的关系密切，好像在水中，寂静的黑暗中，生命会被动地解体。我们再次发现了我曾强调的那种暧昧：女人并不真愿意放弃她所厌恶的事物。她装作想断绝关系，可最终依然和带给她不幸的男人继续生活；她装作要放弃给她造成伤害的生活，但真正自杀身亡的情况极为少见。她本来就对有效的解决方法兴趣不大。她抗议男人、生活和自己的生存处境，可是不能成功地摆脱这一切。

许多的女性行为都可以用抗议的形式来解释。可以发现，女人欺骗她的丈夫常常是因为挑衅，而决非从中找到乐趣，她会因为丈夫的井井有条和精打细算，故意地粗枝大叶和挥霍浪费。讨厌女人的人指责女人老是迟到，觉得她根本没有时间概念。但就我们看见的而言，她完全可以将自己调节得非常准时，她是故意迟到的。搔首弄姿的女人相信这样更能刺激男人的欲望，她们的出现能得到更高的评价，让男人多等几分钟的时间里，女人最想表达的意图是抗议她的生活中的那种长期等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待贯穿于她的整个生命，因为她的利比多被困在内在性和偶然性之中，她对自己生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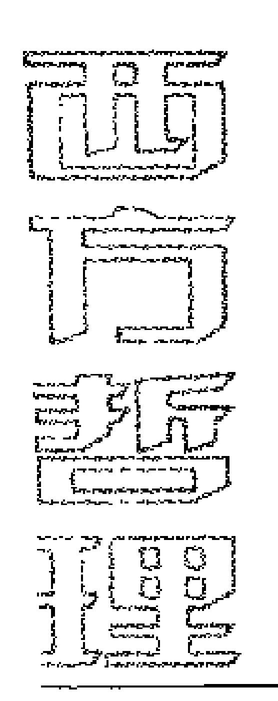
正当性的证明又被别人所掌握。她等待着男人的效忠和赞美，她等待着爱情的降临，她等待着丈夫或情人的感激和夸耀。她等待着支持她的声音，而这种支持来自男人。无论她是管理支票簿，还是每星期或每月从丈夫手中领到一次零花钱，要是她想有钱付给杂货店老板或是购买新衣服，只有盼望丈夫领到薪水或得到加薪。她等待着丈夫出面，经济上的依赖性使她全部由丈夫处理，她只是男性生活中的一个因素，男人却是她的全部世界。丈夫在外有他自己的事业，妻子不得不忍受他不在家的漫漫长夜，情人或许会热情如火，但仍然要根据他的义务来决定他们的幽会和分离。床上的她等待着男人的勃起，等待着（有时焦急地等待着）自己快感的到来。



约瑟芬皇后像

皮埃尔－保罗·普吕东　1758～1823年　法国　*画家为了表现皇后的美丽、端庄，曾画了大量的草图，最后于1805年完成这幅杰作。*

女人并没有相信真理，这和男人所宣布的不一致，她们宁可相信根本就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真理。她怀疑真理的永恒性不光是生命中变化的性质，也不仅是笼罩在神秘中的现象动摇了因果关系的观念，而是男性世界。从本质上说，她作为这个世界中的一员，发觉了一切的原则、价值和存在的事物的含义都是游移不定的。她明白了男性的道德观念和她有关的部分统统成了欺骗。男人将贞洁和正派行为的原则捧上了天，可暗地里却诱惑她来违反这种原则，他甚至期待着这种破坏，没有这种原则，他



借以遮丑的金玉其表的牌坊就坍塌下来。

女人对逻辑原理不予承认，更不接受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所以她缺乏对一般存在的判断能力。她的眼中，世界好像是无数特殊情况的混合体。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她宁愿相信街坊邻里的传言，也不愿相信科学推理的原因。她对印好的书籍很尊重，可这种尊重表现出来却是她看书时的不求甚解，难以领会书中的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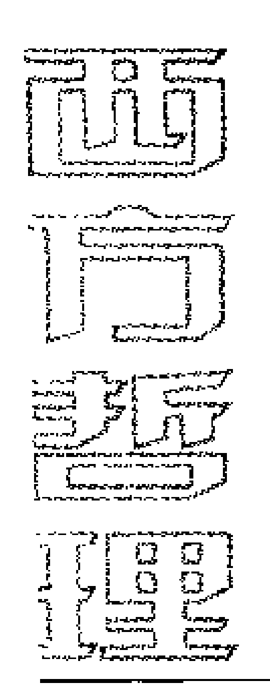
义；另一方面，她对排队时或在车厢里听到某个陌生人讲述的奇谈怪论却马上拥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她认知的领域中所有的东西都具有魔力，除此之外的一切更具有神秘感。她不了解判定是非的标准，而只有直觉的经验——她本人的经验，或被反复强调的别人的经验。而她的自我，她认为她属于一个特例，因为她在家中与外界隔绝，无法主动和其他的女人接触，她一直希望命运和男人会为她带来额外的好处。她对直觉深信不疑而对普遍有效的推论半信半疑，她认为这种直觉源于天赐，或者来自某种难以言述的神秘精神。对于某种不幸或意外事件，她冷静地考虑到："在我身上是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反过来，对利益她却认为"我是个例外"，因此准确地说她在期盼获得额外的利益。售货员卖给她的东西会打折，警察在她没有通行证时也放行，她开始高估自己微笑的作用，而且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所有的女人都会微笑。她没有认为自己比她们的邻居更特殊，她根本没有对此做过比较。同样的道理，经验几乎无法令她明白她犯了什么错。她经历了不计其数的失败，从来没有从中汲取教训。

这就是女人无法建立一个牢固的、能够对男性进行挑战的反面世界的原因。她们埋怨一般的男人，她们讨论着

卧室或者生孩子时发生的事情，她们交流着算命的天宫图和美容秘方，可是她们又不具备建设一个可以让她们发泄不满的世界，她们以极其矛盾的态度对待男人。不可否认他是个孩子、一个弱不禁风而脆弱的身躯，他是个傻瓜、令人厌烦的雄蜂，一个无耻的暴君，一个爱慕虚荣的自私自利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将她们解放出来的英雄，一个使她的生存有了价值的神灵。他的欲望是粗鄙下流的，他的拥抱是可耻的义务，然而他烈火一般的激情和男性的伟岸，又如同开天辟地的力量。当女人在狂喜中说出“他真是个男子汉”的时候，她马上唤起了那个被他赞美的男人的性渴望和社会影响力。他在性和社会领域中都显示了非比寻常的创造性，她无法想像作为一个大艺术家、富商巨贾、将军、领袖的他，却是一个性能力软弱的情人，他在社会上的成功一直带有性吸引力，她认为那个使她的欲望得以满足的男人是个天才。

自然也赋予了她双重的性格，它既带来了汤锅，又给予她神迹的显现。女人成了主妇和母亲之后，没有了在田野和森林中漫游的自由，而更安于在她的菜园里耕种，把盛开的花插进花瓶中，但对着月光和日落她仍然伤感不已。她首先从大地上的动植物中看到了食物和装饰品，同时她也看到了其中流淌着某种高贵、带有魔力的生命之泉。生命不仅有内在重复的一面，也有令人目眩神迷的一面，百花齐放的草地就展示着美。因为女性子宫的生殖力量和自然协调一致，女人也在和煦的春风中感受到它，这种春风就是精神。她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不太满意，她有一种少女般的没有实现和不确定的感觉，在无边无垠的地平线上无限伸展的道路尽头，她的灵魂也看不见了。她虽然被丈夫、她的孩子和她的家庭所奴役，可是在那片山坡上她却惊喜地发现了自己是惟一的所有者，她不再是母亲、妻子和家庭主妇，而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当她注视着被动


西蒙·波伏娃/著



的世界时，她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全有意识的人，具有最起码的自由，神秘的溪泉和起伏的群山之间，男性那至高的地位慢慢消失了。她穿越荒原，将手浸人溪水，此时的她不是为别人而是只为她自己生活。任何一个经受了种种奴役但思想上依旧独立的女人都会热爱在大自然中获得的自由。别的女人则只能从那里找到堂皇、快乐的借口，当黄昏降临的时刻，她们在伤风的危险和灵魂获得的狂喜之

间徜徉。

这种对实在的世界和对“诗”的精神世界的两重性肯定，决定了女性不同程度上并不隐讳地坚持着形而上学和智慧。她极力将生命和超越相结合。也就是说，她并不信奉笛卡儿的哲学思想和形式逻辑及其相关学说。她熟知的自然主义类似于与斯多噶学派或者16世纪新柏拉图主义所信奉的自然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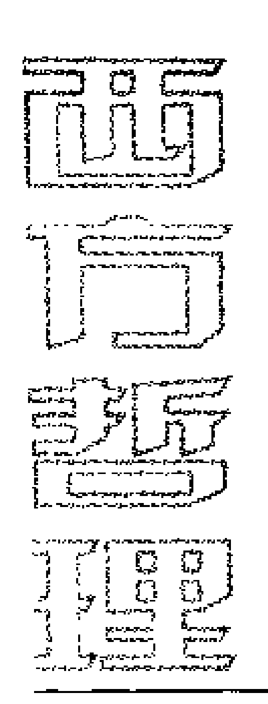
不过有一种证明生存的正当性的方法，一种最高形式的补偿，社会也一直乐意把它赏给女人——宗教。必须有一种专属于女人的宗教，就像是必须有一个为普通人而设的宗教一样，两者设立的理由相同。当迫使某个性别或者某个阶级安于内在性的状态时，为它设一个可以超越的海市蜃楼非常必要。男人使上帝同意他设立法典，从而拥有了相当大的优势，既然男人对女人能够行使最高的权力，而特别幸运的是上帝赋予了这种权力。对信奉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人来说，即使没有别的权利，但还有神授的权利决定了男人的主人地位，因此出于对最高的主宰的敬畏受到蹂躏的女人产生的关于反抗的想法受到压制。人们能够相信她的轻信。女人对男性世界的态度是尊重和信任，她感到天国中的上帝比内阁中的大臣还要遥不可

及，创世的神秘与发电站的神秘同样不可理解。但要是女人心甘情愿地信仰宗教，首要的原因在于它使一种极端的需要得到满足。

显而易见，女性的“特征”——她的信念、价值、智慧、道德观、情趣、行为，都应该以她的生存处境进行解释。不承认她具有超越性，往往使她不能具有人类中最高尚的品质：英雄主义、反抗精神、公而忘私、想像力和创造力，在男性中这些品质也不太常见。相当一部分男人和女人一样，被限定在作为中介和工具性的范围之内，被束缚在次要的地位上。工人阶级以政治活动逃脱了这个范围，表达出革命意志，但所谓“中产”阶级的男性却故意留在这一范围中。雇员、办公室职员和商人注定了和女人一样重复着日常繁杂的事务，对现存价值表示认同，尊重社会舆论，追求世俗、无意义而又含糊的悠闲，他们相对于女性并没有优越多少。女人在做饭、洗涮、理家和抚育子女中所表现的独创性和独立性远大于惟惟诺诺的男人。他始终都在服从他的老板，身穿白领制服，守护着他的社会地位；她却可以随意穿着，在家附近散步，歌唱，同邻里闲聊，她随心所欲，几乎没有什么风险，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某些成果。不像丈夫那样，总是处于必须时时注重外表的氛围之中。

“女性的敏感”是女人神话衍生出的某种特质，是从假设中衍生出的某种特质，它不全是虚假，因为女人相对于男人更注重自己，更关注世界。她的性生活被粗野的男性氛围所包围，作为补偿，她有对“美妙事物”的嗜好，这会导致过分的矫揉造作，但也许会产生真正的优雅。因为她所能涉及的领域有限，她无法达到的目标越发显得弥足为贵。她不相信它们和概念或设计有重要的关系，她所要的只是展现它们的奇妙。她逃避的念头表现为她对喜庆的追求：一束鲜花，一块蛋糕，一张放置得恰到好处的桌


西蒙·波伏娃/著



子，无用的魅力却使她为之迷醉，她酷爱将无聊的闲暇时光变成大度的贡献。她爱笑，爱唱，爱装饰事物，爱小玩意儿，她好奇周围使她激动的一切事：都市的热闹，天空的景色，甚至于一次邀请，一次傍晚的出行都令她开阔眼界。男人通常对此类乐事予以拒绝，他一回家，欢快的声音就消失了，女人又做出了他希望她们处于的那种无聊而满足的姿态。

女人从孤独与隔绝之中领悟出她的生活含义。她对于过去、死亡和时间的流逝比男人的感受更为深切。她对心灵、肉体和思想的冒险有着无比的兴趣，因为她明白这就是她在人间所获得的全部。由于她是被动的这个事实，她对身处其中的现实体验比专注于理想和事业的人更加热情和动人，她有空闲，也愿意放纵感情，咀嚼感受，阐明其中的意义。

她就是这样迫切地注视着整个世界，她感觉世界如同一个谜，每个人，每件物都可能预示着谜底，她急切地追问他和它。她步入暮年，她已经破灭的希望又会转化成冷嘲热讽和常常使人感到辛辣的愤世嫉俗，她不想被男人神秘的举动所迷惑，她从男人建造的雄伟建筑中发现了偶然、荒诞和没有必要的一面。她的依附性使她无法采取超然的立场。

由此来看，谈论所谓一般的“女性”和谈论“永恒的”男性一样令人感到荒诞滑稽。要明白，目的在于证明女人优于或劣于或等同于男人的种种比较的愚蠢之处是，他们的处境太不一样了。如果对这些处境进行比较而并非比较身处其中的人，就可以明显地看到男人的处境的优越。换句话说，在这个世界上，他运用自由的机会远比女



人大，其后果必然导致男性的成就远远超过女人所取得的成就，因为女人事实上被剥夺了做任何事的权利。而试图在男女各自的范围中比较他们运用自由的程度，也是毫无意义的。原因是他们的行为恰恰是自由地运用他们的自由。各种情况中，极为狡猾的骗局和陷阱，虚伪的诱惑，在男女两性中同样多的存在，两性都具有完美的精神自由。事实上女人的自由仅仅是抽象的、空洞的，这一点就让她只能用反抗来运用自由，没有任何机会从事开创性事务的人们对此别无选择。他们必须对抗种种加诸于他们处境的限制，奋力开创未来之路。听天由命意味着退缩和逃避，对女人来说，惟有争取自身的解放，此外别无他途。





第六部　生存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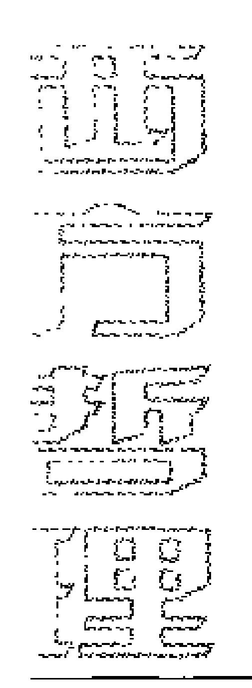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二章　自　恋

有时候人们确信女性都有自恋的基本倾向，但将概念无限推广会破坏它的本来含义，就像拉罗什科夫[1]对个人主义的本意的歪曲一样。事实上自恋是认同的一个既定过程，自我在此过程中被视为绝对的目的，而自身也就包含着主体性。女人或者还有可信或不可信的其他许多态度，我们已经探讨过几种，然而生存处境使女人比男人更易转向自我，将爱奉献给自己。

所有的爱都要有二元性：主体和客体。女人遵循两条途径而进人自恋状态。从主体角度看，她一直有挫败感：从童年开始就缺少第二自我，它在男孩子身上的代表就是阴茎，此后她带有攻击性的性欲总是无法满足。更关键的是，她不被准许从事男性活动；她一直在忙碌，却一事无成；她并不因为履行了妻子、母亲和主妇的义务得到作为一个人的认同。男人的实现自我表现在他盖房，伐木，医疗，而女人却无法用设计和制定目标来实现自我，她只能以自身的内在性来实现现实性的追求。

实际上一个人的自我不可能既真正成为他者而又有意识地承认自我为客体，这种二元性只在想像中存在。女孩子将此种想像放在布娃娃的身上加以实体化，她用布娃娃

① La Rochefoucauld，1613—1680 年，法国伦理作家。



更具体地看到自己的影像，因为她和布娃娃实际上是分离的个体。

到了少女时代她抛开了布娃娃，但从此以后女人都会感觉到镜子的魔力。它能够对她先努力投影自身，再达到自我的认同的想法有巨大帮助。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阐述了镜子和神话、以及如同梦幻中的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影像对女人来说就是认同自我。美丽的容颜对男性来

说代表着超越，对女性来讲意味着被动的内在，而只有后者才千方百计想引人注目，所以才被固定在那里的银色捕兽器捕获。男人认为并希望自己是主动的主体，他不通过静止不动的影像来观察自己，它对他的吸引力近乎为零。因为在男人眼中他的身体不是欲望客体，但女人明白自己是客体，并使自己成为客体，所以她相信她可以通过镜子观察自己。作为被动的既有现实，这一反映和她本身相同，也是一种物的存在，在她确实渴望着女性的、也就是她自己的肉体时，她会用自己的敬仰和欲望，把她自己的镜中特质赋予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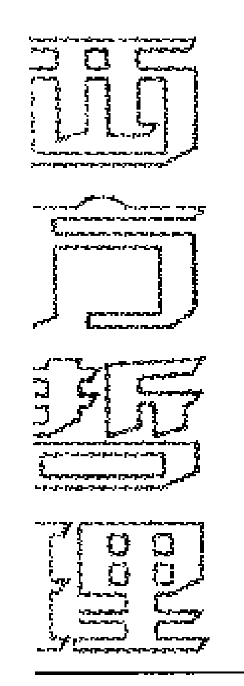
就算是不太幸运的人有时能在镜子中得到极大的快乐。因为仅仅作为肉体的存在物就可以令她们激动不已，恰似和男人在一起时，单单年青女性的温软丰满的胴体就让她们惊奇不已，并且出于自己是单个主体的感觉，她们还可以接受自己特殊的性质，具有个人的魅力，她们会从外貌或身体中发掘出某种优雅的、与众不同的或是有趣的特性。她们觉得自己作为女人很美。同时，尽管镜子讨她欢心，但它决不是可以制造两个自我的惟一手段，所有人都能够以内心对白的方式创造出双我。女人在白天的大多数时间都要独自做令人厌烦的家务活，她一有时间就用想

像来造出特定的形象，她如同少女般幻想着未来。由于在没有止境的现在中被禁锢，她只有追忆历史，她篡改历史的方法却导入了美学原则，她没有死亡之前她的偶然性的生命就成了一种必然的命运。

女人相比男人更加留恋童年旧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们依然记得，在父母的羽翼之下她们是独立的，未来在她们的面前展开，现在她们却没有这样的安全感，作为仆人或物品被束缚在现在。她们曾想征服世界，目下却陷入一般性的状态，作为数不清的妻子和家庭主妇中的一个。女人为现在的状态深深遗憾，想重新在身上找到那个已不复存在的孩子，甚至想让那个孩子复活。她极力期望她的情趣、念头和情感可以前所未有地保持新鲜感，甚至可以保持某种古怪的对世界藐视的因素。她的独特个性在她的衣服和她的"内心"上表现出来，她形成的两个自我通常含糊不清，有时她塑造的明确的人物也能扮演女人生活中的角色。很多女人从文学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发现了被塑造过的自我："她和我好像啊！"这一认同可以被浪漫美艳的人物所激发，也可以被自我牺牲的女主人公所激发。一个女人可能想变成这个时代多愁善感的女性的象征，也可能想成为失意的妻子的代表："这世界上的女人就属我最为不幸了。"

这种女人的共同特征是，她们感到自己受人误解，周围的人没有意识到她们的特殊性质，她们将这种无知和冷漠解释成这些人相信她们心中隐藏着秘密。事实上，她们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的确一直隐藏着童年或少女时的某些事件，这些事件对她们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她们明白，她们正式的传记不会和真实的生活经历混杂在一起。但自恋的女人扮演的女主角常常是臆想出来的，因为这样的女人从现实中没有达到自我实现，赋予她个性的并非具体世界，而是一种神秘力量，一种仿佛是燃素的似有若无





的“物质”或“德行”。女人坚信她扮演的女主角确实存在，她如果对别人表现自我，就会像精神病患者的挣扎一样，狂热地忏悔无形的罪孽。正是由于女人意志力的缺乏和自身的惰性，才会产生这种精神病患者存在的幻觉；正是因为女人不能表达自我，她才相信心中存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而关于神秘女性的有名的神话更鼓励了这种想法，反之又使这种想法进一步证实。

自恋者的慷慨会为她带来益处，因为从别人眼里比从镜中更能发现她的两个自我被神奇的光环缠绕。她没法找到耐心的听众，就会向神甫、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袒露心声，她也会从看手相的人和算命先生那里得到指教。“倒不是我相信他们，”一个小影星说道，“而是因为我喜欢别人向我谈论我本人！”她会将自己的一切统统倒给她的朋友，她希望情人成为听众，这一想法比让其他任何人作为听众的愿望都更加迫切。女人一旦掉进情网，会很快忘掉自我，而许多女人没有找到真正的爱恰恰正是因为她们从没有忘记自我。

服饰和聊天令女性的表演欲获得满足，有野心的自恋女人更希望她的自我表达方式与众不同而且变化无穷。特别是她经常让她的生活成为博得满堂喝彩的表演，于是她一心一意地在舞台上演下去。她的表达方式确实惊人，但由于缺少行动，女人发明了代替行动的物品：对于有的人，剧院就是一种很好的替代，而且女演员有各种目标可以追求。演艺事业对于有的人是谋生手段，仅是一种职业；而对另一些人来讲，它带来用以达到放荡的目的的名声；而更有一部分人可以借此获得她们自恋的胜利。

我们没有必要讨论野心勃勃的女人是如何利用男人来

实现自己的目的，而是要探讨女人是怎样被旨在获得重要地位的主观欲望所激发，这种欲望没有实际的目的，仅仅是醉心于夺取别人的超越性。她们永远不能成功，却欺骗自己没有失败，善于令自我相信她们具有无法抗拒的诱惑力。她们确信自己可爱、令人满意、值得赞美，她们自信十足，相信自己能被别人喜爱，会受到别人的渴望和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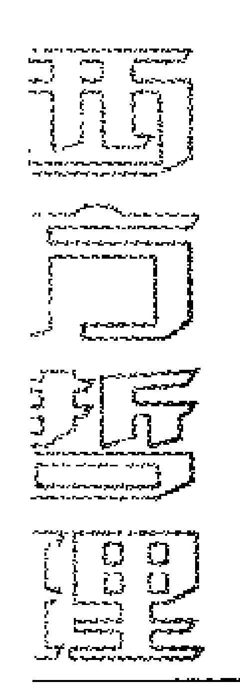


美惠三女神

巴龙·让－巴蒂斯特·勒尼奥　1754－1829年　法国

自恋者决不承认别人可能会不钟情于她，确认了自己并未被人崇拜，她立刻觉得自己是可恶的。她将所有的批评都作为妒忌或嫉恨的表现，她的失败全是因为卑鄙的阴谋所致，她更加确信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她极容易陷入妄自尊大或者反面，即受迫害的幻觉。她坚持成为本身的宇宙中心，出于对其他宇宙的无知，于是她成了世界的绝对中心。

少女在自我崇拜中获得足够的勇气，使她面对令人担忧的未来，不过她必须尽快把握这个机会，否则未来将向她关闭大门。女人要是将情人束缚在两人的内在性中，就会注定了使他和她一起毁灭，自恋者要是对她臆想中的两个自我认同，就会毁自己。她的往事无可改变，她的行为已经定型，她废话连篇，反复表演那空洞的、渐已失去意义的动作，所以女人所写的很多日记和自传异常枯燥，由于全部注意力都集中于她本身，无作为的女人变得毫无价值，只能崇拜虚无。



她不幸的根源是，尽管对自己不诚实，她依然意识到这种空虚。个人和她的两个自我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关系，因为两个自我并不存在。自恋终将会受到重大失败，她无法将自己视为一个整体，不能保持她既作为自为又作为自在的幻觉。与所有人的隔阂一样，她的隔阂也似乎是意外发生并被悲惨地抛弃。要是她不自己改变，她就只有从自身向人群、向闲聊、向他人逃避。如果有人相信她已摆脱

了依附，认为她能够将自己作为考虑的最高目的进行选择，简直荒谬可笑。她并没有坚持她的独立性，而是使自己成了被世界迫害的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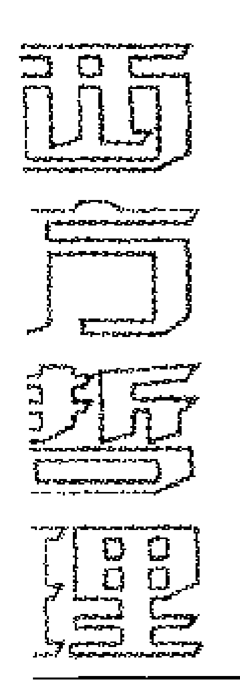
事实上，自恋的女人的依附性一如高级妓女。要是认为她逃避了单个男人的专制，但她却认同了社会舆论。她和别人的关系不具有相互交换性，如果她想认同别人的自由评价，同时又认同这一评价是通过行动要达到的目标，那她就不再是自恋者了。

她的矛盾态度源于下列事实：她需要世界赋予她价值，同时又认为这个世界毫无价值，而只有她的观点才最有价值。别人的认同是种神秘而难以掌控的非人为的力量，想得到这种认可的人都要有魔力。自恋女人表面的傲慢并不能掩盖她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并不牢靠，这就是她为何难以安宁、神经过敏、脾气暴躁、随时警惕的原因，她的虚荣就是个无底洞。岁数越大，更加追求赞美和成就，她更加疑心周围潜藏着阴谋，于是她精神失常，疑神疑鬼，躲进了虚伪之中，最终在自己周围修筑了精神过敏和迫害妄想的高墙。有种说法对她再恰当不过了：“发现了生活的人终将失去生活。”

第二十三章　情　妇

爱情对于男女两性的含义完全不同，这是引起他们严重的误解直至分手的因素之一。拜伦有句最贴切的话："男人的爱情是与男人的生命相异的东西，女人的爱情却意味着女人的整个生命。"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也有相似的看法：爱情对于男女来说，实际上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意思。女人理解的爱情十分明确：它不仅意味着奉献，更是全身心的、毫无保留的、不顾一切的奉献。这种对爱的无条件性让爱情变成了信仰，她惟一拥有的信仰。至于男人，他爱上一个女人，他想获得的是她的爱情，因为他对于爱情的要求和对女人的感情的要求远不相同，要是有的男人也对爱情产生了不顾一切的欲望，可以肯定的说他们必定不是男人。

男人认为在生活的某一时段能够变得热情如火，但没人可以被人称颂为"伟大的情人"，即便是最为神魂颠倒的时候也不会彻底让步，就算拜倒在情妇脚下，他们想的也是如何占有她。男人从生命本质上依然是拥有主权的主体，他们期望使她成为自己生存的一部分，而不是将生命全部浪费在她那里。相反，对于女人爱情就意味着为主人放弃一切。像塞希尔·索朗热所说："女人深陷情网中必须遗忘自己的人格，这是一个自然法则，没有主人女人就无法生存，就是一束散乱的花。"



在这里我们不准备讨论自然法则，男女生存处境的不同在他们对爱情不同的理念上反映出来。男人是主体，代表他自己，如果他有勇气向着超越迈进，就会全力扩张他对世界的掌握，他有理想，有行动。作为次要的女人在主观意识深处无法承认自己的绝对，一个注定了内在的人无法以行动来完成自我的实现。在她看来，除非将自己的身心交给他之外别无选择，他在她心中代表了绝对，代表了

主要者。既然命中注定了自己的依附性，她会宁愿服务于一个神，也不想服侍暴君——父母、丈夫或监护人。她甘心被奴役的愿望如此强烈，达到了以这种奴役表达自身自由的地步，她试图超越自己的处境，这种处境令她全盘接受，迫使她成为次要的客体，她将她的肉体、感情、行为，体现为对他作为最高价值和现实的崇敬，而将自己贬低为可有可无。于是，爱情成了她的宗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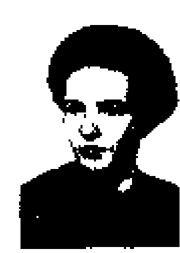
实际情况经常是女人没有将一个她所认识的男人视为神明。与一般的看法相反，爱情在女人生活中并没有占据重要位置。丈夫、子女、娱乐、社交职责、虚荣、性爱和事业与之相比重要得多。大多数女人都梦想愉悦的私情，销魂的爱情。她们懂得替代的道理，她们已经接受了这种爱情，它以热烈、感伤、残缺或虚假的形式降临身边，没有人会将生活彻底交给它。那些愉悦的婚外恋女性经常是在不成熟的恋爱中，没有使生命逐渐消逝的女人，她们开始时接受了传统女性的命运：丈夫、家庭和孩子，或者经历了可怕的孤独，或者她们倚赖迟早要失败的事业。因此，一旦发现有机会让某个优越的人掌握，以此来拯救令她们失望的生活，然后就会不惜一切地臣服于这种希望。

只有在爱情中，女人才能将她的性爱和自恋情结很好

地协调。前文已述，这些感情如此矛盾，以致于女人非常难以适应自己的性命运。将自己转变成为一个肉欲的客体，成为人的猎物，这与她的自我崇拜格格不人。在她眼中，这种拥抱蹂躏并玷污了她的肉体，或者令她的灵魂遭到羞辱。正是这一原因，有的女性才以性冷淡作为逃避的公式，她们以此来保持自我的完整。也有的女人将动物般的肉欲和理想中的情感截然分开。斯特柯尔的一个病例中，有个女病人面对她被人尊敬和名声很高的丈夫时显现出性冷淡，他死后，她对一个同样有优越地位的大音乐家也显现着性冷淡，即使她真诚地爱着他。然而，在和一个粗俗野蛮的守林人的一次偶遇中，她却获得了完全的性满足。在她想到这个情人时，“无法言述的厌恶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狂野的迷醉”。斯特柯尔认为，女人堕人动物性是达到自己性高潮的必要条件。这种女人认为与尊重和爱情相比，肉欲的爱简直是令人羞愧的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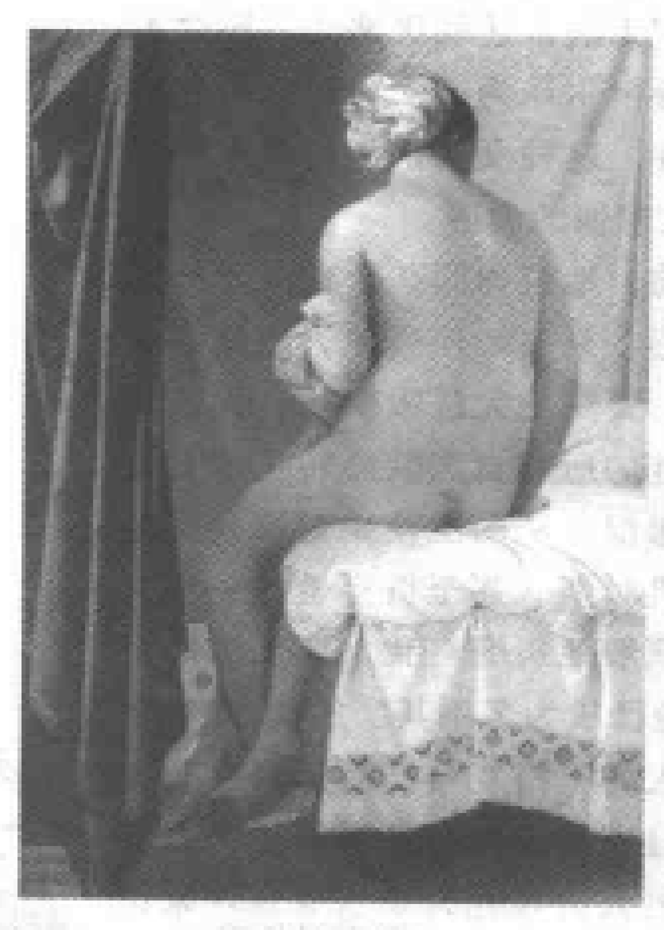
恋爱中的女人在情人面前，地位如同孩子在父母面前一般，易产生对他们的负罪感，只要她还爱他，她就不会对他反抗，但会反抗她自身。要是她无法吸引他，无法使他感到幸福，无法满足他，她的所有自恋就会转化成对自我的厌恶感，转化成羞辱和怨恨，从而驱使她对自我实施惩罚。在感觉有些漫长的危机时期，甚至贯穿她的一生，她会情愿成为受害者，会发疯般地折磨自我，那无法使情人完全满意的自我。此时的她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受虐狂。

然而，混淆恋爱中的女人为了报复自己而折磨自我，和其目标在肯定她的男人的自由和权力两种情形是大错特错的。人们将妓女以挨她的男人的耳光为荣当成真理来谈论，然而令她得意的并非是她想挨打和做奴隶的这种想法，而是因为她所依赖的男人拥有的权威和力量，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她也喜欢他对别的男性施虐。她时常引诱他去打架，她希望自己的主人能够展示他所拥有的


西蒙·波伏娃/

为社会所公认的价值。

女人最大的幸福是她的情人视她为他本人的一部分，在他说“我们”的时候，她就觉得她被他所认同，和他联系在一起，共同分享他的权威，一起统治别的世界，她永远不会厌倦重复这个使人高兴的“我们”。当对于一个恋爱中的女人必须拥有的人，一个在世界上昂首向前、追求超越并以某种形式将世界带给她的人不可或缺之时，她用她的臣服得到了心满意足的回报——绝对。这种确信带来无法言喻的快乐，她升入了天堂。此时她就算处于次要的位置也不要紧，只要在令人惊叹的有秩序的世界中始终有她的位置就足够了。只要她在爱着，并且被爱着，成为她的情人所必须的，她就感到自己生存的正当性得以证实：她领悟了平静和幸福的含义。



瓦品松的浴女

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安·安格尔 1780-1867年 法国 *这一幅具有东方情调的裸女像，因为瓦品松收藏，故得此名称。*

热情似火的女人经受的痛苦之一是她的慷慨一下子成了危机。因为对他表示认同，她也要对方付出报酬，她必须占有那个俘获她的人，她将自己完全奉献给他，他必须有资格接受这种礼物。她将每一分钟都献给了他，他也同样要每一秒钟都陪伴着她，她期望只为他而活——但她渴望生存，所以他必须尽心竭力地让她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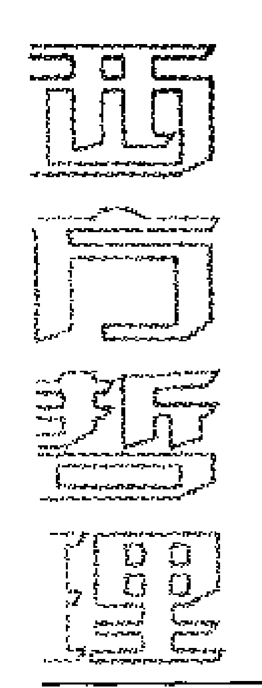
女人的爱情是把自己的所有权利全都放弃，所以它

会要求男人也有同样的情感，那同样有放弃权利的欲望就不足为奇了。女人渴望被占有——所以她要某个人来占有她，这个人并没有将自己奉献出去，也没有放纵自己，恰恰相反，他希望用爱情来丰富他的自我，——女人是奉献自己，男人则以占有她来充实自己。

女人起码能够从她为情人带来的充实中获得她自己的快乐，确实，她并不是他的一切，但她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需要中没有什么程度多少的问题。要是他“没有她就活不下去”，她就会相信自己是他宝贵的生命的基础，由此证实了她的价值。她的快乐就是为他服务，前提是他必须欣悦地承认这种服务，根据奉献的一般辩证法，奉送成为一种义务。头脑清醒的女人必定会扪心自问：他是真的需要我吗？男人在爱着她、渴求她的时候，带着个人的柔情和欲望，可是他对于那些与她旗鼓相当的其他人不也同样产生一种个人情感吗？很多恋爱中的女人宁愿被欺骗，她们故意无视包含在特殊中的道理，男人则因为一开始也产生过这种幻觉，因此加深了这种幻觉。他的欲望如同烈火，仿佛藐视时间，在想拥有这个女人时，他非常渴望她，并且只想拥有她。那一刻无疑是绝对的——然而这种绝对是短暂的。不明白这一点，女人就会被欺骗，而且将永远受到欺骗。由于将主人的拥抱视为神圣，她一直相信自己的神圣，是注定要为神服务的——并且除她之外谁都不行。男性的欲望不但强烈并且不会持续很久，一旦获得释放很快就会消退。然而通常是女人在此之后会为爱情神魂颠倒。这就成了一切通俗文学和很多民谣的主要话题。“小伙子从她身旁经过，姑娘就歌唱……小伙子在歌唱，姑娘在忧伤。”


西蒙·波伏娃/著

即使男人对一个女人长久依恋，也不能说她对于他就不可或缺。可是她要得到的恰恰是这个，她的牺牲惟有在恢复她的天地时才会拯救她，相互性不可逃避。所以她只



有痛苦，或者自我欺骗。她常常紧握住虚伪的稻草。她坚信男人的爱就是她所赋予他的爱的复制品，她虚伪地将欲望视为爱情，再将勃起当做欲望，将爱情当做宗教。

她逼着男人对她撒谎：“你爱我吗？像过去一样爱我？你是否永远爱我？”她狡黠地在某个时刻提出问题，特别是在环境不允许作出回答的时候。在做爱的拥抱中，在接近病愈的时候，在哭泣的时刻，在铁路的月台上，她

的提问咄咄逼人。她将强行获得的答案作为她的战利品。沉默意味着她有所要求，所有处于恋爱中的女人多多少少都有偏执狂的倾向。一个朋友在谈及她在远方的情人长久不给她来信时说道：“当一个人要断绝关系的时候，他就应该写信宣布决裂。”；后来她又在收到一封意思明白无误的来信之后又说：“要是一个人真想断绝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应该写信。”

一个谨慎的通奸的女人（不过这两个词相互矛盾），会试图将情人的热情转化成为爱、友谊和习惯，或者企图以强有力的纽带——孩子或者婚姻，将他们绑在一起。许多私通的人都被这种想要结婚的念头所困扰，这是一种寻求安全的欲望。聪明的情妇会在青春时就用爱情保护她的未来。不过在她进行这种投机活动时，她就不该再冠以“私通的女人”的头衔。因为私通的女人发疯地想永远拥有情人，却不想毁掉它。而这导致了为何除了寥寥无几的以自愿结合延续一生的情况之外，爱情的宗教发生突变的原因。

真正的爱情应建立在两个自由的人互相承认的根基之上，情人们会觉得自己既是自我又是他者：既不会失去超越，也不会变得残缺，他们将一道在世界上证明自己的价

值和目标。对双方来说，爱情都能在奉献自我的同时揭示出自我，都会使这个世界变得丰富。乔治·古斯塔夫在他探讨认识自我的一本书中，极为准确地总结了男人对爱情的要求：爱情使我们远离自己，从而向我们揭示了自己。通过那些在我们之外并充实了我们的事物，我们肯定了自己……爱情作为一种感受的方式，甚至在我们已生活其中的环境之内，它向我们揭示了新的天地。这中间包含着一个重要的秘密：世界是不一样的，自我是不一样的。

男人们竟相宣称爱情是女人能取得的最高成就。尼采称："如果女人作为女人去爱，就会更加女性化"。巴尔扎克认为："最佳的生活对男人来说是名份，对女人来说是爱情。只有在女人将她的生活变成一种无止境的奉献，如同男人的生活是不断的行动一般，她和男人才能取得平等。"然而这其中还是有骗局存在，因为对她所奉献的东西，男人根本不着急接收。男人并不想要他要求的无条件的奉献，也不需要使他的虚荣心得到满足的盲目崇拜的爱情，他在不用满足于这些形态的爱情所隐含的相互要求的前提下，才会接受它们。他告诫女人说，她应该奉献——但她的奉献又让他烦恼，她因为奉献不被接受，因为她的生活空虚而身陷窘迫之中。未来有一天女人很有可能不再用她的弱点去爱，而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去爱；她不再逃避自我，而是发掘自我；她不再贬低自我，而是展现自我——到了那时候，爱情无论对男女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致命的危险的源泉，而是成为生命之源。在那一天到来之前，爱情是最为动人的陷阱，它沉重地压在所禁锢的女人的肩上，不健全的女人对此无能为力。不计其数的爱情的殉道者都证明了，将不公平的命运当做最后的救赎换来的却是荒凉的地狱。


西蒙·波伏娃



第七部 解放之路